

蘇富比 超級拍賣師

在訃聞尋找商機、從八卦掌握客戶，

一窺千萬美元一槌入袋的藝術品拍賣場



The Auctioneer

西蒙·德·普里 Simon de Pury、威廉·斯德蒂姆 William Stadiem —— 著
張穎綺 —— 譯

他是第一個在蘇聯鐵幕舉辦拍賣會的拍賣師、
第一個將平價大眾商品帶進拍賣會的拍賣師、
第一個站著拍賣的拍賣師、第一個橫跨歐美亞洲的拍賣師……
英國BBC稱他為藝術拍賣界的「米克·傑格」，
曾是蘇富比拍賣行歐洲區主席的超級拍賣師西蒙·德·普里，
藉由親身的第一手經歷，引領大家踏進高深莫測的藝術拍賣世界。



蘇富比 超級拍賣師

在計聞尋找商機、從八卦掌握客戶，
一窺千萬美元一槌入袋的藝術品拍賣場

The Auctioneer

西蒙·德·普里 Simon de Pury、威廉·斯德蒂姆 William Stadiem —— 著
張穎綺 —— 譯

他是第一個在蘇聯鐵幕舉辦拍賣會的拍賣師、
第一個將平價大眾商品帶進拍賣會的拍賣師、
第一個站著拍賣的拍賣師、第一個橫跨歐美亞洲的拍賣師……
英國BBC稱他為藝術拍賣界的「米克·傑格」，
曾是蘇富比拍賣行歐洲區主席的超級拍賣師西蒙·德·普里，
藉由親身的第一手經歷，引領大家踏進高深莫測的藝術拍賣世界。



1. 家人珍珠照。我請尤根爾·泰勒為菲利普斯的一場珠寶拍賣會目錄拍出更活潑有趣的照片，於是他讓自己的稚子戴上珠寶，拍出這幀照片。



2. 戴睡帽的一家三口。我們的女兒黛安娜·德芬於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生，一位瑞士銀行家朋友送上這幾套十九世紀風格睡袍和睡帽做為賀禮。



3. 陣陣微風都輕喚著路易絲。（取自法國演員暨歌手，莫里斯·雪佛萊〔Maurice Chevalier, 1888-1972〕一九二九年名曲《路易絲》〔Louise〕的歌詞。）我與路易絲·布盧安·麥克貝恩合影，攝於巴黎歐吉雅（Ojeh）家族宅邸。當晚為一場菲利普斯、德·普里與盧森堡拍賣會的預展。



4. **小小愛因斯坦**。我、妻子米凱拉與女兒黛安娜·德芬前往德國當代藝術家阿爾伯特·厄倫（Albert Oehlen）的工作室參觀，厄倫為我們拍下這張合影，我們的女兒像愛因斯坦一樣，對著鏡頭吐舌頭。



5. **「低調」**。拍攝於我在日內瓦蘇富比的地下室辦公室。這幀照片是為《日內瓦論壇報》的專文介紹所拍攝；也是我首度獲得報章媒體的採訪報導。



6. 男爵伉儷。漢斯·海因里希·提森—博內米薩男爵與其夫人蒂妲。夫人戴著高達一百克拉的鑽石項鍊，她曾對我開玩笑說：「得有夠粗壯的脖子才戴得住！」



7. 父與子。漢斯·海因里希與其長子格奧爾格·海因里希。人稱他們為海里和小海里。



8. 和赫克特一起的全家福。（赫克特〔Hector Malot, 1830-1907〕為法國作家，著名作品為《小英的故事》〔En famille〕）。從左到右為我、查爾斯、赫克特、阿爾班、巴塔薩、伊莎貝爾和洛伊絲。攝於日內瓦附近的科爾西耶（Corsier）。



9. 大人物。攝於一九八四年倫敦提森男爵現代畫收藏品展的開幕式。展覽於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舉行。我與提森男爵、該院院長休·卡森爵士（Sir Hugh Casson, 1910-1999）以及策展人諾曼·羅森塔爾（Norman

Rosenthal，他後來才獲封為爵士）同臺。我們身後為畢卡索和艾德華·霍普的畫作。



10. 大理石隊長。我與傑夫·昆斯合影，中間為他的大理石自塑像。攝於二〇〇八年五月菲利普斯拍賣會的預展。



11. 幕後貴人。我想方設法進入蘇富比工作那段時期，巴塞爾銀行家理察·德雷福斯的遺孀烏拉（Ulla Dreyfus）不遺餘力地協助我。圖中為她與提森男爵的兒子羅恩。



12. 派對生活。兩位特異獨行的貴族女子：弗蘭西絲卡·提森—博內米薩女男爵（現為馮·哈布斯堡大公夫人），以及葛洛莉亞·圖恩塔克西斯公主（她當時有「龐克公主」之稱）。



13. 茱蒂與大弗。阿弗烈·陶博曼與其夫人茱蒂，攝於法沃利塔別墅。當晚我們為提森男爵美國大師收藏品展覽的揭幕，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美國西部鄉村主題派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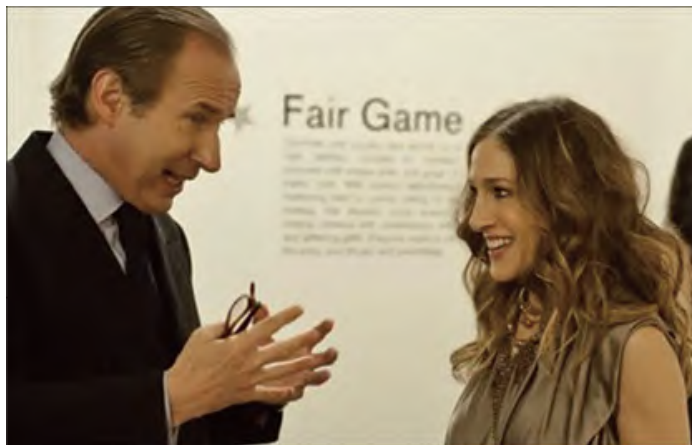
14. **匈牙利狂想曲**。提森男爵最愛的吉普賽樂隊團長「舒茲醫師」與女兒弗蘭西絲卡。



15. **俄羅斯轉盤**。一九八八年蘇富比於莫斯科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拍賣會。照片中，我正在拍賣臺上大展身手，我身旁是當時的蘇富比歐洲區主席高里勛爵，他曾任柴契爾夫人屬下內閣的文化部長。照片最左側為蘇富比蘇聯負責人彼得·巴金。



16. 魚與熊掌可以兼得。海里與蒂坦正在共切婚禮蛋糕；攝於一九八五年戴萊斯福特。



17. 慾望城市。攝於精采電視臺《藝術新秀生死鬥》攝影棚。照片中，我與主要製作人莎拉·潔西卡·帕克正在交換意見，我顯然為她的魅力傾倒。



18. 自然生態保育。攝於二〇一五年夏季聖托佩。我與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正在為他的環境保護基金會進行慈善拍賣。經過四小時的競拍（期間我換了四次襯衫），我們共募得四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二億）善款。



19. 水星威力。與水星集團（俄羅斯最大奢侈品零售集團）創辦人之一，李歐尼德·弗里德蘭合影。我們身在康乃狄克州、彼得·布蘭特所有的一座環境優美的馬球場。



20. 嚴酷實境秀。攝於精采電視臺《藝術新秀生死鬥》攝影棚。由左至右分別為珍妮·格林柏格·羅哈廷、我、周佳納、威廉·鮑爾斯及傑瑞·索爾茲。



21. 坐擁佳人。艾里克·費謝爾以我與安·朵為模特兒，所繪成的那幅畫作。她坐在我的大腿上。



22 換床婚宴。我與米凱拉於二〇一〇年共結連理，查爾斯·沙奇慷慨出借他的畫廊做為我們的婚禮宴會場地。賓客入座時赫然發現眼前是六十九張床單散亂、擺放了食物的床鋪。此一點子是借用自珍妮佛·盧貝爾（Jennifer Rubell，美國概念藝術家）向崔西·艾敏（Tracey Emin，英國當代藝術家）致敬的一個裝置藝術作品。賓客們遊走在床鋪之間取用食物。



23. 問候卡。我與丹妮拉、奧立佛·貝格魯恩（Olivier Berggruen，海因茨的兒子，藝術史學家暨館長）及大衛·布勞耶·威爾（David Breuer-Weil，英國藝術家）。攝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掌鏡人為蒂娜·巴尼（Tina Barney，美國攝影大師）。我們用這張照片來製作德·普里與盧森堡畫廊一九八九年的季節問候卡。



24. 創始之父。前蘇富比總裁彼得·威爾森的開創性視野，引領藝術品交易市場走向今日的樣貌。



25. 完美典範。一九六二年的費歐娜·提森—博內米薩。她如今已年過八十，卻仍然是我認識的女人當中，迷人又典雅出眾的一位。



26. 藝術人。多虧了德魯奧拍賣中心（相當於法國的蘇富比和佳士得）的首席拍賣官摩里斯·杭斯，巴黎當年和倫敦、紐約同為全球的藝術拍賣重鎮。



27. 法國先生。路易威登集團深富遠見的持有人暨總裁，貝爾納·阿爾諾。由於他的主動邀請，我和丹妮拉於二〇〇一年初將旗下的畫廊與菲利普斯拍賣行合併。



28. 末代女沙皇。從史達林掌權到蘇聯解體，再到普丁上臺，無論時局如何變化，鐵娘子伊蓮娜·安東諾娃始終穩坐普希金美術館館長的職位。



29. 藝術贊助人。與深愛藝術的佳士得老闆弗朗索瓦·皮諾合影。我們身後為周英華的畫作。

獻給我的孩子：阿爾班、查爾斯、洛伊絲、巴塔薩、黛安娜·德
芬

謝詞

我能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很短，因此至今讀過的書寥寥可數。其中一本為摩里斯·杭斯（Maurice Rheims）一九七五年所著的《罕見珍品》（*Haute Curiosité*）。這位迷戀藝術的法國拍賣師所寫的傳記，為當時還年輕的我帶來巨大衝擊。我當即下定決心：「這是我想要過的生活！」說來幸運，我至今的人生過得精采，尚未知曉一成不變是什麼滋味，不曾有過無聊的時候，有時甚至會覺得日子過得稍嫌刺激了。藝術家珍妮·霍爾澤（Jenny Holzer）¹一件作品的標語文字說得甚是：「請保護我遠離欲望！」打從老早以前，杭斯自傳就左右影響著我的人生，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著書立傳。

老友史丹利·巴克塔爾（Stanley Buchthal）²不斷鼓勵我寫書。也是他建議《The Auctioneer》（直譯：拍賣大師）這個書名。我特別感謝他的敦促，並能在關鍵時刻推我一把，讓我終將想法落實為行動。

有無耐性讀一本書是一回事，但有無揮筆成文的本事又是另一回事。有人替我引介一位可愛的「幽靈寫手」。我和她開過兩次會以後，她寄來試寫的一個章節；明明讀著自己的故事，我卻覺得乏味透頂。不久後，純粹出於偶然，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時任洛杉磯當代藝術館館長）介紹我認識比爾·斯德蒂姆（Bill Stadiem）。比爾是位卓然有成的作家和編劇，之所以和杰弗里開始往來是為了幫他寫自傳，然而杰弗里當時有其他要事在身，沒法展開如此虛榮的書寫計畫。我要感謝杰弗里居中牽線。

此後開始了倫敦和洛杉磯兩地之間冗長的Skype會議，我感覺自己就像面對一位心理醫師，比爾跟我聊許多許多話，更不時提出尖銳問題。我身為瑞士人的謹慎天性和寫書這件事簡直背道而馳。比爾總是不斷追問我：「告訴我名字，告訴我名字！」

等到終於看見那些談話內容化為文字故事，我認得當中幾則確實出自我口中，但辨識不出我的「聲音」。我隨即明白這其實是莫大優點，眼見比爾將我一些近似「印象畫派筆觸」的言語轉變為非常詳盡、精準的描述，我實在佩服不已。讀著他的文字，我不再覺得自己的故事無聊。我最為感謝的人是比爾，我要謝謝他的協力配合和無比耐心。

驅使我做這一切背後的真正動力，是我對藝術的愛，對藝術的好奇，對藝術的熱情。能夠在這個領域工作，我覺得很幸運。你要是喜歡糖果，就沒有比糖果店更好的工作地點了。

然而到頭來，一個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比不上家人無條件的愛。米凱拉，我的妻子，事業夥伴，么女的母親，我要對她全心的支持致上無限的感謝。我四個已成年孩子的母親，我的前妻伊莎貝爾，我也非常感謝她的全力支持，除了史丹利以外，她是唯一讀過本書初稿的人。

我幾乎日日都有精采絕倫的經歷，本書的內容僅僅是其中片縷。藝術界的許多關鍵角色，以及我親近的收藏家朋友，他們的名字都不在本書裡，他們或許會大鬆一口氣吧。

我要感謝兩位彌足珍貴的同事哈莫妮·杭布里—史密斯（Harmony Hambly-Smith）和馬克·福寇（Mark Ferkul）在成書每一個階段所提供的協助。

我還要謝謝出版經紀人丹·史卓內（Dan Strone）為本書覓得最佳的合作夥伴聖馬汀出版社（St. Martin's）。

最後，我要向出色的編輯珍妮佛·韋斯（Jennifer Weis），以及西爾萬·奎格莫（Sylvan Creekmore）、莎莉·理查森（Sally Richardson）和聖馬汀出版社團隊致上十二萬分謝意。

1 美國藝術家。以街頭廣告或是LED燈看板創作著稱。

2 美國電影製片。曾透過瑪麗蓮·夢露的遺產執行人獲得其手稿，並與Bernard Comment共同編輯出版了《Fragments: Poems, Intimate Notes, Letters》一書（簡體版譯為《瑪麗蓮·夢露私密手稿》）。

第一章 我的裸體畫像

要是有人迫切需要一個新歡，那就是我。在職業生涯方面，我當初欲扭轉拍賣業蘇富比（Sotheby's）、佳士得（Christie's）雙巨頭壟斷，擠身其中、開創三雄鼎立新局的計畫，斷送在九一一的可怕煙塵裡。說真的，沒有比法國精品業巨頭貝爾納·阿爾諾（Bernard Arnault）口袋更深的財務後盾了，而丹妮拉·盧森堡（Daniella Luxembourg），我過去在蘇富比的同事，與我共掌拍賣行的合夥人，也沒有比她更優秀的事業夥伴了。然而很遺憾的是，不論是真實世界，或是通常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界，都在二〇〇一年秋天因蓋達組織（al-Qaida）興風作浪所引發的國際金融恐慌而失去信心，就連對地緣政治冷漠的財力雄厚收藏家也無法倖免。結果阿爾諾撤資，丹妮拉也求去。所有人都說這艘船沉得比鐵達尼號還快，但我這樣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仍然相信它得以歸返正途，光榮地航向落日餘暉。我這個船長啊，面對的卻是何等景況！藝術圈內人目睹我那場失敗的拍賣會，每個人在歸途上見到我都紛紛橫越馬路到對街走避。對他們而言，我已走上死亡之路，不管這條路是紐約麥迪遜大道、倫敦龐德街，或在東京銀座，他們都不想與我同行。

愛情方面，也同樣多災多難。我和妻子伊莎貝爾已分道揚鑣。在多年婚姻生活中，伊莎貝爾始終是我眼中最聰明出色的女人。接下來，我與女企業家路易絲·布盧安·麥克貝恩（Louise Blouin MacBain）交往，她的商業天賦讓我深為折服。她的權力、她的成功，以及猶如瑪麗王后（Marie Antoinette）般光彩奪目的生活方式，都讓我沉迷得無法自拔。肯定是她金閃閃的光環更加刺激我想挑戰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巨頭的野心。但是，那段戀情就如化為火球的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已經灰飛煙滅，我這艘船再度於大海中載波獨行。我向來能在藝術裡發現靈感，藝術也是我的慰藉。這次的低潮期，我在一位藝術家那裡找到避風港。

安·朵（Anh Duong）可說是藝術圈裡極有吸引力的女性之一，是男人可用來炫耀的那種漂亮矜貴「獎盃女」。我之所以會愛上她，可能是因為我一向會被不可一世的人，就好比像貝爾納·阿爾諾和路易絲·布盧安·麥克貝恩那樣的人吸引。他們就像以歌聲誘惑奧德賽、差點使他蒙受災難的海妖賽蓮，讓我無法抗拒。那則古希臘神話真是我的最佳寫照。不幸的是，此艘名為菲利普斯（Phillips de Pury）³、眾人皆認定正在下沉的船隻，船上已經空無一人，因此沒有夥伴能把我綁在桅杆上，阻止我臣服於世上最致命的吸引力。請原諒我就是會被尊貴不凡人物吸引，但這個傾向其來有自。我很幸運，有一個很棒的前妻，四個很棒的孩子，以及很棒的履歷。我做過藝術界的兩份高薪工作，先是為全球藝術收藏最豐的私人藏家提森—博內米薩男爵（Thyssen-Bornemisza）⁴擔任策展人（只有英國女王的收藏質量可與他相媲美），然後又成為拍賣巨頭蘇富比的歐洲區主席。我不由得好高騖遠；這是一種職業災害。而現在，我可是自食其果。

所幸安·朵雖有絕倫的美貌和驚人才華，卻不是蛇蠍美人。安是名符其實的異國人，有一半西班牙血統，一半越南血統，出生於波爾多，曾就讀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建築系。但她改行成為芭蕾舞者，然後是頂尖模特兒，不時登上《時尚》雜誌（Vogue）封面，也為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和克利斯蒂昂·拉夸（Christian Lacroix）⁵走秀。她最終偷走朱利安·許納貝（Julian Schnabel）⁶的心，介入他與服裝設計師賈桂琳·保蘭（Jacqueline Beaurang）的婚姻。而現在，她正要偷我的心，但我已經沒有可離棄的東西，有的只有震驚、孤獨和疲勞，因為奮力拯救菲利普斯這艘大船免於沉沒，我已筋疲力盡。

安最吸引我的一點，絕非是她頂級模特兒的身分，而是由於她是耐人尋味的藝術家。一開始是許納貝鼓勵她創作；他在破碎陶瓷盤子上畫巨幅油畫而建立名聲。許多人認為許納貝是當代在世藝術家中數一數二的自大狂。他曾大言不慚地表示自己是下一個畢卡索，這就好比卡修斯·克萊（Cassius Clay）⁷自誇是繼喬·路易斯（Joe Louis）⁸之後最偉大的拳擊手。如此自負的人居然允許安成為一名藝術家，想

必意味著她具備特殊天分。許納貝為她買了畫架、畫筆和油彩，她就塗塗畫畫起來。她最終發展出個人風格，令人聯想到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⁹。她的招牌作是自畫像，通常為裸體或著透明內衣。

後來許納貝與安分手，娶了第二任妻子：西班牙女演員歐拉茲（Olatz）。安住在西十二街的工作室，距菲利普斯新辦公室所在的第十五街不遠。當時因屢次拍賣會皆一敗塗地，我不得不決定將拍賣行搬離第五十七街的摩天大樓，匆匆找了這個新租處。很久以後，曼哈頓昔日的肉品加工區（Meatpacking District）¹⁰變成引領風騷的新蘇活區，我樂於認為是我在該地播下區域「高檔化」（gentrification）的種子。我是在帕斯蒂餐館吃晚餐時結識安，後來又在附近的小餐館與她不期而遇，我坐到她桌子對面，還隨口邀她幫我畫像。她同樣隨口答應。我是在重現老派的把妞伎倆嗎？那種邀心儀對象來自己家裡看版畫之類的招數？我不認為如此。我當時甚至沒想過要跟她談戀愛，就算有，大概也只是潛意識裡的念頭。

安當時已是頗有名氣的肖像畫家。她不久前才替當今頂尖藏家阿比·羅森（Aby Rosen）¹¹繪製畫像；該位從法蘭克福遷居到紐約的全球房地產大亨，最終買下利華大廈（Lever House）和海冠大廈（Seagram Building）這兩棟紐約數一數二的指標性建築。安畫完了穿著四角褲的阿比，接著替模特兒凱倫·艾爾森（Karen Elson）畫像，而這位以蒼白肌膚和火紅頭髮為招牌的女模則是什麼也沒穿。我真不知道她會為我預備哪一種驚喜。

凡是肖像作品，被畫者每次花在畫室裡擺姿勢的時間往往漫長，和作畫者之間的氣氛也親密無間。我記得提森男爵委託盧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¹²替他畫肖像時，總計坐了超過一百五十小時，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耗時十五個月才告完成。

我對於這幅肖像該怎麼畫毫無概念，只要花的時間不像弗洛伊德替提森男爵畫像那樣漫長，以及不要裸體就行了。我要求穿我的正字標記：一套卡拉契尼（Caraceni）¹³雙排扣西裝入畫。我受到前任老

閻提森男爵的影響，迷戀上這家訂製西裝，他只穿卡拉契尼，因此送我專程飛到米蘭，讓我訂做生平的第一套卡拉契尼西裝，量身加試穿，我前前後後飛了數趟。從此以後，我便欲罷不能。卡拉契尼是皇家御用裁縫師，也是裁縫界之王，義大利與希臘仍是君主制的年代裡，他替一國之尊製作西裝，此外，吉亞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14](#)、卡萊·葛倫（Cary Grant）[15](#)、賈利·古柏（Gary Cooper）[16](#)，甚至服裝設計師聖羅蘭和范倫鐵諾（Valentino）也都是他的客戶。能與這些顯赫人士並列，成為卡拉契尼令人目眩的客戶名單的一份子，我再高興不過了，這是我能留名青史的最好方式。為了匹配這身深藍色西裝，我穿戴上招牌的深藍色領帶和白襯衫，並帶上我的另一項正字標記：從龐德街上的斯邁森（Smythson）[17](#)購入的紅色真皮日記本。拍賣師一向有迷信習慣，我的一項迷信儀式是在每場拍賣會開拍前吃一顆蘋果；另外則是隨身攜帶紅色的東西。安理解也非常包容我的這些小癖好。

到了我擺姿勢讓她作畫的時候，安最吸引我的是她炯炯有神的漂亮眼睛，她銳利的目光。這雙眼睛看得我窘迫難安，恰恰營造出藝術作品最需要的張力。另一個發現也引起我的興趣，就是她的音樂品味與我如出一轍。安作畫時必須聽音樂，她的選擇宛如大雜燴，從歌劇、古典樂、搖滾樂、流行樂、法國香頌到電影原聲帶，完完全全不拘一格。每一首曲子都觸動我的心弦。我從小沉迷的事物有三種，分別是藝術、音樂和足球。僅就其中兩樣來看，安已經盡善盡美。端坐在那裡讓她作畫的過程裡，我和她就這樣看對了眼。安後來送我一座她自己的雕像，我則是向她買下名模艾爾森的肖像。儘管是正面全裸的一幅畫，安沒有顯現絲毫的妒意。我買的是藝術品，與性毫無關係。這就是安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作風，紐約雀兒喜區[18](#)版本的。然而，藝術是那樣性感，非常的性感，最後，我們之間產生了情愫。

我一直相當欽仰的藝術家艾里克·費謝爾（Eric Fischl）接著登場。在我看來，他是美國藝術偉大寫實主義傳統的延續，溫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19](#)與艾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20](#)精神的

繼承人。在一九八〇年代，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家比艾里克更了不起。他躋升到與許納貝、羅斯·布雷肯那（Ross Bleckner）[21](#)同等的大師地位。這三位猶如札格納特（juggernaut）[22](#)般令人敬畏的大人物，被稱為「布恩男孩」（Boone Boys），因為他們皆是由當年的蘇活藝術天神瑪麗·布恩（Mary Boone）所發掘和代理。稱她是現代商界的埃及豔后也不為過，畢竟她恰恰也具有埃及血統。我掌管日內瓦蘇富比那時期曾舉辦一系列藝術講座，邀請過當時最紅的艾里克擔任嘉賓。傑夫·昆斯（Jeff Koons）[23](#)、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24](#)和菲利普·史塔克（Philippe Starck）[25](#)也在我的邀請名單之列，足證我已感知當代藝術會平地一生雷地崛起，成為藝術市場下一個大潮流。

但由於藝術市場變幻莫測，艾里克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成就已是他的巔峰，瑪麗·布恩也未曾再創高峰。艾里克被視為美國郊區的竇加（Degas）而聞名，他總是畫「逾越造反」（transgressive）的主題，例如：他畫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盯著床上赤裸熟睡的母親，一邊偷她的錢包（〈壞孩子〉〔Bad Boy〕，或是，另一個自我站在後院的游泳池裡自慰（〈夢遊〉〔Sleepwalker〕）。艾里克絕不苦情，但是假裝藝術界不存在好萊塢圈子那種幸災樂禍的人，無疑是戴著玫瑰色的眼鏡看世界。他的作品行情如今只有六位數，而不是以前慣有的七位數，或是如另兩位布恩男孩，作品成交價總能攀上八位數。但是，沒有人覺得這是什麼慘事。事實上，以我的角度，這是天大的好機會。藝術經紀商就愛畫價被低估的藝術家，更何況在一九八〇年代根本買不起艾里克的畫作，因此我發誓一定要在新千禧年以超划算價格購入他的作品。

二〇〇二年，我在布恩畫廊的一場展覽，看上了一幅費謝爾的作品，我非要將它納入囊中不可，就如同我一定要買安的那幅艾爾森肖像一樣，就如同我最終一定要把畫家安本人追到手一樣。該件作品名為〈客廳，場景2〉（*Living Room, Scene 2*），繪製於德國克雷費爾德（Krefeld），由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26](#)操刀設計、現為美術館的一幢別墅。艾里克為了作畫，將它

還原為住家，並雇用演員當模特兒演出德國郊區家庭的日常生活（一如他重現在亞利桑那州童年時光的那些畫作）。〈客廳，場景2〉描繪一對衣著鮮麗的富裕夫婦與他們最自豪的財產：一幅傑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27](#)、一幅安迪·沃荷（Andy Warhol），以及布魯斯·諾曼（Bruce Nauman）[28](#)的霓虹燈管裝置。我身為藏家，特別是作為藝術經紀商，對這樣一幅畫特別有共鳴。於是我去找瑪麗，和她握手成交。

可嘆的是，我們的握手約定轉眼成空。不久後，瑪麗來電表明要取消交易。名聲鵲起的西雅圖美術館也出了價，她希望把那幅畫賣給館方。來自西雅圖、微軟公司的保羅·艾倫（Paul Allen）[29](#)先生，對那片高科技淨土上的藝術紮根發展卓有貢獻，而瑪麗喜歡把別人要的東西送到跟前。瑪麗在她如日中天的年代所代理的眾多藝壇巨星裡，只有艾里克和布雷肯那仍然忠誠不二。許納貝已經捨她而去，大衛·薩利（David Salle）[30](#)、喬治·巴塞利茲（Georg Baselitz）[31](#)、芭芭拉·克魯格（Barbara Kruger）[32](#)、布萊斯·馬登（Brice Marden）[33](#)也一樣。至於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34](#)，很遺憾，他已不在人世。

我當下勃然大怒，拒絕接受瑪麗的毀約行為。門都沒有，我怒不可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絕不容許她出爾反爾。不過，瑪麗不屈不撓，她的纏功在這世上無人能出其右，就跟我非常想要那幅費謝爾一樣，她也執意要完成和西雅圖美術館的交易。她想出了一個折衷方法：只要我放棄〈客廳〉，她就親自情商艾里克為我畫幅肖像。這是絕無僅有的機會，瑪麗鼓足三寸不爛之舌試圖說服我，艾里克只為密友畫肖像，比如史提夫·馬丁（Steve Martin）[35](#)。

算了吧，我對她說。我已經有自己的肖像，安正在替我畫一幅。我需要那麼多幅肖像嗎？我誰啊？路易十四嗎？鑑於我當時的事業低潮，我當然不是大人物。瑪麗的糾纏不休倒是讓我自覺像洛尼·丹吉菲爾德（Rodney Dangerfield），我很想脫口大喊這位偉大喜劇演員的口頭禪：「沒有人尊重我。」再說，就算是出自艾里克·費謝爾之

手，有誰會想買我的單人畫像？跟真正的費謝爾作品相比，該是多麼無聊的一幅畫，畢竟他的註冊商標是雙人畫，兩個人物之間總是充滿劍拔弩張的氣氛。以我看法，艾里克創造畫面張力的本事，足可和盧西安·弗洛伊德媲美。不賣我〈客廳〉，我毋寧死，跟瑪麗說完這句話後，我悍然掛上電話。

後來我改變了主意，我倒不是懷抱高尚情操，心想就讓瑪麗如願以償好了，畢竟我們都經歷過人生浮沉、興衰榮辱，就放她一馬吧。不，我才不是出於無私、高尚的動機，而是看到了一個絕佳機會，不僅能幫瑪麗一個大忙，也對自己有利。也就是說，我打算把這幅肖像變成一幅真正的費謝爾作品，而不僅僅是一幅頌揚自己的畫。我靈機一動的想法是，為了獲得他著名的畫面張力，我要在這幅肖像裡加入另外一個人，也就是安。裸體的安。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安是我所認識的人裡相當波西米亞、相當自由不羈的一位。她不假裝端莊，不假裝正經。她跟瑞士人截然不同，跟我從小生活圈裡圍繞的那些衛道人士大異其趣。

由於安畫過那麼多的裸體自畫像，我甚至沒先問過她的意見，就直接跟瑪麗說出我的構想。瑪麗很喜歡我的點子。我接著打電話給艾里克，他也贊同。接下來，才輪到跟安說明，她說好。一切就緒。安曾讓其他藝術家畫過裸體畫像，例如：彼得·麥高（Peter McGough）；他從一九八〇年代即與許納貝交遊密切，曾創作銀版攝影風格的〈安朵，一九一七年〉（*Anh Duong, 1917*），安在他的畫筆之下，成了爵士時代的海報女郎。再者，費謝爾和安是好朋友，她喜歡他的作品。

一個夏日週末，我們前往蒙托克（Montauk）赴這場裸體畫之約。艾里克與妻子—備受讚譽的風景畫家艾波·格尼可（April Gornik）住在薩格港（Sag Harbor）。他逃離蘇活區，逃離一九八〇年代一夕致富藝術家慣有的藥物癮，投向長島東端相對純樸的鄉村生活（早在基金經理人也絡繹不絕移居至此以前）。艾里克絕不是那種孱弱的藝術家。他喜歡運動，曾用畫作跟他的朋友約翰·馬克安諾

（John McEnroe）[36](#)交換網球課。他早年還曾在芝加哥一家博物館當保全。

跟寫生創作的安不同，艾里克只靠照片和記憶作畫。他的工作鐵則就是，客戶對肖像沒有置喙餘地，而且在畫作完成前，客戶甚至不能看。我料想艾里克會給予非常明確的指示，要我們配合他的構想。結果根本沒有，他什麼也沒說。「你們想怎麼做？」他問。安和我都毫無頭緒。她已經脫了衣服，全身赤裸，茫然地站著，而我穿著卡拉契尼西裝，也茫然地站在那裡。接著，艾里克終於打破僵局，接連不斷地按下快門，活脫像電影《春光乍現》（*Blow-up*）[37](#)裡大衛·漢明斯（David Hemmings）的那個角色，但是不像漢明斯會給薇露西卡（Veruschka）下指示。不知怎的，我注意到工作室的木地板上放了一張搖椅。我走過去，坐到椅子上，然後安出於本能，走過來坐在我腿上。艾里克爬上一把梯子，從上頭往下俯拍我們。「天啊，我簡直就像漢姆特·紐頓（Helmut Newton）[38](#)。」艾里克興奮地大嚷。在那一刻，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這個特別的拍攝角度；這個由上而下的俯拍，將成為肖像的畫面。

整個拍攝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安穿回衣服。隨後，我們跟艾里克和艾波正經八百地喝茶，再開車回蒙托克，在那裡的朋友家過夜。我與安交往了十個月。我們的戀情在該幅畫作交貨前即畫下句點。我早就提醒過安，我們的關係可能不會天長地久，但安毫不後悔，她是為藝術而同意入畫，這就是她的態度。總算看到畫作時，我很高興。它不是肖像畫，而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費謝爾作品。整幅畫簡直像嘶喊似的，展現出巨大的心理張力，讓我不禁納悶，我是否曾意識到自己與安的關係是多麼脆弱。我看起來如此孤獨，儘管安風情萬種、赤裸裸坐在我大腿上，我們之間卻完全缺乏情感連結。這件作品證明了像艾里克這樣敏銳的藝術家能夠看到表象以下潛藏的一切。

我雖然擁有這幅畫作，但從來沒有拿出來給任何人看過。我擔心朋友們會將它當成佐證，指稱我有中年危機，或其他更糟的毛病。二〇一二年，瑪麗要在雀兒喜區的新畫廊舉辦費謝爾肖像畫展，因此向

我借畫。我略帶忐忑地應允。她把我，或者說這幅費謝爾，掛在入門第一面牆上，獨獨掛著它。它是來看展的人所看見的第一幅畫。安特意來看這幅肖像，看得哈哈大笑。《紐約時報》嚴詞批評瑪麗的這場展覽；藝評家猛烈抨擊展覽裡的肖像畫主角都是金字塔頂端的富人。但我得為瑪麗說句公道話。歷史上哪一個藝術家不是為他那個時代的貴族作畫？梅迪奇家族（Medicis）³⁹不就是位居金字塔頂尖嗎？

我為瑪麗叫屈，為艾里克感到不平。我認為有十到十五位重要藝術家未受到應得的賞識，艾里克是其一。藝評人針對我那幅肖像大加撻伐，將其描述為「瀆神版的聖母慟子圖」。那樣的人物姿勢是我靈光乍現的點子，卻是可憐的艾里克承受所有非難。至於另一幅肖像，開啟整段故事的那一幅，安也完成它了，正好就在我們分手以前。它不是她最好的作品。我們的分手過程也稱不上和平，我不由得納悶，糟糕的藝術品是否恰恰是對糟糕生活的模仿？而最終，我和她都能夠笑著回顧那一段往事，藝術竟能反映出一段愛情關係的赤裸裸真相，那麼，倒不如不畫為妙。

3 作者當時任職的拍賣公司（直到二〇一二年）。成立於一七九六年，主要據點在倫敦和紐約。

4 私人收藏豐厚的德國家族，因其中一代成員娶了匈牙利籍的妻子，而承襲岳父爵位。現有家族博物館在西班牙馬德里，但已收歸國有。

5 法國知名時裝設計師，已有同名自創品牌。

6 美國藝術家暨電影導演。最著名作品是電影《潛水鐘與蝴蝶》。

7 拳擊手阿里（一九四二～二〇一六）。

8 美國職業拳擊手（一九一四～一九八一），外號「褐色轟炸機」，公認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重量級拳擊手之一。

9 墨西哥畫家（一九〇七～一九五四），以自畫像聞名。

10 介於雀兒喜（Chelsea）和西村（West Village）之間。

11 德國裔的紐約地產大亨。也熱衷於收藏現代與當代藝術，包含安迪·沃荷的作品。

12 英國藝術家（一九二二～二〇一一），出生在德國，是知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孫子。

- 13 源自於米蘭的高級訂製西裝。
- 14 義大利實業家（一九二一～二〇〇三），飛雅特汽車集團前總裁。
- 15 美國電影明星（一九〇四～一九八六），代表作如《北西北》（North by Northwest）、《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費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等。
- 16 美國電影明星（一九〇一～一九六一），代表作如《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黃昏之戀》（Love in the Afternoon）等。
- 17 英國經典的高級文具與皮件品牌。
- 18 雀兒喜區近年取代蘇活區，成為紐約的藝術創意中心。但作者敘述的這個時間點，雀兒喜區應該仍充斥著髒亂與廢棄倉庫。
- 19 美國風景畫畫家和版畫家（一八三六～一九一〇），公認是十九世紀美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
- 20 美國最重要的寫實畫家之一（一八八二～一九六七），以描繪美國當代生活風景聞名。
- 21 美國知名藝術家。
- 22 札格納特是印度毗濕奴神（Vishnu）化身克里希那（Krishna）的神像，每年乘車節即用車載此神像遊行市中，過去狂熱的信徒相信被此車壓死即可升天。
- 23 美國當代藝術家，評價兩極，有人認為俗豔，有人認為前衛。
- 24 法國的時尚設計師、藝術家。曾與許多知名品牌合作，並擔任香奈兒、芬迪的領銜設計師、創意總監，並自創同名品牌。
- 25 法國知名設計師，創作領域涵蓋建築、家具、生活用品、交通產品等。
- 26 著名現代主義建築大師（一八八六～一九六九）。
- 27 德國藝術家，被譽為最重要的在世藝術家之一。
- 28 美國藝術家。
- 29 微軟創始人之一。
- 30 美國著名的新表現主義藝術家。
- 31 畫家、雕塑家、版畫家和製圖員，德國最著名的在世藝術家之一。
- 32 美國女性藝術家，以文字、圖像並置的手法創作，極富視覺張力。她不僅是藝術家，也是社會評論家、政治運動者。
- 33 美國藝術家，對今日的繪畫影響深遠。

34 以紐約塗鴉藝術家起家，後來成為表現主義藝術家。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的藝術家，可惜英年早逝（一九六〇～一九八八）。

35 美國男演員。

36 美國知名網球選手，國際網球名人堂成員。

37 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於一九六六年所執導的英語電影。

38 知名德澳籍攝影師（一九二〇～二〇〇四），從事時裝、肖像和人體攝影，常以裸女為主題，畫面風格強烈，強調性感、解放欲望。

39 十三到十七世紀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義大利名門望族，在金融方面的影響力尤鉅，但其最重大的成就在於藝術和建築方面，資助文藝復興時期許多藝術家。梅迪奇家族世代傳承的收藏品，現保存在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

第二章 當代藝術熱

當代藝術是新的古典大師（Old Masters），因為如今市場上再也沒有任何古典大師的作品可供畫商和拍賣行出售，它們都收藏在博物館裡。印象派和後印象派作品也面臨同樣景況，藏家私人收藏裡已愈來愈少見這類珍稀。而隨著時間流逝，即使是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也成了老東西。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如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⁴⁰等人似乎都成了古典大師。一九九八年，佳士得藉由更改規則，或起碼是更改用詞，一舉改變了藝術遊戲。它將當代藝術重新定義為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至一九七〇年代藝術經歷徹底變革後的創作，而不再以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為分野。即使它的宿敵蘇富比全力維持一九四五年這個基準，一九七〇年仍成為新的「賞味期限」。

我們當然卯足全力地賣。多虧了人們的平均壽命愈來愈長，而且創造生產力旺盛，儘管市場偶爾會瀰漫懊悔情緒，但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供應量具有無窮彈性，能隨時因應市場需求。一九八七年電影《華爾街》裡，麥克·道格拉斯那句慷慨陳詞：「貪婪是好事。」可說是市場需求的最好寫照。該臺詞的靈感來自因套利⁴¹而遭判刑的伊萬·布斯基（Ivan Boesky）⁴²。華爾街貪婪，當代藝術市場亦然。一些老古板可能會問，比如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那只塞滿菸蒂的菸灰缸，除了唯利是圖的華爾街人士，還會有誰想買此類作品。那只菸灰缸，是我二〇〇一年在菲利普斯以六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千八百萬）、刷新世界紀錄的價格拍賣出去的，自此以後，赫斯特的一百三十七件作品—數量仍在增加中—成交價屢屢創下拍賣市場新高。

或者昆斯的〈浴缸中的女人〉（*Woman in Tub*）雕塑，呈現一個無頭女在泡澡，一根潛水呼吸管從水底冒出，面對闖入者的突襲，女人兩手抓著乳房。二〇〇〇年，該件作品在佳士得拍賣會上以一百七十萬美金（約臺幣五千一百萬）售出。之後，為了宣傳昆斯的〈頑皮豹〉（*Pink Panther*）雕塑拍賣，佳士得大概雇用了紐約市裡半數的失業演員，讓他們穿著粉紅頑皮豹玩偶服在拍賣場內走動。強力宣傳果

然奏效，〈頑皮豹〉以一百八十萬美金（約臺幣五千四百萬）成交，是原本估價的兩倍，就連佳士得也大感意外。我當時代表一位私人藏家競標，是〈頑皮豹〉第二高的出價者。我的客戶也出價四十二萬美元（約臺幣一千兩百六十萬）競標克里斯多佛·沃爾（Christopher Wool）⁴³的〈傻子〉（*Fool*）。兩項都競標失利以後，一名記者走近我，直接了當地問：「你是不是瘋了？」我笑了笑，告訴他，我沒標到〈傻子〉才真是傻子。往後該件作品節節高升的行情證明我說得沒錯，我一點也不傻不瘋。

沒錯，貪婪是好事。藝術市場始終錢潮滾滾。就舉佳士得二〇一三年春拍來說，那是多項拍品競價一路飆升，連番創下新高價的又一場名留青史夜拍。那一晚，佳士得的氣氛不像一間拍賣行，而是像一座賭場。在洛克斐勒中心裡，五月悶熱空氣中瀰漫的緊張氣氛，與蒙地卡羅賭場的任何一場豪賭之夜並無二致。玩家們，或說藏家們，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從俄羅斯、亞洲和波斯灣來的富人，以及美國當地富豪。那晚成果豐碩，我所預期的「豪賭」絕不是誇大其辭，當代藝術拍品總成交額達到驚人的四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約臺幣一百四十八億五千萬），總計刷新十五位藝術家的拍賣成交紀錄，並創下史上最高的拍賣會總成交額。

當晚拍出最高價四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十四億四千萬）的作品為巴斯奇亞的〈癮君子〉（*Dustheads*）。時代正在改變，而且速度出奇地快。不過一年半前，我身為唯一能和雙巨頭蘇富比、佳士得抗衡的菲利普斯拍賣行總裁，站在拍賣臺上主持巴斯奇亞另一幅作品的競價，拍出一千六百三十萬美元（約臺幣四億八千九百萬），創下該藝術家的全球拍賣最高紀錄。如今，新締造的成交價不只是我當初的雙倍，而是三倍。我原本以為自己非常優秀呢。我喜歡締造新紀錄，紀錄是藝術經紀商和拍賣師的命脈。好吧，我很傑出，但是沒想到那時的紀錄不過是暖身。二〇〇八年似乎已崩盤的全球經濟突然從谷底強勁復甦，甚至是重生。股市猶如加注了燃料的火箭一飛沖天，而股市一漲，藝術市場也跟著水漲船高，漲勢甚且比股市還強上數倍。

今日要評價一位藝術家偉大與否，其作品的行情往往被當作衡量的指標。畢竟在品味殊異的華爾街人士、俄羅斯人、中國人與阿拉伯人之間，除了可量化的金錢以外，還有什麼可做為共同的標準呢？因此，以可量化的價格標準來看，巴斯奇亞不啻是當代藝術的梵谷。而巧合的是，這兩位飽受折磨的藝術天才都是在死後才被供奉到文化資本主義的萬神殿。我真希望巴斯奇亞從那座殿堂頂端對我微笑，因為我可以驕傲地說，現今市場對他作品的熱切需求，我曾貢獻了一己之力。不過就在數年前，菲利普斯拍賣行締造了這位藝術家的三項世界紀錄。

第一項紀錄創於二〇〇七年，巴斯奇亞的〈格里歐〉（*Grillo*，西班牙文的蟋蟀，而不是板球），一幅獻給其母親家鄉波多黎各的巨幅畫作（約九公尺寬），以八百八十萬美元（約臺幣兩億六千四百萬）成交。在更早的十年之前，我還是蘇富比歐洲區主席時，就迷上了該幅畫。畫作的主人，以色列藝術經紀商米奇·蒂羅基（Micky Tiroche）允諾有一天會把它交給我賣。我原以為他不過是說說而已，畢竟在藝術界，承諾通常只是社交辭令。出乎我意料的是，米奇說到做到，我親自出馬主持拍賣，給足他面子。該幅畫在紐約拍賣會以高價落槌，再一次，又是透過電話競價的神祕買家得標。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天價成交價，其中許多都是透過電話競價的買家所創造，儘管他們多為知名人士，卻堅持在一擲千金時隱姓埋名。

二〇〇八年在紐約的拍賣會上，巴斯奇亞自己的勝利女神，那幅〈墮落天使〉（*Fallen Angel*）畫作，由我拍出一千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億三千萬）新高價。該幅畫繪於一九八一年，他的奇蹟年分。他當時尚未結識沃荷，兩人的友誼還未開始。那一年是他創作生涯高峰的起點，該年的所有作品卻也是他畢生最出色的傑作。〈墮落天使〉是由一位義大利人委託出售，而再一次，又是由透過電話競標的神祕買主得標。該件作品的拍賣過程收錄在導演塔拉·戴維斯（Tamra Davis）—「野獸男孩」麥克·戴亞蒙（Beastie Boy, Mike D）[44](#)的妻子

一所拍攝的紀錄片《光之子：尚·米榭·巴斯奇亞》裡。可惜啊可惜，我在拍賣臺上的閃亮表現最後全落進剪接室的垃圾桶。

巴斯奇亞的作品行情不斷往上攀升。二〇〇九年，蘇富比拍出他作品的新高價，這激起我的競爭心和所有腎上腺素，於是我更加倍努力。到了二〇一二年，他的〈無題〉（*Untitled*），一幅頭頂光環、火紅骷髏骨的黑人男子肖像登上菲利普斯拍賣會。這一幅畫也是出自最佳年分，一九八一年的作品。畫作主人羅伯·萊爾曼（Robert Lehrman）是華盛頓特區的低調收藏家。那是一個與前衛藝術沾不上邊的城市，而他是律師暨巨人食品超市（Giant Food）的繼承人。他當年以每件五千美元（約臺幣十五萬），買下兩幅巴斯奇亞畫作。

在藝術市場變得像大型狩獵遊戲場以前，他賣掉其中一幅，賺到正常獲利。而現在，是他能夠賺取不尋常利潤的時機。市場一片欣欣向榮，這會是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⁴⁵嗎？日後自然會見分曉，但可以確定的是，藝術市場規模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我在二〇〇八年將菲利普斯拍賣行的一部分股份賣給俄羅斯精品零售業龍頭水星集團（Mercury Group）。因此我有足夠的財力與佳士得及蘇富比競爭，便欣然應允萊爾曼先生要求的價格保證。也就是，即使〈無題〉的成交價低於預估的九百萬到一千兩百萬美元（約臺幣兩億七千萬到三億六千萬），他仍能拿到最低保證價（保底金額）。這是一個高風險策略，但拍賣是無勞則無獲的行業；我很習慣賭一把。

一般人對拍賣會的想像是有眾多的競價者，人們在場內此起彼伏地舉牌，但〈無題〉的拍賣截然不同，僅有三名競標者，且沒有一人現身我們在雀兒喜區的拍賣場。一些拍賣會有滿場爭相出價的競標者，但這一場不是。儘管如此，質重於量，人頭鑽動的現場仍洋溢著激昂興奮的氣氛。羅馬人到競技場看流血廝殺，紐約客專程來菲利普斯看金錢橫流的盛況。雖然匿名藏家都透過電話，委託菲利普斯專家代為出價，但每位競價者都看著網路直播，我身為拍賣官，職責就是假裝他們都坐在臺下，讓他們產生競爭心，卯足勁地出價、抬價。

儘管表面上看來，我就像在賣畫給自己的員工，這就跟對著唱詩班布道一樣，簡直多此一舉，但實際上，我的工作並不輕鬆，說起來，我毋寧像一個傳教士，正在說服一群獵頭族改宗皈依。我的福音結合了超驗的默示（transcendent inspiration）與永恆價值（eternal value）。我清楚知道準買家的身分，知道臺下那些員工手機通話的對象。每次看到有牌子舉起，我會盯著我手下代為出價的這位專家，暗示他和他的客戶往上加價，盡量加高，否則很有可能失去想要的這件珍寶。暗示的方式很簡單，或是蹙眉，或是多注視他一會兒，或是改變說話音調；無論如何，我的挑戰是以配得一座奧斯卡獎的高超細膩演技來傳達訊息，身為上司的我想告訴他們：你得讓客戶再抬價。最重要的是，我得傳達自己是如何看好巴斯奇亞。我太愛他了。

還有一點也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反，實際上，以八位數價格成交的那些藝術品，多數競標過程不會太冗長，大概介於一分鐘到十二分鐘之間，速戰速決。而這幅畫從起拍到落槌只歷時六分鐘。我對委託臺上手拿電話的員工微微一笑，敲下手中的木鎚。成交價一千六百三十萬美元（約臺幣四億八千九百萬），遠遠超出預估價，我刷新了巴斯奇亞的拍賣成交紀錄。全場發出驚呼，掌聲雷動，感覺棒極了。但我明白，好景不長，我也樂見如此，拍賣這一行就是因為這樣才緊張刺激。你無法永遠安於現狀，滿足於已得的榮耀冠冕。所以，永遠不可能覺得無聊。

二〇一三年佳士得春拍上，以四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十四億四千萬）成交價刷新記錄的〈癮君子〉，是由三十來歲闊綽的馬來西亞富豪劉特佐⁴⁶透過電話委託買下。沒有人確切知道他從事哪一行。一說是石油商，也有人說是營造業，或軍火商。他畢業於賓州大學華頓（Wharton）商學院，想必學有專精。當時為華頓商學院畢業生呼風喚雨的年代，一位超級藏家更可能擁有企業管理碩士學位（MBA），而不是大英帝國勳章，或者是「馮」（von）、「德」（de）等古代貴族姓氏。繼承來的家族財富與科技業、石油、對沖基金等帶來的新財

富相比，往往相形見绌。拍賣行—以及全球賭場—的新玩家都是來自那些領域的新貴。

我不認識的重要收藏家可說屈指可數，這位青年才俊劉先生正是其一。我不禁納悶他怎麼能與世隔離至今，我一邊思索，一邊把他列入我的「待訪」名單。我環顧佳士得拍賣室，由於木鑲板裝潢，讓它猶如一間圖書室，跟純白一片、彷彿手術房的蘇富比拍賣室相較，感覺上溫暖許多。話雖如此，拍賣室裡的一切運作，其實就像是最高水準的手術流程。會場裡幾乎每一張臉孔我都認識，因為每張臉孔都代表一隻舉牌出價的手，我非認識不可。在藝術界，知識—對藝術和買家瞭若指掌—就是力量，有知識更意味著有生意；無知的話，則只有苦難和失敗一途，絕沒有幸福。

在我前面、也就是拍賣臺正下方第五排，坐著勞倫斯·格拉夫（Laurence Graff），出生於倫敦斯特普尼貧民區（Stepney）的這位鑽石珠寶商已與海瑞·溫斯頓（Harry Winston）齊名。事實證明，深諳珠寶的格拉夫對藝術也有高超的鑑賞力；這兩者的關係也非常密切，都是美麗的物品。今晚，他瞄準的獵物是羅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⁴⁷一九六三年的作品〈戴花帽的女人〉（*Woman with Flowered Hat*），一幅以普普藝術形式重現的畢卡索「復刻作」；賣方是露華濃集團（Revlon）的羅恩·佩雷爾曼（Ron Perelman）⁴⁸，預估價值為兩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八億四千萬）。早前我才與格拉夫一起喝過茶，他身穿在薩佛街（Savile Row）⁴⁹訂製的西服，看上去光彩奪目，好一個名符其實的鑽石之王。格拉夫專程前來紐約參加拍賣會，帶著同為珠寶同行的美麗女友約瑟芬·丹尼爾（Josephine Daniel）。她是巴西和英國混血兒，約莫小他三十歲，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喝茶時，格拉夫告訴我，他很喜歡李奇登斯坦。究竟有多喜歡呢？就如我現在看到的，他正和佳士得的年輕（五十來歲）主席布雷特·戈維（Brett Gorvy）激烈廝殺，戈維在拍賣臺旁的電話委託臺，代替匿名買家出價。儘管戈維身居高位，他的衣著與格拉夫相反，非

常樸素，毫不顯眼，就像個銀行家或律師，或某種有受信責任的專業人士。畢竟在拍賣這門服務業，你不應該搶客戶的風頭。戈維炫目耀眼之處是在於他的認真和執著。格拉夫與戈維的競爭就像一場網球比賽，你來我往，一輪接一輪，格拉夫幾乎不用動手，而是以眼皮示意。價格持續往上飆升，直到格拉夫喊出五千五百萬美元（約臺幣十六億五千萬），近乎估價的兩倍。

整個拍賣會場一片嘩然。全球一流的藝術經紀商都在此觀戰。首先是最頂尖的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這位沉著冷靜、猶如銀狐般的亞美尼亞裔美國人，他的第一家畫廊開在比佛利山，而後逐漸擴張據點，如今已堪稱他那一輩人的杜維恩（Duveen）⁵⁰。如果將高古軒比喻為新杜維恩，那麼原本居住在敘利亞，現今事業版圖擴及倫敦、紐約的猶太裔納瑪德家族（Nahmads）則相當於新的威爾頓斯坦家族（Wildensteins）⁵¹。幾位納瑪德家族成員都出席了此場拍賣會，但赫利·納瑪德（Hillel “Helly” Nahmad，Helly取自其祖父的名字）顯然缺席。三十來歲的赫利，擁有一家位於麥迪遜大道的知名畫廊，約會對象盡是超級名模，是人人欣羨的花花公子，也是一位藝術吹笛人（Pied Piper）⁵²，他的好萊塢友人，例如：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即在他影響下成為當代藝術愛好者。唉，赫利因涉嫌參與高賭注跨國賭博，在洛杉磯遭到逮捕（其後遭到判刑，蹲了幾個月苦牢後又回到藝術界，仍然在業界呼風喚雨）。而在這個夜晚，納瑪德家族的人沒有一個討論赫利的事；藝術秀還是得繼續演下去。

穆格拉比家族（Mugrabis）也在場，他們也是出身敘利亞的猶太裔，移民到波哥大後經營紡織生意，每每趁藝術市場崩盤之際買入大量畫作，從而累積了數量驚人的藏品。他們擁有的沃荷作品高達八百件，堪稱全球藏家之冠，更別提還有一百多件巴斯奇亞的作品，以及赫斯特、昆斯、理查·普林斯（Richard Prince）⁵³的許多重要作品。他們在日內瓦和紐華克擁有數座巨大的收藏品倉庫。我跟一家之主何塞（Jose），以及他的兒子大衛（David）和阿爾貝托（Alberto）打招

呼，一面思索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藝術市場似乎是由這些來自大敘利亞區的人主導。我猜他們都有某種不凡的經商基因。查爾斯·薩奇（Charles Saatchi）是今晚唯一一位未出席的中東裔巨富。這位伊拉克裔廣告界巨擘樂於資助英國青年藝術家，儼然是新世代的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Medici）。他跟任何藏家一樣，都為我今晚目睹的這一場當代藝術天價秀做過貢獻。

佳士得大老闆弗朗索瓦·皮諾（Francois Pinault）坐在天廂（Skybox）裡縱觀全場。這些供貴賓使用的天廂，往往有半透明簾幕遮蔽，以免讓到場的好萊塢大明星和阿拉伯王子曝光身分。皮諾這位法國精品業大亨也握有古馳（Gucci）、寶缇嘉（Bottega Veneta）和史黛拉·麥卡尼（Stella McCartney）⁵⁴品牌，但他最廣被美國人知曉的身分，是身為電影明星莎瑪·海耶克（Salma Hayek）的公公。皮諾是完全的事必躬親派。有一年的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開幕前，他曾穿著工人服，假扮為搬運工，只為了搶先一睹待售物品。皮諾先生就是如此野心勃勃、求勝心切。而我竟敢挑戰這位巨人，找來他的競爭對手貝爾納·阿爾諾（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LVMH〕集團，旗下有迪奧〔Dior〕、唐納·凱倫〔DKNY〕、馬克·雅各布斯〔Marc Jacobs〕等任何你說得出名稱的品牌）為後盾，投身新千禧年的藝術拍賣戰爭。在許多人看來，這不啻為瘋狂的自殺舉動。無論如何，弗朗索瓦正朝下方揮手，給我親切的問候。

前幾天的晚上，我們才在一場「小型」拍賣會上打過照面。那是一場慈善拍賣，所得收益全數捐給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基金會，用於資助世界各地的鳥類與野生動物保護區。救救那隻老虎吧！與今晚五億美元（約臺幣一百五十億）的總成交額相較，該晚募得款項只有三千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九億三千萬），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然而考慮到年輕的一代會追隨自己心愛的明星，也對藝術萌生興趣，那麼那場義賣會附帶的宣傳效益可說是價值連城。除了李奧納多和莎瑪以外，陶比·麥奎爾、布萊德利·古柏、馬克·魯法洛、歐文·威爾森也都盛情與會，準備好要接受鎂光燈的洗禮。拉里·高古軒以七百餘萬美

元（約臺幣兩億一千萬）高價買下一件馬克·格羅蒂揚（Mark Grotjahn）⁵⁵的作品以表示對基金會的支持，證明自己「跟得上潮流」，也贏得更多年輕好萊塢明星的心，但他根本不需要，因為拉里本身就是潮流。

一場拍賣會的盛大與否端看蒞臨的買家而定，今晚的陣容就如同昔日洋基隊的「殺手打線」（Murderers' Row）一樣堅強。除了格拉夫以外，還有洛杉磯皇帝：艾里·布羅德（Eli Broad）蒞場。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將那座電影之都變成藝術之都，既是該城市主要美術館的贊助人，也興建創辦了一間美術館（陸續增加中）。八十開外的艾里擁有少年般的活力，他的青春之泉正是藝術。為了藝術，他和妻子伊迪絲（Edythe，人稱夫妻倆為E&E）搭乘私人噴射機，以巴塞爾藝術展作為第一站，環遊世界各地參與如雨後春筍般愈冒愈多的重要藝術饗宴（足以讓他們一整年馬不停蹄）。其中的巴塞爾正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皈依成為藝術教徒的地方。

艾里·布羅德當初選任洛杉磯當代藝術館（MOCA）館長時，我赫然被他納入考慮名單，和幾位頂尖人士並列，讓我受寵若驚。二〇〇九年邁阿密巴塞爾藝術展期間，他曾找我去南海灘區的飯店套房面試，雖然順利通過，但我心思都在菲利普斯的業務上，只得婉拒他的垂青。我向他推薦了一位朋友，也是他名單上的另一位候選人：出色的藝術經紀商，在蘇活區有一間畫廊的杰弗里·戴奇，最終艾里真的選擇了他，令我激動不已。敢於任命桀弗里，一位既非傳統策展、藝術史專科出身，也缺乏非營利機構工作歷練的人（儘管他三年任職期間的動盪紛擾不斷），證明艾里·布羅德樂於跳脫思考框架。桀弗里在當代藝術館推出的展覽，例如：「街頭藝術」塗鴉展，獨創性十足，也反映出他老闆—看似古板的布羅德夫婦—內在的創新思維。

擁有億萬資產的布羅德夫婦作風樸實，蒐集的豐富收藏品則是不同凡響。財富都掛在他們家的牆壁上，而不是馱在各自的背上。艾里讀會計，靠房地產開發起家，而後於保險業大發利市，然後才迷上繪畫藝術。這一切都開始於一張羅特列克（Toulouse-Lautrec）⁵⁶所繪的

海報，以及伊迪絲買回家的一張布拉克（Braque）[57](#)複製畫海報。她曾經與沃荷的「湯罐頭」失之交臂，因為她擔心艾里會罵她花一百美元（約臺幣三千元）買一個罐頭。你不見得要鋪張奢侈才能當收藏家，布羅德夫婦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與布羅德夫婦截然相反的人物也在場。愛好馬球的億萬富翁，也是《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訪談》（*Interview*）雜誌的出版人：彼得·布蘭特（Peter M. Brant）。他也是電影《輕狂歲月》（*Basquiat*）、《畫家波洛克》（*Pollock*）的製片人，並在康乃狄克州創立了極棒的基金會兼美術館。他由衷地熱愛藝術。身為家族繼承人的他，年輕時就結識沃荷，早年即從保加利亞裔父親手裡接下紙業公司，並發展成一個龐大帝國，累積的財富使得布蘭特得以追求各式各樣的愛好，從藝術、馬到美女。今晚，與他水火不容的妻子（夫妻已逐漸重修舊好，令嗜血的八卦小報大失所望），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超級名模、艾索·羅斯〔Axl Rose〕[58](#)的前妻）並未出席。但彼得·布蘭特自身就光芒四射，從來不需帶著美麗嬌妻在人前炫耀。

彼得這晚以千餘萬美元標下昆斯的一件作品，想來是為下一場拍賣重頭戲做的市場暖身。他已委託佳士得在當年十一月拍賣昆斯的橘色〈氣球狗〉（*Balloon Dog*）。這件雕塑品預估價在三千五百萬至五千五百萬美元之間（約臺幣十億五千萬至十六億五千萬），遠遠高於今晚巴斯奇亞作品的新高記錄，也超過昆斯作品至今的最高拍賣價格。昆斯的〈氣球狗〉系列還有另外四件，每一隻狗的顏色都不同，五名持有人分別是多倫多巨擘：布蘭特、布羅德、皮諾，以及希臘建築大亨達奇斯·喬昂諾（Dakis Joannou）和對沖基金界霸主史蒂文·柯恩（Steven A. Cohen）。由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柯恩提起訴訟，使得他今晚和赫利·納瑪德一樣不克出席。

說到成為局外人的感覺，去年十二月離開菲利普斯為我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我仍在調適當中。俄羅斯水星集團已在二〇一二年買下我剩餘的菲利普斯股份，我已不再是拍賣行總裁。曾經死氣沉沉的菲

利普斯在我的改造下，如今已是當代藝術市場的領頭羊，因此又是我往人生下個階段前進、迎向下個新挑戰的時候了。我已離開拍賣行，我的姓氏也是。遭史達林（Joseph Stalin）剷除的對手被稱為「非人」（non-people），等同不再存在；菲利普斯拍賣行拿掉名字裡的德·普里（de Pury），似乎也讓我頓時失去存在感。我已盡了全力和兩位巨人拚鬥較量，雖然我的大衛沒有殺死巨人⁵⁹，但我確定已搖動他們頭頂上的穹蒼；我決不是「非人」。

當然，我只要一看到拍賣臺，就會有想站上去的衝動。但我這回坐在臺下，見證了友人蒂姬·亞騰西奧（Tiqui Atencio）⁶⁰出售巴斯奇亞〈癮君子〉的喜悅。優雅的委內瑞拉人蒂姬住在最富麗堂皇的豪宅，在法國蔚藍海岸（不言而喻的地位身分表徵）舉辦最狂野的派對，她一向是情感奔放的類型，該幅畫作以四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十四億四千萬）落槌之際，她從椅子上一躍而起，高舉雙臂，彷彿她支持的足球隊剛剛贏得了世界盃冠軍。我真想念與客戶共享勝利的時刻。對我而言，拍賣槌的呼喚猶如野性的呼喚。那也是為什麼我依然保持活躍的原因，儘管沒有拍賣行的舞臺，我仍然周遊世界各地主持慈善拍賣會，通常每週會有一場。

我看著臺上的佳士得芬蘭籍拍賣官彭肯南（Jussi Pylkkanen；足以當拼寫比賽超級難題的一個名字）賣力喊價，每口叫價都以百萬計。這不難，對億萬富翁，諸如這些藝術拍賣會的常客來說，每口的一百萬美元就跟花玩具紙鈔沒兩樣。無足輕重，無關痛癢，只有一擲千金的暢快感。就像是上賭場一樣。而拍賣會這種「賭場」是否也有詐賭狀況？紐約州立法者多年來一直呼籲改革，企圖禁止一種叫做「吊燈叫價」（chandelier bids）的手法，卻一直未能如願。這種手法是拍賣官伸手指向拍賣廳後方，然後抬高競價，但實際上根本沒有出價的人，他指的方向可能是一盞吊燈，也就是虛晃一招。使不使用屬於拍賣官的酬處權，以便炒熱氣氛，加快競價節奏，盡快達到賣家和拍賣行談定的底價。順帶一提，這種叫價方式完全合法，日後很可能仍是如此。

我心想，若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每口叫價百萬美元，勢必會造成大轟動，我環顧四周，看著分坐在各處的大買家。佳士得再清楚不過，最好不要讓這些競爭對手坐得太近；拍賣會就跟那些藝術界「權貴」光顧的餐廳（紐約的「青蛙」〔La Grenouille〕、威尼斯「哈利酒吧」〔Harry's Bar〕、蘇黎世「皇冠廳」〔Kronenhalle〕、香港「中國會」〔China Club〕）一樣，如何排座位是一件難之又難的大學問。我估計全球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人花得起一億美元（約臺幣三十億）買一件藝術品，再有一百至一百二十五人可能花得起五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五億），金額再往下，人數則愈多。過去一件作品拍出一百萬美元即是頭條新聞，如今這樣的成交價甚至上不了報。在金字塔底層是eBay，根據最新統計數字顯示，約有八千五百萬個收藏家在那個全球最大的跳蚤市場競標、購買物品。至於金字塔頂端約有一百五十位收藏家，無論是親自到場或精神參與，他們今晚似乎全數到齊。

我想像要是由我來主持這場拍賣，我會怎麼做，以及怎麼達成更高的成交總額—要知道，大頭症也是拍賣師的職業病之一。大藝術需要大自我來匹配。雖然很不情願，但我不得不承認，彭肯南的表現好得不得了。說實話，我並不後悔離開拍賣行，也沒有身為同行的妒意。我只感到無比快樂興奮，爆炸成長的市場令我心跳加速、熱血沸騰，我正在思量著該如何在其中重新定位自己。當代藝術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淘金熱，而我是其中一名採金工人，我永遠無法捨棄採金脈的刺激感，以及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福至心靈時刻。

40 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一九一二～一九五六），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繪畫的象徵及抽象表現主義的先驅，可謂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

41 買低賣高，從而獲取收益。有時因內線交易，妨礙市場公平性而引起法律問題。

42 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股市大亨、金融鉅子。

43 美國藝術家。

44 自一九七九年活躍至今的美國嘻哈樂團，麥克·戴亞蒙為其主唱。

45 非理性繁榮是指資產價格脫離決定其價值的基本因素，而由市場參與者的主觀判斷決定，而導致持續上漲的現象。

- 46 劉特佐目前（二〇一六年）因涉嫌洗錢案而遭聯邦調查局調查，其帳戶也遭凍結，據說他已將手上的名畫賤價脫手，換取現金，包含巴斯奇亞的作品。
- 47 美國普普藝術的代表畫家（一九二三～一九九七）。
- 48 美國實業家，經營範圍廣泛，據傳是現今（二〇一六年）全球八十大富豪之一，身價十二・二億。
- 49 位於倫敦，因高級訂製西裝而聞名，有「西裝街」之稱。
- 50 約瑟夫・杜維恩（Joseph Duveen, 1869-1939），英國傳奇猶太裔藝術經紀商。
- 51 二十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猶太裔藝術經紀商。
- 52 典故出自德國民間故事《哈梅爾的吹笛人》（Rattenfänger von Hameln）（收錄在《格林童話》），比喻他是藝術界很有影響力的人。
- 53 美國攝影師及畫家，因利用他人IG照片創作而備受侵權爭議。
- 54 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的女兒。二〇一二年其自創品牌曾獲得英國時尚大獎年度設計師及最佳設計師品牌兩項大獎。
- 55 美國畫家，創作以抽象主義油畫為主。
- 56 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法國貴族、後印象派畫家、近代海報設計與石版畫藝術先驅，被稱作「蒙馬特之魂」。
- 57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國畫家，與畢卡索同為立體主義畫派創始人。
- 58 美國搖滾樂團「槍與玫瑰」（Guns N' Roses）的主唱。
- 59 典故出自《聖經》，原本的故事中，大衛殺死了巨人，引申為以小搏大的勇氣。
- 60 知名的當代藝術、前哥倫布時期及拉丁美洲藝術的收藏家，二〇一六年出版了第一本書。

第三章 藝術之都

身為一名藝術品經紀商，一位藝術收藏家，一位藝術愛好者，我樂於認為（可不是出於盲目的愛國精神），像我這樣為藝術痴狂的人，只可能出身一個地方；那就是巴塞爾。

世界上許多城市都有偉大的藝術，我馬上可以舉出的例子有佛羅倫斯、巴黎、聖彼得堡，但沒有其他任何城市像我的瑞士家鄉一樣，每位市民的血管裡都流著藝術的基因。如今一說到「藝術」，所有人最先聯想到的城市必然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無論這個全球頂級藝術展會是在發源地城市巴塞爾，或邁阿密、香港舉辦，或者日後又被複製到其他據點。只要提到「巴塞爾」，你會想到巴塞爾藝術展；提到「藝術」，你會想到巴塞爾藝術展。但巴塞爾藝術展的歷史還很短，一九七〇年才創辦，但是在巴塞爾，這個位於法國、德國和瑞士交界，萊茵河流經的絕美小城，藝術已經在此紮根了數個世紀。巴塞爾是文化與財富的完美交匯地；是藝術藏家的新月沃土。

巴塞爾擁有瑞士最古老、最優秀的大學，伊拉斯謨（Erasmus）⁶¹和尼采都曾於該校執教。堪稱萊茵河畔「哈佛大學」的巴塞爾大學成立於一四六〇年，與它有密切淵源的美術館（Kunstmuseum）則創於一六六一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美術館。巴塞爾也是製藥業重鎮，匯聚了諾華藥廠（Novartis）、羅氏大藥廠（Hoffmann-La Roche）、先正達公司（Syngenta）和其他多家製藥公司。製藥公司帶來財富，藝術收藏風氣遂在當地萌芽。簡言之，這裡的地利人和確實造就出偉大的藝術收藏環境。萊茵河水似乎賦予每位市民藝術審美本能，瑞士人擅長從商的基因則讓人人生財有道，富裕的人們再以金錢打造出美麗事物；那裡正是我的根脈所在。

一九五一年，我出生在巴塞爾。我父親是一位律師，任職於當地的羅氏大藥廠。他的家族來自納沙泰爾（Neuchâtel），是距巴塞爾一百公里的景色如畫古堡小城。我父親是男爵，但從不張揚自己的貴族

頭銜。（順帶一提，我也是男爵，也從不張揚；不好出風頭是我們家族的秉性。）我們的祖先在數百年期間都是納沙泰爾行政官，後來因協助信仰新教的普魯士對抗信仰天主教的法國有功，而由腓特烈二世（史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冊封爵位。納沙泰爾由於地理位置敏感，夾在經常交戰不休的諸國之間，每每淪為一顆被踢來踢去的政治皮球。我的祖先大衛·德·普里（David de Pury）受夠群雄爭霸的是非紛擾，乾脆一走了之，搬到里斯本，而後成為葡萄牙國王的御用銀行家。然而在遺囑裡，他將畢生在葡萄牙累積的財富贈與納沙泰爾；因此在納沙泰爾名為德·普里（Place de Pury）的主廣場上，立著一尊他的雕像。也因此，我娶第一任妻子，到號稱納沙泰爾地標的那座城堡舉辦婚禮時，獲得皇家級的禮遇。

我在美國也有家族親戚。一七三一年，大衛的兒子尚皮耶（Jean-Pierre）向國王遞送請願書，請求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當時新世界的巴黎）南邊、薩凡納河（Savannah River）的河岸沼地，為六百位渡海尋找新生活的納沙泰爾農民建立定居地。這些德·普里殖民者是從義大利熱那亞（Genoa）啟程飄洋過海。他們取姓氏字母再多加一個「R」，將這個新創立的小鎮命名為普里斯堡（Purrysburg）。遺憾的是，儘管這些新教徒移民勤奮工作，卻不敵瘧疾與其他常在低窪地區肆虐的疾病，因此在美國獨立後不久，普里斯堡就已淪為空城。在小鎮荒廢之前，喬治·華盛頓曾途經鎮上並享用了早餐，因而將它給標示到地圖上。倘若小鎮還在，如今的鎮民雖然無法大吹大擂「喬治·華盛頓曾在此地過夜」—這可是相當於美國版的「皇家御用」保證—但如此的名人光環已足以為小鎮增光添色。

由於有過這一塊荒廢的殖民地，南卡羅萊納州（州民們普遍懷舊的一個州）至今依然有許多瑞士姓氏的家族，他們和最早在該州落地生根的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法國新教教徒〔French Protestant〕）一樣，都是當地歷史悠久的望族。一九八〇年代期間，南卡羅萊納州的望族後代發起納沙泰爾與普里斯堡的交流活動，我應

邀前去參加普里斯堡的建城兩百五十週年紀念。那是一個宛如電影《亂世佳人》場景的地方，紀念活動顯得浪漫懷舊，我不由覺得自己有點像瑞士版的白瑞德⁶²。

不過，在巴塞爾的童年時代，我覺得自己更像是瑞士版的《孤雛淚》主角奧立佛。我十歲大的時候，就成了藥品孤兒。實際狀況並沒聽起來的那麼慘。當時我父親得到職業生涯中絕無僅有的機會，被外派到東京，負責羅氏大藥廠在當地的業務，留下我無依無靠。我父親一九六一年抵達日本時，當地分部只有十名雇員，在他的領導下，最後成長為員工超過萬人的大公司。我有三位手足，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他們都已經自立生活。為了我父親的璀璨職業生涯著想，我只得犧牲自己，去家族友人的家裡生活。

我就讀伊拉斯謨所創的著名人文中學（Humanistisches Gymnasium），卻是很糟的學生。儘管長得高，我的運動神經奇爛，沒人想跟我同組。我依然熱愛足球，不過僅僅止於觀戰。比起足球，我更愛藝術，對於此事，不只我父母感到吃驚，「收養」我的伯諾特（Bonhote）夫婦尤其不敢相信。伯諾特先生在另一家製藥公司汽巴嘉基（Ciba-Geigy）擔任專員。我雙親是文化狂熱分子，伯諾特夫婦則與文化絕緣。有一次，伯諾特太太問我那天下午到哪裡去了，我告訴她，我去看克利（Klee）⁶³展覽，她誤以為我看的是鑰匙展（法語的鑰匙「clef」一字，音同「克利」），大概以為我未來想成為鎖匠吧。儘管巴塞爾是一個偉大的藝術之鄉，但不是每位市民都受到藝術蟲感染，伯諾特太太正是一個現成例子。

我的「感染」則是始於童年與母親前往佛羅倫斯的數次旅行。那裡的烏菲茲美術館（Uffizi）、巴傑羅美術館（Bargello）讓我深深著迷，一般父母用來獎勵乖乖逛完美術館孩子的冰淇淋，對我的吸引力反而不大；多數正常小孩一定更愛義大利冰淇淋。後來我第一次到巴黎玩，住在聖路易島的叔叔家，被帶到羅浮宮放牛吃草，又為內心的這把藝術火苗加柴添薪。如果當時已有歐洲迪士尼樂園開在巴黎近郊，我很可能會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那時哪有樂園可去呢，

就連歐洲各國的電視臺也不播迪士尼製作的《大衛克羅傳》（*Davy Crockett*）⁶⁴。我們仍堅守歐洲大陸舊世界文化，將新世界小螢幕流行文化的誘惑隔絕在外。

所以說，藝術是我的「心頭好」。就像有人愛看電影，而我特別喜歡去巴塞爾美術館參觀的校外教學活動。我一位朋友的父親繼承了巴塞爾史上第一位大收藏家羅許（Raoul La Roche）⁶⁵的部分藏品。他們住的房子平凡無奇，但裡頭的藝術品可是超凡絕倫。我巡梭在一幅幅畢卡索、勒澤（Leger）⁶⁶、布拉克、格里斯（Gris）⁶⁷的畫作之間，看得目瞪口呆，我朋友對父親的藝術收藏則是無動於衷，自顧自津津有味地看漫畫書。

後來，我跟這個朋友從巴塞爾搭四小時的火車到巴黎參觀羅許的別墅。這幢非常了不起的現代建築作品是由羅許的好友柯比意（Le Corbusier）⁶⁸設計。一九六五年羅許過世後，多數藏品存放於此別墅。羅許是從一九一八年開始收藏他那些巴黎畫家朋友的作品，當年只有二十九歲。年少的我將他視為榜樣，是我立志要看齊的非凡人物。我的兩位哥哥都是高材生，都是年少得志；一位是神學家，另一位是律師。我不指望跟他們爭高下，於是我想尋找另一條道路，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在我寂寞的青春時代，在巴塞爾發生的一件事恰恰說明這座小城的藝術氣息為什麼和其他城市迥異，又是從何時開始截然不同。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六歲，正瘋狂迷戀英美流行音樂而不可自拔。我也喜歡美國的普普藝術。我幾個愛好藝術的哥兒們當中，有一位母親是美國人，她介紹我認識羅森伯格（Rauschenberg）⁶⁹和沃荷的作品，我覺得他們很酷，作品都呈現出我在夢裡看見、從歌曲裡聽見的美國本色。沃荷創作出的美國形象與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⁷⁰的不同。沃荷的是瑪麗蓮·夢露、貓王和湯廚濃湯罐頭（Campbell's Soup），罕醉克斯則是〈紫霧〉（*Purple Haze*）⁷¹。我後來才知道，和我同世代的美國男孩是靠閱讀《國家地理雜誌》來暫時逃離現實生活；我則是透過藝術和音樂。雖然夢想成為下一個羅許

有點不自量力，但就像我那些朋友的家人蒐集藝術藏品一樣，我至少能——把披頭四、滾石合唱團、海灘男孩⁷²和巴布·狄倫的專輯收齊。

我有一位同學叫魯迪·史特赫林（Ruedi Staechelin），他家族的藝術收藏量之豐，在全蘇黎世無人能出其右。魯迪的祖父魯道夫（Rudolf）擁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法國印象派（莫內、雷諾瓦、希斯里⁷³）與後印象派（梵谷、高更）藏品。魯迪日後也進入蘇富比工作。不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場災難降臨在史特赫林家族。他們擁有瑞士最大的包機公司：環球航空（Globe Air）。他們的一架布里斯托不列顛尼亞型（Bristol Britannia）飛機，在從泰國曼谷飛往巴塞爾途中，因遭遇雷暴雨，而墜毀於賽普勒斯尼古西亞（Nicosia）附近，機上一百二十六人全數罹難，多數乘客為出國度假的瑞士人。兩名機師都違反法規超時工作，其中一位的飛行經驗未達最低時數標準。空難家屬陸續對史特赫林家族提告求償，但家族拿到的保險理賠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罹難者的賠償金，為了要度過眼前的財務危機，他們只有出售藝術藏品一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何謂財務困境，有錢的瑞士人根本罕有金錢煩惱，我的國家的銀行業就和起司、手錶一樣出名。

史特赫林家先賣了一幅梵谷給沃爾特·安納伯格（Walter Annenberg，在那之後不久，尼克森總統任命他為美國駐英大使）⁷⁴。但單單賣一幅梵谷解決不了燃眉之急，他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畫，而安納伯格堪比是他那個時代的卡達王室（Qatari）⁷⁵，口袋深如峇那峨海溝（Mindanao Trench），雄厚財力夠他永不餓足地狂買。接下來待售的是兩幅價值連城、永久借展給巴塞爾美術館的畢卡索畫作，兩幅都是傑作：一九〇六年粉紅時期的作品〈兩兄弟〉（*Two Brothers*），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作品〈坐著的小丑〉（*The Seated Harlequin*）。安納伯格打算購買它們的消息一傳出，巴塞爾市民憤然反對，不僅因為安納伯格是美國人，而且還是個暴發戶。他不是靠印

刷《聖經》致富，賣的是《賽馬》雜誌 (*The Daily Racing Form*) —— 一本賽馬下注的聖經。再者，他父親是做過牢、有案底的人。

不過，即使買家是英國女王，巴塞爾市民照樣會伸張這兩幅畫的所有權。畢卡索只在巴塞爾待過一晚，他前去拜訪友人：瑞士藝術家保羅·克利，卻被放鴿子，因此投宿在萊茵河畔三王大飯店 (*Les Trois Rois*) 的面河房間。儘管如此，巴塞爾市民把畢卡索視為本地人。因為收有他許多作品的藏家都是巴塞爾市民，比如羅許、史特赫林，以及全市首屈一指的畫商恩斯特·貝耶勒 (Ernst Beyeler)。貝耶勒經手了四百件以上的畢卡索作品，賣給世界各地的買家。巴塞爾市議員和美術館高層去拜訪史特赫林家族，詢問要花多少代價才能把這兩幅畢卡索作品留在市內。史特赫林家開價將近一千五百萬美金 (約臺幣四億五千萬)，讓這兩幅畫作瞬間晉升為當時全球最貴的畢卡索作品。巴塞爾市民很有錢，但不像安納伯格那樣有錢，所以市政府決定辦公民投票，交由市民決定是否該花費公帑買下畫作，畢竟許多人認為這個價格太過荒唐，簡直是藝術界的溢價回購⁷⁶。

隨之而來的是巴塞爾史上最熱鬧繽紛的公投宣傳活動。政治人物打扮成小丑來催票，還有盛大的街頭市集，各處可見當地藝術家擺攤賣自己的畢卡索仿作，其間交錯著香腸攤和啤酒花園；在街頭表演的樂團把披頭四〈你需要的是愛〉 (*All You Need Is Love*) 唱成「你需要的是畢卡索」；民眾別著「我愛巴布羅」的圓形徽章，就像是艾森豪競選美國總統時「我愛艾克」口號的翻版。至於節儉、保守，如同蘇格蘭人般小氣吝嗇的另一派瑞士人，則堅決反對由市政府出資購買畫作，斥之為巨額浪費。

公投前的造勢活動也呈現出青年與老一輩的對壘狀態，雖然年輕世代一面倒支持買下畫作，但仍有一些經濟較貧困的孩子認為這是最糟糕的擺闊行為。因此魯迪·史特赫林在學校操場、足球場上就成了大家的眼中釘，挨揍在所難免。他父母只得把他送到城外另一所學校就讀。投票結果，支持買畢卡索的一方取得壓倒性勝利。在全球民主史上，這是首次有一個城市針對藝術議題進行公民投票；這是巴塞爾

最光輝的時刻。畢卡索本人深受感動，另外捐贈四幅作品給巴塞爾美術館，還附加一件無價之寶：一九〇七年作品《亞維農少女》（*Les Femmes d'Alger*）的素描草稿。他的慷慨舉動啟發其他人起而效尤，包括羅氏大藥廠集團繼承人之一：瑪雅·薩赫（Maja Sacher）夫人。她的丈夫也是積極的藝術贊助人，有個音樂家好友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薩赫夫人將她擁有的一幅畢卡索立體主義傑作捐贈給巴塞爾美術館，環球航空的悲劇最終讓巴塞爾市成為大贏家。

-
- 61 是中世紀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神學家，為北方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
 - 62 電影《亂世佳人》的男主角。
 - 63 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德國裔的瑞士籍畫家。原先創作以黑白為主的版畫和線畫，後來，成為彩色畫的畫家。他和俄國畫家康丁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四），都是當時包浩斯的名師。
 - 64 一九五五年迪士尼剛進軍電視界不久，便拍攝了這部真人真事電影，講述西部拓荒時代的傳奇人物，共三部曲，風靡全美。
 - 65 瑞士銀行家（一八八九～一九六五），後遷居巴黎，收藏了許多重要的純粹和立體主義的藝術作品。
 - 66 費爾南·勒澤（Fernand Leger, 1881-1955），機械派與立體派繪畫大師。
 - 67 胡安·格里斯（Juan Gris, 1887-1927），是西班牙畫家、雕塑家。立體派畫家中頗具特色的一位。
 - 68 法國建築師、室內設計師、雕塑家、畫家，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也是功能主義建築的泰斗，被稱為「功能主義之父」（一八八七～一九六五）。
 - 69 羅伯特·羅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美國普普藝術的先鋒。
 - 70 詹姆斯·馬歇爾·罕醉克斯（James Marshall Hendrix, 1942-1970），暱稱吉米·罕醉克斯。著名的美國吉他手、歌手、音樂人，公認是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電吉他演奏者，也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音樂家之一。
 - 71 罕醉克斯組的樂團：罕醉克斯體驗樂團（Jimi Hendrix Experience），於一九六七年推出的單曲。
 - 72 海灘男孩（The Beach Boys），美國衝浪搖滾的經典代表樂團，反映加州青年文化。四十年的輝煌成績使其成為最成功的美國樂團之一；一九八八年入選搖滾名人堂。

73 阿爾弗雷德·希斯里（Alfred Sisley, 1839-1899），法國印象派創始人之一，主要創作風景畫，但在生前並不被人看重，死後才獲得好評。

74 美國知名的出版大亨，暢銷雜誌《電視指南》（TV Guide）的創始人，也是慈善家及外交官（一九〇八～二〇〇二）。

75 位在阿拉伯半島波斯灣的卡達（Qatar），因石油及天然氣致富，堪稱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而卡達王室也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品買家之一。

76 是指投機者購買目標公司大量的股票，企圖加價出售給該公司的收購者，或者是以更高的價格把股票賣回給該公司，該公司為了避免這部分股份落入公司收購者之手，只能用高於市場的價格買回。

第四章 藝術家

在巴塞爾長大的我，少年時做著三個夢：成為足球明星，或搖滾巨星，或偉大的藝術家。儘管這三個領域的傑出人士眾多，比利（Pele）⁷⁷、保羅·麥卡尼和畢卡索是我心目中的聖三角。不過，因為我踢不好球，唱不好歌，我只好走最後一條還能通往夢想的道路。我愛巴布羅⁷⁸。這個口號成了我的口頭禪，而早在父母前往日本以前，我已經在畫素描，後來也去上課，開始畫油畫。雖然我主要靠自學，但大大出乎我雙親預料的是，我的老師竟然認為我畫得不錯。別的父母大概會覺得畫畫不是什麼正途，但我的課業成績實在糟到無藥可救，以至於我父母寧願一廂情願地認可我的藝術天分。他們鼓勵我持續下去，努力學好一個專長。

我童年時期最精采的日子是暑假，那時我會出國，去日本探望父母。對我來說，那是一場名符其實的冒險，因為他們住在大倉飯店，過著氣派的生活。大倉飯店是一九六〇年代現代主義建築的傑作，設計絕妙精采，和柯比意設計的羅許別墅不相上下。我很喜歡夜晚的銀座，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閃爍，看來就像一個夢幻世界，與傳統風格的巴塞爾截然不同。我也喜歡東京新舊交融的魅力，高速現代化之下還保留著古老傳統和高深莫測的寧謐之美。要知道，我是在東京第一次吃到壽司；也在銀座生意興隆的麥當勞第一次吃到大麥克漢堡。

我父親成為企業首腦，為羅氏大藥廠在日本成立分公司，我母親也沒閒著，她憑自己的努力成為藝術家。她學習日式插花藝術，進而成為日本花道專家。她是第一位取得草月流（日本花道最前衛的流派）一級設計師資格的非日籍人士。等到我父親退休，和母親搬回巴塞爾以後，她在城裡開了草月流海外支部。即使我毫無蒔花弄草的本領，仍然與有榮焉，家中出了一個藝術家，對我是莫大鼓舞。連我父親也投入藝術創作，他在東京生活時曾向雕塑家井上幸男（Yukio Inoue）學藝。

我十七歲那年去華盛頓參加哥哥的婚禮，順道去了紐約，那是我的初訪。父母原本不想讓我去，因為我的課業成績太糟，害我沮喪透頂。他們最後心軟可憐我，父親甚至吩咐我好好地玩。他見我如此不成材，很篤定我將來不會再有出國旅行的機會，而我現在過著以飛機為家的生活。想起往事，我付諸一笑，但心裡也忖度，或許我雲遊四海只是為了證明給父親看，我沒他料想的那樣沒前途。

無論如何，我父親有一點說對了，我是該好好享受第一次見識外面世界的機會。我年少時最開心興奮的一個時刻，就是飛機即將降落甘迺迪機場，而我透過窗戶看到曼哈頓的雄偉天際線。我投靠住在格林威治村的堂姊瑪麗·德·普里（Marianne de Pury），她過著美式的波希米亞人生活：在距離百老匯遙遠的地下劇場演戲，跟長頭髮的藝術家、音樂家混在一起。聽她隨口說起查爾士·明格斯（Charlie Mingus）⁷⁹的事，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這趟令我心蕩神馳的紐約之行，最美妙的時刻是我在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度過的一整天。親眼看到畢卡索的〈桂尼卡〉（*Guernica*），更激勵我以藝術家為志。我愛巴布羅！

接著，我搭乘都會特級列車到華盛頓參加婚禮，初次見識了美國的權力政治。我準嫂嫂的父親恩斯特·庫尼奧（Ernest Cuneo），是當時民主黨內極具影響力的華盛頓特區律師。庫尼奧曾是哥倫比亞大學和職業聯盟的美式足球明星，後來成為前紐約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的左右手，也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首席顧問。拉瓜迪亞後來成為全球頂尖的媒體法律師，一九五〇年代最火紅的八卦專欄作家沃爾特·溫徹爾（Walter Winchell）也聘他為顧問律師。當天有許多參議員、前內閣官員、報業老闆到場觀禮，不過，再一次，我心裡只有藝術。

我的華盛頓之行最令人興奮的時刻，並不是和後來的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范錫（Cyrus Vance）有一面之緣，而是在美術館裡又度過愉快的一天；這次去的是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當時的館長是剛展露頭角的卡特·布朗（Carter Brown）。布朗家世高遠，早在英格

蘭移民搭乘「五月花號」抵達東岸以前，其家族就已在北美大陸落地生根。他畢業自哈佛大學，後來受到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⁸⁰的栽培。假使當時有人跟我說許多年後，我和他會成為同僚，我想必會一笑置之，以為是什麼科幻小說的情節。總之，我很高興能到華盛頓一遊，能夠參觀國家畫廊就猶如天賜恩寵。

隔年，我成績平平地從高中畢業，隨即面臨兩種選擇：去服半年兵役（拜託，別又拿瑞士海軍⁸¹當笑柄），或是進入法學院過更難捱的生活。父母期望我以哥哥大衛為榜樣，但毫不指望我能跟他一樣當律師。至於向另一個哥哥阿爾搏看齊，成為聲譽卓著的神學家，更是絕無可能的事。他已是有名的舊約聖經研究學者，在日內瓦大學擔任榮譽講座教授，也是該校最年輕的終身聘教授，還能說流利的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我姊姊瑪麗伊莎貝爾（Marie-Isabelle）倒毋須面對非此即彼的生涯選擇，雖然今日的她很可能會抱怨雙親對女兒的期望較低，無異是一種性別歧視。她後來成為護士，先到達荷美（Dahomey）⁸²工作和生活，然後返回家鄉嫁給一位傑出的律師，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在放棄青春、毅然接受別人為我規畫的輝煌前途以前，我想放手最後一搏，盡情揮灑我的藝術夢。因此，我搬到東京住了幾個月，註冊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話說大學校區所在的上野公園就如同柏林的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匯集了許多代表性的博物館、美術館。我在那裡學習「墨繪」，即日本水墨畫。如同東方書法，這是一種運用不同濃淡的墨色塗刷勾繪的畫法，重點在於「五十道陰影」一層次感。

畫水墨的每一步驟都令我著迷不已：本身已是一件藝術品的竹管毛筆；以植物為原料、美得不可方物的和紙；還有高深複雜的運筆技巧。看似很簡單，但弗雷·亞斯坦（Fred Astaire）⁸³的舞步不也是乍看簡單，但跳起來累人。其實任何一筆一畫都是經過千錘百練的真本事，但作畫過程絕不枯燥乏味，我感覺就像是重獲新生。我也學習了被稱為膠彩畫（nihonga）的日本傳統繪畫，是以礦物顏料在絲絹上作

畫。我還陪父親去上雕塑課，跟井上先生商借幾尊美麗作品來畫素描作業。這種親密無間的藝術父子情，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

我喜歡日本藝術的種種美麗傳說，比方說，十七世紀有位神官想要一隻巨毫來創作巨幅畫作，於是他把頭髮留長，束起髮辮來沾墨水，就是現成的人體畫筆。我發現日本古代藝術在許多方面遠遠超越了同時期的歐洲藝術。二次大戰後盛行紐約（早於普普藝術）的新流派，以波洛克、羅斯科（Rothko）⁸⁴、紐曼（Newman）⁸⁵、德·庫寧（de Kooning）⁸⁶等畫家為代表，強調非具象、表現情緒、反傳統的抽象表現主義，更是與日本繪畫有許多共通點。我也和梵谷一樣熱愛浮士繪版畫，從中汲取不少靈感。而這分愛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得到回報，那時我在蘇富比任職，日本買家持續以天價搶標梵谷和雷諾瓦的作品，創造了藝術史上最大的牛市。

天價中的天價出現在一九九〇年，日本造紙業大亨齋藤良平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八千兩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二十四億七千五百萬）購入梵谷一八九〇年的畫作《嘉舍醫師的畫像》（*Dr. Gachet*）。而該場拍賣會的隔天晚上，我有機會打破這個甫創下的全球最高價格紀錄。我當時在蘇富比工作，那天我們的拍賣會上有一幅雷諾瓦一八七六年的作品《煎餅磨坊的舞會》（*Bal du Moulin de la Galette*），我代理一位勢在必得的電話競標者出價。於是，我和齋藤良平先生展開一場藝術版的相撲對戰。我真欣賞齋藤先生是靠造紙致富，那是一個多麼適合藝術藏家的行業。他可說是日本版的彼得·布蘭特，一人從事製紙業，另一人是出版業，而兩人都熱愛藝術收藏。

此幅雷諾瓦拍品為美國豪門惠特尼（Witney）家族所持有。我這位買家來頭也不小，而且買意十分堅決，不過，終究不像齋藤先生那麼堅決，他抬到七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二十三億四千萬）的價格，我們只能瞠乎其後。我代表的買家是次高出價者，我未能如願創下紀錄。就差一點點，功敗垂成。前後登場的這兩場拍賣會震撼了整個藝術界，簡直是敗家奢華史上的最盛大購物狂歡節，也是日本人雄厚財

力的戲劇化展現（一如日本人後來買下洛克斐勒中心、圓石灘高爾夫球場〔Pebble Beach〕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Columbia Pictures〕）。

齋藤先生的光輝日子不料只是曇花一現。首先，他聲稱死後要與這兩幅畫一起火化，引發藝術界嘩然。隨後，他表示是玩笑話，但藝術傳媒領會不了他的幽默。後來又爆發他行賄的醜聞，他企圖用賄賂的方式加速一塊森林地的土地使用類別變更。他預定在那塊地上創建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還計畫將它命名為梵谷。收藏熱情無與倫比的齋藤先生於一九九六年死於中風，或許他試圖藉由藝術獲得名聲，卻過快就從巔峰跌落，以致積勞成疾。他購買的梵谷畫作從此消失在世人面前，下落不明。說來可悲，他是典型的「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實例。不久以後，藝術市場從高峰轉跌，有好一陣子，人人都急於找出當初炒熱牛市、炒熱價格廝殺的代罪羔羊。我反而要深感慶幸，創下最高價紀錄的人不是我。

先擱下我已闖出一番事業的一九九〇年，回到一九六九年。當時，身為籍籍無名的菜鳥畫家，我根本與藝術市場沾不上邊。我準備回瑞士服兵役的旅途上，更赫然發現自己有多麼不自量力。那時候我從東京先飛到紐約市，想試著賣掉我在日本完成的畫作。我從甘迺迪機場搭巴士到市區，一路上，映入眼簾的壯觀天際線讓我驚歎連連。儘管震懾於這樣的美景，但我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天真衝勁，毫不畏懼任何剛入行藝術家（請容許我厚臉皮地自稱藝術家）都要面對的閉門羹。

我再次跑到格林威治村，賴在我那位有藝術氣息的堂姊家裡，也擬好作戰計畫。我打算毛遂自薦，遍訪在《紐約時報》有登大版廣告的每一家畫廊。畢竟這裡是大蘋果，什麼都大。在這裡，愈大的愈好，至少看似如此。第一站去曼哈頓歷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諾德勒畫廊（Knoedler），它位在上城五十七街和第五大道路口，與蒂芙尼珠寶（Tiffany's）、邦維泰勒百貨公司（Bonwit Teller）、海瑞溫斯頓珠寶（Harry Winston）面對面。儘管有反越戰示威者舉著標語牌遊行

於街頭，與滿街時髦亮麗的女性消費者如此不搭，你依然可以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金錢、奢華、貴氣。

「您好，我找諾德勒先生。」我對一張撲克臉的櫃臺接待員施展迷人笑容。

「這裡沒有這個人。」她冷冷地回道，目光嫌惡地瞪向我的作品袋，彷彿當我是一個背著全部家當的流浪漢。

我是做了一些功課，但做得還不足。創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諾德勒畫廊本來是一家巴黎畫廊的分部，它的第一任經理人是德國人—我仗著自己的歐洲氣質，以為可以在這間歐洲血統的畫廊通行無阻呢！諾德勒畫廊在十九世紀末那段「鍍金時代」累積起名聲和財富，它專門賣古典大師的作品給一夕暴富的強盜資本家，諸如阿斯特（Astor）[87](#)、弗里克（Frick）[88](#)、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89](#)、梅隆（Mellon）[90](#)、洛克斐勒等人。目前的畫廊老闆仍是諾德勒家族成員，但名為羅蘭·巴雷（Roland Balay）。不久後，他將畫廊易手給企業家阿莫德·哈默（Armand Hammer）[91](#)，我日後將透過提森—博內米薩男爵結識該位大人物，但在這當下，櫃臺接待員可沒有一個能夠預見未來的水晶球。她當然可以替我引見巴雷先生，名義上，他是這裡的「諾德勒」先生沒錯，但她不認為有必要。她眼前的我就是個無名小卒，所以我吃了閉門羹。

在二〇一一年，這家顯赫的老字號畫廊爆發販售假畫醜聞，因而無預警地關門大吉。從波洛克、迪本柯恩（Diebenkorn）[92](#)到羅斯科，每幅售價數百萬美元的贗品皆是由居住在皇后區的一名中國畫家所仿作；他是在街頭出售這些仿畫。因畫廊的一位買家將購得的畫作送交科學鑑定，結果畫上某些顏料與畫家所屬的時代不符，這才發現買到假畫。我的一位好朋友多明尼克·迪梭（Domenico De Sole，曾讓古馳〔Gucci〕起死回生的前總裁；蘇富比拍賣行現任董事長）當年也是受害者，他在諾德勒畫廊買到一幅羅斯科偽畫，可見縱使是經驗最老練的藏家，縱使擁有查證作品來源的資源，仍然有可能上當。

總而言之，憑我這等貨色，唬弄不了諾德勒畫廊。於是，我沿著麥迪遜大道走了又走，前往七十七街的下一站：里奧·卡斯特里畫廊（Leo Castelli Gallery）。兩年後，卡斯特里畫廊遷移到西百老匯，從此扭轉了紐約藝術界的軸心區。但就目前而言，藝術版圖仍位於上東城，由穩固屹立的蘇富比·帕克博內拍賣行（Sotheby Parke-Bernet auction house）據守。卡斯特里畫廊就座落在麥迪遜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間，如同諾德勒畫廊一樣，它所在建築物是一幢設計別緻的連排屋。卡斯特里是繼約瑟夫·杜維恩之後，又一位家喻戶曉的藝術經紀商，起碼住在公園大道或格林威治村的每戶人家都聽聞過其名。

個子不高、溫文儒雅的卡斯特里先生原姓庫魯斯（Krausz），成長於第里雅斯特（Trieste），拿到法律學位後任職於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一家保險公司。他毫無藝術背景這個事實，將是我在法學院忍受痛苦煎熬時的莫大鼓舞。他在羅馬尼亞的保險公司工作時，遭藝術與愛情的閃電雙雙擊中。在那裡，他與一個服飾業家族千金伊蓮娜·夏皮拉（Ileana Schapira）相遇，後來共結連理。富商岳父送女兒和女婿一幅馬蒂斯（Matisse）畫作當作結婚賀禮，不久後，更進一步資助女婿在巴黎的凡登廣場、麗池飯店對面開設一家畫廊，里奧的事業起點就已不同凡響。後來，夫妻倆為了逃離納粹迫害，透過伊蓮娜家族的人脈，取道摩洛哥丹吉爾（Tangier）和古巴哈瓦那（Havana）前往紐約，到了美國以後，他建立了更廣闊的事業版圖。

二次戰後，卡斯特里夫婦很快地融入紐約當地藝術圈，結識多位剛崛起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比方波洛克、德·庫寧；他們也與幾家新銳畫廊的老闆建立交情，其中一位西德尼·亞尼斯（Sidney Janis）⁹³給予里奧不少幫助和提攜。到了一九五七年，卡斯特里開設了自己的畫廊，不只經紀波洛克、德·庫寧、湯伯利（Twombly）⁹⁴等抽象表現主義明星，也簽下日後將聲名大噪的幾位普普藝術王子，包括瓊斯（Johns）⁹⁵、羅森伯格、李奇登斯坦、沃荷（他起初遭到回絕，二度叩門才獲青睞）。我興沖沖前往的目的地，正是這樣一家旗下只有大師名家的畫廊。我究竟是有多瘋狂，竟然妄想可以敲開它的大門？

我畢竟沒有其他門路。他們登了大版廣告，我知道是可以一試的地方。

「請問卡斯特里先生在嗎？」我問。

「他出差不在。」打扮時髦、神色冷淡的櫃臺接待員回道。

「我有一些作品，想請他看一看——」

她隨即打斷我：「卡斯特里先生只代理美國藝術作品。」她單聽我的口音就將我宣判出局。她根本不知道我那厚鼓鼓的作品袋裡裝著哪種畫。

「這是日本藝術。」我試著殊死一搏。

「卡斯特里先生只代理美國藝術。」她厲聲說。

我至今旅行各地的次數不計其數，那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我深深感覺自己是個外來者，來到一塊格格不入的陌生土地。話說，美國人去到像樓閣餐廳（Le Pavillon）那樣的美食聖殿，竟然還抱怨法國人領班態度倨傲呢。吉亞尼·阿涅利遇上這位傲慢女子恐怕都會不由自主生出自卑感。我連忙為自己貿然登門打擾致歉，接著就溜之大吉。

我的第三站是史丹菲利畫廊（Staempfli）。同樣位於七十七街，就在麥迪遜大道東側。喬治·史丹菲利（George Staempfli）因代理達利的作品而享負盛名。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他是瑞士人，出身伯恩；我們既是同胞，他絕無可能像卡斯特里畫廊那般，用「不要歐洲人」的藉口打發我。史丹菲利先生曾在諾德勒畫廊任職，接著在一九五九年自立門戶，開設了這家畫廊。他專門經紀歐洲藝術家，我認為自己也屬於其中一個。

「您好，我找史丹菲利先生。」我開門見山地說。

「很抱歉，他不在。」櫃臺接待員回道。她是典型的美國金髮女孩，是那種開朗陽光、就像美式足球啦啦隊長的類型，並不是穿一身

黑的晚娘面孔守門人。而她確實人如其表，相當和善，沒有對我不理不睬。「他馬上會回來。你何不留下作品袋，三個小時後再來。」

我欣喜若狂。只要有藝術的地方就有希望。接下來的三小時，我走過摩天樓聳立的麥迪遜大道，漫步穿過中央公園，還參觀了大都會博物館和古根漢美術館。我想像著在紐約當藝術家的生活會有多麼精采，然後又任由想像力從最光輝的頂端墜入黑暗深淵，忖度在瑞士當一個律師會有多麼糟糕。我想起狄更斯寫律師行業的小說《荒涼山莊》。兩者之間該怎麼選擇，答案看來很明確了。但是，做出決定的人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同胞喬治·史丹菲利。我的未來、我的藝術家生涯，全操在他的手中。

「史丹菲利先生喜歡你的作品。」我一走進門，金髮「啦啦隊長」就朗聲宣布。有那麼一秒，我的藝術夢想終於成真。史丹菲利、達利、德·普里，多棒的鐵三角！我喜歡巴布羅。「只不過……」

我已不記得她用哪個理由回絕我，「只不過」三個字在我耳裡轟隆迴響，我再也聽不見其他聲音。美麗的接待員或許以最光明正面的方式說出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但我照樣受到打擊。我拿起作品袋，轉身離開。我知道我在紐約的美夢結束了，回瑞士加入陸軍或海軍都好，反正都不重要了。至少我努力過了。當我垂頭喪氣，拖著沉重腳步行經蘇富比·帕克博內這幢藝術殿堂時，壓根想不到猛吃閉門羹的自己（簡直是我青春期遭遇的重現。那時每逢體育課要分隊比賽，無輪哪一邊的隊長都不願選我為隊友），有一天會以專業人士之姿重回到這片藝術崇高聖域。畢竟，那就跟妄想有朝一日能與滾石樂團同臺飆吉他一樣，怎麼看都像是痴人說夢、天方夜譚。

77 巴西著名職業足球員，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體育明星之一，有「球王」（The King of football）的稱號。

78 畢卡索的名字，Pablo Picasso。

79 美國爵士貝斯手、作曲家、樂隊領隊，有時還是鋼琴手（一九二二～一九七九）。

80 美國藝術史學家（一八六五～一九五九），主要鑽研文藝復興時期。

- 81 意指不臨海卻有海軍。
- 82 非洲貝南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u Bénin）舊稱。
- 83 美國電影演員、舞者、舞台劇演員、編舞家與歌手（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 84 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生於俄國，後移居美國。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開創色域繪畫風格，對美國二次大戰後現代主義抽象表現繪畫的發展影響深遠。
- 85 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 1905-1970），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同樣也是色域繪畫的先鋒。
- 86 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出生在荷蘭鹿特丹，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
- 87 從德國移民至剛剛獨立的美國，早期透過貿易（包含鴉片、皮毛、茶葉等）致富，後又投資房地產，成為美國第一批百萬富翁之一。
- 88 十九世紀崛起於美國賓州的鋼鐵煤碳大亨，但最為今人稱道的為其藝術方面的貢獻，如位於曼哈頓的藝術博物館：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
- 89 從荷蘭移居美國、興起於鍍金時代的范德堡家族創始人。因經營航運與鐵路運輸業而致富，其家族至二十世紀中葉沒落，但仍是歷史上第七富裕的家族。
- 90 因金融業而致富的美國賓州家族，至今不墜。
- 91 俄裔美國人（一八九八～一九九〇），企業家，號稱「商業天才」。哈默一生從事過許多商業活動，古董與藝術品交易只是其中一項。同時哈默也是社會活動家，特別是對美國與蘇聯的外交多有貢獻。
- 92 理查·迪本柯恩（Richard Diebenkorn, 1922-1993）美國畫家。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抽象表現主義和美國灣區畫派風格，後期則轉為抽象畫。
- 93 不僅是擁有自己畫廊的藝術收藏家，同時也是成衣業大亨（一八九六～一九八九）。
- 94 塞·湯伯利（Cy Twombly, 1928-2011）美國畫家、雕刻家及攝影師。曾被《紐約時報》評為這個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
- 95 傑斯帕·瓊斯（Jasper Johns），美國當代藝術家，擅長油畫和版畫。雖然他被視為普普藝術的大師，但也被譽為新達達主義的代表。

第五章 學徒生涯

漫長得彷彿沒有盡頭的新兵訓練和當兵日子，猶如一場肉體苦修，是用來痛切悔改我在日本享受的精緻優雅生活。服役期間，我唯一的救贖是想著心上人。在東京學藝術的時候，我愛上了一位將軍的千金，是這段戀情支撐我熬過嚴酷的基本軍事訓練。後來將軍成為派駐巴黎的武官，而女兒在巴黎為思琳（Céline）品牌走秀。我很想去見她，因此需要請三天的假。我戰戰兢兢走到指揮官面前，一邊想著該用哪個藉口，該胡扯有親戚過世嗎？或是自己罹患了某種疑難疾病，只有巴黎的某位專家能醫治？指揮官一眼看穿我患的是相思病。他對我說：「我也是男人，去吧，盡情地玩。」

我們家族的一些朋友知道我深愛藝術，曾送我生日禮金，好讓我存錢買下生平第一件收藏品。結果我拿著這筆錢和女朋友跑到蔚藍海岸度假，當作是預度一場蜜月旅行，住豪華酒店，上高級餐廳，把每一分錢揮霍精光。我的藝術收藏之路就這麼劃上句點，起碼就那時候來說，我只能斷了買畫的念頭。藝術可能就像一個嫉妒的情人，但藝術終究敵不過一個活生生的真正情人。我的女朋友最後返回日本；我們靠長途電話維繫關係（那年代的電話費可是貴得嚇人）。我再也不去想藝術的事，並準備面對另一個鼎鼎有名的嫉妒情人：法律。

我以為軍旅生涯很糟，但法學院生涯更糟。不是說學校糟。我那位神學家哥哥任教的日內瓦大學（University of Geneva）是在一五五九年由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96](#)所創辦，其法學院與美國哈佛法學院有交換學程協定，所以這兩所學院被視為姊妹學校，起碼瑞士人都這麼想。如果巴塞爾大學是萊茵河畔的哈佛，日內瓦法學院就是五湖區的哈佛。無論如何，對我而言，那是一所太優秀的學校，我根本念不來。

巴塞爾是文化城；蘇黎世是金錢之都；日內瓦則是珠寶之都，藝術只是一種錦上添花。當時全市只有五家上得了檯面的畫廊。那裡為

數不少的有錢人，更喜歡有形資產；因此海瑞·溫斯頓、卡地亞、梵克雅寶、寶格麗等珠寶品牌滿街林立，三步一家，五步一店。在紐約有蒂凡內的早餐，在日內瓦，人們可以一邊看溫斯頓櫥窗裡的珠寶，一邊吃起司火鍋。我對珠寶或金錢都毫無興趣，我想念巴塞爾和那裡的藝術。我在舊城區詩情畫意的格朗日街（Rue des Granges）租了一間小得可憐的頂樓房間，盡我所能好好地學習法律。但是第一次期中考，我一看到考卷就愣住了；我回答不出任何一個問題。於是，我輟學離校。就像當初在紐約的卡斯特里畫廊倉皇敗退一樣，我灰頭土臉地離開日內瓦回家去。

我一回巴塞爾，消息就傳到人在日本的母親耳裡，她狠狠發了一頓脾氣。然而，我母親從來不會沉湎於失敗，她是行動派，她隨即打電話給老朋友恩斯特·貝耶勒，跟他叨叨述說自己有多傷心絕望，也許為了戲劇效果，還過度誇大自己的處境。「我不知道該拿這個孩子怎麼辦，我走投無路了，你可以幫幫我嗎？」叫他來找我，貝耶勒對她說。

慨然接下燙手山芋的恩斯特·貝耶勒，當年五十來歲，是城裡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波恩蘭加斯街（Bäumleingasse）九號開設的畫廊，堪稱是當地的藝術聖殿，而畫廊附近就座落著另一座聖殿：巴塞爾美術館。就因為巴塞爾是座小城，所有人彼此相識，我母親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他商量。不久後，在一九七一年，他協助創辦巴塞爾藝術展，再過三十年，他委託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⁹⁷操刀設計，在巴塞爾市郊建立自己的美術館——它也許是全球最佳的一座私人美術館。不過，我去見他時，他只是貝耶勒先生——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家族朋友，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才。

要不是我和他有同鄉關係，去見他一面，恐怕要比求見里奧·卡斯特里更讓我心生畏懼。雖然恩斯特·貝耶勒本人平易近人，但任何人只要知道他的成就，莫不心懷敬畏。他被視為全球最具權威的二十世紀藝術鑑賞家，也是專營該時代作品的頂尖畫商。他生於鐵路工人家庭，一個與藝術八竿子打不著的瑞士家庭，如今擁有如此顯赫地

位，可謂成就了一番豐功偉業。貝耶勒身材高大精瘦，看起來更像一名粗獷英俊的滑雪教練，而不像藝術專家。他對待我的態度親切和善，讓我印象深刻。正因為如此，後來的我，對於任何有意踏進藝術這行的年輕人，總會盡力給予建議；正因為如此，我才會接下實境選秀節目《藝術新秀生死鬥》（*Work of Art*），擔任參賽者的導師。我曾經需要協助，現在的我則是盡我所能給予後輩支持和幫助。但那時的我要是知道，自己有一天會在數百萬觀眾收看的電視節目裡給人忠告，肯定會驚訝得合不攏嘴。

貝耶勒跟我一樣是大學中輟生，他在二次大戰期間來到巴塞爾為古董書商人奧斯卡·施洛斯（Oskar Schloss）工作。施洛斯是流亡的德籍猶太人，自稱是佛教徒。我猜想在那時候，即使是在中立國瑞士，身為佛教徒依然安全得多。貝耶勒則是跟我一樣熱愛日本藝術。施洛斯於一九四五年去世以後，貝耶勒買下他的古書店。他舉辦的第一個展覽就是日本浮世繪展。因此，除了我的脫序行為，我和他還有別的話題可聊。貝耶勒一開始和我閒扯的話當中，有一句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太過漂亮反而不美。」這句話出自立體派畫家勒澤，我旁邊的一面牆上，就懸著他的幾幅畫作。總之，和人面獅身像之謎一般令人費解的這句話，驀地把我敲醒，讓我思考起來，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我最好留心聽恩斯特·貝耶勒要說的話。坐在這位偉大的藝術品經紀商身邊，我仍然把自己視為藝術家—固然胸懷大志，但迄今只有失敗—儘管如此，仍然是一個藝術家、創意人，而不是生意人。然而，貝耶勒有種本事，能讓你覺得買賣藝術品就跟創作藝術一樣神奇、迷人。顯然，說到藝術買賣，沒有人做得比他更好，而當你擅長一件事，你的非凡本領會讓你做的任何事情都顯得如此出色、令人著迷。因此，我完全被他俘虜，主動說起幾個月前的美國行，在紐約遭遇了多麼冰冷，或者該說寒風刺骨的對待。他跟我分享個人經驗，說他過去也屢屢吃美國人的閉門羹。

造就貝耶勒巍峨事業基石的，是一位出身印第安納州佩魯（Peru），白手起家的鋼鐵大亨。佩魯還出了另一個著名人物，作曲

家科爾·波特（Cole Porter）[98](#)。不搞音樂的那一位大亨名叫G·大衛·湯普森（George David Thompson）。他也是中輟生，原本在匹茲堡的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沃荷也是該校畢業生）讀工程學，但遭退學。他並沒有因此氣餒，隨即進入華爾街金融圈工作，賺了大筆財富之後即返回匹茲堡。在一九四五年，還不到四十歲的年紀，他已是四家鋼鐵公司的老闆。鋼鐵業的獲利支持湯普森追求他真正的熱情，也就是藝術。他對藝術的興趣啟蒙於童年時期。佩魯當地百貨公司曾請一位「藝術家」坐在櫥窗裡，凡是購物滿十元的消費者可免費獲贈一幅畫作。湯普森找上每個拿到畫作的購物者，出一點點錢跟他們買下；一個收藏家就此誕生。一九二八年，湯普森買下生平第一幅「真正」的畫作：克利的作品。從此以後沒有停止過買畫。

座落於阿勒格尼河（Allegheny）和莫農加希拉河（Monongahela）交會處的匹茲堡，那裡的河水必然孕育著某種特質，美國幾位重要藝術收藏家都出身該座工業城，最知名的包括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弗里克收藏的創始人）、保羅·梅隆（Paul Mellon，美國國家畫廊主要贊助人）、鄧肯·菲利普（Duncan Phillips，華盛頓菲利普美術館創始人）；旅居巴黎的女作家暨收藏家葛楚德·斯坦（Gertrude Stein）[99](#)也是匹茲堡人。但是說來遺憾，這些收藏家都是在別的城市建造自己的收藏展示館。一九五九年，年近六旬的湯普森提議將自己的龐大珍藏（質量堪稱全美數一數二）捐贈給匹茲堡市政府，並提供自己的超現代未來主義風格豪宅做為展廳，結果匹茲堡市政府斷然拒絕他的好意。

不同於儒雅的保羅·梅隆，湯普森粗野、好鬥，他不是那種足智多謀的藏家，更像他對自己的形容——一個「鄉下馬販」。他的收藏準則簡單明瞭。「早些年，我把藝術分為抽象和寫實兩類，再按畫派區分，比方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他曾寫道。但就像他從卡內基理工學院退學一樣，湯普森鄙棄了這些林林總總的畫派。「我如今只辨別兩種藝術……好藝術與壞藝術。」遭到匹茲堡保守派人士回絕，深

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從此只收集現代藝術，那是保守人士毫無所悉或鮮有興趣的「新」藝術—就像湯普森的新貴身分—太「新」了。到頭來，笑到最後的贏家是湯普森。不過，笑得更響亮的人是貝耶勒，因為是他發財得意，飛黃騰達。

當時湯普森心想，既然無法展示自己的收藏，乾脆悉數賣掉。就像今日的「鄉下馬販」，那個靠囤積藝術家作品致富、在哥倫比亞起家的敘利亞裔穆格拉比家族（他們擁有上千件沃荷作品），湯普森也是史上頭幾位大批買進藝術品的藏家之一。比方說，如果他認為克利作品的價值被低估，他就會購入市場上流通的每一幅克利。他既買了克利，當然也會賣克利，而世上還有比瑞士收藏家貝耶勒更適合的買家嗎？貝耶勒在一九六一年向湯普森買了近百幅克利，還買了九十件賈科梅蒂（Giacometti）¹⁰⁰，數百件馬蒂斯、米羅（Miró）¹⁰¹和塞尚。在自己的家鄉匹茲堡沒能受到重視，大概讓湯普森心碎，他在一九六五年死於心臟衰竭。幾年過後，他妻子繼續替他大出清，賣了上百幅康丁斯基給貝耶勒。

湯普森辭世以後，貝耶勒一躍成為藝術界最大的「馬販」，但他毫無市井之氣。他有好東西，也以得當的方式銷售，他精於溫和的勸誘式推銷。貝耶勒給我看他出版的幾本目錄，設計得就像是藝術精品。這些巧奪天工的目錄贏得了畢卡索的心，在一九六六年，他邀請貝耶勒前往他在法國小鎮穆然（Mougins）的別墅作客，貝耶勒離開時，帶了二十六件作品回畫廊銷售和展示。對我、對別人，貝耶勒將自己形容為「獵人」，而且他捕獲的「大」獵物數量遠勝其他人。

我也見到貝耶勒先生的妻子海蒂（Hildy），她發揮鐵腕與貝耶勒一起經營畫廊生意。夫婦倆沒有孩子，他們經紀、收藏的畫作就是他們的家人，再說，他們認識這世界上所有人，從不會寂寞。我納悶為什麼貝耶勒沒有像瑪勃洛畫廊（Marlborough Gallery）老闆弗蘭克·勞伊德（Frank Lloyd）那般引起國際關注。勞伊德陸續在倫敦、紐約、摩納哥、馬德里、布宜諾斯艾利斯、東京設立畫廊分部（現今拉里·高古軒也拿這套全球擴展劇本走天下，在世界各地設立新據點）。我

想答案只有一個，貝耶勒喜愛巴塞爾，喜愛那裡的藝術氛圍。世界各地的人會去找他；他不需要擴展到全世界。他可能會搬出勒澤那句名言，稍微更動幾個字：「盛名太過反而不威。」

和他會面讓我眼界大開，我當時就下定決心，我不當藝術家了，我要成為藝術經紀商。我顯然很容易受人影響，然而在藝術界，除了畢卡索本人以外，還有誰能比恩斯特·貝耶勒更令人肅然起敬？他試著引導我立定志向。他告訴我，想以藝術為職志的話，除了當藝術家，還有另外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走研究的路，可以教書或寫評論；第二條路是進入藝術市場。貝耶勒單刀直入地問我的偏好：「你對藝術的喜好是智識上的興趣？還是感官式的？」「感官式的。」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不管我的母親是否早已告訴他，我坦然承認自己對念書根本不行，我絕不是啃書研究藝術的人。「那麼你絕不能進學校念藝術史，不然看到的只有書本和幻燈片。你得成為畫商！」貝耶勒說。

「那要怎麼做？」我說出心裡疑惑。貝耶勒已幫我擬妥一個計畫。「我會送你到伯恩的科恩菲爾德畫廊（Kornfeld）見習三個月，然後去倫敦蘇富比待一年，再到紐約蘇富比一年，第三年到瑪勃洛畫廊，最後回來我這裡。」這是一個為期四年的計畫，就像大學課程，儘管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全球大學，而這道彩虹盡頭的金子，是在畢卡索作品的圍繞之下，為藝術之王工作。

於是我就到伯恩去了。瑞士的首都伯恩就跟其他國家的首都，諸如巴西利亞、坎培拉、渥太華、華盛頓等一樣乏味無聊，畢竟這些城市都不是一個國家的商業和文化中心。在這座古老、優雅的城市裡，最有生機活力的地點是「熊公園」（Bären graben / bear pit），一如其名，裡頭住著熊，此種動物既是伯恩市的吉祥物和市徽，也恰恰說明了這座首都慢悠悠的生活節奏。要是有一兩個金髮小女孩歌蒂拉（Goldilocks）[102](#)闖進「熊公園」大鬧一場該有多好……好，好，我是到伯恩工作，而不是玩樂。既然我有這個機會可以追隨恩斯特·貝

耶勒的腳步成為畫商，就算得在伯恩過缺乏娛樂、悶到發慌的生活，也不過是不足掛齒的代價。

科恩菲爾德畫廊堪稱是瑞士的蘇富比。這是一家拍賣行，其響亮名聲奠基於版畫和素描交易，是譽滿全球的傑出經紀商。其悠久、輝煌的歷史可追溯至一八六四年，由一位H·G·顧德昆斯（H.G. Gutekunst）於現今德國的斯圖加特所創立。說來巧合，「Gutekunst」此姓氏恰恰是德文的「好藝術」。一九一九年畫廊搬遷至伯恩，一九五一年，埃伯哈德·科恩菲爾德（Eberhard Kornfeld）接手，更為現名。科恩菲爾德跟嚴肅寡言的貝耶勒南轅北轍，是非常幽默風趣的人，如今已九十高齡仍然不改本性。他的筆跡是我見過最美的，凡是他售出的作品，都會親手書寫來源證明。科恩菲爾德中等身材，有一頭紅長髮和粗眉，儼然像誇張版的愛因斯坦。細數曾在伯恩短暫居住的名人，最赫赫有名的當屬列寧和愛因斯坦。二十世紀初期，尚未揚名立萬的愛因斯坦在瑞士專利局擔任審查員。如果連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過枯燥的學徒生涯，那麼我也做得到。

所幸我的學徒生涯毫不無聊。科恩菲爾德把我當「ein Schnupperlehre」，大致的意思就是說，「一個東看看、西聞聞的實習生。」簡言之，就像一隻找松露的豬，到處嗅一嗅，看哪裡藏著珍寶。我在科恩菲爾德畫廊很快就學到「精確」這一門課。瑞士人能製造出全世界最精良的錶不是沒有原因；科恩菲爾德畫廊的目錄就和貝耶勒的目錄一樣精美，甚至更棒。他把畢卡索版畫賣得嚇嚇叫，與巴布羅有交情，和賈科梅蒂、丁格利（Tinguely）[103](#)、桑法勒（Saint Phalle）[104](#)、夏卡爾也是好友。他舉止高雅的妻子瑪麗斯（Marlies）出身富裕，其岳父雅克·考爾佛（Jacques Koerfer）是知名藝術藏家，就居住在瑞士阿斯科納（Ascona）的水池住宅，一幢由馬歇爾·布魯耶（Marcel Breuer）[105](#)設計、所有建築書籍都會介紹的經典建築物。科恩菲爾德夫妻也擁有一間大有來頭的屋子，它位在達沃斯（Davos），曾是德國表現主義畫家恩斯特·路德維格·凱爾希納（Ernest Ludwig Kirchner）故居。凱爾希納遭納粹指為「頹廢」藝術

家，不堪迫害最後自殺身亡。科恩菲爾德擁有一大批凱爾希納的信件，我來到畫廊後的第一項工作即是辨讀和謄寫所有內容。

畫廊設於科恩菲爾德夫婦在伯恩的宅邸。我寄宿在畫廊樓上，全心投入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只可惜我沒多少嗅嗅聞聞的機會，常常都在跑腿打雜。儘管如此，我還是見到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其中最不同凡響的一位，是科恩菲爾德的好友海因茨·貝格魯恩（Heinz Berggruen）。每逢貝格魯恩從巴黎來訪，總是由我接送他出入。貝格魯恩也是我日後有機會平起平坐、更深入了解的大人物。當時還是實習生的我，對這位短小精悍、坐五望六的男人只有敬畏。他也是知名的「畢卡索畫商」，名氣更甚於貝耶勒。

貝格魯恩生於德國，但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先後在德國柏林和法國格勒諾布爾（Grenoble）求學，三十出頭時在法蘭克福當記者。納粹黨崛起以後，出身富裕猶太家庭的他寫稿無法署全名，只能用名字縮寫。他意識到大難恐將臨頭，於是在一九三六年逃到美國加州，並進入柏克萊大學攻讀藝術史，不久後成為《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藝評人。當年沒多少人和他競爭那份工作，美國人講求實際，在絕大多數人眼裡，進入金融界、法律界，或者當醫師、工程師才是「可以養家活口的」職業。貝格魯恩後來鯉躍龍門，娶了紙業巨擘澤勒巴赫皇冠公司（Crown Zellerbach）106繼承人，莉莉安·澤勒巴赫（Lillian Zellerbach）為妻。他總算有財力開始收藏藝術品。和大衛·湯普森一樣，他人生的第一件收藏是保羅·克利的作品。對於收藏現代藝術的藏家來說，克利作品是入門款。那幅畫花了貝格魯恩一百美元（約臺幣三千）。

由於貝格魯恩是舊金山灣區寥寥無幾的「藝術人」之一，他也身兼舊金山現代美術館（SFMOMA）的策展人。該館展品多為富豪藏家所出借的藏品，這些富人多數靠淘金發跡，但已不再提「挖到金礦」的當年勇，而是自詡為有教養的文化人，樂於用藝術為自己鍍上一層光華。他初試啼聲的幾檔展覽包括了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107作品展，兩人更一見如故成為朋友。貝格魯恩對現代藝術，以及現

代藝術家的熱愛，可說遙遙走在時代前端。新朋友里維拉帶他去醫院探視其妻子芙烈達·卡蘿（十八歲時遭遇的一場公車車禍造成她長年疼痛的後遺症，當時入院接受治療），他那時根本無從曉得，這對夫妻日後會對藝壇帶來何其大的新震撼。前往醫院的路上，里維拉跟他打包票：「你會愛上我老婆。」這句話就像是預言一樣。

貝格魯恩當時二十五歲，卡蘿三十二歲。她的舊情人列夫·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08](#)甫於墨西哥遇刺身亡；她和里維拉的婚姻瀕臨破裂。儘管身體疼痛，又失去故友，但在巴黎辦的超現實主義個展大獲成功，因此整個人意氣風發。雖然名門妻子對他極好，貝格魯恩卻瘋狂愛上卡蘿，追她追到紐約去，在那裡，兩人陷入熱戀，卡蘿也跟里維拉離異。不過，如同貝格魯恩快速愛上她一樣，才過一個半月，她就甩掉他，回頭和里維拉復合，兩位畫家再次結婚。貝格魯恩晚年時，瑪丹娜想把卡蘿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曾找他聊了不少話，他後來總是得意洋洋地跟每個朋友吹噓。只可惜，最後是由莎瑪·海耶克（又稱皮諾夫人）飾演卡蘿。

失戀的貝格魯恩加入美軍，想要藉此撫平傷痛。因為他會說德語，了解德國，同盟國軍隊如獲至寶。二戰結束後，他與勒澤巴赫離婚，移居巴黎，在聖路易島上開了一家圖文書專門店。他在店內結識了畢卡索；接下來的事，讀過藝術史的人都知道。

所幸我在接送貝格魯恩這類名流的時候不必穿制服，將貝格魯恩送達他鍾愛的高級餐廳和飯店以後，我也不必留在車上等候。他去過的餐廳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家當屬蘇黎世的「皇冠廳」，它是全球最知名的「藝術餐廳」。

蘇黎世的「皇冠廳」，就如同紐約的四季飯店、威尼斯的「哈利酒吧」、巴黎的「力普啤酒館」（Brasserie Lipp），是各路菁英名流匯集之地，想見任何大人物去那裡就對了。昔日的常客包括有愛因斯坦、史懷哲、托瑪斯·曼（Thomas Mann）[109](#)、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10](#)，以及每一位到蘇黎世與大銀行家們打交道的金融

家。但那裡主要可看的，是藝術，滿牆紋章圖案與紅皮沙發之間，隨處懸掛著畫作；例如有一幅畢卡索自畫像，以及琳琅滿目的米羅、波納爾（Bonnard）¹¹¹、康丁斯基、夏卡爾和瓦爾蘭（Varlin）¹¹²作品。這些畫家皆是科恩菲爾德、貝耶勒、貝格魯恩及餐廳老闆古斯塔夫·讓斯蒂格（Gustav Zumsteg）的友人。讓斯蒂格在巴黎靠絲織業賺進財富，他把經營蘇黎世這家餐廳當作一項嗜好，高朋滿座的餐廳成了非常熱鬧的美術館。

藝術經紀商一向和重要客戶約在「皇冠廳」會面，這裡既是菁英會議中心，也給人賓至如歸的愜意溫暖。再者，餐廳裡的女性顧客就和巴黎馬克西姆餐廳（Maxim's）裡的那些貴婦一般美麗貴氣，差別只在於，她們在這裡大啖的是豐盛的白香腸和馬鈴薯絲煎餅，而不是酒燉兔肉。我在科恩菲爾德畫廊遇見的另一號藝術界大人物是梵谷的曾姪孫：西奧·梵谷（Theo van Gogh）。他那雙眼睛和其曾伯祖父簡直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與他握手就像碰觸了藝術，讓我感動極了。還有一次，我見到阿優沙·克利（Aljoscha Klee），他那雙懾人的黑眼睛就和其祖父保羅·克利如出一轍。再一次，我感受到遇見歷史的悸動。阿優沙寫過一部專論硬皮病（患者皮膚會逐漸硬化萎縮）的巨著，娓娓道來保羅·克利罹患此一病症，如何飽受煎熬，以及疾病對他藝術作品的影響。能夠與這些傳奇人物相遇，我覺得就像來到一個俱樂部，一個我也嚮往加入的藝術俱樂部。那時候，光是能當他們的吉祥物、他們的嗅探犬、他們的司機，什麼都好，已讓我歡喜得心花怒放。我能把一隻腳，或者說一根腳趾頭伸進門裡邊，已是萬分幸運的事。

儘管天天接觸這些頂尖經紀商，我倒還沒有完全放棄成為一個藝術家的夢想。不過，在來到這裡之前，除了我在日本的藝術老師以外，我還沒有遇過任何真正的藝術家；西方風格的藝術家。科恩菲爾德為我填補了此一空白，他多給我一項工作：當天才保姆。我負責照料的對象，是二戰後一九五〇年代旅居巴黎畫家當中的領銜人物：美國抽象派的傳奇大師山姆·法蘭西斯（Sam Francis）。法蘭西斯之所

以前來伯恩，是因為將在科恩菲爾德畫廊舉辦新近作品的個展。展覽還未登場即受到高度矚目，唯一的問題在於，法蘭西斯老在呼大麻，根本沒有任何新作品。因此，科恩菲爾德把法蘭西斯關在畫廊後方的豪華畫室，讓我居間跑腿傳話，看看是否能激發天才，讓他創作到忘我（可不是呼麻呼到忘我）；這是一項高難度任務。

當時法蘭西斯年近五十，是一個極有魅力的人。他成長於舊金山灣區，母親是鋼琴家，父親是數學教師。他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醫學，二戰時期在美國空軍服役，擔任試飛員。因一次墜機意外險些喪命，還住院長達兩年，期間放棄從醫志向，轉而提起畫筆開始創作。出院以後，他重返柏克萊分校，但這次是攻讀藝術。他深受波洛克和羅斯科作品的影響。拿到碩士學位之後，他移居巴黎，在那裡被奉為天才，有藝壇傑利·路易斯（Jerry Lewis）¹¹³之稱，也被公認為第二代抽象表現主義的代表性畫家。我記得第一次紐約行，造訪現代美術館時，曾看著他那幅〈大紅色〉（*Big Red*），震撼得久久無法回神。

法蘭西斯和我還有其他可交心的理由。他熱愛日本藝術，也受其影響，被日本人當作英雄看待，還娶了日本畫家橫井照子為妻。因此，我們可以聊日本，聊巴塞爾也行，他在那座城裡也備受尊敬，曾為巴塞爾美術館創作一幅大尺寸畫作；巴塞爾藝術博物館（兩館相隔不遠）時常舉辦他的大型回顧展。法蘭西斯曾跟我解釋，他之所以抽這麼多大麻，並不是出於柏克萊大學的嬉皮傳統（我覺得這理由會更酷一點），而是因為戰時受傷導致的腎結核病讓他長年苦於疼痛，就跟卡蘿深受車禍後遺症折磨，常因疼痛而不時進出醫院一樣。他肉體遭受的痛苦讓我想起克利、卡蘿、梵谷，我不由得納悶，是否只有巨大的痛苦才能造就偉大的藝術；我們針對這個話題聊了許多。

法蘭西斯曾經間接地稱讚過我，那可能是我年輕時獲得的最好讚美之一。他有自己獨特的滴畫技法，先用沾清水的海綿在畫布上勾勒線條，然後用畫筆把顏料滴濺在那些線條上。有一天，他去廁所的時候，我忍不住仿造他的方式作畫。他從廁所出來後，一一揀選要展出

的畫作，他也拿起我的作品，把西蒙·德·普里的畫當成山姆·法蘭西斯。基於瑞士人的誠實不欺傳統，我趕緊向他坦白招出真相，說那一幅是我的小小嘗試。出乎我的意料，他客氣地給我鼓勵，但我堅持把畫布扔進垃圾桶。法蘭西斯如此傑出，我完全望塵莫及，我很高興又自豪自己能幫上一點忙，他在科恩菲爾德畫廊的個展如期舉辦，所有新作也銷售一空。

科恩菲爾德交代我的另一項任務卻被我搞砸了，我還差點葬送我在藝術界的未來（儘管還未真正起步）。科恩菲爾德先生吩咐我為一幅珍貴的恩斯特超現實主義畫作做一個紙裱框。我用非常鋒利的刀切割紙框，卻沒發現恩斯特畫作就擱在紙板下方，也就是說，我把這幅恩斯特割成四片。二〇〇六年，患有色素性視網膜炎的拉斯維加斯賭場大亨：史蒂夫·韋恩（Steve Wynn）曾經一個不慎，用手肘捅破畢卡索的畫作〈夢〉（Le Rêve）。此事故發生前不久，他才剛以一億三千九百萬美元（約臺幣四十一億七千萬）將此畫賣給對沖基金大亨暨收藏家史蒂文·柯恩。修復費用約莫要十萬美元（約臺幣三百萬），而且這一肘更撞掉原定交易，並讓畫作價值折損一半。韋恩對倫敦的勞伊德保險公司（Lloyd's）提起訴訟，要求五千四百萬美元（約臺幣十六億兩千萬）的價差補償，保險公司拒絕支付。到了二〇一三年，柯恩仍然念念不忘該幅畫，出價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約臺幣四十六億五千萬）買下它。綿延數年的這場藝術界紛爭總算落幕。至於我，我一時不察所造成的傷害可比捅破一幅畫還嚴重。我既拿不到保險公司的賠償金，名下也無財產可賠，我心想，我的未來全都毀了。一想到該怎麼跟科恩菲爾德先生說出可怕真相，我就驚恐萬分。幾經掙扎，我總算鼓足勇氣，和盤托出。科恩菲爾德先生仍然維持一派冷靜，他叫我不用擔心，說他有全世界最優秀的修復專家。那幅恩斯特果然被修復得不著痕跡，用肉眼完全看不出割痕。科恩菲爾德畫廊出的目錄從未記載該次意外損傷，一直到那幅恩斯特登上拍賣會的時候，我仍然心驚膽戰，深怕畫作曾受損一事東窗事發。後來該幅畫拍出高價，斬獲這幅完美復原畫作（對有罪的我而言，是一樁完美犯罪）的買主心滿意足，就和史蒂文·柯恩還是很滿意那幅修復的畢卡索一樣。我

心中的大石總算落地，我對科恩菲爾德更是心悅誠服。我在他那裡待了一年半，遠遠超出貝耶勒為我規畫的時間。但我終究得升入大二，還有蘇富比等著我。我在一九七四年動身前往倫敦。

96 法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學家（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在教會歷史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著有《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97 義大利建築師，一九九八年第二十屆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他與理察·羅傑斯（Richard George Rogers）共同設計了巴黎的龐畢度藝術中心。

98 美國作曲家（一八九一～一九六四）。作品以百老匯音樂劇為主，且不僅寫詞，也負責譜曲。

99 美國作家與詩人（一八七四～一九四六），後來主要在法國生活，影響現代主義文學與現代藝術的發展。

100 阿爾伯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瑞士超現實以及存在主義雕塑大師。

101 胡安·米羅（Joan Miró, 1893-1983），加泰隆尼亞畫家、雕塑家、陶藝家、版畫家，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與畢卡索、達利並列西班牙後三大藝術家。

102 取自英國兒童故事《歌蒂拉與三隻熊》（*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103 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 1925-1991），瑞士達達主義畫家與雕刻家，以機動藝術創作聞名。

104 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 1930-2002），法國雕塑師，畫家和電影導演。妮基是個自學且多產的藝術家，最為眾人所知的是射擊繪畫與雕塑作品。

105 出生匈牙利，後移居美國，是現代主義藝術家、建築師、家具設計師（一九〇二～一九八一）。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以及紐約的惠特尼博物館都是他的建築作品。

106 二〇〇一年被喬治亞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Georgia-Pacific LLC）併購。

107 墨西哥著名畫家（一八八六～一九五七），促進了墨西哥壁畫復興運動，被譽為墨西哥壁畫之父，妻子是著名女畫家芙烈達·卡蘿。

108 俄國革命家、軍事家、政治理論家和作家（一八七九～一九四〇）。是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十月革命指揮者、蘇聯紅軍締造者以及第四國際精神領袖。

109 德國作家（一八七五～一九五五），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作包括《浮士德博士》、《魂斷威尼斯》以及《魔山》等。

110 愛爾蘭作家和詩人（一八八二～一九四一），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以及《芬尼根的守靈夜》。

111 皮耶·波納爾（Pierre Bonnard, 1867-1947），法國畫家和版畫家，也是後印象派與那比派創始成員之一。

112 猶太裔瑞士畫家（一九〇〇～一九七七），風格獨樹一幟，不同於抽象藝術或前衛藝術，是二十世紀瑞士藝術史上的重要畫家。

113 美國喜劇演員，歌手，電影製片人，編劇和導演。曾榮獲多個獎項，包含美國喜劇獎（American Comedy Awards）、洛杉磯影評人協會和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電視藝術與科學院（Academy of Television Arts & Sciences）州長獎，以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授予的讓赫紹特人道主義獎。

第六章 倫敦召喚

我對倫敦早已一見鍾情。首次邂逅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倫敦的黃金時期，披頭四熱潮正盛，我走在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想起電影《春光乍現》場景，滿街迷你裙，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是倫敦一九六〇年代晚期成為全世界最酷城市的理由。那一年，父母為了精進我的英文能力，把我送到罕布夏郡（Hampshire）一個叫貝辛斯托克（Basingstoke）的古老小鎮，跟一個英國家庭一同生活。翌年夏天，我到劍橋上正規英語課程，一有機會就搭火車上倫敦溜達。儘管撐篙遊康河似乎很浪漫，但我迷上的新潮音樂和文化只有一個城市才有，而且是「那個時期」的那個城市。我不知道有多少到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¹¹⁴和艾比路（Abbey Road）¹¹⁵朝聖的孩子也把泰德美術館當朝覲聖地，但我就是這樣一個怪胎。

我在一九七四年重返時，倫敦已經截然不同。披頭四樂團已告解散；卡納比街淪為俗不可耐的觀光景點。難道我想聽阿巴合唱團或貝瑞·懷特的歌，還需要來倫敦聽嗎？最令人吃驚的是，倫敦已經從生活物價最低的城市躍居全球物價最高的城市之一。原因在於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導致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引發全球石油危機，中東產油國變得富甲一方，而倫敦搖身一變成為泰晤士河畔的麥加，中東頂級富豪紛紛嚮往到大不列顛島居住，過英倫酷風的奢華生活。但正如全球石油價格連翻四倍，倫敦的每一樣東西，從克拉里奇飯店（Claridge）的套房，到溫比漢堡店（Wimpy Bar）的油膩膩漢堡，價格也都漲了又漲。一九七四年的倫敦不是一個吃不飽的學生該去的地方；因為你只會更飢餓。

我不打算在倫敦當學生。我的計畫是成為蘇富比裡光鮮亮麗的一分子，這家雄踞全球藝術市場龍頭地位的拍賣行，其總部昂然屹立於雅緻的龐德街（Bond Street）。我在科恩菲爾德畫廊見習時拿很好的薪水，又享有堪稱豪華的包吃包住福利。我以為能繼續過舒適日子，但現實把我從幻想中驚醒，我發現蘇富比沒有任何空缺職位，就連貝

耶勒也無法幫我變出一個工作來。隨著大環境不景氣，拍賣行業也進入寒冬期。石油危機將全球經濟置於死地，藝術市場也連帶受到衝擊。隨著通貨膨脹升溫，人們的焦慮也升溫。沒人要買藝術品，一個又一個專家遭到裁員—換個俚語說法，就是「被炒魷魚」—哪還有工作給一個瑞士孩子呢？想都別想。

我那足智多謀的母親不得不臨危受命，幫我找同鄉的人脈協助。她找到一位出身巴塞爾的銀行家理察·德雷福斯（Richard Dreyfus，跟一位美國演員同名同姓）。此位德雷福斯與蘇富比總裁彼得·威爾森（Peter Cecil Wilson）曾是伊頓公學同窗，而後因埃及再續前緣。德雷福斯在那裡做生意，威爾森在開羅主持了登上全球新聞頭條的「埃及皇家寶藏拍賣」（the Palace Collections），該批豐富的收藏品為埃及末代國王法魯克（Farouk）所蒐集。在一九五二年，以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少校為首的埃及軍官發動政變，法魯克國王攜黃金，駕皇家遊艇，倉皇出逃到義大利卡布里島，留在皇宮的收藏即由納瑟領導的新政府委由蘇富比拍賣。該場「世紀拍賣」最大的缺憾在於埃及政府對談妥的佣金出爾反爾。總而言之，儘管有伊頓公學及埃及牽起的情誼，德雷福斯也無法跟威爾森本人通上話，他只得到一位小助理回電，而對方再次重申蘇富比沒有工作可以給任何人。

助理也說，這個瑞士男孩可以進入蘇富比的唯一辦法，就是付錢取得特權。蘇富比剛開設了一個為期十個月的「藝術作品」課程，據此助理描述，這是提供給有志進入畫廊、藝術市場工作者的「培訓課」。

由於一年學費（不包含生活費）要兩千美元，相當於現今的五萬美元（約臺幣一百五十萬），連我父母也認為這是一個「空中樓閣般的計畫」¹¹⁶。我父母知道我對念書不在行，事到如今他們還得再花學費供我念書嗎？只為了學習如何辨別莫內和馬奈的不同？分辨德國麥森（Meissen）瓷器和中國明朝瓷器的差別嗎？總之我應該去工作賺錢，而不是靠父母救濟。

我苦苦哀求父母，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動之以情，誘之以利，說明就讀那門課就像拿到一張「會員證」，日後不僅可能獲得蘇富比雇用，肯定也是進入某家畫廊或到美術館任職的入門磚；他們壓根不信。當然啦，你到時可以在巴塞爾美術館當收票員。讀完之後甚至拿不到正式文憑。我母親的一些朋友嘲笑那種課程頂多是業餘水平，就像去巴黎藍帶廚藝學校上課、拿個證書之類。但我強調，那個課程就像藝術界的牛津大學，他們只收五十名學生。對啦，五十個被寵壞的富家小鬼，不知道怎麼搭觀光巴士去牛津大學的五十個飯桶。為什麼不乾脆去念牛津大學就好？為什麼不去拿個獎學金呢？他們知道我反駁不了。不過，到頭來，面對我這麼一個沒出路、沒前途的孩子，他們還能怎麼辦？他們唉聲嘆氣，非常勉強地同意這項「計畫」。我知道這是他們給我的最後一次機會。

為了把開銷降到最低，我盡力找最便宜的住處，找到克倫威爾路（Cromwell Road）上的一間分租公寓，和三位陌生人當室友。那裡可不是騎士橋站（Knightsbridge）的高級地段，而是噩夢般的地方。地鐵線從建築物下方穿過，一整天有列車轟隆隆來回穿梭，整棟屋子都隨之震動。熙來攘往的公車、計程車排放的廢氣，和寄居走廊大批貓類的排泄物氣味相比，我不知道哪個更臭。再一次，又是巴塞爾同鄉的人脈關係解救了我。我一個在瑞士大使館工作的親戚，安排我去找他姊姊。她住在鄰近攝政公園的一幢美麗屋子，雖然我和她未曾見過面，但她好心地給我一個大房間住。偌大的空間裡，只在中央放著一張床，沒有其他家具。我覺得很有禪味，不由得想像自己是回到日本。

「藝術作品」課程的教室不在梅費爾區（Mayfair）的蘇富比總部，而是在附近多佛街（Dover Street）的一幢普通商業大樓裡。我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其中有幾個是美國人，可惜美國第一千金卡洛琳·甘迺迪（Caroline Kennedy）晚我一屆就讀，不然我就可以跟父母大大吹噓一番，贏回他們對我的一點信賴。

的確有很多富家子、富家女來上課，要是我父母知道，大概會得意地對我說：「看吧，我們早就說了。」依我估計，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同學出身一流藏家家庭。課程包括德語課、義大利語課，但就是沒有法語課，其菁英色彩可見一般。校方認定每個人都會說法語，也認定每個人都知道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的區別，倘若有文化修養不足的，就任憑他們自生自滅吧。

學生性別比例則是男女各半，我認為起碼一半的男同學是同性戀，雖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人會公開談論這類的事。在極端保守，卻也莫名地極端寬容的瑞士，只要保持祕而不宣，性傾向並不構成問題。我投身的藝術界倒是和瑞士銀行業截然相反，這個領域的人對性傾向沒有偏見。不過，即使在藝術圈以外的世界，我也從來不曾因為熱愛藝術，就遭人質疑我的男性特質。大概只有那時代的美國人還抱持成見，每每聽到有人說藝術圈裡全都是同性戀，我就覺得好笑。我所結識的人，從貝耶勒、科恩菲爾德、貝格魯恩到山姆·法蘭西斯，沒有一個是同性戀。再說畢卡索，可不就是不折不扣的異性戀？這些百分之百的異性戀者也非常開明。

「藝術作品」課程負責人三十來歲，個頭不高，染了頭髮，一身雅痞穿著，說話帶倫敦腔，是他幫我上了一堂性意識的速成課。他有特別的植物姓氏，叫德瑞克·索布（Derek Shrub）¹¹⁷，完全不是典型的「蘇富比人」——畢業自伊頓公學或哈羅公學（Old Harrovian），為人拘謹、人脈廣闊、出身高貴的名門子弟。將蘇富比比喻為龐德街的話，德瑞克更像卡納比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總部的人要派他待在多佛街這棟普通大樓的理由。德瑞克自視為情聖，健壯帥氣，也愛炫耀自己風流不羈。他毫不掩飾自己跟兩個情人同居的私生活，兩個都是男人。他講的話往往隱含性暗示。他會自誇：「我沒受過教育，我完全是自己摸出來的。」德瑞克是從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¹¹⁸家具部門歷練出來的。

我第一次見到德瑞克·索布的時候，驕傲自大地問他這個課程能教我什麼，依我在科恩菲爾德畫廊的歷練，我也算是個有經驗的新

手。德瑞克回敬我一句：「十七歲就結婚會不會嫌早？你總要先試試跟許多人上床。」他跟另外兩位講師會教我們認識銀器、家具、珠寶、亞洲藝術等所有一切，而不僅僅是了解獲利可觀（市場低迷以前）的古典大師和印象派繪畫。

班上並非每個學生都出身特權階層，其中有兩位拿獎學金的學生，而我後來跟其中一位結為連理。但是，那個未來還很遙遠，我最初對這個女子只有嫉妒，毫無男女情愫。她才不是我想娶來當老婆的人，由於藝術界僧多粥少，我視她為深具威脅性的競爭對手。她名叫伊莎貝爾·斯洛曼（Isabel Sloman），從倫敦大學學院和科陶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兩校畢業，是我們班上的明星人物。她父親阿爾伯特·斯洛曼爵士（Sir Albert Sloman）於二戰期間在英國皇家空軍擔任戰鬥機飛行員，退役後成為知名學者，是艾塞克斯大學（Essex University）創始元老和第一任副校長。這所後起的「紅磚大學」（redbrick schools）[119](#)專出敢於噙言怒語、衝勁十足的畢業生，他們就如同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120](#)在劇作裡描述的那種「憤怒青年」，一個個準備挑戰英國上流社會那些懶散的紈袴子弟。

伊莎貝爾的母親是法國人，老家在干邑區（Cognac），並在該地置有一間度假屋。伊莎貝爾金髮碧眼，身材苗條，絕頂聰明，但不至於古板正經到不願意穿迷你裙。總而言之，基於伊莎貝爾內外條件出眾，任何畫廊，或美術館，或蘇富比，都樂於雇用她—肯定先於我。我每週寫到日本的家書中，字裡行間洋溢著我的危機意識。為了贏得父母的認可稱讚，我挑她作為「強大敵手」，誰也不會想到，這名敵人最終成為我的妻子。

是德瑞克·索布改變了我和她的競爭關係，他等於間接地做了我倆的丘比特。每次業界想招募年輕新血，第一個一定先找他打聽。當時課程尚未結束，座落在傑明街（Jermyn Street），由一位波蘭伯爵所開，專營古典大師作品的海姆畫廊（Heim Gallery）出現一個空缺。想當然耳，索布最先想到的人選是伊莎貝爾。我起初很生氣，有這樣一個正職職缺，如此絕無僅有的機會，他竟然沒給我。但是，當我得知

學識淵博，足以當老師的伊莎貝爾接受了那份工作，我感到如釋重負。在我看來，再也沒有人跟我搶蘇富比的門票了。而且，既然已不再是對手，就可以跟她成為朋友；只要伊莎貝爾不會危及我的未來發展，我其實非常欽佩她。這分敬仰最後演變成愛情。

與此同時，我們在課堂上玩的一個遊戲，再度扭轉了我的職業願景。索布問我們誰想要扮演拍賣師，儘管蘇富比是拍賣公司，我們卻從未去拍賣會見習。也許因為不景氣，成交總額過於微薄，索布不願讓我們受到打擊。總之，我只見識過科恩菲爾德畫廊的拍賣會。雖然埃伯哈德·科恩菲爾德是出色拍賣師，但他向來將蘇富比尊為藝術拍賣業界的應許之地。他辦公桌上擺著一幅蘇富比大門的裱框版畫，彷彿提醒自己在拍賣巨擘前保持謙卑。畫中掛在大門上方的神祕黑色玄武岩，是一尊西元前一三二〇年製成的埃及獅面女神賽克麥特（Sekhmet）。該座雕像於一八八〇年代以四十英鎊（在當年是一筆巨款）售出，但買家一直不曾出現認領，蘇富比便將它當成「吉祥物」和象徵（一如伯恩的熊），直至今日。

由於在科恩菲爾德畫廊的歷練，我自認算是內行人，於是大膽地舉手。五十人的班上，只有另外兩個男同學也自告奮勇。其中一個是奧地利人彼得·馮·艾爾茲（Peter von Eltz），他後來也成為拍賣師，在柏林業界功成名就，現今在奧地利坐擁一座城堡。另一位是年輕的英國人，但我與他失聯已久。接著由我們三個志願者輪流擔任拍賣師，進行幾場模擬拍賣會。等到索布叫我上臺，拍賣幾件家具、瓷器和一幅平庸畫作的時候，我表現得畏畏縮縮，索布直言我會膽怯是因為無知，如果我真正了解所拍賣的物品，就會更懂得怎麼賣。我得用最巧妙的方式向買家傳達我對這件物品的讚賞與瞭若指掌。我還得記住，競價人都是聰明、見多識廣的藏家，輕易就能看穿你的花招、揪出你的錯誤。總之，就是推銷。我自詡為歐洲紳士，推銷是我從來沒有做過，也沒有想過要做的事。然而，蘇富比就是一家推銷公司，藝術是交易的商品。我學到一課：趁早習慣，努力學習。別做無謂掙扎，認命吧。

我堅信蘇富比是我想進就能進的地方，但後來證明，這純粹是我的狂妄自大想法。我在一九七五年修完堪稱新兵訓練的「藝術作品」課程，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自信。索布這位魔鬼教官教導我、鍛鍊我。而這門短期課程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期間我不曾見過任何一位藝術家。我記得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¹²¹有一天前來，當時他在加州已經享有盛名，我很想見見他，但沒有如願；我遇見的都是已作古的藝術家。這正是貝耶勒告誡我別進學校的部分原因，我應該遠離藝術史的理由，但我別無選擇。而如今，是我運用苦讀的藝術史來賺進薪水、謀生工作的時候了，但再一次，職缺已滿。當我得知有個迷人的親戚是蘇富比一位高階主管的情人時，我以為大有機會，然而在倫敦這個地方，愛情征服不了一切，尤其無法解決我的失業問題。我可不想認輸離開倫敦，回到巴塞爾。因此，我不得不忍氣接受無償工作，在蘇富比龐德街總部擔任前臺接待員。最起碼，我終於得以穿過獅面女神賽克麥特鎮守的大門，登堂入室。

¹¹⁴ 一九六〇年代的倫敦是世界潮流的指標，被《時代》雜誌譽為「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影響力更勝紐約、巴黎。而卡納比街是倫敦創作者尋求靈感的地方，這裡薈萃了各式民族、新潮文化、前衛音樂、叛逆的象徵。音樂人如吉米·罕醉克斯、披頭四、滾石樂團、奇想樂團（The Kinks）以及時尚指標，如碧姬·芭杜、伊莉莎白·泰勒，都是卡納比街的常客。

¹¹⁵ 披頭四的錄音室位在艾比路上，他們的第十一張專輯（解散前最後一張）也以此路命名。

¹¹⁶ 淪為口號或無法貫徹之意。

¹¹⁷ Shrub為灌木之意。

¹¹⁸ 位於倫敦，以工藝美術、裝置及應用藝術為主的博物館，成立於一八五二年。歷經遷址、修建、更名，直到維多利亞女王修建才確定今日的樣貌，並命名為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以紀念她的丈夫亞伯特。

¹¹⁹ 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以平民教育為宗旨而成立的大學，起初有六所大學。

¹²⁰ 英國著名現實主義劇作家（一九二九～一九九四），著有《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賣藝人》（The Entertainer）等。

¹²¹ 英國畫家、版畫家、舞台設計師及攝影師。被譽為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大師，繼盧西安·弗洛伊德之後，第二位被英國女王頒發功績勳章的藝術家。

第七章 我的榜樣

在蘇富比的前臺，我不僅「接待」訪客，同時也是把關的門房。不是用勢利眼看人的工作，如同巴黎「雷吉娜」（Régine's）或紐約「54俱樂部」（Studio 54）那些夜店的保鏢，憑你的外表判斷是否夠酷，是否要放你進入聖殿，不，我太卑微，哪能當裁決者。我在蘇富比幾乎是個外人，哪能做出判斷。然而，蘇富比確實以英國式傲慢著稱。那種「龐德街斜眼」，也就是讓對方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的睥睨眼神，正是驅使底特律購物商場大亨阿弗烈·陶博曼（Alfred Taubman）在一九八三年買下蘇富比的理由，他只是為了讓那些無禮英國人知道，顧客永遠是對的，要永遠歡迎顧客光臨。雖然我從來沒有攆走任何人，但面對帶著東西來賣的潛藏客戶，我得迅速做出決定，是否該讓他「上樓」見蘇富比的某位專家。蘇富比有許多專家，古典大師、印象派、現代藝術、瓷器、玉器、東方藝術、獎章和錢幣、手稿等分門別類的專家。說到傲慢和壞脾氣，那些脾氣古怪的專家可容忍不了傻子，如果我不審慎過濾來客，因為我的愚蠢害他們浪費了寶貴時間，到時可是我遭殃。

有一天，一對老夫婦走進龐德街總部。他們抱著一個盒子，小心翼翼踩著腳步，彷彿裡頭裝了大量硝化甘油，一個不慎就會爆炸。他們想請專家鑑定看看，而當下，我是唯一可以提供意見的，至少由我進行初步鑑別。他們起碼花了半小時解開包裹，就像俄羅斯娃娃，每一層底下還裹著另一層。好不容易拆到最後，他們自豪地拿出寶物。顯然是件傳家寶，陶器之類的，老實說，我已不記得。在他們眼中，那件物品值得被擺放在溫莎古堡（Windsor Castle）裡。但以我這位新手的鑑別眼光看來，它更適合的歸宿是在波多貝羅（Portobello）市集122或襯裙巷（Petticoat Lane）市集123，而且是最不起眼的小攤位；它唯一具備的是情感價值。我只好發揮舌粲蓮花的本事，盡所能地用美麗糖衣包裝此一真相。

我覺得自己就像潑人冷水的卑鄙無賴，不過，要是讓他們上樓，陶瓷專家事後肯定痛斥我一頓，我並不會更好過。況且我不該推卸責任，由別人當壞人，客戶要怪就怪我，但這對夫婦完全沒有責怪之意，他們始終彬彬有禮，感謝我給的判定。然而，等到要重新打包那件家族寶物的時候，他們一改之前的慎重包裝，只是將它扔進一個盒子裡，就帶著離開了。之前的層層包裝材料（足以在埃及路克索帝王谷 [Luxor's Valley of the Kings] 裹起一個木乃伊）全留在桌上由我收拾。我學到的一課是，人們只關心有價值的東西。自認擁有一件寶物的話，就會愛護珍惜它，一旦發現寶物原來一文不值，就棄如敝屣；一樣東西沒有價值的話，人們就毫不在乎。

在前臺待了兩個月以後，機會來敲門。進入蘇富比工作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掌握內線消息，知道哪裡釋出職缺。古典大師版畫部的一位初級專家準備跳槽到科爾納吉畫廊（Colnaghi's）。這是一家創設於一七六〇年，被公認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畫廊，位於舊龐德街，與蘇富比隔街相望。該畫廊專營古典大師作品，甫易主到一位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財力雄厚的雅各布·羅斯柴爾德勳爵（Lord Jacob Rothschild）手中。蘇富比一位主管到前臺找我，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問我可有興趣「上樓」去？

上樓去任何部門都好，我都會激動地抓緊機會—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內。我知道一旦接受這個職位，這一輩子將會困在這個沒出路的工作。全球只有約三十位藏家對古典大師版畫感興趣，那不是一個具有成長空間的部門；那是古老歷史。再者，那是技術性極強的領域，我缺乏相關的評估和鑑定技術。我回絕該位主管，他視為一種侮辱，這個櫃臺男孩自以為是誰啊？竟敢藐視林布蘭、拉斐爾、提香？我很幸運，他沒在氣憤之下炒我魷魚。我既然是無償工作，解雇我對節省公司開銷毫無益處，僅僅對他的自尊心有益。我堅持待下去。

我盡力讓自己派上用場，並結識了國際部主管鄧肯·麥克雷倫（Duncan McLaren），是他帶頭推動蘇富比全球化發展。一九六四年

蘇富比進軍美國，收購紐約的帕克博內拍賣行（Parke-Bernet），隨後在歐洲拓點，於一九六六年陸續成立了慕尼黑、蘇黎世和巴黎辦事處。無論如何，我運用在瑞士藝術界的人脈幫上麥克雷倫的忙，他禮尚往來，當總部又出現一個職位空缺的時候，他好意地內定給我。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成為英國家具評鑑專家的機會，似乎比當一個古典大師版畫專家還缺乏揚名立萬的機會。而且比起古典大師，我對古董家具的專業甚至更加不足。但我也知道，這是我擠進蘇富比的最後一次機會，由不得我這個乞丐挑挑揀揀。

我馬上欣然接受。接下來，我得到一部中階雷諾（Renault）的公司配車、一份英國汽車協會出版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三島地圖，以及要拜訪的客戶名單。一夕之間，蘇富比把我變成了推銷員，我做夢也沒想到會從事的工作。我登門拜訪的對象，也不是住沃德斯登莊園（Waddesdon Manor）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那一類人物。我去的不是城堡或豪宅，而是到普通人家挖掘藏在民間的寶物。要說有人比我更失望，就是我登門拜訪的那些客戶了。他們打開門見到我，臉上表情隨即一垮。他們想必期待見到一位頭髮花白，也許還拄著拐杖的英國紳士，而眼前卻是一位講話有口音的年輕外國人，對每件家具的判斷了解，往往還不如他們那樣透徹。

我始終不習慣靠左行駛，或是拿員工餐券上酒吧吃的那些差勁食物，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我曾以為進蘇富比就能做最光鮮亮麗的工作，這份職務治好了我不切實際的幻想。儘管如此，我持續做了一年半，至少我向父母證明自己能夠謀生，縱然只是維持基本生活溫飽。在那段日子裡，與伊莎貝爾·斯洛曼—我早已莫塵莫及的對手—逐漸增長的友誼，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她當時正跟一位有頭有臉的銀行家交往，而我曾發誓三十五歲以前不會結婚。儘管如此，同是藝術圈內人，已是一個強大的立基點，未來可以變得更投契。

伊莎貝爾值得我等待；蘇富比的總裁，神話般的彼得·威爾森也是。我當初透過他的伊頓公學同學攀關係，想進入朝思暮想的蘇富比工作，而他甚至沒有親自回電給他的同學。等到我就讀「藝術作品」

課程，他召我進辦公室，類似表達歡迎之意，算是禮貌性地對理察·德雷福斯補個交代。結果那次會面是一場災難。彼得·威爾森風度翩翩，卻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而我是個很害羞的男孩，戰戰兢兢地不知如何是好。兩個害羞的人同處一室，幾乎不太可能投緣地聊開。我和他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只記得零碎的陳腔濫調之間，惱人的沉默籠罩。走出房間那一刻，我簡直如釋重負，但也擔心了好一陣子，深怕他嫌我太笨，立即命令我退學，永遠不得再出入龐德街。我絕沒想到，這位不苟言笑、神祉般的人物將會成為我的朋友兼大貴人。

威爾森和我最終因為家具結緣。他在蘇富比也是從底層做起。一九三六年加入時擔任門房，後來到家具部編製目錄。但如同我這般穿梭於大道小路，在大不列顛島各地奔波跑業務的辛酸經歷，他從來不曾體驗過。不過，他喜歡奔波各地搜尋美麗的物品。當我真正認識他，並有幸成為他在法國南部出遊的司機時，他總會指示我沿著七拐八彎的小路駛進某座小村，找看看是否有古董店，找到的話，往往會在裡頭待上數個小時，細看每件家具、每樣東西，彷彿他進到了溫莎古堡。他喜愛所有種類的藝術，他還喜歡推銷。加入蘇富比之前，他在藝術暨古董雜誌《鑑賞家》（*Connoisseur*）當過廣告業務。

拉廣告，看似和威爾森後來的職業生涯八竿子打不著，然而他卻成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推銷員，說「推銷員」根本不足以形容他在拍賣場精湛的表現，看他的現場演出，就如同目睹吉米·罕醉克斯飆奏電吉他一般，看得我既敬畏又陶醉。他展露出貴族氣質、優雅和專業，他從來不用鄙夷目光暗示買家出更多的錢，不說笑話，也不要任何花招。有人說，威爾森的狡猾之處在於他毫不狡猾。不過，他有天生的氣勢，威風凜凜，渾身散發出一股威嚴。他身高達六呎四吋（約一九四公分），祖父和外公都是男爵；其中里布爾斯代爾勳爵（Lord Ribblesdale）委託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24](#)所繪的畫像，如今高掛在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他也曾效力英國軍事情報部第六處（MI6），前往南美洲和日本從事諜報活動。據他當時的親密戰友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125](#)

所說，〇〇七系列電影主角詹姆士·龐德就是以他為原型。有貴族血統的威爾森卻也是新貧戶。在他的童年時期，父母先是賣掉經營的書店，接著又出售自家豪宅。彼得的父親是股票經紀人，卻沉迷賭博，揮霍無度，是個敗家子。彼得從小就知道將來得找工作謀生，對金錢的渴望驅使他奮發向上，他擁有多數貴族缺乏的幹勁和進取心，而這股衝勁也讓他帶領蘇富比走向壯大，從守舊過時的機構搖身一變成為主宰全球拍賣市場的巨人。

這樣的積極進取也是被其他隱伏的暗流驅動。蘇富比內部員工總會繪聲繪影地耳語一些傳聞。首先，他是同性戀。德瑞克·索布就是同性戀，大家都知道，但對於威爾森而言，這是不便公開的隱私，就如同他隱瞞自己患有糖尿病，得一天數次施打胰島素的事一樣。沒有人親眼看過他「打針」，雖然偶爾會有針筒從他那身訂製西裝的口袋掉出來。每每遇到這種狀況，一如處理任何事，他總是處變不驚，彷彿掉了把梳子或一枝筆。

威爾森看來更像詹姆士·龐德，而不是諾爾·寇威爾（Noël Coward）¹²⁶，儘管他顯然兼備兩者特質。從一九四七年離婚以後，他一直低調地遊戲人間，他喜歡的男性是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那型的粗獷硬漢。他的一號情人是位退役軍人，在肯特郡（Kent）開雜貨店，就在威爾森的週末度假屋附近。蘇富比的女人團借用威徹利（William Wycherley）¹²⁷的劇作名稱，稱他為「鄉下妻子」。這就是蘇富比女子，個個聰明、毒舌、通曉文學、愛竊竊私語。兩個男人都熱愛園藝，威爾森和前妻也共享此一愛好。

事實上，威爾森向來是一個以家庭為重的男人，每次說起兩個兒子，菲利普和湯姆，他的語氣滿是驕傲。他虛懷若谷，也是一種異性戀者特質。我曾滔滔不絕讚頌他是多麼了不起的拍賣大師，坦承自己一拿起木槌時多麼忐忑焦慮，威爾森倒向我自曝往事，說他自己也是容易緊張的人。一九三八年第一次登上拍賣臺以前，他整個週末都在家裡模擬演練，他向我描述了當時的情況，如何對著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介紹每一件家具拍品，模擬競拍過程。

除了是個糖尿病患、同性戀者，威爾森的盔甲還有另一道裂縫，而那也是他深具魅力的原因：與其說他是〇〇七情報員的原型，他更有可能曾是蘇聯國家安全局（KGB）的間諜。威爾森確實符合蘇聯間諜的輪廓，如同菲爾比（Kim Philby）、麥克林（Donald Maclean）、伯吉斯（Guy Burgess）、布朗特（Anthony Blunt），皆是高格調、高學歷和謹慎的同性戀者。其中布朗特也一如威爾森，是英國藝術界的棟梁之才，曾任伊莉莎白女王的藝術顧問。後來遭同伴供出，才揭發他是冷戰時期的傳奇間諜「劍橋五傑」128中的「第四人」。有傳言指稱威爾森是「第五人」，儘管未經證實，卻是足以讓所有人戰慄的震撼彈。他身在一個夢幻行業，在那個業界，人人見過世面，老成世故，威爾森這項不可說的歷練對生意有利，而在這門生意裡，終究是威爾森在呼風喚雨，主宰市場。

但是光從他在龐德街總部的辦公室判斷，你絕對想不到他是這樣一號人物。那個房間就位在大拍賣廳旁邊，又小又雜亂，看起來更像是儲藏室，而不是大老闆坐鎮的司令部，它甚至比蘇富比各經理人的辦公室還來得小。拿破崙掌握大權的時候，讓將領穿精工細作的華麗軍服，他自己則堅持衣著樸實，威爾森此舉無異是拿破崙的翻版（高大版）。反正，他從來不會在辦公室待太久，他喜歡在迷宮般的總部四處閒晃，參觀每一個部門，看看旗下的專家斬獲了什麼樣的寶藏。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戀物男人，他看上的物品可能是一張只值幾英鎊的藥丸廣告海報，也可能是一幅價值數百萬的雷諾瓦畫作。從還在伊頓公學念書的時候，一直到如今在肯特郡當鄉紳也未改，他最大的樂趣是逛逛當地的每家古董店，尋找未被發現的珍寶；因此他才會帶我到法國蔚藍海岸各地尋寶，雖然最終一無所獲。除了肯特郡的那位雜貨店老闆，威爾森還有另一位週末情人，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銷售員，此人是在拉著手推車兜售古董時與威爾森結識。在全世界最勢利的業界打滾，還身為其中的統治者，威爾森卻是我們所能想像最不勢利的人。他只在乎美不美，濟慈先生，請多多包涵，他也是一個「美的使徒」呢。

威爾遜是我見過最有禮貌的人。我從來沒聽他說過任何人的壞話，即使對方是佳士得的人也不例外。他從來不用職權壓人，或是頤指氣使，差遣人做這兒做那兒。儘管如此，他交付的事都能完成。比方說，我在摩納哥為他工作的時期，我們在冬季體育館（Sporting d'Hiver）大廳裡忙著布展，威爾森走進來東瞧西看，指出一張桌子擺錯地方，可能是因為照明不對，或是跟另一件家具的位置不協調之類。他輕聲細語地問我：「你覺得把桌子挪到那邊怎麼樣？」字面下的意思就是：「現在就把那張桌子搬過去！」威爾森說話總是溫溫和和，我們從來不曾見過他厲聲威嚇，但我們知道，雖然沒看過他發怒，但你清楚他其實有脾氣。

除了他的個人魅力，威爾森吸引我之處還包括他的聰明才智，能徹底改革全世界最不具革命性的保守行業。稱霸拍賣市場的兩大拍賣行：蘇富比和佳士得，皆於十八世紀在倫敦創立。儘管數世紀以來，兩家拍賣行的發展始終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但在我看來，蘇富比更具大眾知名度，而且更具神祕感，這樣的形象都得歸功於威爾森，他懂得以炫目手法吸引大眾注意，雖然就外表來看，他完全不像一個公關大師，但他的貴族血液裡顯然流著商業天賦。

威爾森就如同土耳其市集裡的地毯商人一般機靈，具備第六感，能洞悉顧客內心，也是談判高手，還做得不著痕跡。我第一次目睹他的斡旋功力，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剛調任到新成立的日內瓦辦事處。威爾森從倫敦打電話告知我一個壞消息，我們鎖定的一位潛在客戶選擇了佳士得來做「宅邸現場拍賣」，拍品來自她在科洛尼（Cologne）那座俯瞰日內瓦湖的宅第，件件家具、收藏都是逸品。科洛尼、旺德夫爾（Vandoeuvres）之於日內瓦，一如格林威治、貝德福德（Bedford）之於紐約，是最美麗的郊區，但科洛尼美侖美奐的鄉村景致，絕非「郊區」兩字所能涵蓋。

賣家名叫羅絲瑪麗·坎茨勒（Rosemarie Kanzler），曾是美甲師和柏林夜總會歌手（經歷和電影《酒店》裡的女主角莎莉·鮑爾斯頗有雷同之處）。她有過幾段婚姻，歷任丈夫都是全球頂級富豪，留給

她大筆財富，包括必治妥施貴寶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和福特汽車公司股票。她現在選擇結婚對象可以完全不考慮目的，只順從自己的心意。她現任丈夫是一個年紀比她小、長相體面的法國人尚皮耶·馬西—里維爾（Jean Pierre Marcie-Rivière）。夫妻租了位於日內瓦湖畔的博德默（Bodmer）宅邸居住（該家族擁有罕見的古騰堡聖經）。現在，他們打算以「開放宅邸參觀」的方式出售家當，既能展示他們令人豔羨的生活方式，也由於拍品的「質量」，佳士得將獲得巨大的宣傳效果，因為人人都會想到場看看超級富豪的生活。威爾森非常惱火，認為是佳士得「偷」走了他的客戶，畢竟他經營羅絲瑪麗這個客戶已有十多年。現在，他指派我把客戶偷回來。

乍看之下似乎絕無可能，但威爾森透過他細心布線的消息網絡，得知佳士得是降低佣金搶客戶，只收取成交價的百分之十。他指示我：「你打電話給尚皮耶，恭喜他談到那麼好的佣金比例。順便告訴他，我們頂多降到百分之十五。然後巧妙地提醒他，我們要做到最好、盡我們所能做到最好的話，這是我們佣金的底線。如果想要勞斯萊斯級的服務，就必須付出代價。」所以我打給馬西—里維爾先生，照威爾森交代的內容跟他談。我在交談中發現他們還未跟佳士得簽署委託書，此外，「最好」兩個字似乎發揮效果。馬西—里維爾先生主動來電表示，他將棄佳士得選擇我們，而為了得到我們勞斯萊斯級的服務，他願意支付百分之十二的佣金比例。

我得意洋洋地向威爾森報告這個好消息，但威爾森就像最精打細算的北非商人，總要爭取最好的利潤。「再打一次電話給他，告訴他百分之十二絕無可能，但是我們可以破例打個折扣，只給好朋友的友情價，百分之十三·五。」我才說出數字，馬西—里維爾先生馬上接受。當我忙著準備文件，急著趕往科洛尼請他簽字的時候，佳士得打給馬西—里維爾，將佣金一口氣降到百分之七，降幅雖大，但他不買帳。威爾森利用我當傀儡打心理戰，已向客戶暗示「貴等於好」的概念。威爾森的魔咒實在有效，馬西—里維爾先生甚至脫口說出：「百分之七？他們怎麼可能這麼便宜！」該場拍賣會引起轟動，數千人湧

入科洛尼來看全球金字塔頂端的百分之一巨富如何生活。拍賣會進行到一半，威爾森用他一貫的方式「發號施令」，俯身對我柔聲說：「為什麼不由你接手呢？是你促成這次拍賣的。」我嚇得馬上照辦，完成生平第一次登臺，還因此登上《日內瓦論壇報》（*Tribune de de Genève*），獲得了相當正面的評價。

威爾森毫不掩飾他堅信藝術和金錢密不可分的信念。「喜歡一件藝術作品的人，幾乎都希望將它占為己有。一個人得垂涎藝術，才能真正欣賞藝術。」他在一九六六年接受《紐約客》雜誌訪問時說道。威爾森認為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¹²⁹是個極有意思的人，常常惋惜赫斯特已不在人世。威爾森告訴雜誌記者：「赫斯特就是想要那些修道院。」—於是命人將心儀的古建築一磚一瓦拆解下來，將所有磚瓦，連同他在歐洲大陸看上的其他珍玩寶物，悉數運回到新世界的聖西蒙（Saint Simeon）¹³⁰。儘管歐斯赫在歐洲瘋狂大蒐購的那些文物古董多數都躺在貨箱裡，他從沒打開拿出，但他就是非買不可。有買上癮的人，那麼就有威爾森這樣賣上癮的人。

除了是個不公開的糖尿病患者、沒出櫃的同性戀，威爾森還是個公開身分的猶太人，一個不折不扣的猶太文化愛好者。英國的反猶主義歷史悠久，儘管英國猶太人成就出眾，諸如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牛津街的購物中心大亨（瑪莎百貨〔Marks and Spencer〕的希佛〔Sieff〕家族）、牛津與劍橋大學學者（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倫敦銀行家（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批的歐洲猶太畫商與收藏家移居倫敦及紐約。在威爾森帶領下，蘇富比跟偉大的（猶太裔的）藝術經紀人杜維恩及威爾頓斯坦競爭，全力爭取猶太裔客戶。

直到威爾森改變拍賣市場以前，偉大的藝術傑作通常是私下成交，因為買賣雙方都是低調、不喜張揚的有錢人。這並不是說蘇富比和佳士得只能撿拾殘渣，而是能為拍賣行帶來高利潤的高價物品非常罕見。威爾森垂涎其中的利潤，首先就要爭取猶太人的好感和信任。

因此，他聘用來自德國的猶太裔移民、前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藝術教授漢斯·格羅瑙（Hans Gronau）擔任首席藝術顧問。

後來格羅瑙用力拖沉重畫作時心臟病發作猝逝，威爾森選定其遺孀，卡門（Carmen），一名專研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接下職缺，成為他左右手。反觀競爭對手佳士得，從未讓猶太裔藏家覺得它是個安心的避風港，而威爾森給予這些收藏家的保障，卻是無人能及。威爾森願意捨棄短期利益，著眼於公關宣傳效益，即使拍品最後沒有賣出，取得其拍賣權已是何其榮幸、何等榮耀的事。

威爾森要對抗、競爭的生意對手不只佳士得，還有紐約的帕克博內拍賣行，其開出的百分之二十三佣金比足以讓任何賣家張口結舌，因而威爾森談價時得以有更大的談判空間；他經常給到百分之八的降幅。再者，美國課徵拍賣稅，但英國不課稅，這是另一個有利的談價籌碼，不僅能和美國拍賣行搶客戶，也可與巴黎的德魯奧拍賣中心（Hôtel Drouot）抗衡。該中心是由法國拍賣師共同組織的交易中心，也背負著食古不化、濃厚的法國官僚主義作風。法國人沒麵包吃，就吃蛋糕吧。¹³¹這是威爾遜的態度，為了談出最好的成交佣金，他無孔不鑽，常常見縫插針。有的時候，藝術市場如戰場。

一九五七年，威爾森主持的拍賣會首次登上世界各大報紙頭版。那一場拍賣的是阿姆斯特丹銀行家暨慈善家威廉·溫伯格（Wilhelm Weinberg）的收藏，包括多幅梵谷傑作。溫伯格在一九四〇年流亡到紐約，一九五七年在斯卡斯岱爾鎮（Scarsdale）去世，身後未留下繼承人。隨著波音七〇七和道格拉斯DC-8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問世，開啟了噴射機時代，威爾森可說是史上第一個搭噴射機到處跑的拍賣師。他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是閱讀《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訃告版，因此馬上抓住機會，搭機飛往溫切斯特機場（Westchester Airport）。到紐約與溫伯格的遺囑執行人晤談後，他得知所有拍賣收益必須捐給慈善機構，他預期此場拍賣會勢將引起極大轟動。

於是威爾森做出不可思議的舉動。他雇請廣告龍頭智威湯遜公司（J. Walter Thompson）將該場拍賣會操作為深具話題性的活動。因為那是一場慈善拍賣，參與其中的公司勢必能提升品牌形象，他以此為由，說服那些廣告人免費提供服務。接著，威爾森透過他在埃及法魯克國王藏品拍賣會上結識的人脈、伊頓公學的校友，也就是曾擔任法魯克國王年少時期家庭教師（諄諄教導看來都是白費）的愛德華·福特爵士（Sir Edward Ford），成功邀得身分最尊貴的人士：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福特爵士如今是英國女王的私人祕書。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位甫五年，爵士認為女王走出宮殿參與這類活動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此，威爾森特別在龐德街總部安排了一次私人預覽。女王在丈夫菲利普親王、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以及一眾隨從的陪同下蒞臨，全球媒體陷入狂熱。據傳言，她最中意的是竇加那幅〈落馬的騎師〉（*The Wounded Jockey*）。女王愛馬，而那是一幅優秀的馬繪畫。

全球各國電視臺都報導了那場拍賣會，儘管英國王室並無人到場，但傳言早已甚囂塵上，指出白金漢宮的主人打算競標那幅畫。最後，該畫的得標者卻不是女王，而是好萊塢製片大王，甫以《桂河大橋》（*Bridge on the River Kwai*）創下賣座佳績的山姆·史匹格（Sam Spiegel）。他出價約一萬美元（約臺幣三十萬），對於幾年前才結束戰後配給制度的英國而言，這是一筆巨額數字。那天晚上，成交價最高的拍品是一幅梵谷作品，拍出約五萬美元（約臺幣一百五十萬），拍賣會總成交額則達到近百萬美元，寫下新紀錄。一九五〇年代美國上層中產階級奉為聖經的《生活》雜誌（*Life*）也大書特書了一番。

自此大眾開始痴迷於拍賣紀錄，而威爾森締造紀錄、打破紀錄的次數之多，無人能出其右。對外行人而言，紀錄和排名要比品味來得更容易理解，金錢成了衡量藝術的尺度。大家不再問：「美嗎？」而是問：「貴嗎？」藝術品也開始被視為一種投資標的，不僅僅只是賞心悅目而已，繪畫作品就像股票一樣會升值。經歷過嚴酷戰爭洗禮，景氣正在恢復到正常狀態的世界，開始沉迷於財富帶來的樂趣，藝術品不斷升值的現象引發世人的好奇與關注。

由藝術和金錢組成的這一道新方程式裡，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畫作成為豪客們的投資首選。主要原因並非在於畫作的用色和浪漫特質，而是它們不像古典大師的作品那麼容易偽造。再者，這些法國畫家作品創作的年代距今不遠，因此畫商仍然有法深入查證作品的來源和真偽。這兩派繪畫作品多由戰後暴富的新貴，特別是希臘新富所購買。戰後百廢待興，舊富階級仍未從貧窮的泥沼中爬出，對那些新富嗤之以鼻。新富則不想冒著被誑騙的風險，畢竟剛踏入藝術收藏領域，想必還無所適從。因此梵谷作品是他們最穩當的選擇。

一九五八年，威爾森超越自己，更上一層樓，以拍出七幅印象派傑作得到《生活》雜誌更大版面的報導。那是一場私人珍藏拍賣會，拍品來自剛過世不久的歐洲猶太裔藝術行家：雅各布·高爾施密特（Jacob Goldschmidt）。此人出生於柏林，流亡至美國後成為華爾街銀行家，在一九五五年過世。「七巨作」成為拍賣史上規模最大的單一私人珍藏專拍。在威爾森催逼下，蘇富比的會計部門還準備超過百萬元的巨款做為擔保金。

在酒吧十點即關門的倫敦，該場在深夜舉行的拍賣會，超乎想像地璀璨奢華。這是史上第一場須穿正式禮服出席的拍賣會。場內到處都有電視臺攝影機，與會的名人包括甫於電影《梵谷傳》（*Lust for Life*）飾演主角梵谷的寇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威爾森喜愛邀請好萊塢明星當作吸引人的宣傳點）、飾演配角的安東尼·昆（Anthony Quinn，飾演高更）、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¹³²、瑪格·芳登（Margot Fonteyn）¹³³、柴契爾夫人，以及希臘船王歐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船業鉅子尼亞爾霍斯（Stavros Niarchos）與古蘭德里斯（Basil Goulandris）。三人曾是堅毅的航海人，如今是高雅的藝術藏家。另外，好萊塢的頂尖藏家，堪稱小凱撒級¹³⁴的鑑賞家：愛德華·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也從比佛利山莊的家中打越洋電話競標。凡是可引起話題的名人，威爾森都會讓他的公關大軍盡可能到處傳誦。全球有二十多國的媒體報

導了此場拍賣會，當時世界上蘇富比的名號比佳士得更為人所知，威爾森在此事上厥功甚偉，是他讓蘇富比成為藝術品拍賣的代名詞。

其中也不乏一些極富戲劇性的情節。代表處理高爾施密特遺產、相當優秀的紐約藝術專業律師：杰西·沃爾夫（Jesse Wolff），在該場拍賣大獲成功以後也獲蘇富比青睞聘用，成為拍賣行在美國的代表律師。此人始終強力對抗反猶太主義，他專門承接來自歐洲的富裕猶太移民，是追討被納粹掠奪的藝術品的先驅。沃爾夫在紐約被稱為「披著白人新教徒皮的猶太骨」（WASPy Jew），因為他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對猶太移民的負面刻板印象—盡是一些「在德蘭西街上叫賣的手推車小販」。沃爾夫曾是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的冰球隊隊長、哈佛法學院的明星學生，本來能在布魯克俱樂部（Brook），或尼克俱樂部（Knick），或者曼哈頓島任何一家時髦的私人俱樂部如魚得水，但他絕不跟任何有種族歧視的人事物扯上關係。

一九五八年秋天那一晚，蘇富比的拍賣廳裡衣香鬢影，全是衣冠楚楚、一身珠寶華服的男男女女。在威爾森踏上拍賣臺以前，沃爾夫不經意聽見一句詆毀猶太人的話，他不管滿場的盛裝觀眾，悍然打斷拍賣。他根本不信任英國人，因為他所看到的英國人總是袖手旁觀，納粹集中營的暴行在當時固然是祕密，但無人不略知一二。沃爾夫以取消拍賣為要脅，堅持一定要把那位偏執種族歧視的名流趕出會場。在場媒體無不屏息，深怕這場世紀拍賣就要泡湯。最後，那位出言不遜的人被請出場；這是對種族歧視者的有力一擊，而且蘇富比再一次證明自己是「猶太人的朋友」。威爾森走上臺，拍賣會繼續進行。

那是多麼美滿的一晚，總成交額為兩百一十八萬六千美元（約臺幣六千五百五十八萬），刷新了世界紀錄。每幅作品均以高於底價的價格售出，且都不低於十萬美元（約臺幣三百萬）。該晚的焦點是塞尚作品〈穿紅背心的男孩〉（*Boy in a Red Jacket*），由保羅·梅隆以六十一萬六千美元（約臺幣一千八百四十八萬）得標，打破全球非古典大師作品的成交價紀錄，比原紀錄保持者：一年前在巴黎拍賣會拍出的高更畫作，超出兩倍之多。每逢沒人再往上喊價，威爾森就會裝

腔作勢。「什麼？」他彷彿在「奚落」滿場的富裕觀眾太窮酸，「沒人要再加價嗎？」這段話打破原本沉悶的氣氛，贏得哄堂的笑聲，後來也成為廣為流傳的軼事傳說。

梅隆為自己的一擲千金如此辯護：「當你面對這樣的美麗畫作，錢算什麼呢？」七巨作當中，只有最便宜的那幅雷諾瓦〈沉思者〉（*La Pensée*）是由英國買家得標，來自伯明罕的白手起家大地主傑克·科頓（Jack Cotton）出價二十萬美元（約臺幣六百萬）購入（該畫亦是當晚成交價與底價差距最小的拍品）；其他六幅都賣給了美國人。整場拍賣會歷時二十二分鐘即宣告結束。「我從來不曾賣得這麼快，賣出這麼多錢。」威爾森表示，隨即以一貫的謙遜補充說：「我敢肯定，我以後再也做不到。」

據《紐約時報》報導，倫敦蘇富比之所以會拿到委託，是因為高爾施密特的兒子認為蘇富比能比紐約的帕克博內拍賣行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買家。該場拍賣會創下絕頂佳績，證明了蘇富比的名號確實有號召力，能夠讓藝術界人士和眾買家跨洋遠道前來與會，而它的長年勁敵佳士得這下俯首稱臣，只能屈居第二，至少暫時如此。此場勝利也預告著帕克博內拍賣行將遇上大麻煩，因為它成了威爾森瞄準的下一個目標。既然紐約藝術界、紐約的買家，他全都手到擒來，為什麼不把紐約納為囊中之物呢？

122 位在倫敦諾丁丘，堪稱全球最大的古董、二手市集，聚集了上千個攤位。

123 倫敦最古老的市場之一，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過去以賣女性內衣聞名，現在除了內衣和布料，也有生鮮食品和工藝品。

124 美國藝術家（一八五六～一九二五），因肖像畫享有美名，被譽為當代最優秀的肖像畫大師。

125 〇〇七系列書籍的作者。

126 英國演員、劇作家、流行音樂作曲家（一八九九～一九七三）。因影片《與祖國同在》（*In Which We Serve*）獲得一九四三年奧斯卡榮譽獎（也譯為終身成就獎）。

127 英國復辟時期的劇作家（一六四一～一七一六），以諷刺上流社會的喜劇聞名，作品包括《鄉下妻子》（*The Country Wife*）、《老實人》（*The Plain Dealer*）等。

128 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雙面間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美蘇冷戰期間，在英國為蘇聯收集情報。除了菲爾比、麥克林、伯吉斯、布朗特四人外，第五人據傳是他們的劍橋同窗：約翰·卡爾恩克洛斯（John Cairncross）。五人皆為英國中上階層，並於劍橋大學就學時被招募，因而有此稱號。

129 美國報業大王、企業家（一八六三～一九五一）。赫斯特在新聞史上備受爭議，甚至被稱為新聞界的「希特勒」、「黃色新聞大王」。他在二十世紀初掀起黃色新聞浪潮（黃色不代表色情，而是以聳動為主），對後世新聞傳媒具深遠影響。

130 聖西蒙位在美國加州中部海岸，有時會用來指稱赫斯特家族建立的赫氏城堡（Hearst Castle）及附近莊園。但赫斯特去世後，其家族已將城堡及莊園捐獻給加州，成為州立歷史公園對外開放。其中收藏了許多藝術作品及古董。

131 這句話原本出自被送上斷頭臺的法國瑪麗王后，但根據歷史記載，瑪麗王后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是他人杜撰。

132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國現代小說家、劇作家。設立毛姆文學獎，著有《月亮與六便士》、《巴黎的異鄉人》、《剃刀邊緣》等。

133 英國著名的首席芭蕾舞者（一九一九～一九九一）。

134 此位演員憑藉黑幫電影《小凱撒》（Little Caesar）走紅。

第八章 拍賣行龍虎鬥

紐約堪稱是藝術經紀人的城市，整體從業人員數量遠遠超過倫敦。紐約市上流社會人士早期把隱姓埋名、不事張揚奉為圭臬，一個人的姓名登上《紐約時報》的機會，一生只有三次，分別是出生、結婚和死亡，而不是賣出名下一件藝術藏品的時候。因此，即使紐約成為藝術經紀商之都，任何人選擇在蘇富比和佳士得工作也只是一種謀生方式。然而，美國禁酒時期結束之後，鍍金時代名流家族的後裔一改低調行事傳統，開始在晚上出門、在城裡玩樂，造就出一個更容易打入的「咖啡社會」（Café Society），也餵養出專寫名流八卦軼事的專欄作家，諸如艾爾莎·麥克斯威爾（Elsa Maxwell）和伊戈爾·卡西尼（Igor Cassini）。時至今日，出名不再是一件可恥的事，甚而成為身分地位的表徵。

紐約上層社會逐漸瀰漫追名逐利的風氣，菁英名流變得愈來愈自戀，彼得·威爾森精準嗅到其中商機，意識到如同在倫敦一樣，在紐約，只要能參與帕克博內拍賣行的某場拍賣盛事，像是摩根家族（Morgan）¹³⁵、范德堡家族（Vanderbilt）、畢多家族（Biddle）¹³⁶的私人珍藏拍賣會，就等同於社會地位又向上一階。倘若還成功標下一件拍品，那麼，他達成的，不僅僅是買下公園大道或第五大道某棟豪宅主人的一件藏品而已，只要被哪位八卦專欄作家在文章裡提及名字，他就等同被認證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畢竟美國的階級流動性甚高，並非壁壘森嚴。因此，威爾森不單單把帕克博內拍賣行視為可投資的好目標，更是他大棋局中的關鍵一步。他的目標是要讓蘇富比在紐約藝術圈掙得一席之地，為當地業界帶入新氣象，以利公司及他自己持續發展與獲利。

帕克博內拍賣行創立於一九三〇年代，創始人為兩位脫離美國藝術協會（American Art Association）自立門戶的拍賣師。該協會縮寫AAA，令人聯想到任何採用十二個步驟戒癮的團體，比方說，戒藝術癮匿名互助會（Art Addicts Anonymous）或美國汽車協會之類，但實

際上，它是美國強盜資本家時代應運而生的拍賣行。當時美國人的拓荒精神創造了巨大財富，土財主們亟思擺脫財大氣粗的商人本色，於是起而把金錢投入藝術，藉此營造優雅形象。美國藝術協會迎合的那類白手起家富豪，當中有一些人在鐵達尼號和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沉沒時罹難。帕克和博內從AAA這艘母艦叛逃自行創業，做得有聲有色，最終在一九五〇年接手AAA，在麥迪遜大道九百八十號建造起一幢宛如博物館般龐大的現代建築，做為他們獨霸紐約藝術市場的拍賣中心。一如蘇富比總部入口上方有獅面女神半身像坐鎮，帕克博內拍賣行也有雕像高踞於門面，那座雕像刻劃著代表文化的赤裸維納斯在勾引一位肌肉發達的凡人，後者大概象徵了世俗且強大的紐約。

說到獨占市場，新世界美國的藝術拍賣界之所以看似也具備舊世界歐洲的優雅英國氣息，那是因為帕克博內拍賣行的董事長正是一名英國優雅紳士：萊斯利·海姆（Leslie Hyam）。海姆畢業自劍橋大學物理系，身高六呎三吋（約一九一公分），與他的主要對手威爾森站在一起時，可以平視對方的眼睛。他也跟威爾森一樣非常戀物，更是多種藝術品領域的權威專家，包括法國家具和東方地毯。但和威爾森不同的是，海姆愛的是女人，更是曼哈頓鼎鼎有名的花花公子。海姆以物理學者的身分來到美國，紐約的蓬勃生氣與創新活力帶給他極大啟發，他改變志向，想成為一個小說家。但此路不通，於是他燒了所有手稿，改到美國藝術協會當目錄編製員。在那裡，他發現了自己的天職。他編製的目錄被視為業界最佳，與科恩菲爾德和貝耶勒的目錄平分秋色，於是帕克和博內將他挖角過去，兩人退休之後，讓他接掌已經壯大無比的公司。

除了性向，海姆和威爾森之間另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於海姆並不是拍賣師。他將拍賣重責交給了副手，一位原姓馬里安諾（Mariano）的健朗義大利人：盧·馬里昂（Lou Marion）。不過此人有一頭火紅頭髮，還會在聖派翠克日（St. Patrick's Day）[137](#)辦派對，讓人不由得聯想到愛爾蘭的紅髮綠裝矮精靈（leprechaun），以致大家

都以為他是愛爾蘭人。馬里昂進藝術拍賣這行以前，曾在紐約的愛爾蘭移民區兜售保險，他甚至改變姓氏好讓自己更融入那個社群。政治機構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向來由愛爾蘭裔移民掌控，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依然能在紐約呼風喚雨，而馬里昂仍然握有那些高層人脈，因此能補足英國人海姆的人脈缺口。身為拍賣師，馬里昂曾在一九六一年創下拍賣史上最高成交價紀錄，拍品是林布蘭的超級傑作〈看著荷馬半身像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在他的槌下以兩百三十萬美元（約臺幣六千九百萬）拍出，賣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跟威爾森最輝煌的拍賣成績：高爾施密特那幅塞尚的成交價相比，足足多出四倍。

儘管馬里昂以林布蘭畫作創下世界紀錄，蘇富比在兩方面比帕克博內拍賣行更具優勢。第一，是給予賣家擔保價格；美國人認定這樣有違美式精神，有如祕密商妥價格，美國人喜歡讓每個競價者都有機會撿便宜。提供最低價保證是威爾森吸引賣家委託的方式，在美國人看來，卻是人為干預，完全扼殺了價格彈性。蘇富比的另一個優勢則是賣方支付的佣金比例。帕克博內拍賣行收取百分之二十，足以證明它在紐約拍賣市場的獨占地位，而蘇富比收百分之十，只有它的一半。那是由於在倫敦還有佳士得這個對手，蘇富比得始終維持合理的低價。

然而，蘇富比對上帕克博內最大的優勢竟是因為海姆在一九六三年秋天自殺身亡。他在康乃狄克州新迦南（New Canaan）的度假屋，坐在汽車裡引廢氣自殺，死於一氧化碳中毒，得年六十一歲。動機據說是感情問題。威爾森衷心地致上慰問，然後把握一生僅此一次的機會，立即採取收購行動。海姆對帕克博內的重要性，就像麥可·喬丹之於芝加哥公牛隊，馬克·祖克柏之於臉書，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138](#)之於東街樂團（The E Street Band）；他是拍賣行的中心人物。少了他的帕克博內，可以很便宜就收購。在大西洋這一邊，蘇富比的中心人物威爾森竭盡全力去說服董事會，指出收購

帕克博內可以為蘇富比悠久的純正英國血統注入新血，以變得「不那麼英國」。時代潮流也站在威爾森這一邊，短短幾個月後，一九六四年二月，披頭四樂團現身於《艾德·蘇利文秀》（Ed Sullivan Show），美國變得「更為英國化」；音樂侵略為藝術侵略鋪好了道路。

擋在威爾森前方的阻礙，是法國藝術拍賣界的王者至尊：摩里斯·杭斯（Maurice Rheims）。倫敦的威爾森、巴黎的杭斯、紐約的海姆，當時是由這三個男人統治藝術世界。現在，海姆已不在，杭斯和威爾森即將展開繼拿破崙與威靈頓在滑鐵盧決戰之後，史上又一次最重大的英法對決。此兩位巨頭在一九五三年於開羅曾經交手過一次，當時杭斯介入埃及國王法魯克藏品拍賣，就法國藏家標下拍品的買家佣金，他硬是要求分一杯羹。眼見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拍賣行競爭，法國始終處於英國的陰影之下，杭斯不免氣惱。而威爾森不只打破了杭斯締造的所有紀錄，現在還想拿下曼哈頓，為自己和英國爭光添耀，杭斯實在忍不下這口氣。

杭斯著手集結多位法國富豪組成聯盟，其中包括與他妻子有親戚關係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不過，這一次，來自優雅舊世界的杭斯敵不過威爾森已嫺熟的美國式宣傳技巧：如果有料就大方展現，能宣傳就宣傳，能炒作就炒作。由史丹利·克拉克（Stanley Clark）出馬助威爾森一臂之力。這位弗利特街（Fleet Street）139的魔法師向全球各國媒體發送新聞稿，指出蘇富比收購帕克博內已是既定事實。不過事實上，生米還未煮成熟飯，隨時有破局的可能。主要障礙來自一位百貨公司繼承人理查·金貝爾上校（Colonel Richard Gimbel）。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也是激進的反英人士。他擁有帕克博內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足以左右任何的交易案。

愛國的金貝爾上校以華盛頓率領軍隊死守福吉谷（Valley Forge）來比擬，表示同意蘇富比的收購等同是向英軍投降。但他對杭斯來說也是個問題，因為金貝爾上校對法國人也無好感。無論是哪一方，他都打算從中作梗。儘管杭斯已經投入足夠的錢到紐約，可以壓過蘇富

比的出價，但由於他不會說英文，反而證明了美國人對法國人的刻板印象：傲慢、自認優越（都是紐約法國餐廳那些傲慢領班種下的惡因）。至少蘇富比這些掠奪者會講英語，能和他們說理。不過，金貝爾仍然在觀望。

已是蘇富比顧問律師的沃爾夫當時出力最多，盡所能為威爾森扭轉局面。他運用自身的魅力，也憑藉與猶太菁英「四海一家」的交情，向金貝爾保證這家新接手的公司值得信賴，一定會妥善保管他那些無與倫比的珍本書收藏。最後金貝爾對愛倫坡和狄更斯作品的熱情，壓過他對無信無義英國人的反感，交易案於一九六五年拍板定案。

威爾森是我最崇拜的藝術界人士，杭斯則是最想成為的藝術界人士。這個白日夢最初萌芽於母親送我的禮物：幫我訂閱《藝術鑑賞》（*Connaissance des Arts*）數年。這本美不勝收的精緻雜誌是杭斯於一九五〇年代創辦的。當時我母親準備前往日本，雖然無法陪在我身旁，但眼看我已對藝術產生興趣，於是她想進一步幫我培養這分熱情。再加上我處於青春期的我，我懷疑母親的如意算盤是，倘若把我的思想維持得高尚純淨，我就不會去看《花花公子》之類的雜誌。事實證明，不是讀了前者就不會讀後者，雖然我相信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同時把休·海夫納（Hugh Hefner）¹⁴⁰和杭斯當偶像來崇拜的青少年。對我而言，《藝術鑑賞》也宛如一本高尚正向的「成人」雜誌。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我剛進入蘇富比任職，但日子過得黯淡無光，讀過杭斯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自傳《罕見珍品》後，我像是打了一針藝術腎上腺素，又能生龍活虎地繼續追夢。這本書後來出了英文版，書名改為《美好的迷戀》（*The Glorious Obsession*）。儘管非法語國家的人讀過它的少之又少，但我個人認為，任何對藝術感興趣，特別是想以藝術為職志的人，都該讀一讀，它真是最生動有趣、最富啟發性的一本藝術入門書。我很早就領悟，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威爾森那樣的人。他如此有英國氣質，同時又兼具拜占庭異國風。但杭斯是完全歐陸氣質，我和他無疑講同一種語言、在相同文化環境下成

長。威爾森隱藏的祕密多到足以寫一本書；杭斯則是完全開誠布公，而且由於他下筆坦率，讀過他的自傳後，我就像朋友一樣了解他。不過，還要再過許多年以後，我才真正有幸見到這位心目中的偶像。

那是何其榮幸的一件事。一九九〇年代，我剛接任總部設於日內瓦的蘇富比歐洲區主席，籌辦了一系列講座，不只邀請藝術界的大師，也將觸角擴及與藝術緊密聯繫的文學、時尚、音樂等領域。講者陣容相當多元，包括卡爾·拉格斐、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發條橘子》作者）、哲學家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和貝爾納—亨利·李維（Bernard-Henri Lévy）、漢姆特·紐頓，以及尚未聲名大噪的傑夫·昆斯。但是能夠「邀到」杭斯，對我尤其意義重大，他以「華爾街的阿波羅」為講題，內容勁爆；比如他妙語譏諷我們所辦的一場艾爾頓·強藏品拍賣，將拍賣目錄比喻為「承諾凡爾賽宮，給的卻是車庫大拍賣」。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副偌大眼鏡下不斷掃視四方的炯炯大眼，彷彿目光隨時會被美女吸引過去，就如同他愛美麗藝術品那樣，他愛所有美的事物。那是我至今見過最機靈警覺的眼睛。

在杭斯九十來歲時，我極其榮幸能登門拜訪，這才清楚認識到，他那雙靈動掃視的眼睛是何等的一雙火眼金睛。他居住在麗池酒店附近，聖多諾黑市郊街（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上的一座豪華氣派大宅邸。我到得太早，來開門的杭斯上半身襯衫、領帶一應俱全，但下半身只穿了一條四角褲。顯然他隨時枕戈待旦，做好「談情說愛」的準備。因為不時有景仰他的聰慧女性和藝術追星族上門造訪，他簡直接應不暇。門廳裡擺了一箱大師版畫，他征服的每一位新歡告辭離開時，可以順手挑一幅帶走，好一個珍貴的「派對小禮物」啊。他兩個住在巴黎、事業有成、頗負盛名的女兒：攝影師貝蒂娜（Bettina）和導演娜塔莉（Nathalie），很擔心父親會把收藏品送光光。但她們用不著擔心，他的收藏多到難以斗量。

穿上長褲的杭斯帶我參觀他的豐富藏品，從拉斐爾、法國利摩日（Limoges）名瓷到巴爾蒂斯（Balthus）[141](#)，包羅萬象。其中最精采

的，是一幅美得驚人的克林姆（Klimt）畫作。該幅畫目前收藏於紐約的新畫廊（Neue Galerie）—我在世界上最喜歡的美術館。還有一張出自方索·卡拉班（François-Rupert Carabin）¹⁴²之手的十九世紀末桌子，也令我難忘，那四尊支撐桌面的人物雕像頗有日後超現實主義的風格。我和杭斯共處的時候，想起了一九八一年過世的威爾森。他享年七十一歲，可以說走得太早。很顯然，威爾森不會像杭斯這般，把藝術當春藥誘惑年輕女人或男人。威爾森有帝王般的威儀，守禮克己，縱然儀表堂堂，卻也是一個內向、非常謙虛的人。反之，矮小（與威爾森相比）、熱情、外向的杭斯就像多數的法國人，絕不會自謙，而是自我誇大。他們兩人的共同點在於對藝術最挑剔的品味，對藝術最深切的熱情，不管他們身在跳蚤市場或是博物館裡。

杭斯的座右銘是「別相信物品」（Distrust objects），雖然據他自己的估算，他畢生拍賣的物品數量在一千四百萬件以上，遠遠超過其他拍賣師。其中有最偉大的古典大師及印象派繪畫，也有另類作品，比如埃及國王法魯克收藏的色情漫畫書、砍斷路易十六脖子的斷頭臺鋤刀、拿破崙在瓦格拉姆戰役（Battle of Wagram）戴的帽子。杭斯不相信物品，這沒什麼奇怪的。依他之見，看重物品，只會讓每個偉大收藏家臨終時顯得更加可憐、無助，畢竟滿室的珍寶會活得比藏家更長久。

杭斯是洛林人，成長於法德交界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Alsace-Lorraine）。話說，他家鄉的家常菜：洛林鹹派，儼然已成為法國美食的代表，我第一次前往紐約旅行時，發現此道料理正席捲當地菁英族群。杭斯的父親是位將軍，在法國，猶太人當上將軍是極其罕見之事。而這位杭斯將軍，就如同金貝爾上校一樣，也是著名的一戰英雄，曾於凡爾登戰役（Verdun）負傷。杭斯生於人脈廣闊的家庭，但也生活在德雷福事件（Dreyfus Affair）¹⁴³帶來的反猶太主義陰影之下。在法國的猶太人，即便身居高位，權勢龐大，也永遠不可能高枕無憂。杭斯因為他的血統，始終有點社會邊緣人的氣息，性格也因此非常隨和體貼。

杭斯讓我心有戚戚的另一點在於，他也是輟學生。他曾進入羅浮宮學院（École du Louvre）和巴黎索邦大學念藝術，但沒有念完。儘管如此，他仍是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Academie Française）的拍賣師。該學院是法國學術最高殿堂，院士數量始終保持在四十位，法國人稱呼他們為「不朽者」（和美國的一個人聲重唱〔doo-wop〕樂團同名）。歷代院士包括了雨果、巴斯德¹⁴⁴和伏爾泰等人，輟學生杭斯能躋身於天才之列，對一個執木槌的拍賣師來說，真是不壞的際遇。

但對杭斯而言，跟法蘭西學院那座聖殿相較，要成為德魯奧拍賣中心的一員可能更具難度。該中心座落在歌劇院附近，匯集了巴黎約七十家拍賣公司，是一幢可與蘇富比總部媲美的龐大建築。成立於一八五二年，獨占法國藝術拍賣市場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德奧魯，向來不歡迎猶太人。出生於一九一〇年的杭斯，是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希特勒上臺前夕，走上藝術拍賣這一行，因此對他而言，德奧魯於他是一扇更難擠進的窄門。然而，他不僅取得鑑定拍賣官（commissaire-priseur，即法國的估價拍賣師）資格，更突破障礙進入德奧魯，在納粹占領法國期間，成為唯一一個能在神聖拍賣廳主持拍賣的猶太人，儘管大門上的告示寫著：INTERDIT AUX CHIENS ET JUIFS；狗與猶太人不得入內。

納粹最後識破杭斯的猶太身分，將他送到巴黎郊外的德朗西（Drancy）轉運營，以待押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幸好家族人脈，即他父親與貝當元帥（Marshal Pétain）的同袍情誼解救了他。此兩位將軍都是凡爾登戰役的赫赫英雄，曾經並肩血灑疆場，生死與共的戰友情誼使得杭斯家族流的禁忌血液不再成問題。杭斯一離開德朗西轉運營即加入法國反納粹地下組織，專門協助猶太人和共產黨員偷渡到瑞士。接著，他與北非的自由法國突擊隊接上線，加入指揮部在阿爾及爾（Algiers）的北非盟軍，成為傘兵，並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¹⁴⁵結為好友。我在瑞士服的短短兵役根本相形見拙，就如我說過的，他是個深具啟發性的人物，誰能比得上他呢？

二戰法國光復後，杭斯回到巴黎，迅速竄升為頂尖拍賣師。正如威爾森天天讀《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訃告版一般，杭斯讀《費加洛報》（*Le Figaro*）訃聞版，並成為巴黎花卉市場的主力消費者，因為他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個重要藏家的葬禮。戰後，他主持的第一場大型拍賣會，拍的正是赫爾曼·戈林¹⁴⁶的財產，好一個甜蜜的復仇。由於戰後的巴黎經濟景氣比倫敦來得好，很多富有的美國人或是在當地購屋，或是在麗池飯店擁有永久住房，因此，杭斯能與他們見面，談成拍賣委託，將他們的藏品送上德魯奧拍賣場。

杭斯於一九五六年締造了一個拍賣新紀錄。美國費城畢多家族委賣的一幅高更作品：〈蘋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Apples*），由希臘航運大亨古蘭德里斯得標。該畫以二十五萬五千美元（約臺幣七百六十五萬）成交，打破全球非古典大師作品拍賣的最高價紀錄。約莫一年後，一九五八年，威爾森以高爾施密特收藏的一幅塞尚作品，再次刷新世界紀錄。據傳，古蘭德里斯志在必得該幅畫作的原因是，畫中的「蘋果」其實是柳橙，正是他最喜歡的水果。他在航運業的主要競爭對手尼亞爾霍斯也出席了這場拍賣會，坐在拍賣場另一頭與他遙遙相望。不過，古蘭德里斯純粹是愛柳橙心切而豪氣競投，與商場敵手在場無關，終至衝出了新高價記錄。

儘管在收購帕克博內拍賣行之役落敗，杭斯在一九六〇年代主持的場場拍賣會規模甚至更加盛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藏品的專場拍賣，以及質量同樣精采的貝斯特吉（Bestegui）家族珍藏拍賣。唐·卡洛斯·德·貝斯特吉（Don Carlos de Bestegui）是移民到墨西哥的巴斯克人¹⁴⁷後裔。他是伊頓公學畢業生，住在香榭麗舍大道（Champs-Élysées）上一間由柯比意打造的頂樓公寓（屋頂陽臺則由達利設計），還擁有一棟巍峨城堡，裡頭掛滿的世界名畫全是以假亂真的贗品。塞西爾·比頓（Cecil Beaton）¹⁴⁸即以該城堡的書房為藍本，設計了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裡希金斯（Henry Higgins）教授的書房布景。大家都稱呼唐·卡洛斯為查理，他也曾以威尼斯的拉比亞宮（Palazzo Labia）為家；一九五一年，他在該處舉

辦了一場奢華璀璨、無與倫比，堪稱那個時代最盛大的「世紀舞會」。一九六六年，作家楚門·柯波帝（Truman Capote）以這場盛會為靈感，舉辦了一場同樣成為傳奇的黑白舞會。

完成貝斯特吉藏品拍賣以後，杭斯專注於提供藝術顧問服務，客戶包括蓋蒂（Getty）¹⁴⁹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甚至是法國政府。畢卡索在一九七三年去世後，其家族提出以藝術品充抵巨額遺產稅，因此愛麗舍宮（Élysée Palace）¹⁵⁰特別向杭斯諮詢意見，以決定該選擇大師的哪些作品。沒有任何其他藝術鑑賞家會比杭斯更勝任此一重任，他那無人能出其右的絕佳品味，最終呈現在巴黎畢卡索美術館的館藏—其精緻度為全世界美術館中的翹楚。一直到了年過九旬，他還周旋在眾美女之間左右逢源，也筆耕不輟，寫出本本睿智、詼諧之作，內容精采度完全不輸他當年那本自傳。我就是讀了那本自傳，才更加堅定成為拍賣師的念頭，才得以毫不畏懼，以區區小雞般的碎步，跟著他那宛如恐龍般的巨大足印前行。他筆下展現的機智、毫不造作的樸實，驅走我的恐懼，更猶如幫我上了一堂入門課，日後有幸與藝術界的形形色色「神聖巨獸」打交道時，我起碼懂得如何應對進退。

¹³⁵ 美國的摩根家族以金融和銀行業起家、致富，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美國及世界各地建立起名聲。

¹³⁶ 美國畢多家族原在英國，為躲避宗教迫害來到美國，經幾代發展，最後落腳費城，同是以金融業起家致富。

¹³⁷ 紀念愛爾蘭主保聖人聖派翠克的節日，為愛爾蘭當地規模最大的節慶。

¹³⁸ 美國搖滾歌手、創作者與吉他手。經常與東街樂團共同創作與巡迴演出，也會以個人的身分與其他樂手合作。

¹³⁹ 曾為英國媒體報業的大本營，現為司法界的倫敦據點，法院和律師事務所林立，又譯為艦隊街。

¹⁴⁰ 《花花公子》雜誌創辦人及企業總裁。

¹⁴¹ 波蘭裔法國具象派畫家（一九〇八～二〇〇一），作品極富爭議性，以描繪青春期少年聞名。

- 142 法國木作工藝師、攝影師、雕刻師（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新藝術運動的代表之一。
- 143 一八九四年，法國陸軍上尉亞弗·德雷福因其猶太血統，而被誣陷出賣軍方情報給德國，遭流放處分，是為法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德雷福事件」，也引發了後來的社會分裂及群眾運動。
- 144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國微生物學之父，倡導疾病細菌學說（菌原論）和發明預防接種，以及狂犬病和炭疽的疫苗。
- 145 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里·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 1890-1970），法國軍事家、政治家。一九五八年推動制定新憲法，成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並出任第一任總統。
- 146 赫爾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 1893-1946），納粹德國的政軍領袖，曾被希特勒指定為接班人；也是「蓋世太保」的首長、「四年計畫」負責人。
- 147 是指居住於西班牙中北部以及法國西南部的民族，可能是歐洲舊石器時代居民的後裔。
- 148 英國著名的攝影師、服裝設計師、肖像畫家、室內設計師（一九〇四～一九八〇），曾榮獲電影、舞台劇的場景及服裝設計獎項。
- 149 二十世紀因石油而致富的美國家族，除蓋蒂石油公司外，也設立了蓋蒂中心，其中收藏豐富的藝術品，猶如博物館。
- 150 法國總統官邸及辦公室。

第九章 摩納哥的西蒙

銀行搶匪威利·薩頓（Willie Sutton）有句名言，他說自己之所以搶銀行，是因為那裡有錢。同理，蘇富比會在蒙地卡羅設辦事處，也是因為那裡有錢。尤其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我被調派到該地時，那裡的錢多到不只淹腳目。那時也是石油危機最嚴重的時期，不消說，倫敦深受影響，經濟景氣始終低迷，似乎並不是開展海外據點的好時機。一九七五年一月，蘇富比總部正式宣布將在蒙地卡羅開設辦事處，時值倫敦股市跌到空前低點，國民西敏寺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陷入財務危機，英格蘭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甚且得暗中提供資金，全力挽救這家不能倒的大銀行。在英國似乎還有一點錢的人都是中東人，他們大肆購買最高級的豪宅，或許不久後就會開始買英國每家大企業。當時，他們唯獨不買藝術品，但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他們終究會在藝術市場大把大把地砸錢。不過，世界上仍然有很多超級有錢人，法國蔚藍海岸似乎是富豪聚集密度最高的地方。

我之所以被調派到蘇富比的這處新據點，很可能是因為我講法語。而我在公司運用法語能力，並不是力求表現，我所圖的是逃離，暫且拋下陰沉的天氣、低迷不振的經濟環境和一成不變的陰鬱生活——開著右駕車穿梭在荒僻的高速公路，奔波四處尋找物品來送進再也無人出價的市場。我尋找遁逃的出路，於是決定幫點忙，協助將蘇富比目錄的英文內容翻譯為法文。蘇富比出的所有目錄都是英、法雙語版，品味格調可是英國拍賣行賴以生存的命脈，沒有什麼比法文更能給人高雅印象了。

然而，這可不是普通的翻譯，那些數不清的拍賣術語與藝術技法術語實在超出我的能力範圍，而我一旦打算做一件事，就會想盡辦法做到十全十美，以期給人留下印象。於是我找到倫敦大學一位高材生，雇他代譯一些內容。我的投資最終得到了回報，威爾森看到這些目錄，特地向目錄部主管約翰·溫特（John Winter）探詢，如此完美

的法語譯文是由誰操刀。有一天，溫特帶著獎賞來表彰我，他說威爾森決定調我去新成立的摩納哥辦事處。這宛如黑手黨教父（蘇富比教父）親自下的派令，我沒有拒絕的餘地。再說，這似乎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我的頭銜是銷售經理，但就像所有的頭銜，往往是空有名號，並無實權。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掛畫、跑腿、做各種雜事。英語稱作gofer，打雜小職員；法文稱為l'homme à tout faire，樣樣事都做的人，一個全能幫手；法語實在是一種字彙精準的語言呢。我還被指派另一個任務：打電話給任何可能出售藝術品或家具的潛在賣家。很顯然，這份名單不會包含超級藏家，就算我無意中說錯了什麼話、搞砸了什麼事，蘇富比失去的起碼不會是某個得罪不起的大客戶。

威爾森已經獲得摩納哥雷尼爾親王（Prince Ranier）授權，可以在摩納哥獨家拍賣皇室收藏品，邊界另一頭的法國人只能吹鬍子瞪眼睛，徒呼負負。至於摩納哥新據點的負責人，威爾森指派了一位好友，英勇傑出的海軍少將鄧普頓—科堤（Rear Admiral Templeton-Cottill）來擔任。少將交往中的男友也是一名海軍將官：上將理查·克雷頓爵士（Sir Richard Clayton）。雖然少將是將官中最低的軍階，這一對將官愛侶身高倒是同樣挺拔，而且盡得英國海軍的真傳，服裝儀容總是打理得一絲不苟。他們共同持有一座曾屬於聖殿騎士團的城堡：羅艾堡（Château de Roaix），其所在位置與威爾森名下的克拉瓦利城堡（Château de Clavary）相距不遠。而且這三個男人都熱愛園藝。每到週末，兩位退役的海軍將官會騎著同型號的摩托車在蔚藍海岸四處遊玩；遺憾的是，數年後，兩人共同出遊時，克雷頓出車禍身亡。辦公室裡不免流傳許多有關威爾森與鄧普頓—科堤的戲謔玩笑話，當然都只是暗地裡嚼嚼舌根。

兩位海軍將官都對藝術一無所知，然而被大家稱為TC的鄧普頓—科堤，因為軍旅生涯而足跡遍及全球，不僅曾統領澳洲皇家海軍、擔任蒙巴頓勛爵（Lord Mountbatten）的首席經濟師—或說省錢大師（對如今力行撙節的蘇富比來說，是人間至寶），還曾於莫斯科大使館擔

任海軍武官，並先後在英國地中海艦隊最重要的兩棲攻擊艦「堡壘號」與英國遠東艦隊擔任指揮官。此外，TC對蘇富比的最大價值在於他是「老寡婦殺手」，而且能說一口流利法語；任何一個女人都會欣然託付自己的財產給他拍賣。從英國皇家海軍退役後，他成為蘇富比巴黎辦事處負責人（依法國法律規定，他可以負責營運，只是無法站上拍賣臺）。如今成立摩納哥這個新據點，威爾森第一時間即屬意他來接掌營運大任。

新辦公室富麗堂皇，為了吸引我們的目標客群，這是不得不砸下的重本。與我們比鄰的，是王室成員和商業大亨最喜歡的兩個落腳點：巴黎大飯店（Hotel de Paris）和冬宮飯店（Hotel Hermitage）。兩家飯店之間座落著冬季體育館（或稱冬季賭場），館內那座裝飾藝術風格的大廳，無疑是全世界最美不勝收的拍賣廳。而不負那般華麗的背景，我們在那裡舉辦的第一場拍賣會，便拍出四百萬美元（約臺幣一億兩千萬）總成交額，獲利遠勝當年在倫敦的每一場拍賣會。

那是一場家具拍賣。原本我感到相當絕望，就算跑來摩納哥，我還是個家具銷售員；差別只在於我告別陰霧天氣，來到一個陽光普照的地方。不過這次的家具可大有來頭，是兩位猶太裔貴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蓋伊男爵（Baron Guy de Rothschild）與阿列克西·德·雷德男爵（Baron Alexis de Redé）的家具收藏。大家都聽過羅斯柴爾德家族，不過雷德男爵也是同樣魅力十足的人物。之所以會有這場拍賣會，是因為這兩位男爵成了室友（最單純的室友關係），而雷德男爵剛剛脫手位於巴黎聖路易島尖的自宅—出自凡爾賽宮建築師勒沃（Le Vau）之手，一六四四年興建的蘭伯特府邸（Hôtel Lambert）。他將這幢堪稱全巴黎最精緻的住家，賣給了羅斯柴爾德男爵夫婦。男爵夫人瑪麗—伊蓮娜（Marie-Hélène）的父母分別是荷蘭裔和埃及裔，她在二戰後活躍於法國上流社交界，是眾所矚目的女王級人物。

雷德男爵迅速與瑪麗—伊蓮娜發展出南西·雷根（Nancy Reagan）和杰里·吉普肯（Jerry Zipkin）的那種情誼。吉普肯這位非常時髦、似為同性戀的未婚男子，時常充當男伴，陪伴上流社會女子

前往頂級法國餐廳或入場券昂貴的慈善宴會，他後來成為雷根總統夫人的護花使者，與她形影不離。雷德男爵與瑪麗—伊蓮娜的關係也是這般如膠似漆，儘管府邸已易主，雷德仍然住在蘭伯特府邸的一翼；這簡直是影集《六人行》的上流社會版。雷德雖未搬離，但是必須脫手府邸裡的大批家具，羅斯柴爾德男爵夫婦則是因為把費里耶爾城堡（Château de Ferrières）捐贈給法國政府，巴黎的新家容納不了原本舊宅的所有家具。這是拍賣史上挺罕見的一次委託，賣家並不是為了錢而賣；兩位男爵要的不是錢，他們要的是空間。因此，他們找上威爾森，而不是杭斯，主要是因為在巴黎舉行拍賣的話，將會被課徵巨額的拍賣稅，在摩納哥則無稅款問題。

對我來說，能見到這幾位傳奇人物，實在是一大樂事。他們就像從巴爾扎克小說裡走出來的角色，宛如來自另一個時空。當時五十來歲的雷德男爵是那樣文弱，那樣優雅，我和他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瑞士人。他在蘇黎世長大，以多爾德大飯店（Dolder Grand Hotel）的一層樓為家，身邊有女僕、傭人伺候照顧。他就像兒童故事《艾洛伊絲》（Eloise）裡那個住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的小女孩。他原來的名字叫亞歷克斯·羅森堡（Alex Rosenberg），一九一六年，他的銀行家父親因協助奧匈帝國皇帝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有功，獲皇帝（在該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授與貴族名銜馮·羅森堡—雷德（Von Rosenberg-Redé）。

那是羅馬尼亞的男爵頭銜，不屬於主流的王公貴族，但頭銜畢竟是頭銜。亞歷克斯約二十歲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父親和哥哥都自殺身亡，家道中落。被攆出多爾德大飯店以後，繼承男爵頭銜的他，決定拿掉羅森堡，將頭銜改為德·雷德男爵。他動身前往美國，先去紐約，接著到好萊塢（在那裡，貴族身分頗吃香）。為了養活腦部損傷的姊姊，他到古董店工作賺錢。儘管外表體面，男爵並不是自戀狂。

男爵的好運在一九四一年降臨。那時候，十九歲的他到曼哈頓東城的美食聖殿布魯塞爾餐廳（Brussels）用晚餐，一位年紀大他兩輪、

正與妻子一同用餐的紳士注意到他（這對夫婦住在聖瑞吉斯〔St. Regis〕飯店）。此位紳士可不是泛泛之輩，而是全球最有錢的男人之一：智利億萬富豪阿圖羅·洛佩茲—威蕭（Arturo Lopez-Willshaw）。他是靠肥料發財，但財富就是財富，就像男爵雖然是個羅馬尼亞的男爵，但他就是個貴族。因一見鍾情而開展的這段戀情，不僅讓雷德男爵從此衣食無虞，過著優渥生活，還讓世人見識到，一個被金屋藏嬌的情人也能翻身富貴、飛黃騰達。

洛佩茲—威蕭將這位愛人安置在巴黎的蘭伯特府邸，還在銀行為他存了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千萬）。然而，男爵不是徒有外表、遊手好閒的漂亮男孩，他最終用這筆智利來的資金（洛佩茲—威蕭於一九六二年去世後，其夫人拿到一半遺產，另一半由雷德繼承），與一名猶太裔貴族魯柏·羅文斯坦王子（Prince Rupert Loewenstein）一起買下倫敦一家商業銀行的股份。此外，這兩人也成為滾石樂團的財務經理，大家都知道他們做出多麼出色的成績。

電影《瘦子》（*The Thin Man's*）的男星威廉·鮑威爾（William Powell）汲汲於保持年輕，比他俊俏的雷德男爵也一樣。他總是把頭髮染黑，也跟搭著私人噴射機到處飛的巴西整形名醫伊沃·皮坦基（Ivo Pitanguy）有好交情。一雙半眯的眼睛是男爵的註冊商標，你不會知道他是在看你，還是在嫌你無趣—光是看到你就足以讓他無聊得想打瞌睡；畢竟跟他自己輝煌的生活相比，任何人事物都可能顯得乏味。雷德男爵可能是我認識的人裡人脈最廣的一位。他就讀瑞士一家私立寄宿學校羅西學院（Le Rosey，那裡才不會收我這種糟糕學生）時，就和日後的伊朗國王和摩納哥親王建立非常好的情誼，到了現在，他還經常與雷尼爾親王、葛麗絲王妃在王宮共進晚餐。

雷德男爵跟貝斯特吉一樣，也是個唯美主義者，兩人是好友。受到貝斯特吉所舉辦的那場奢華舞會啟發，他也在一九五六年主辦一場盛大的化妝舞會。據說是他發掘了還沒沒無聞的聖羅蘭來設計舞會頭飾。溫莎公爵夫人也是男爵的莫逆之交，舞會當晚，她是評選最佳服裝的評審團一員。那場舞會的主題為「世界真是小」。我協助威爾森

規畫該場家具拍賣的時候，時不時會聽到一些大人物的軼事，我有幸還能記得其中幾位的名字。

拍賣會在摩納哥最光輝美麗的春天時節舉行，為期一週的時間裡，共有數個場次，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買主參與競拍。其中一些人倒不只為了家具而來，他們也滿心期待見到葛麗絲王妃（她吸引觀光客的魅力依然未減）。這一大批家具樣樣都是精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兩張桌子。一張是拿破崙用過的桌子，他在上頭簽署了路易斯安那購地案；另外是一張無比精巧、媲美達文西設計的機械桌，曾為俄羅斯凱薩琳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所有。

摩納哥法律規定得由本地司法執達員（huissier）或獲得認證的拍賣師來執行拍賣。如此一來，專程來看威爾森拍賣秀的那些藏家恐怕要大失所望（威爾森簡直像搖滾巨星一樣吸引了追星族）。因此，威爾森想出一個絕妙辦法，他找來資格具足、可敬的瑪凱女士（Madame Marquet）與他同站拍賣臺，由她負責敲槌子喊成交。威爾森認為敲木槌是拍賣最重要的一環，摩納哥的規定卻讓他束手束腳。他對我說：「就像做完所有前戲，卻沒有了結的快感。」他還嫌瑪凱女士抓不準落槌時機，他認為她落槌過快，到了拍賣會的後半階段，他根本是抓著她的手臂，在他評估可以的時候，才准她下槌。他把她變成聽憑他擺布的機器人，畢竟落槌時機是拍賣最重要的關鍵。

成交價最高的拍品是一尊佛羅倫斯工匠製作的三呎（約九十公分）高青銅馬雕像，一位英國人和一位義大利人為它爭得你死我活，最後卻由一位居住在巴黎的伊朗人以近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千五百萬）得標。法國政府不滿蘇富比公然侵門踏戶，搶走理應屬於德魯奧拍賣中心的領土和特權。他們鄙夷摩納哥的作為，譏諷它已成了「婊子王國」。可不是嘛，雷尼爾親王早已把該國的著名賭場賣給了希臘船王歐納西斯，現在又打算把冬季體育館賣給蘇富比；法國遲早也會被他賣掉。因此，法國人祭出他們非常擅長的官僚手段，禁止任何在法國製作，或部分在法國製作的物品出口，比方那張凱薩琳女皇的桌子就是其一。但法國人再努力也功敗垂成，該場拍賣會確立了摩納哥

蘇富比在全球拍賣市場的地位，法國政府是改變不了這一點的。此外，在其他營運據點買氣陷入低迷之際，我們在摩納哥初試啼聲的斐然成績，無疑為蘇富比打了一劑強心針。摩納哥辦事處接下來仍穩定獲利，就像一座希望的燈塔，為黑暗的倫敦總部與紐約分部帶來一絲光明。

因為威爾森很愛他的克拉瓦利城堡，他待在摩納哥辦事處的時間也非常多，而我身為他的得力助手，一大樂事即是陪伴他到處跑。我們通常坐一輛毫無不起眼的雪鐵龍（Citroën）大車，駕車的是個神似史恩·康納萊的英俊倫敦人。威爾森不管到哪裡，似乎總能雇到一個粗獷俊朗的倫敦佬。不過，威爾森從來不帶一分錢出門的習慣，似乎讓這名司機相當吃不消。一天，車子正要通過一條新高速公路的收費站，司機猛地踩下煞車，他拒絕支付通行費。「老闆，你還欠我七十八英鎊。」司機吼道。威爾森不好意思地轉頭跟我借錢。「能否麻煩你幫忙付這筆錢？」他無奈地拜託我。

蘇富比收購帕克博內拍賣行以後，雇用的第一個美國人叫愛德華·李·凱夫（Edward Lee Cave）。他是在麥迪遜大道出沒、穿布魯克兄弟（Brooks Brothers）151的那類西裝筆挺人士，他最令人難忘的服裝特色，就是使用領帶釘來固定他那學院風格的斜紋領帶，但是沒有人能讓凱夫固定在一處。他平步青雲，迅速晉升為裝飾藝術部門主管，而既然那是我們摩納哥分部專精的領域，他便時常待在我們辦公室。當他看到蔚藍海岸地區到處遍布著城堡，他意識到賣富豪的房子要比賣房子裡的家具來得有賺頭。於是，他說服公司成立子公司：蘇富比·帕克博內國際房地產，專門賣城堡給美國人，賣第五大道公寓給歐洲人。凱夫自己也是住豪宅的人，他的妻子寶琳（Pauline Whitney）是惠特尼家族千金，岳母貝利夫人（Lady Baillie）從小住在英國肯特郡的利茲城堡（Leeds Castle），在十八世紀法國家具的包圍下長大（那些家具最後登上蘇富比拍賣場）；那是一個不看重物品也難的家庭。

凱夫的行動力讓我大為佩服。有一次，我目睹他如何力保一場拍賣會順利進行。當時蘇富比擔憂即將到來的一場拍賣會恐怕會以失敗收場，因為賣主設定的底價太高。凱夫受命去找賣家，請她降低底價。那是一名住在巴黎飯店的孀居美國女人，性格頗強硬，凱夫簡直是跪著乞求她，就如同在麥加朝覲、不安地捏著念珠的朝聖者，他一頭亂髮，滿身是汗，不住地摸著他的領帶釘。最後，他不負所託圓滿完成任務，接著就從蘇富比離職，成為紐約的頂尖房地產經紀人，事業更上一層樓。

在摩納哥的時候，「噴射機階層」（Jet Set）的每一個「創始成員」，我應該都打過照面了。此一新社會階層的成員過著奢華生活、到處旅行，他們可能有錢，可能有名，可能有貴族頭銜，可能美貌，或者以上皆是。一九五八年，第一代商用噴射客機波音七〇七和道格拉斯DC-8問世後，從紐約到歐洲的飛行時間便從十二小時縮短到六小時，空中旅行變快，噴射機階層人數的成長也一樣快。但我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到摩納哥工作的時候，這群人的人數已下滑，由於石油價昂，以致飛機只能勉強加滿一半的油量飛行，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使然，那些新貴只得節制雲遊四海的大夢。

然而真正的噴射機富豪，也就是蘇富比的客戶或目標客戶，卻照樣繞著全世界到處飛，這證明了藝術市場金字塔頂端的客層向來對價格不敏感，比方像阿涅利、阿迦汗（Aga Khan）[152](#)，以及羅斯柴爾德、弗里克、高曼（Goldman）、盛克斯（Sachs）[153](#)、尼亞爾霍斯、圖恩塔克西斯（Thurn und Taxis）[154](#)、提森等家族。我在摩納哥見過的唯一一位電影明星，是住在費拉角（Cap Ferrat）附近的大衛·尼文（David Niven）[155](#)。居住在當地的美國人則是少之又少，只有來自休斯頓的奧斯卡·瓦耶特（Oscar Wyatt）伉儷[156](#)。瓦耶特夫人琳恩（Lynn）是美國薩可維茲百貨（Sakowitz）的繼承人，衣著總是優雅入時。上述這些人物都是全球各大報八卦專欄的常客，大多數為工業界、商業界巨賈，一些是新富，一些是繼承家業，其中多位是遊戲人間的花花公子，而每一位都是風采迷人。光臨我們蒙地卡羅拍賣會

的正是這些人，都是億萬富翁，都是全球前一百名的富豪，他們擁有傲人的消費力，但不必然會為了炫耀而消費。

我的薪水很少，開銷卻大。公司配給我一輛平價的寶獅車（Peugeot），比我在英國開的雷諾車要好，但跟辦公室一些年輕男同事開的保時捷相比，實在是雲泥之別。我發現，就跟我在「藝術作品」課程的那些同學一樣，蘇富比多數員工也都出身富裕家庭，生活養尊處優。我想，就像我的父母一樣，那些家長一定很高興自己的孩子能找到工作，一份工作，任何的一份工作；但由於我的父母對我沒那麼慷慨大方，我只得更努力工作。

威爾森指派我的任務，是「把整套收藏品帶進來」。這意味我得拜訪每一名潛在客戶，鼓動他們脫手家中的收藏，而且交由蘇富比來賣。因此，我不時會遇上一些窘迫的局面。有一次我拜訪一位六十開外的女飛行員，想說服她出售家具。她堅持要在機上談，便駕著她的小螺旋槳飛機，帶我到濱海阿爾卑斯省上空兜兜風。她講到激動處會不自主放開操縱桿，我嚇壞了，但更怕無功而返，無顏面對我的退役少將上司。還有一位九十三歲的女繼承人，每一回我前去拜訪，她都只顧激動大談她丈夫跟二十七歲古巴看護私奔的事，其實家裡的錢全在她名下，她之所以想賣收藏品只是為了給丈夫一個教訓。對蘇富比來說，這已是一個夠充分的委託拍賣理由，但我發現我的工作比較像一名幫助富豪、名流的社工人員，而不是藝術專家。

上班時努力跟我那些神經質客戶打交道，休息時，我特別想縱情享樂。蘇富比在海灘俱樂部（Beach Club）有一間度假小屋，我總到那裡吃午餐，曬出喬治·漢密爾頓（George Hamilton）¹⁵⁷那般的古銅膚色。晚餐的話，則是經常在巴黎飯店的高檔餐廳吃，然後去吉米俱樂部（Jimmy's，巴黎雷吉娜俱樂部在蒙地卡羅的分店）跳舞，我在那裡有自己的酒櫃，存放了一瓶約翰走路黑牌威士忌（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當年正值唐娜·桑默（Donna Summer）¹⁵⁸紅遍歐洲，如今回想起那段時光，她的迪斯可舞曲仍在我耳邊縈繞。

我在辦公室有位「大哥」，也是指導我的前輩，他是來自英國的珠寶盒專家，名叫布萊恩·艾凡—瓊斯（Brian Ivon-Jones）。他自稱為女人殺手，說他住在洛杉磯時，曾跟一些小明星約會。他把我視為無藥可救的書呆子，但我仍然在等伊莎貝爾，她仍然在倫敦海姆畫廊工作，仍然迷戀她那位比利時銀行家，仍然把我當「朋友」。我即便人在蒙地卡羅這個享樂天堂，仍是獨身一人，和艾凡—瓊斯廝混總是讓我感覺更糟。我剛到摩納哥的初期，有天晚上跟他在「巴黎咖啡館」喝雞尾酒，我倆同時對一位古銅膚色的金髮美女驚為天人，她是《時尚》雜誌泳裝專題或防曬霜廣告裡可見的那類陽光型性感尤物。

艾凡—瓊斯照著牆上的鏡子，得意地左顧右盼，一邊對我說：「老弟，來，看我的示範。」語畢，他留下我一個人坐在原地。一會兒後，他眉開眼笑地走回來。「小兄弟，她答應今晚一起用餐。」他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那隻笑臉貓，咧開大嘴、喜孜孜地笑。我倍感孤單，覺得自己像個笨蛋，只好起身離開，獨自去看當地的足球比賽。球賽結束，我散步回我那間位在岩洞大道（La Grotte，我想grotty〔討厭的、髒腳的〕這個英文字大概是由此字衍生而出）的陰暗小套房，不料在賭場對面的廣場遇見了那位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他獨自一人，已喝得爛醉，表情看起來非常悲傷。「五百法郎！」他憤憤地嚷道，「她要收我五百法郎。」那位陽光型金髮尤物，就跟「巴黎咖啡館」裡許許多多的漂亮女孩一樣，是一名高級應召女郎。就如同威爾森，她來摩納哥就只為了一樣東西：錢。

151 美國西裝第一品牌，有「總統的御衣」之美譽。

152 阿迦汗（Agha Khan）是近代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尼扎爾支派宗教領袖的世襲稱號，共四代。從曾經留學英國的阿迦汗三世開始，其影響力大增，成為各地伊斯瑪儀派信徒的精神領袖，被尊為「活主」，英王還曾授予爵位。

153 高曼及盛克斯皆為德國猶太後裔，美國投資銀行界的龍頭。其跨國銀行控股公司集團「高盛」（Goldman-Sachs），為美國投資銀行界的龍頭，被為《財富》雜誌評選為的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之一。

154 歷史悠久的德國貴族家庭，以歐洲郵政業起家，同時也涉足釀酒業與營建業。

155 英國演員與作家（一九一〇～一九八三），曾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作品有《環遊世界八十天》、《六壯士》、《粉紅豹》等。

156 奧斯卡與琳恩·瓦耶特分別是美國德州石油大亨與連鎖百貨業的千金。

157 美國電影明星。

158 美國著名流行樂歌手（一九四八～二〇一二），曾五度獲得《葛萊美獎》，有「迪斯科女皇」之稱。

第十章 前進日內瓦

我在摩納哥待了約一年後，威爾森決定送我回瑞士。積極擴張、拓點的蘇富比，已於一九六九年在蘇黎世成立辦事處，由尤格·威勒（Jurg Wille）擔任負責人。威勒可能是全瑞士人脈最廣的男人，至少他在藝術收藏圈左右逢源，而威爾森最在乎的就是找到藝術藏家，跟他們做生意。著眼於既定目標的威爾森知人善任，擅長挖掘與重用人脈深廣的人士，海軍少將鄧普頓—科堤就是一例。威勒和鄧普頓—科堤同樣是軍人，他出身於將軍世家，其祖父在一戰時期曾任瑞士軍隊總司令，其父親在二戰期間曾任副總司令。

威勒家族與作曲家華格納家族後裔為世交。透過華格納家族的安排，希特勒到訪蘇黎世時曾住宿於威勒家。我到威勒宅邸參加宴會時，一想到希特勒曾睡在這裡，總是升起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們的尊貴客戶羅絲瑪麗·坎茨勒也是蘇黎世人，但出生在比較窮的那一區，先在柏林成為歌手，才一步步踏上財富之路。她不只曾對希特勒唱奧地利搖籃曲，哄他入睡，也是戈林、戈培爾（Goebbels）¹⁵⁹和其他納粹高層的寵兒，等她流亡到西半球的美國以後，又一舉征服了華爾街高層。但羅絲瑪麗性格如此狂野，如此雄心勃勃，實在讓人無法責備她有這樣的人脈網，她只是盡力找生路，盡力想存活下去吧。威勒也有比較清白、善良的德國友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是大皮件製造廠「奧芬巴哈」（Offenbacher）的少東羅伯·馮·赫希（Robert von Hirsch）。有家族事業那些琳琅滿目的鞋、包所帶來的財富，他二十來歲即開始收藏藝術品，逐漸累積出傲視歐洲同儕的豐富收藏量。威爾森也是馮·赫希的朋友，他小學到德國度暑假的時候與這位富家少東結識。

馮·赫希在一九七七年以九十四歲高齡辭世以後，威勒拿下他私人藏品的拍賣權，威爾森在倫敦又辦了一場規模盛大的拍賣會。要在威勒這樣出色的上司手下做事，我這種菜鳥自覺實力還不夠，所以我很感激威爾森把我派到「農村隊」—蘇富比在日內瓦新設立的辦事

處。狹小的辦公室位在舊城區，也就是當年我以法律系學生身分生活的地方。我曾是失敗的法律系學生，現在不免擔心重蹈覆轍，淪為一個失敗的藝術經紀人。威爾森對這處新分部的前景滿懷信心，他從蘇黎世辦公室那裡調來一位神似彼得·奧圖（Peter O'Toole）¹⁶⁰，外型粗獷又優雅的英國退伍傘兵尼古拉斯·雷納（Nicholas Rayner）。雷納相貌英俊到好萊塢都主動為他打開大門，《阿拉伯的勞倫斯》製片人山姆·史匹格就在一場拍賣會上對他驚為天人。到了瑞士後，雷納玩起平板雪橇運動，曾參與聖莫里茨（St. Moritz）的克里斯塔滑雪道（Cresta Run）冰橇賽，還摘下冠軍。

因此，威爾森調我去當第二把交椅，並宣布由雷納和我一起入鏡拍攝開幕廣告，買法國版《時尚》雜誌的大版面（一般做法是在某本過度精美的藝術雜誌買個小欄位）刊登時，我真是受寵若驚。我很開心能登上《時尚》雜誌，覺得自己儼然就是男模，像我這樣一個跑腿打雜的年輕人竟能享有此等榮耀，無疑大大提升我的自信心。在這樣保守的拍賣業界，選擇在《時尚》雜誌上刊登廣告，無疑是一項創新之舉，這就是威爾森，天生的公關高手，一向走在時代的前端。

正如我提過的，日內瓦稱不上是一個真正的「藝術之都」，而是一座珠寶城，而且是條條道路彷彿用鑽石鋪成的終極珠寶城。在日內瓦新辦事處，我雖不用在威勒的影子下工作，卻仍然遭到另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即是格札·馮·哈布斯堡（Géza von Hasburg）博士。哈布斯堡為佳士得日內瓦辦事處負責人，一向是蘇富比勁敵的佳士得，也開始擴張它的帝國版圖。在那個時期，佳士得始終亦步亦趨地跟隨蘇富比的腳步。蘇富比最先在巴黎和慕尼黑設立海外辦事處，佳士得也有樣學樣。佳士得唯一沒有依樣畫葫蘆的一次，是我們選在蘇黎世設據點，他們反而選在日內瓦開分部。而且，由於日內瓦是一座珠寶城，他們指派世上最懂珠寶的兩個男人來運籌帷幄。馮·哈布斯堡是全球最具權威的法貝熱（Fabergé）¹⁶¹彩蛋珠寶專家，而他的年輕副手漢斯·納德霍夫爾（Hans Nadelhoffer）當時甫出版了一本介紹卡地亞的權威性專書；兩人的傑出成就實在令人難以望其項背。

我陪同威爾森遊歷法國南部的時候，經常談論可以到日內瓦設辦事處的事。但由於威爾森的人脈深厚，蘇富比仰仗他很多，而他住在蘇黎世，所以蘇富比選擇去蘇黎世設據點。不過，真要說起來，那時的日內瓦是一個風采比蘇黎世更迷人的五光十色城市，像法國，而不是德國，具備了所有法式的浮華氣息和生活情趣。要在蘇黎世那樣毫不耀眼的城市賣珠寶這樣光彩奪目的東西，在我看來似乎自相矛盾，威爾森也曾說：「在蘇黎世賣珠寶就跟在伯明罕162賣沒兩樣！」最後，蘇富比終究開設了日內瓦辦事處，做為瑞士的第二個營運據點。我們知道這將會是一場艱苦戰鬥。

馮·哈布斯堡堪稱珠寶界的王者至尊，地位無人能及。有誰能和他並駕齊驅？佳士得喜歡聘用歐洲大陸貴族，威爾森則對海軍上將情有獨鍾。馮·哈布斯堡既是大公、也是親王，多驚人的頭銜啊！我在日內瓦的老闆雷納心知肚明，我們也心裡有數，無論就世家譜系，或就專業權威而言，我們都不是這位大公的對手。我抵達日內瓦以後，嘗試做一次生意場上的禮貌性拜訪。結果馮·哈布斯堡拒絕接待我；他並不把自己當成平凡的生意人。

但我並未就此罷休。有一天，我自以為得到了一個天賜良機。在高速列車出現之前，蘇黎世和日內瓦之間有頻繁的飛機航班往來，這天，我恰巧和他搭同一班飛機。由於航程只有一個半小時，可任選座位，所以我一屁股坐到大公旁邊。真好運！位置，位置，搶到位置就搶到先機。可他瞧也不瞧我一眼，開口說：「很抱歉，我不想坐在你旁邊。」完全是王子對乞丐說話的口氣。我大可以堅持坐著，但我沒有。我禮貌地（跟某位親王不一樣）起身，換到機尾的位置。

日內瓦不是一天建起來的，也不是我在那裡的一年半裡建起來的。我們要攀登的是多麼巍峨的一座大山，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爬了。當時我生活裡真正的一點光亮，是我總算贏得伊莎貝爾的芳心。我是在蒙特摩爾（Mentmore）—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那座維多利亞風格莊園—向她求婚。威爾森曾在該處進行另一場大張旗鼓的「開放宅邸」拍賣（一如我早前和他共同促成的那場坎茨勒藏品拍賣）。我

在豪宅莊園求婚，我們的婚禮則是以童話場景般的納沙泰爾城堡為背景，在小鎮山丘上的大教堂舉行。幾個月過後，我們的第一個兒子阿爾班（Alban）就要出生。有了養家擔子，我更投入工作，更努力為目標奮鬥—從強大的大公勁敵手中搶下日內瓦市場，建立蘇富比在當地的信譽和影響力。

為了有個好的開始，雷納突發奇想，打算辦一場開幕宴會，而且是化妝舞會，點子來自雷德男爵所辦、由聖羅蘭設計賓客頭飾的那場舞會。我們打出的噱頭是，賓客的頭飾得跟二十世紀藝術家和藝術有關。我不知道該戴什麼出席，幸好我聰明的老婆想出絕妙點子。有一天上超市的時候，她看到貨架上擺著進口的湯廚濃湯罐頭。當年正是普普藝術的鼎盛期，她買下架上所有罐頭，打造出一個向沃荷致敬的罐頭尖塔頭飾。可惜，有孕的伊莎貝爾害喜非常嚴重，晨吐、晚吐，一天要吐好幾次。於是我獨自出席，和威爾森待在一起。他按當晚的著裝要求，穿正式禮服，但沒戴頭飾。

舞會在日內瓦最美麗的建築，索緒爾宅邸（Hôtel de Saussure）舉辦。我們的辦公室位在它的地下室，我們成功說動樓上租客，一位傑出的保加利亞律師皮耶·塞克蘭諾夫（Pierre Sciclunoff），他同意出借兩間客廳做為舞會會場。出席的賓客有人頭戴畢卡索式遮陽帽；有人頂著基里訶（de Chirico）[163](#)式圓蛋型頭顱；有人戴馬格利特（Magritte）[164](#)式的圓頂硬禮帽。蘇富比高層馬克·布隆杜（Marc Blondeau）裝扮成留大鬍子、帽不離身，惡名昭彰的藝術贗品商斐南·勒闊（Fernand Legros）。在宅邸大得驚人的浴室裡，有兩座大理石大浴缸，並排而立，看起來就像石棺，盛裝打扮的男女賓客個個迫不及待躺到裡頭體驗。

這場盛宴獲得《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報導，撰文者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時尚編輯赫柏·多西（Hebe Dorsey）。儘管與會者個個爭奇鬥豔，該報只刊出一個人的照片。猜猜是誰？我才二十五歲，已先後上過《時尚》雜誌和《國際先驅論壇報》。我真覺得難為情！現今的人，尤其是藝術圈的人樂於有

曝光機會，但我是傳統守舊派，對此避之唯恐不及。這般「拋頭露面」，我只能自我安慰，即使馮·哈布斯堡無視我的存在，但他為了尋找客戶，總會閱讀報章雜誌，終究會注意到我「人在」日內瓦。這場化妝舞會是我首次協辦的盛大宴會；但它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在日內瓦最棒的時光是載送威爾森。由於沒有倫敦佬常駐在此，也沒有體格強健的司機可供他差遣，所以他指定我幫他開車，送他前往瑞士各地。在瑞士有許多偉大的藝術作品，而威爾森似乎對每一件作品的所在地都瞭若指掌。至於我們一同征戰各地的「火戰車」，他不介意我開那輛寶獅低檔車。早在摩納哥的時候，他已坐過一輛笨重的雪鐵龍到處跑。他寧願低調，以免潛在客戶認為他是削他們的錢過奢華生活。他一心追求客戶與珍品的這分堅韌毅力，令我驚歎不已。威爾森宛如是藝術界的「鬥犬杜蒙」（Bulldog rummond）[165](#)；就像這位偵探小說的主角一定會揪到真兇，威爾森總是會找到他想要的藝術品。

威爾遜有多麼專心致志，我在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日內瓦辦事處剛設立的早期，我們曾去拜訪住在穆爾騰湖（Lac de Morat）湖畔城堡的一對英美聯姻夫婦：康斯塔伯－麥斯威爾（Constable-Maxwells），努力和他們打好關係。那位丈夫是蘇格蘭男爵，鷹鉤鼻，舉止優雅，符合一般人眼中的典型英國紳士形象；美國裔妻子則是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型的金髮尤物。威爾森會去那裡只為了一樣東西：一只狄亞翠塔杯（Diatreta Cup）。這只西元四世紀製造的狄亞翠塔杯從古到今一直被視為玻璃手工藝的巔峰之作，因此是全球最重要、也最脆弱的一塊玻璃。它如此精妙又完美，但究竟是如何製成，至今仍然是個謎。杯口周圍均勻排列了一圈字母：Bibe Vivas Multis Annis，意思是：喝吧！要長命百歲。

為了得到杯子的拍賣權，必要的話，威爾森很樂意喝酒，很樂意長命百歲。不過這一次，威爾森從未使用壓力戰術，也沒有運用讓我們搶到羅絲瑪麗委託的反向心理操作，他反而奉行從英國殖民時代流傳下來的吉卜林式非洲叢林法則：「抓猴子要輕輕抓。」長達數個月

的時間裡，他每兩週會從倫敦飛來日內瓦與這對新結識的好朋友度週末，雖然除了那只古羅馬杯子以外，他和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婦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共同點。由於我負責接送他來回城堡和日內瓦，有時候我也會受邀與他們一起用餐。餐席上，威爾森從來不曾提過杯子，一次也沒有！我從來不曾聽過他大聊這麼多話，但沒有一個字是有關杯子的。

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婦喜愛的東西不只有那只聖杯，他們也熱愛打槌球。某一天下午，我被逼著下場一起打，恭敬不如從命之下，我「這才知道」威爾森也是槌球的狂熱愛好者。我和他同隊與聖杯夫婦對戰，終於來到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威爾森只要再一揮，十拿九穩的一揮，我們就能摘下勝利（再來就能打道回府，返回日內瓦）。明明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一揮，他卻反覆瞄準又瞄準，再三躊躇，花了彷彿永無止境的一段時間。終於，這位巨人俯下身，努力瞄準，準備要贏，彷彿他的人生就取決於這一刻。他一擊而出，但球沒有通過球門。他一臉懊惱，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婦則是雀躍地像是贏了環法自行車賽冠軍。威爾森趁著夫婦倆陶醉在勝利、沒有注意到的瞬間，對我眨眨眼，低聲說：「抱歉，但我為了那件收藏品，不得不這麼做。」

開車回機場的路上，威爾森掩不住勝利的喜悅，但又像賠罪似地滿臉堆笑，講起兩個準備提親的情敵，陪心上人父親上山散步的故事。一行人走著走著，女孩父親失足掉進山溝裡，其中一個人跳進去救他出來。三人繼續往前走。然後另一個男人失足掉進山溝裡，女孩父親跳進去救他出來。女孩父親最後會答應哪一位的提親呢？是第二個男人，他會選自己親手救的人，而不是出手搭救他的人。威爾森跟我解釋說，因為救人是投注心力的事，被救則不是。同樣的，在今天的那場重要比賽，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婦多麼享受擊敗對手的優越感。威爾森就是如此耐心經營與他們的關係，久而久之，他們終於委託他拍賣狄亞翠塔杯。說也奇怪，在杯子拍賣之後，他再也沒去找他們較量槌球了。

不過，還有最後一道關卡。由於我們合作的貨運公司認定杯子過於脆弱，不願冒險承運，把這只杯子送到倫敦的榮耀任務就落到我身上。縱然攜帶的是一件藝術品，但我一路忐忑得就像克魯佐（Cluzot）[166](#)那部名片《恐懼的代價》（*The Wages of Fear*）裡，運送硝化甘油的卡車駕駛一樣。「這只杯子會打破任何拍賣紀錄。」威爾森對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婦信誓旦旦地保證。而康斯塔伯—麥斯威爾夫人烏鴉嘴似地接口：「只要西蒙沒先摔破它。」搭計程車前往機場的路上，飛往倫敦彷彿漫長得無止境的航程中，以及下機後往梅費爾區一路大塞車的車程裡，我都小心翼翼地把這件絕世珍寶夾在雙腿之間。這一趟行程，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漫長、最膽戰心驚的旅程。謝天謝地，是紀錄破了，而不是玻璃杯。

有一天，藝術界的三位重量級人物來到日內瓦舊城區，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我那間位於地下室的寒酸辦公室，令我受寵若驚。容我稱他們為「三賢士」[167](#)。第一位賢士是法蘭索瓦·杜勒特（François Daulte），一位國際頂尖的雷諾瓦專家暨希斯里專家，他所著的兩畫家作品編年目錄，是業界最具權威之作。此些目錄的全集是由杜勒特的好友，藝術經紀商丹尼爾·威爾頓斯坦（Daniel Wildenstein）[168](#)出版。住在洛桑（Lausanne）的杜勒特也是一名傑出商人，是少數能把專業知識變成謀生工具的學者之一。

正是杜勒特為一九八〇年代藝術市場的日本淘金熱打下基礎。在還屬於戰後復甦期的一九六〇年代，他策畫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畫展，在日本各地巡迴展出，締造了所謂的日本「奇蹟」。他找上西武百貨集團贊助展覽，對方欣然接受，很樂意讓商業與文化結合。二十年過後，杜勒特種下的種子開出了燦爛的印象派花朵，當年因杜勒特舉辦的精采展覽，迷上法國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日本人，爭相競購兩派的畫作，杜勒特和他的金主威爾頓斯坦因而大發利市。

第二位是彼得·澤爾烏達齊（Peter Zervudachi）。這位具有貴族儀表的優雅希臘人成長於亞歷山卓城（Alexandria），在法魯克王朝遭推翻後即離開埃及。他如今居住在得天獨厚的威韋（Vevey）小鎮—雀

巢品牌發源地及默劇大師卓別林終老之地。澤爾烏達齊是專為頂級富豪藏家服務，專營古董家具和金銀器皿的私家經紀人。由於他的希臘血統，他的服務對象也包括了幾位希臘船運大亨。二戰後全球石油需求量大增，是這幾位靠石油運輸發跡的希臘船王，帶動了戰後藝術品市場的復甦。

第三名賢士最為顯赫，也是杜勒特和澤爾烏達齊的重要客戶，是一個遠比格札·馮·哈布斯堡更赫赫有名的貴族。

他的全名是漢斯·海因里希·阿爾戈斯·蓋布爾·塔索·提森—博內米薩男爵（Baron Hans Heinrich Agost Gábor Tasso Thyssen-Bornemisza）；他的同輩（為數並不多）叫他海里。我起初都稱呼他為男爵。他是全世界最偉大的藝術收藏家，而這樣一位人物，竟然出現在這裡，來到我的小小辦公室。我早前在摩納哥蘇富比的拍賣會上見過他，可能是隨侍在威爾森或海軍少將上司左右時，和他握過手，但我從來不曾跟他說過話。

我不知道三賢士來這裡的目的，或許提森男爵，這位據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女神終結者（結婚的結），有意要替他新一任的妻子買些珠寶；我工作太忙碌，向來沒時間看報紙八卦專欄，並不了解他最近的風流情史。我請他們坐在醜陋但是舒適、非常一九七〇年代工業風的白色皮沙發上，然後泡了茶，等著他們說明來意、揭露袋裡乾坤—不管它是乳香、沒藥，或者其他東西。

他們什麼也沒提；在索緒爾宅邸這間曾為地窖或酒窖、天花板低矮的斗室裡，我們用法語，天南地北地閒聊了將近一小時。澤爾烏達齊跟蘇富比做過不少生意，所以我們談了這方面的事。而杜勒特的女兒瑪麗安娜（Marianne）是我在蘇富比「藝術作品」課程的同學。她如今在巴黎工作，任職於巴黎馬蒙坦美術館（Musée Marmottan），那裡無與倫比的精采館藏，正是其父親專精的印象派領域—這就是如何謀得一份美術館職位的「現實政治學」（realpolitik）。杜勒特過去每

次到倫敦，常常帶瑪麗安娜和我出去吃晚飯，我懷疑他想撮合我和他女兒，但我的心已給了伊莎貝爾。

由於男爵和我沒有交集點，我已回想不起他說了什麼，只記得他幽默感十足，而且就和威爾森一樣彬彬有禮。他以無懈可擊的周到禮節，讓每個人如沐春風。每當有女員工走進辦公室，男爵會很紳士地起身致意，彷彿面對的是英國女王。就藝術藏品的廣度而論，他在全世界也只有英國女王這一位對手。我想我跟他聊的是藝術話題吧，誰買了什麼，誰賣了什麼之類的事。

最後，我們再也無話可說。三位賢士站起來，我陪他們走到開在西堤街（Rue de la Cité）的大門，心中仍然大惑不解三人的來意。一路上，杜勒特和澤爾烏達齊看著彼此，一語不發；沉默持續了良久，他們似乎在等待男爵的指令。最後，男爵終於打破了沉默。我們走到門口時，男爵轉頭對我說：「你今晚來歷峰飯店（Hotel Richemond），我們一起吃飯。」哇！這是我無法拒絕的邀約，我興奮極了。

我對男爵欽佩不已，五十多歲的他，身材高大，英俊相貌完全不輸電影明星。儀容打理得一絲不苟，指甲修過，跟另一個收藏家雷德男爵一樣，眼睛始終半眯。海里雖然還不算粗獷，不是威爾森個人偏愛的那種康納萊型倫敦佬，但比雷德男爵更具陽剛氣，無論在女人圈或男人圈裡都很吃得開，只有運動方面比較不在行。

他肯定是現代版的美男子布魯梅爾（Beau Brummell）¹⁶⁹。男爵一身雅緻非凡的西裝，讓我馬上自慚形穢。我從杭斯的書上讀到，拍賣師成功的關鍵在穿著，給人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至關緊要，因此，我在倫敦的微薄薪水，全花在薩佛街那間吉弗和霍克斯（Gieves and Hawkes）的量身訂製西裝；它們成了我的正字標記。不過男爵邀我吃飯的當下，我覺得自己就像穿著二等兵軍服，而他一身將軍戎裝。薩佛街的頂級名店也敵不過男爵的裁縫師。我想回家換套衣服，但能換上什麼呢？這已是我最好的一套衣服，而我覺得衣衫襤褸。後來我得

悉他的西裝是由米蘭卡拉契尼店製作；有一天，我也會到那裡訂製西服，但那是多年以後的事了，直到那時，我才不再覺得自己寒酸得格格不入。

我當晚忐忑地來到歷峰飯店，可以俯瞰日內瓦湖和著名大噴泉（美國優勝美地老忠實噴泉〔Yosemite's Old Faithful〕的瑞士版）的市內最頂級旅館。餐廳裡高朋滿座的客人都是高雅的藝術界人士，加上深紅色錦緞、金色天鵝絨座椅和沙發的裝潢，頗有燈紅酒綠的迷濛氣氛。與背景毫不相襯的，是一位彈奏電子琴、唱著《我走我的路》（My Way）170之類經典歌目的駐唱歌手。瑞士所有的頂級大飯店似乎都會安排這類歌手在餐廳彈唱，這種娛樂方式，就跟在菜單上並列鵝肝和油煎香腸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是夏天，餐廳裡有很多阿拉伯人。拜他們一手造成的石油危機所賜，這些阿拉伯人變成非常有錢的新富。依山傍湖、氣候涼爽的日內瓦成了他們最喜歡的夏季度假地之一，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就買下了湖畔的一幢華美豪宅。他本人不曾來過，但他的家族親人會帶著大批隨行人員入住，他們喜歡成群結隊到最時髦的場所吃晚餐，也喜歡歷峰飯店—從音樂到所有一切都喜歡。阿拉伯人還沒有真正開始買藝術品（他們當時主要買珠寶和手錶），但蘇富比的每個人都熱切希望他們有天會這麼做。

這一晚，晚餐五重奏的另一名是八卦專欄的要角，迷人的伊拉·馮·弗斯騰柏格（Ira von Fürstenberg）公主。她是吉亞尼·阿涅利的外甥女，其前夫阿方索·霍恩洛厄王子（Alfonso Hohenlohe）「事業」也做得有聲有色，一手打造的馬貝拉俱樂部（Marbella Club）是噴射機名流最愛的頂級度假場所。伊拉公主嫁給霍恩洛厄王子時年方十五歲，她以美貌著名，若要找一個字眼來描述，法語pulpeuse（嬌嫩欲滴）可說是最貼切的形容詞（對應的英文字是voluptuous，聽起來就沒那麼性感）。她抵達時，男爵起身執起她的手，行了一個吻手禮；我喜歡這種舊世界的紳士風範。

公主是整晚餐宴的焦點，她很擅長說故事，妙語如珠，以風趣、機敏的言詞主導餐桌上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宛如身在八卦專欄的世界裡。曾跨足演戲的公主，現在涉足珠寶設計。我不由得納悶，自己何德何能可以身在這裡，與他們同桌共餐？一直到晚餐結束，我仍然得不到任何線索，但我嚐到這輩子所喝過最昂貴的酒。男爵是葡萄酒行家，也對女人、藝術、每一件事都有優秀鑑賞力，而且價格從來不是他考量的因素。我多麼高興能結識這樣一位傳奇人物。

第二天，我接到澤爾烏達齊來電。「你會執著要待在蘇富比嗎？」他問我，接著娓娓說明，如此讓我摸不著頭腦的提問是有理由的。提森男爵正在尋找一個新館長來管理他在盧加諾（Lugano）法沃利塔別墅（Villa Favorita）的收藏品。其實若以藝術史術語的定義，他從未聘過「真正的」館長，他只雇了一個上年紀的匈牙利人，職務比較像是管理員或看門人。法沃利塔別墅必須對大眾開放，這是男爵和瑞士政府達成免稅協議的一環。他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一個導覽員？收票員？我腦海裡閃過在龐德街蘇富比總部坐前臺的記憶，頓時覺得不安起來。我已走過迢迢長路，從過去一個小小接待員到如今可以登上《國際先驅論壇報》版面。我想到美國維珍妮涼菸（American feminist Virginia Slims）洋溢女權意識的那句廣告看板標語：親愛的，妳可走了很長一段路。

我心裡納悶，為什麼選上我。威爾森倒是很鼓勵我接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許從他和杜勒特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該好好珍惜的天賜良機。畢竟我很年輕，有禮貌，可塑性十足，他們肯定將我看作是一個易於控制的人。我是完美的一顆棋子，就像他們的內線，能為他們帶進更多提森男爵的生意。我知道，這是很不知好歹的想法，然而一思及生意，尤其是男爵代表的大生意，就足以引起我的憤懣情緒。我罵自己，別再想這事對於他們的意義，想想對我自己意味了什麼。男爵那裡有全世界最棒的藝術收藏，而我得到管理那些珍藏的機會。蘇富比是個競爭非常激烈的地方，我只是眾多員工之一；在男爵那裡，我會是萬中選一的唯一一個。我放下義大利式的犬儒¹⁷¹心態，

改採英國人的機會主義態度，我也想起威爾森的一句座右銘：「該你吃的餅乾，你就吃吧。」

「我真的很榮幸，」我對澤爾烏達齊說，「請讓我考慮一下。」

偏偏時間和提森男爵都不會等人。男爵總能擄獲心儀女人的芳心，關於追求這件事，他無疑是箇中高手。他也打算要施展手腕，籠絡我的心。

159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945），擔任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在任期間將納粹黨所列禁書焚毀，對德國媒體、藝術和信息採取極權控制。

160 英國電影演員（一九三二～二〇一三），最著名的作品是《阿拉伯的勞倫斯》。

161 是指俄國著名珠寶首飾工匠彼得·卡爾·法貝熱（Карл Густавович Фаберже）所製作的蛋型工藝品。

162 英國工業大城，早期有世界工廠之稱，以機械工業最為繁盛。

163 義大利畫家（一八八八～一九七八），以高度象徵性幻覺藝術著稱。這種象徵性的幻覺藝術後來被稱為「形而上繪畫」，公認是達達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的先驅。

164 雷內·弗朗索瓦·吉蘭·馬格利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 1898-1967），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其作品影響普普藝術、簡約主義及概念主義。

165 出自同名小說《鬥犬杜蒙》。作者沙波（筆名）是英國人，最著名的作品即是《鬥犬杜蒙》；主角杜蒙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166 亨利-喬治·克魯佐（Henri-Georges Clouzot, 1907-1977），法國新浪潮運動之前最重要的導演之一，擅長恐怖懸疑片。

167 出自《聖經》。耶穌在馬廄出生時，有三名賢士（又稱東方三博士、三個國王、三智者等）從東方前來祝賀，並分別帶來黃金、乳香、沒藥獻給耶穌。

168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經紀商」（一九一七～二〇〇一），同時也是美國猶太裔富豪，威爾頓斯坦家族的成員。其家族擁有驚人財富和難以想像的藝術收藏珍品。

169 公認是英國男士時尚潮流的開創者（一七七八～一八四〇）。

170 美國知名男歌手及奧斯卡得獎演員，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 1915-1998）的名曲。

171 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弟子安諦斯提尼斯（Antisthenes）成立的學派，提倡有德即幸福，以簡單的物質生活自甘，藉苦行達於主善。

第十一章 皇家規格的追求術

我在這本書提及提森男爵的部分相當多，因為他不僅僅改變了我的人生，是他造就了我的人生。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藏家工作，出任館長一職，是我個人履歷表上無與倫比的經歷，而且不止於紙面上的榮耀。為男爵工作，身處於藝術界的最高端，我無論是在品味或交際手腕方面，都培養出驚人的自信。我能搞定男爵，就能搞定任何人。在擴展人脈方面，身為男爵的親信助手，我差不多誰都能見，不管是藝術界、政治界、金融界、社交界的人都對我奉為上賓，這份職位是任何想建立廣大人脈的人都夢寐以求的工作，況且我在踏入法沃利塔別墅以前，毫無人脈可言。我既然當不了啟發佩姬·古根漢（Peggy Guggenheim）[172](#)的伯納德·貝倫森，成為提森男爵身邊的西蒙·德·普里，已稱得上是藝術工作的終極聖殿。不過，我當初差一點婉拒，是男爵使盡渾身解數施展魅力和誘惑，才成功吸引我坐上那個大位。

我最初就像優柔寡斷的哈姆雷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接受這個邀請，於是向生命中的兩個女人—我媽和我太太—徵詢意見。「留在蘇富比。」我媽不假思索地說。「乖乖待著，你有一個家庭要養。」我之所以能進蘇富比，全靠我爸媽出錢資助，他們的投資應該得到一點回報。她勸我別再想提森男爵的藝術收藏，別回頭看那滿是古典大師作品的罪惡之地，以免變成一根鹽柱[173](#)。

我太太則更樂於接受冒險。我們曾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去盧加諾度蜜月。當時我們無法負擔真正的蜜月旅行，所以從納沙泰爾駕車出發，又因為一場反常的暴風雪導致多數公路封閉，只有通往盧加諾（那裡的天氣可晴朗了）的路仍通行無阻。我們住進一家提供新婚套房、有圓形大床的奇特旅館，從那裡可以直接俯瞰法沃利塔別墅。我們都想去參觀提森男爵的收藏品，但別墅在冬季關閉。當然，我大可打電話過去，利用我在蘇富比任職的人脈讓館方破例為我開放，但我沒那個膽子。現在，別墅大門大敞，就看我要不要走進去，伊莎貝爾

認為我們正巧待過那家俗氣的蜜月旅館，無疑是個好兆頭，預示我跟著男爵會有光明未來。

我也找了其他人商量，每一個人人都勸我打消主意。提森男爵的聲譽不是非常好，他以性格古怪、作風跋扈而聞名，而且只對兩樣東西感興趣：美女和美麗藝術品。這還是好的部分；壞的方面，或者說最常為人詬病的一點，在於他被公認是整個藝術界、甚至是整個世界脾氣最暴躁、性格最反覆無常的超級富豪。我是一個已婚男人，一個關心老婆小孩的人，我對男爵的女人不感興趣。而在蘇富比，我早已坐擁人人夢寐以求的各種藝術精品，再說，我已在蘇富比待了五年，我和威爾森的關係愈來愈好，我相信自己已踏上成功的康莊大道，為什麼要離開業界的第一把交椅蘇富比呢？

我猜想提森男爵認為自己才是業界第一把交椅，因為他並沒有將我的猶豫當作無言的回絕。他派出私人座機到日內瓦，接我和伊莎貝爾前往盧加諾參觀；所謂眼見為憑。以專機相迎當然是一個盛大排場，當年可沒人擁有私人噴射機—國家元首大概有，或是海夫納，或是霍華·休斯（Howard Hughes）。提森男爵的私人飛機是一架達索獵鷹，我和妻子在日內瓦機場的私人飛機專用航站樓登機。

候機的時候，我首度見到敘利亞出生的畫商大衛·納瑪德（David Nahmad）。他的家族似乎慣於大量購買藝術品—注意，都是精品級作品，但他們都是成批買入。大衛是摩納哥重量級銀行家愛德蒙·薩夫拉（Edmond Safra）的表弟。納瑪德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原本一直居住在米蘭，但如今隨著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174](#)的興起，遭綁架的風險激增，他們發現紐約才是最安全的避風港。縱使他們基本上逐藝術而居，是以飛機和豪華飯店為家，以私人飛機代步的「金手指」。

男爵儼然是從電影《金手指》裡走出來的人物，而和他一起搭機前來的，是第四任老婆丹尼絲·蕭圖，一個宛如龐德女郎帕希·加羅爾（Pussy Galore）翻版的迷人金髮美女。巴西籍的丹尼絲是所謂的花

瓶妻，但不是拜金女。她出身富裕，父親是聖保羅的銀行家，母親是蘇格蘭美人——如男爵的第三任妻子，超模費歐娜·坎貝爾。蕭圖家族在巴西那個人人對甜食上癮的國度，擁有可口可樂特許經營的生產工廠，規模在當地數一數二大。男爵已年過五旬，丹尼絲只有三十開外，一頭秀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看起來就像上流貴婦版的碧姬·芭杜。她上過巴黎索邦大學，精通五種語言，而且說得字正腔圓。她喜愛藝術，似乎也通曉藝術。我心想，已經擁有世間一切的男人就會喜歡這類女人。雖然這位嬌小的男爵夫人禮節周到也非常迷人，但態度不冷不熱，似乎對我沒什麼興趣。

十八世紀建造的法沃利塔別墅如今由隨風搖曳的棕櫚樹環繞，別具熱帶風情，是一個與擁有私人噴射機的主人相當匹配的地方，也讓我聯想到里約熱內盧，丹尼絲必定也有此感覺。矗立於盧加諾湖另一頭，與別墅遙遙相對的小山，就宛如那座巴西城市的糖麵包山（Sugarloaf）；通往別墅約一哩長（約一·六公里）的絲柏大道，則令人想起阿諾德·勃克林（Arnold Böcklin）[175](#)的畫作《亡者之島》（*Island of the Dead*），沿途可見成串盛開的紫藤花，花香一路相隨。海里的父親「大」海恩里希於一九三二年的一場「家當拍賣」，從普魯士的利奧波德親王（Prince Leopold of Bavaria）手中買下別墅、附屬的十來間小別館、停滿賓利車（Bentley）與弗拉斯基尼車（Isotta Fraschini）的多間車庫，以及別墅土地上的所有附屬物。據男爵說，親王是為了籌資買一幅華鐸（Watteau）[176](#)的畫《小丑》（*The Clown*），那幅畫現今掛在華盛頓國家畫廊。在一九三六年，大提森男爵以慕尼黑的新繪畫陳列館（Neue Pinakothek）為參考藍本，在此地蓋了一幢美術館建築。

我們和男爵伉儷共享了一頓男爵規格的豪華午餐，喝了很多的酒，瓶瓶都是不喝可惜的名貴好酒。男爵跟丹尼絲說英文，對伊莎貝爾和我講法語，對現任館長桑德爾·伯克斯（Sandor Berkes）則說德文。伯克斯就像三流電影裡的角色，對男爵行屈膝禮，稱呼他為「男爵閣下」。伯克斯正是澤爾烏達齊提過的，那位上了年紀的匈牙利

人，我就是要接替他的職位，而他顯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即將不保。他一見到我，就像看到他家鄉的吉普賽人似的，馬上升起懷疑和戒心。我們也見到男爵的私人祕書約瑟夫·格羅博士（Dr. Joseph Groh），他跟男爵講德語，與伯克斯則是用母語匈牙利語交談。另外還有一名非常英國風格的制服管家，他是不折不扣的萬能貼身男僕，不過是義大利人，名叫喬吉歐（Giorgio），他跟男爵說法語。法沃利塔別墅宛如是一座巴別塔¹⁷⁷，裡頭的人物活脫是從美國知名電視影集《怪胎一族》（The Munsters）走出來的。

丹尼絲在午餐後就消失不見，男爵彷彿如釋重負，以輕鬆許多的姿態帶伊莎貝爾和我參觀美術館。我目瞪口呆，我們在蘇富比「藝術作品」課程研習過的名畫，從文藝復興時代到後印象派的經典傑作，全在我的眼前，我宛如讀著一本活生生的藝術史大全。我對哪些畫印象最深呢？每一幅！我大開眼界，但或許吉爾蘭達（Ghirlandaio）¹⁷⁸的《女子畫像》（*Portrait of Giovanna Tornabuoni*）最讓我魂牽夢縈。那是一幅文藝復興時代佛羅倫斯派畫家的女性肖像經典之作，畫中女人手拿佛羅倫斯之鑰，美麗的她有著某種吸引我的特質；也許這幅作品讓我聯想到伊莎貝爾。

卡巴喬（Carpaccio）¹⁷⁹以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麾下主將羅蘭（Roland de Roncevaux）的傳說為靈感，所繪的那幅《盔甲騎士》（*Knight in Armour*），也令我難忘。還有霍爾拜因（Holbein）¹⁸⁰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肖像；若不是提森男爵的出價高過英國王室，這幅畫本來會掛在白金漢宮裡。說到白金漢宮，這幅霍爾拜因是大海因里希從斯賓塞勳爵（Lord Spencer）一日後那位戴安娜王妃的祖父—手中買下。據謠傳，斯賓塞勳爵拿售畫所得買了一輛布加迪（Bugatti）超跑。戴安娜王妃的父親約翰·斯賓塞（John Spencer）曾造訪別墅，我帶他參觀所有收藏，忍不住問起布加迪超跑的事。斯賓塞勳爵以英國人典型的幽默自貶道：「他賣畫是為了供我讀書，」他糾正誤傳的說法，隨即又補上一句：「但是那筆錢白花了。」

海里對父親讚譽連連，他說大海因里希是一個精明的撿便宜高手，在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後，從頂尖美國藏家那裡斬獲不少珍品。他說起父親豐富的古典大師作品收藏，表示：「我這一輩子根本不必再買任何畫。」他又告訴我，他父親在一九四七年去世後，他發現與其爭金錢財產，不如跟兄姊買下收藏品的持分。「我就這樣迷上了藝術。」這就是他收藏品的由來，他聲稱自己每週起碼買一幅畫，有時候甚至一連幾週，每天買一幅畫。

據男爵告訴我們，他父親的收藏準則是：「藝術終止於十八世紀」；而他自己的收藏哲學則是，只買已故藝術家的作品。他向我們講述了他當初是怎麼戒除對古典大師的癮頭，主要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蘇格蘭超模費歐娜·坎貝爾幫的忙。她就和丹尼絲一樣熱愛藝術，有一次，她拖著百般不情願的海里（想像一個又踢又叫的發牢騷貴族）到德國斯圖加特一家畫廊觀賞二戰前曾遭第三帝國禁展的「頹廢藝術」。畫廊主人羅曼·諾伯·凱特勒（Roman Norbert Ketterer）致力於推廣凱爾希納、貝克曼（Max Beckmann）[181](#)等這些「已遭遺忘」的偉大德國藝術家；費歐娜則是迷上另一位德國「頹廢藝術」大師，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182](#)的水彩畫。男爵受到她的熱情感染開始購畫，最終演變為他現今的大買特買習慣，包括惠斯勒（Whistler）[183](#)、霍默、雷明頓（Remington）[184](#)等美國藝術家都在他收藏的範圍。「美國藝術史並不是從波洛克才開始的。」他說。他似乎有點懷念費歐娜，特別是我們已查覺到他與丹尼絲之間的緊張關係；他這脆弱的一面很讓我喜歡。

我們又喝了更多酒，接著才搭上達索獵鷹回到日內瓦。男爵不只對女性、藝術有高超鑑賞力，也該被稱為葡萄酒行家。說他「喝很多」算保守的說法了，我們喝著一瓶又一瓶珍稀佳釀時，他使了個威爾森式的自嘲眼色，坦承他父親是死於酒精中毒。他說Bornemisza（博內米薩）這個匈牙利頭銜直譯是「不喝酒」，應該要改成「只喝酒」才對。他喜歡拿自己開玩笑，從喝酒、跟女人的糾葛到藝術癮，男爵實在是一個風趣的人。

在回程的飛機上，我滿腦子只有藝術，了不起的藝術，我心想，男爵出奇地討人喜歡，跟他的那些負面八卦截然不同，想必多數流言蜚語都出自從未見過他的人。我沒去想他人的看法，我只想著藝術。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不過仍有一個缺憾，我很可能會淪為一個豪宅看門人。那麼，我跟伯克斯又有何不同？他當初簽約任職時，想必也是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吧。

我媽勸我要欣然留在蘇富比，她不只把諄諄告誡灌入我耳裡，還想烙印在我眼裡。母親寫來一封長信，口氣嚴肅地提醒我，我負有為人父、為人夫的重責大任。男爵提供的職位適合一個年輕、單身版本的男爵，一個隨心所欲、無拘無束、沒有家累的男人。所有母親都是讓兒子內疚的箇中高手，並不一定要是個猶太裔母親才有這本事，我媽就是最佳例證。在那個年代，有一首「三犬之夜合唱團」（Three Dog Night）的歌曲叫〈媽媽叫我不要來〉（*Mama Told Me Not to Come*），它逐漸成為我的寫照，於是我乖乖回到索緒爾宅邸地下室的辦公室，乖乖回到現實生活。

我還來不及寫信婉拒，男爵來了電話。他邀請我去他在聖莫里茨的度假小木屋，面對面一起商討我們的未來。和我媽不一樣，伊莎貝爾鼓勵我去，她從不怕做大膽的決定，畢竟她會嫁給我，就是一項大膽之舉。再者，還有令我耿耿於懷的另一個因素。我接到尤格·威勒從蘇黎世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倘若我不接這份工作，他計畫向男爵推薦他那位也在蘇富比工作的兒子。光是這通來電就證明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多麼令人嚮往，同時也激發出我的競爭本能。

我坐上我的寶獅驅車上山，前往上流社會人士最常造訪的滑雪勝地。我不記得投宿在哪裡，但絕對不是名人最愛下榻的皇宮飯店（Palace Hotel）。回想起來，我當時會堅持自費，不接受男爵的慷慨招待，應該是為了避免拿人手軟，為了可以跟他坦率地談論我憂慮的問題。結果我根本不需要自己開口提，男爵已讀懂我的心思，他向我保證，我的職務絕對跟伯克斯不一樣。他之所以想要雇用我，是因為

我年輕、有朝氣、毫無偏見，他會給我無限的自由和空間，他需要我幫忙尋覓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品。

由於費歐娜狂熱支持「頹廢藝術」，男爵已接受過現代藝術的洗禮，他的收藏範圍不再局限於古典大師，他什麼都可以買，他什麼都想要買，而我猶如一隻幫他尋找松露的獵犬，身份是他的顧問，他在藝術領域的得力助手。在財務方面，薪水待遇不僅更高，而且我不須擔心房租；我們夫妻可以免費住在莊園裡的附屬別館。

就這樣，我毅然接下男爵的工作邀約，向蘇富比告別。幸運的是，儘管我說的是再見，得到的回應卻是：不久後再見。我收到瓷器專家馬庫斯·林內（Marcus Linell）情深意切的來信。他在蘇富比從搬運工做起，步步高升成為公司最年輕的主管。他向我保證，蘇富比大門永遠會為我敞開。雖然可能是純粹的客套話，但我仍把它當成一張安全網。

在做出決定之前，我曾找威爾森商量，雖然這個舉動，就跟徵詢那尊獅身人面雕像的意見沒有兩樣。對於如此重大的事業生涯問題，他永遠不會直接給答案。然而，正如澤爾烏達齊和杜勒特想把我「安插」到男爵身邊當內線，以蘇富比的立場，當然也樂於將旗下的忠誠員工送到全球最重要的藏家身旁。

至於我最初的藝術顧問貝耶勒，我倒沒有問他的意見。為男爵工作並不在他為我規畫的生涯藍圖當中。貝耶勒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對男爵窮追不捨的畫商，但他既是瑞士藝術界的焦點人物，很可能也希望成為海里的主要往來畫商。以我看法，貝耶勒太傑出了，根本不需要追著任何人跑；另一個可能是，他也許認為該由海里自己來求見。海里也很少行經巴塞爾，兩人就如同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此外，大家都知道，男爵只「追求」女人，所以這兩位藝術界巨頭從來不曾建立起畫商和客戶的共生關係。

總之，我們去了盧加諾。因為男爵重新裝修我們將要入住的看門人小屋，在最初幾個星期，我們住在莊園的客房，享受周到的管家服

務和最棒的食物，過了一段帝王般的豪奢生活。倒是在工作上，我真希望頭幾週也這麼順遂愉快就好了。我和桑德爾一開始就有芥蒂，他直到發現辦公室的鎖全都換了，才被告知我即將到任的事。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陪同桑德爾到米蘭攜回出借給布雷拉美術館（Brera Museum）的男爵藏品。我們緊隨著載畫的卡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我身旁的桑德爾滿腔怒火，與此同時，不斷有媲美F1賽車手的義大利駕駛高速超車而過，咒罵我們開得太慢。我想起甫看過的一部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裡的一幕。伍迪·艾倫坐在克里斯多夫·華肯（Christopher Walken）駕駛的車上，而安妮的這位瘋狂哥哥跟他吐露，曾有過開到對向車道自殺的念頭，以致他在接下來的整趟車程都心驚膽跳。我擔心職位已不保的桑德爾會想帶我同歸於盡，讓我們連人帶車化為火球，完成他光榮的復仇。等到安然回到盧加諾，我萬分慶幸自己還活著，卻依然覺得自己就像個送貨員。

接下來，桑德爾開始訓練我開館和閉館的流程。在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整，他會敲鑼，然後拿起麥克風廣播，提醒美術館訪客還有十五分鐘就要閉館。他每隔五分鐘就重複一次廣播，直到所有訪客都離開為止。我以為餘生的每一天就只能做這件事了，不由得懊悔當初沒有聽我媽的話。但是，男爵似乎有讀心能力，他察覺到我的痛苦，也順便終結了桑德爾就要失業的不幸。桑德爾得到莊園的一幢小屋當終身住所，也拿到終身職，可以繼續他原本的工作，而我再也不用負責敲鑼。

我們住在法沃利塔別墅的七年期間，伊莎貝爾似乎把時間都花在傳宗接代。我們帶著長子阿爾班來赴任，至於其他三個孩子：查爾斯、洛伊絲、巴塔薩，都是在莊園的這七年裡懷胎出生。男爵表示要當巴塔薩的教父時，我們深感榮幸。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他還安排祕書格羅博士搬到別的房子，以空出那間寬敞的住所給我們住，畢竟我們家的人口增多，需要更多的房間。男爵是這麼告知我好消息的：「你們趕緊給我滾出那間小屋。」他地位雖崇高，卻總是如此風趣。

男爵這位天生的東道主，無法容許初來乍到的我們孤孤單單，也不能忍受自己單獨一人，因此堅持我們每天都到別墅去，與他共進午餐和晚餐。但用餐地點不是在主餐廳，那裡專供正式、隆重的場合使用；我們都在二樓俯瞰湖泊的露臺，就著一張圓桌用餐。起初，丹尼絲偶爾會加入我們，但沒多久就變成三人餐桌。丹尼絲和海里表面上是一對神仙美眷，不過他們的作息方式完全不同。丹尼絲雖是金髮白膚，但在時間概念上，倒是不折不扣的拉丁美洲人，凡事都會晚一點。男爵則嚴格守時，特別是出席全球各地為他舉辦的活動時，更會一絲不苟地要求自己。向男爵感謝致意的這類活動，事前早已安排好進行流程，但丹尼絲往往姍姍來遲，遲到兩個小時是常事，惹得男爵勃然大怒。她後來不再出席活動，令男爵著實鬆了口氣。

我們在盧加諾剛安頓下來，男爵即親身示範了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對富人的描述：「他們跟你、我不是同類人。」那天是晴空萬里、炎熱的一天，用過早餐後，男爵突然提議：「我們今天去威尼斯一趟。」在奇尼宮（Palazzo Cini）有一場加納萊托（Canaletto）[185](#)展覽，他認為伊莎貝爾和我可能會想看一看。他打電話安排飛機，我們就此出發。威尼斯的天氣又溼又熱，因此看完畫展後，他帶我們到哈利酒吧坐坐，男爵說那裡有整座城裡最好的空調設備。我在那裡品嚐了生平第一杯貝里尼粉紅氣泡酒（Bellini），一連喝到第十杯。我以為那只是一種消暑（確實有效果）的可口桃子汁，根本不知道甜味掩蓋了酒精的味道，後來他們幾乎是用扛的，才把我帶回到機場，搭上達索獵鷹打道回府。男爵經常這樣過日子，在倫敦吃早餐，在阿姆斯特丹吃午餐，到巴黎美術館亮相一會兒，晚上在羅馬用餐。如今有很多對沖基金經理人、商業巨擘和其他重要藝術藏家也是這樣過生活，但當年絕少有人可以做到。男爵是當時屈指可數的真正重量級藏家之一，也是噴射機階層裡少數擁有私人飛機的人。

在盧加諾的日子，由管家和成群侍者、服務員伺候的每一頓飯，就宛如是在巴黎的馬克西姆餐廳或銀塔餐廳（La Tour d'Argent）用餐，入口的都是米其林三星級美食，每一道菜也都搭配了珍貴佳釀，

我當時沒有罹患痛風真是萬幸。可是我的體重增加了；怎麼可能不變胖。我滾出看門人小屋，搬進了真正的別館，也胖得穿不下本來的吉弗和霍克斯訂製西服，改為換上卡拉契尼。與男爵每日共餐的那些日子，表面上或許就像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¹⁸⁶的真實版暨歐洲版。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老年的時候孤獨生活，他會在聖西蒙山區的城堡舉辦豪華盛宴，邀一群年輕人參加，一整夜跟他們大講特講戰爭故事，直到他們再也受不了；或者也像另一部電影《紅樓金粉》（*Sunset Boulevard*）¹⁸⁷，男爵宛如那位還活在過去風光歲月的過氣女星諾瑪·戴斯蒙（Norma Desmond）。但其實兩者皆非。男爵正值人生巔峰，既不過氣，也不年老，更未活在幻想當中。他很幽默風趣，跟他共餐的那段日子非常可貴，我從他那裡學到權力世界，以及政治、金融、文化各領域的許許多多事。

¹⁷² 義大利威尼斯的古根漢美術館便是她的故居及收藏，更以她命名。

¹⁷³ 出自《聖經》中講述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故事。

¹⁷⁴ 一九七〇年代義大利的恐怖分子、激進組織。

¹⁷⁵ 瑞士象徵主義畫家（一八二七～一九〇一），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一共五幅的《亡者之島》系列。

¹⁷⁶ 洛可可時期的法國畫家（一六八四～一七二一）。

¹⁷⁷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被視為人類語言分歧的起源。

¹⁷⁸ 佛羅倫斯畫家（一四四九～一四九四），屬寫實主義風格，作品以教堂壁畫及個人肖像為主。

¹⁷⁹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一四五〇～一五二五）。

¹⁸⁰ 小漢斯·霍爾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 1497-1543）德國藝術大師，以肖像畫聞名，但也創作油畫和版畫。父親老漢斯·霍爾拜因也是畫家。

¹⁸¹ 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 1884-1950），德國畫家、雕塑家、作家，作品受印象派及象徵主義的影響。因納粹迫害移居阿姆斯特丹，最後卒於紐約。

¹⁸² 德國著名的畫家（一八六七～一九五六），擅長水彩，表現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¹⁸³ 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 1834-1903），美國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畫家。

184 弗雷德里克·雷明頓 (Frederic Remington, 1861-1909) ，美國畫家、雕塑家、作家，以描繪美國西部早期的寫實主義繪畫而著稱。

185 義大利畫家 (一六九七～一七六八) ，以描繪十八世紀的威尼斯風光著稱。

186 美國知名導演奧森·威爾斯 (Orson Welles, 1915-1985) 於一九四〇年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影片講述報業大王查爾斯·福士特·凱恩的一生 (此角色是以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為原型) 。

187 又譯為《日落大道》，是一九五〇年的黑白電影。由猶太裔美國導演比利·懷德 (Billy Wilder, 1906-2002) 執導和編劇。講述落魄編劇喬·吉利斯與過氣電影明星諾瑪·戴斯蒙相遇的故事。

第十二章 伯爵與我

每逢有人提起男爵的家庭背景、他家族成員於二戰期間從事的活動，男爵從不會心生防衛而轉移話題，對於任何負面的傳聞，他一向正面迎戰再導正視聽。他總是不畏面對問題，就像他明白我的煩惱，並沒有讓我取代桑德爾的位置，而是讓我適才適所展現能力，一舉化解我心頭的結。他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則笑話，是出自紐約波希特帶（Borscht Belt）[188](#)一場喜劇演出的臺詞：「我家做鋼鐵業。我媽負責燙，我爸負責偷。[189](#)」接著，海里會用稍微正經的語氣，跟我們講述他祖父奧古斯特·提森（August Thyssen）發跡的故事。這位一家之主原來在萊茵河邊務農，後來靠鐵絲網生意發了財，又做起煤和鋼鐵買賣，生意愈做愈大，最後在全歐洲只有克魯伯家族（Krupp）[190](#)能與他抗衡。在維斯康堤（Visconti）[191](#)的電影《納粹狂魔》（*The Damned*）裡，該家族正是助納粹崛起的關鍵。跟他們相比，提森家族就跟童子軍一樣天真無辜。

雖然提森男爵的財富來自德國，其家族不光彩的淵源關係也在德國，不過，他的根是在別處。其父親海因里希是奧古斯特的次子，傾心知識（而不是工業），於是遠離父親的陰影和鋼鐵廠去英國念書，拿到倫敦大學博士學位；隨後搬到匈牙利，娶了一位有一半美國血統的女爵，他岳母是來自德拉瓦州（Delaware）的美國人。

海里對自己的美國血源相當自豪，他也跟我們說起祖父和祖母是如何糊裡糊塗地結為連理。匈牙利男爵以為他娶到杜邦家族（Du Pont）[192](#)的千金，而她根本不是；美國女孩則以為她嫁給真實版基督山伯爵—鍍金時代美國人普遍會幻想的那種歐洲貴族。唉，結果雙方都一貧如洗。兩家人如此機關算盡，全是為了一個可疑的、匈牙利政府甚且已不再承認的貴族頭銜。儘管如此，大海因里希和現在的海里依然是個「男爵」，擁有這個頭銜總是比沒有更威風凜凜。

奧古斯特·提森於一九二〇年代去世，他的帝國由兩個兒子弗里茨（Fritz）和海因里希繼承。長子弗里茨繼承德國的鋼鐵廠，全球其他地方的產業則歸海因里希所有。海因里希在海牙設立了國際總部；海里即是一九二一年在當地席凡寧根海岸（Scheveningen）的度假村出生。提森家族在德國以外的產業主要集中在造船和銀行業，但大海因里希真正的興趣是收集古典大師作品。至於弗里茨，他最大的愛好是：造王。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最富有的企業巨擘，他發揮影響力將希特勒推上德國元首的位置。不過，據男爵告訴我們，弗里茨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已意識到自己創造了一個怪物。

「碎玻璃之夜」事件（Kristallnacht）[193](#)發生後，弗里茨對猶太人遭受的對待深感駭然，他向納粹黨內身居高位的友人，也是美學家暨藝術專家的赫爾曼·戈林表達看法，戈林隨即開除他的黨籍，將他的鋼鐵廠收歸國有，並沒收他所有的藝術藏品（和其弟海因里希的收藏一樣質量精湛、傲視全球）。弗里茨逃到法國，準備前往阿根廷，但維琪政府（Vichy France）[194](#)背叛他，將他遣送回納粹德國。在最殘酷的命運作弄下，他先被送到薩克森豪森集中營（Sachsenhausen），然後是達豪集中營（Dachau）。他在集中營裡撰寫了一本回憶錄，後來在美國出版，書名為《我曾資助過希特勒》（*I Paid Hitler*）。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陣營認為弗里茨光是認錯道歉還不夠，他們將他交付審判。但跟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5](#)那樣的「頭號大戰犯」不同，他被判定是「小戰犯」。法庭沒有判他入獄，而是處以十萬美元（約臺幣三百萬）罰金做為集中營受難者的補償金；他也許是唯一一個遭到二戰交戰雙方懲處的高知名度德國人。一九五〇年，他總算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隔年死於心肌梗塞。

海里有一個姊姊瑪基特（Margit），她住在原屬奧匈帝國的雷希尼茨（Rechnitz）一座十二世紀城堡裡。瑪基特嫁給貧窮的伊凡·波斯賈尼伯爵（Count Ivan Batthyany），日子倒是過得逍遙愜意，比如養養純種馬，帶獵犬騎馬狩獵。她比海里大十歲，所以當我結識她

時，她已是暮年。當時健康狀況不佳的她，迷上一位年輕醫師席費爾拜因（Scheffelbein）。正如海里神似他父親，瑪基特也是海里和大海因里希的女性翻版，儘管霸氣的貴族樣貌在男性身上會較為出色。

海里和瑪基特有另一位姊妹嘉貝麗（Gabrielle），我也見到了她，這位孀居的本廷克男爵夫人（Bentinck）長相並不太像她的弟弟或姊姊，大家都稱她為嘉比。本廷克家族是一個與荷蘭及英國王室皆有親戚關係的尊貴家族，嘉比的丈夫生前是荷蘭駐法國大使，她則是一個自成一格的偉大藝術贊助人——一個不識藝術家的贊助人。有一回，她在巴黎參加一場晚宴，坐在她旁邊的男人自稱是個「畫家」。她於是喋喋不休地談起父親和弟弟，說提森家族是繼梅迪奇家族以後，最不遺餘力支持藝術的贊助者。她認為鄰座的男人是個還在奮鬥求出名的藝術家。「也許我們可以幫幫你。」她提議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回答：「夏卡爾。」由於聽海里講過嘉比的這段軼事，後來在倫敦的一場宴會上，坐在我身旁的她問起對面的年老紳士是什麼人，我不由得忍俊不住，湊向她耳邊悄聲說：「巴爾蒂斯。」

每一年，身為家族事業負責人的海里會編寫印發旗下企業的年度報告。他心知這些報告的內容有多麼枯燥無聊，於是在第二十頁頁尾加上一段註腳，大意是說：「恭喜你認真閱讀這麼多頁，打電話給我，我會送你一箱庫克香檳（Krug）。」他不曾接到家人來電要香檳酒，但這就是海里典型的冷面幽默。我最喜歡他的一點，就是他不曾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彷彿置身事外，看著自己瘋狂、古怪、比任何小說情節都更離奇的人生，然後和世人一起嘲笑，笑它堪比一齣肥皂劇。

海里父親的聲譽比他伯父弗里茨要好。大海因里希眼見希特勒崛起，曉得自己在荷蘭的資產承受極大的風險，因此盡可能遠離納粹，待在瑞士的法沃利塔別墅避難，當二戰戰火席捲全世界時，他專注於藝術。至於海里，他似乎過度熱衷於分享自己的藝術收藏。他討厭把畫作貯藏在倉庫裡，他就是想要分享自己的藝術收藏，即使對象只有一個人也好。

舉個很好的例子。海里擁有一幅蘇聯前衛派畫家娜塔莉亞·貢查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的美妙畫作，他把它出借給雷根總統任內的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當辦公室裡的掛畫。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人士，一個保守的共和黨黨員，他華盛頓辦公室的主牆上掛著一幅蘇聯共產黨員的畫作，而出借這幅畫的男爵，有個扶植希特勒上臺的伯父；瞧，這就是藝術搭起橋梁、促進交流的力量。

沃爾克借的畫屬於「大使館藝術計畫」（Art in Embassies）的一部分。負責該計畫的部門為甘迺迪總統任內所成立，隸屬於美國國務院。甘迺迪夫人賈姬熱愛藝術，認為分享藝術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外交方式，因此竭力促成此一美事。由於全世界沒有其他人比男爵擁有更多藝術品，或者說沒有其他人比男爵更樂於分享藝術品，因此他成為該項計畫的臺柱。我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前往世界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視察那裡所懸掛的提森男爵藏品。也許我們最感驕傲的時刻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雷根總統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為結束冷戰，在日內瓦首度舉行高峰會（第二次高峰會在冰島雷克雅維克進行），大使館藝術計畫部連絡我們，想借「適當」的畫作來裝飾阿迦汗出借的別墅，為和平會談的場地營造合宜的氣氛。

在我任職期間，海里購入不少十九世紀以降的美國藝術作品，包括東岸畫家霍默、柴爾德·哈薩姆（Childe Hassam）[196](#)到狂野西部的畫家雷明頓、亨利·法爾尼（Henry Farny）[197](#)。鑑於他原本的藏品內容滿滿是古典大師作品，這無疑是極大的飛躍，而既然是國務院要求，涉及美國，就只能出借美國藝術家的畫作，沒有其他選項。儘管海里相當慷慨，他仍舊是一個生意人，一個了不起的生意人——有本事在二戰後重整四分五裂的家族企業，並使其再度壯大。藝術對他而言既是樂趣，也是一項投資。那次會出借藏品，他自有他的如意算盤。想想，只要全球兩大領導人在這一幅畫前的合影登上全球各大報頭版，畫作價值可不是一夕之間水漲船高？

男爵交付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跑遍世界各地盤點，編製他所有收藏品的完整目錄。他在許多城市，諸如不萊梅、蘇黎世、蒙地卡羅等地擁有辦公室，而在倫敦切斯特廣場、聖莫里茨、薩丁尼亞島、馬貝拉、牙買加等地方有宅邸。他在每一處都擺放了大量收藏，另外，也得算入出借給大使館藝術計畫部的畫作；因此，我得去的地方可多了。我的第一站是男爵在英國新購入的豪宅，位於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科茨沃爾德（Cotswolds）的戴萊斯福特宅邸（House Daylesford），是嚮往英國貴族社會的丹尼絲說服他買下的。丹尼絲聘請當時正紅的室內設計師倫佐·蒙賈爾迪諾（Renzo Mongiardino）[198](#)，我抵達時，宅邸才剛重新裝潢完成。蒙賈爾迪諾是義大利人，原本為舞臺設計師，後被尼亞爾霍斯發掘，重新裝潢了聖莫里茨的庫爾姆飯店（Kulm Hotel）。自此以後，所有以噴射機代步的富豪都對他趨之若鶩。蒙賈爾迪諾也透過李·拉齊維爾（Lee Radziwill）[199](#)得到甘迺迪家族的認可，可謂氣勢如虹，銳不可當。

戴萊斯福特宅邸為曾任印度總督的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所遺留下來，其蔥型圓頂頗具印度異國風情，但蒙賈爾迪諾添加了皮革壁毯之類的設計，多少扭轉印度風味。我獨自一人前往，宅邸裡配置了僕役、園丁，一應俱全，這麼大陣仗一群人服務的只有我和另一名客人：一個名為愛德華·蓋東（Edouard Gueydan）的法國耶穌會教士。海里曾在瑞士弗里堡大學（Fribourg University）念法律（差不多跟我一般「滿腔熱忱」），此位教士也曾是那裡的學生。說來有趣，海里年輕時對藝術毫無興趣，直到他父親去世，留給他那些古典大師作品，他才完全改觀。

蓋東神父身材高大，穿黑袍、戴硬白領的身影相當醒目。他總是拿著一大本皮面聖經到處走動。他並未奉行禁欲和苦行，起碼在我們待在戴萊斯福特宅邸期間並沒有。相反地，我們實行我那位攝影師朋友馬里奧·特斯蒂諾（Mario Testino）[200](#)所說的「看到就吃飲食法」，也就是看到任何食物就塞入口。而我們看到了：龍蝦、魚子醬、鵝肝、松露、蘇格蘭牛肉、鮭魚……多到無法一一列舉。蓋東神

父還拿出男爵珍藏的奧格斯堡銀器（Augsburg silver），即興為工作人員做了一場彌撒，逗得我更加開心。

在我完成堪比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小說的歷險旅程，編完男爵藏品目錄後，我也沒時間好好待在盧加諾，因為男爵先生老是要我陪同他旅行，那是泛美空服員也大有可能累癱的高密度行程。我們跟馮·弗斯騰柏格姊弟，伊拉和伊根（Egon），一起去了布拉格。伊根甫與服裝設計師妻子黛安（Diane von Furstenberg）²⁰¹離婚—就在她以圍裹裙（一片式）洋裝走紅全球之後。布拉格當時還在鐵幕裡，還未搖身一變成為東歐的巴黎。我們見到日後當上總統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以及他最好的朋友兼顧問卡雷爾·馮·施瓦岑貝格親王（Prince Karel Von Schwarzenberg）。話說，一九八九年天鵝絨革命²⁰²後，哈維爾任命施瓦岑貝格親王為總理；而這位親王是伊拉公主和伊根親王的遠房親戚，想到歐洲最古老貴族的後裔竟是一場翻天覆地革命的要員，實在是很有意思。離開布拉格後，我們去了維也納，下榻在施瓦岑貝格宮（不然還有哪裡呢？）。

然後海里又帶我周遊美國的重要美術館，先後去了兩趟。第一趟是因為他收藏的古典大師作品在九個城市巡迴展出，從華盛頓國家畫廊開始，以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最後一站。丹尼絲曾在華盛頓現身，一身盛裝地姍姍來遲，遲得令人捉狂（對海里而言），接下來七個城市，她則完全隱身、不見人影，直到巡迴到紐約，同樣的姍姍來遲出場秀才又重演一遍。更有意思的是第二趟，藏品在美國中部的六家「地方美術館」巡迴展出，包括奧克拉荷馬市、奧馬哈和聖地亞哥。海里很享受各地的地方特色，即使他慣常的旅行裝束：藍色西裝外套、灰色休閒褲、白襯衫、紅藍色條紋領帶和黑色樂福鞋，讓他在當地顯得特異出眾。

海里不需要穿著美國國旗的顏色來討好美國人，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都巴不得來會一會這位全球知名富豪。在奧克拉荷馬市，我們去了一個叫「牛仔女孩」的俱樂部，當時正值電影《都市牛仔》

（*Urban Cowboy*）引爆騎機器公牛的熱潮，可愛的當地女孩雖然無法

說服海里騎上公牛體驗，但她們教我們如何跳方塊舞。那次體驗留在男爵心中，後來他為亨利·福特（Henry Ford）辦宴會，便將法沃利塔別墅變身為草原上的小屋。男爵辦過不少令人難忘的宴會，那場是其中之一。

我們在奧馬哈（Omaha）則遭遇了另一場大異其趣的冒險。我們到達時，接到美國策展人弗雷德·科迪（Fred Cody）的來電，他苦惱地說我們碰到「大麻煩」。因為奧馬哈美術館前，將舉辦一場反對「納粹藝術」展覽的抗議集會。而海里總是臨危不亂。「打電話給我的朋友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203。」他指示弗雷德，「他會處理。」弗雷德照辦。著名的納粹獵人維森塔爾發出一份新聞稿，指出奧馬哈市民弄錯對象了。弗里茨才是前納粹黨人，海因里希則是反納粹，而海里是猶太人的好朋友。於是，抗議集會變成歡迎男爵的遊行，展覽吸引許多民眾大排長龍。

伊莎貝爾竟能容忍我與男爵過著吉普賽式的生活，我對此只有萬般感謝。即使人在盧加諾，我照樣沒日沒夜地工作，只有與她共餐的次數不計其數—儘管從來不是兩人世界的用餐。這樣的生活完全實踐了男爵的座右銘：「努力工作，努力玩」。雖然某些夜晚，喬吉歐和我差不多是將他扛回房間，隔天早上七點，他一定一骨碌地起床，頭腦完全清醒，思緒清晰敏銳，急於買入更多藝術品。醫師警告他別再喝酒，但他絲毫不當回事。一直到六十出頭時腦中風，導致左手臂完全失能，他才終於決心戒酒。

男爵倒是維持每日游泳數小時的習慣，或是在別墅的游泳池，或是駕他的遊艇「漢薩號」（Hanse，德文意思為中世紀貿易公會）出海，這是他唯一能力行的運動。但節制克己不適合放浪不羈的男爵，於是他乾脆換了另一個醫師，對方告訴他，改善動脈硬化的最好方法是吃很多生大蒜，放在烤土司上吃下肚。我不知道醫師是不是外西凡尼亞（Transsilvania）來的吸血鬼獵人，但男爵很喜歡這個醫囑，以至於整個別墅，以及我們自己，都散發出韓國泡菜餐廳的大蒜臭氣。

不管有沒有中風，沒有任何事可以平息男爵的買畫狂熱。他在他那間寬闊的藝術圖書室翻看書本和目錄時，只要看到喜歡的東西，就會把那一頁折角做為記號。他大概認為，凡是他想要的都能到手，所以有不計其數的書頁折角，而我的任務即是追查這些畫作的下落。那是網際網路還未出現前（要到很久以後才問世）的年代；除了親眼看畫，評價繪畫的唯一方式是透過幻燈片，而那些正片非常昂貴，一捲三百美元（約臺幣九千）。每天早上，我們會收到各地畫商寄來的幻燈片大包裹。因為男爵是市場的頭號買家，只要一有新物品，我們必能先睹為快。然後我得做很多功課，像是判斷價格是否合理，追溯物品的來源（如今我只需要登入Artnet網站），再來我得馬不停蹄地奔波各地，但能夠位居藝術市場的核心，讓我滿心激動。

能夠成為男爵信任的對象，也令我十分欣喜。他認識所有畫商，杜勒特、澤爾烏達齊等每一個人。但他們都有東西要賣；都有各自的立場，而我沒有。男爵能夠諮詢、最接近真正超級專家伯納德·貝倫森那樣的人物，就是他父親的古典大師顧問：魯道夫·海涅曼（Rudolf Heinemann）。此位猶太裔藝術經紀商於一九三五年從柏林流亡到紐約，後來成為學者，在紐約大學藝術學院獨領風騷。

海涅曼在一九七五年，我到別墅任職之前去世，但是每一次我陪同男爵前往紐約，我們都會去拜訪魯道夫的遺孀洛荷（Lore）。她的寓所座落在第五大道和第七十二街口，屋內掛滿古典大師畫作，包括竇加、塞尚和其他經典大師。等我從男爵那裡離職，回到蘇富比工作以後，還是會親自前往拜訪。年過七旬的她仍然相當性感，她總是穿著洋裝現身，但背後拉鍊從來沒拉好，要我幫她拉上。海里總是開玩笑說，如果我拉下拉鍊，我一定能拿到她驚人的藝術收藏給蘇富比拍賣。

現在男爵既然不再局限於收藏古典大師作品，我便成為他在現代藝術新世界探險的眼睛和耳朵。男爵的現代藝術收藏不時遭到藝評家詬病，認為水平及不上他的古典大師藏品。但這是想當然耳的事，有什麼作品能及得上古典大師傑作呢？反正，男爵置批評於度外，總是

以他一向冷眼旁觀自己的作風，看著一切喧鬧爭吵，自己也開懷大笑。得到惡評，那是「別人家」的事，繼續買畫是海里最好的報復方式。他就是喜歡買，如果他出席一場拍賣會，沒有得標他的目標物，就會改買別的拍品。

海里對愛好的東西是一心一意的。有一回，我們參加美國駐法大使伊凡·蓋布瑞斯（Evan Galbraith）在巴黎官邸舉辦的晚宴。我剛剛才找到一幅非常適合海里購入收藏的蒙德里安（Mondrian）204畫作。他同意要買。唯一的障礙是，那幅畫當晚已登上倫敦蘇富比的拍賣會。「讓我們買下來！」海里喝雞尾酒時做下決定。他請蓋布瑞斯大使安排了一個房間，讓他能與倫敦蘇富比熱線競標。這幅畫約在晚宴中場登場，海里和我暫時離開餐桌，返回時滿臉笑容，蒙德里安已入袋。海里不只違反社交禮儀，接下來的時間還對著席上賓客—全是藝術的不可知論者—興奮大談他剛剛斬獲的寶物，簡直反客為主。

海里剛購入的畫作必然成為他那段時期的最愛。若是他人在別墅，晚餐結束後，他會上樓到辦公室，欣賞懸掛在那裡的所有新近戰利品。他會滿懷愛意地盯著它們看上數小時，直到不敵睡意打起瞌睡。因為他的收藏品實在太多，所以「最後買進、最先欣賞」，也不失為一種盤點庫存的好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海里對藝術品收藏是奉行一夫一妻制，只不過新歡換不停。反之，我永遠愛著我幫他選擇的每一件作品。形形色色的精采傑作令我目不暇給，難以偏袒任何一個，一直處於心醉神迷的狀態真是莫大的恩寵。總而言之，對我來說，男爵的收藏實在驚人，涵蓋十二到二十世紀的每個重要畫家，呈現藝術一路演進的全貌。還有其他私人藏家可以與他匹敵嗎？

除了盧西安·弗洛伊德畫作以外，他還是絕不收藏當代藝術作品。他遠在弗洛伊德揚名立萬、作品行情水漲船高到幾百萬美元以前，即已購入多幅畫作。

男爵是透過丹尼絲的弟弟羅伯托·蕭圖（Roberto Shorto）結識了弗洛伊德。羅伯托有一雙迷人的眼睛，但鼻子頗醜，畢竟他不幸濫用

古柯鹼成癮，所以暱稱是「羅伯托·吸圖」。羅伯托不僅說服海里買下幾幅弗洛伊德畫作，還讓他同意擺姿勢，由弗洛伊德為他繪製肖像。弗洛伊德欠了賭債，非常需要錢，但他作畫速度非常慢，下筆慎重，海里估計自己一共坐了一百六十個小時。男爵肖像的背景有一幅華鐸的畫，弗洛伊德從未見過那幅畫作，是按照我找到並寄去的黑白照片摹畫而出，且畫成彩色。還記得嗎？法沃利塔別墅的前一任主人就是為了籌錢買一幅華鐸的畫，才出售莊園，並由海里父親買下。對男爵來說，最糟糕的部分倒不是擺姿勢的時間，而是舟車勞頓，弗洛伊德的工作室位在倫敦荷蘭公園，男爵一共搭機往返了五趟。海里挺喜歡弗洛伊德，這位畫家在英國有深厚人脈，實際上出生在柏林。海里會取笑弗洛伊德，說他才是更「道地」的德國人。

羅伯托代為安排的另一次男爵肖像繪製，則是胎死腹中。羅伯托這個走在潮流前端的時髦人士，結交了安迪·沃荷。他帶沃荷到盧加諾「打造」男爵和丹尼絲的肖像；那是我去別墅工作之前的事。丹尼絲喜歡安迪，擺姿勢拍了許多照片，沃荷接著用絹印版畫來完成他招牌的肖像創作。然而有一天在晚餐時，男爵注意到安迪的手在桌子下擺弄某樣東西，男爵問那是什麼，「我的錄音機。」安迪告訴他。

安迪可能習慣錄下每一個客戶的談話，做為他創作和累積名聲的方法，但是男爵斷然無法接受。男爵絕少發脾氣，但他這一回勃然大怒，當即把安迪轟出別墅。這件事讓男爵更堅決避開還在世的藝術家，無論是要買掛在牆上的作品，或是邀本人來作客。

海里喜歡開玩笑說他喜歡繪畫勝過女人。「只需要把它們掛在牆上就夠了，再說它們多安靜。」他也時常說，他喜歡老大師勝過老情婦，女權主義者聽到這種發言恐怕笑不出來，不過丹尼絲不是女權主義者。

但她倒是藝術市場的精明操盤手。在一九八〇年代，她和海里撕破臉，展開互揭瘡疤、史上爭吵最激烈的離婚官司，當時有傳言指出，丹尼絲和她已離世的密友：義大利藝術經紀商法蘭柯·拉佩帝

（Franco Rappetti），曾合謀打點幾家畫廊，要他們暗中在售價動手腳，因此實質上向男爵收取了高達百分之五十的佣金。畢竟，以經濟學語彙來說，男爵的錢包彈性無限大。你有錢的話，為了追求美麗物品，錢算什麼呢？

紐約畫商當中最得海里歡心的，正是那些黑心經紀商裡最黑心的一位，他的名字是安德魯·克里斯波（Andrew Crispo）。他是幾位同性戀名人的情人，包括鋼琴家列勃拉斯（Liberace）及費城美術館館長亨利·麥克何尼（Henry McIlhenny）。克里斯波出身費城孤兒院，一路爬到第五十七街和麥迪遜大道街口的福勒（Fuller）大廈，在紐約上城藝術界的這棟巴別塔裡開了一家氣派畫廊。只要能得到男爵這個客戶，付多少佣金回扣都不嫌多。在一九七八年，就在男爵雇用我之前不久，拉佩帝被發現陳屍在西五十八街一輛福斯露營車車頂上。據說他從十一樓跳下，是克里斯波連絡殯葬業者法蘭克·坎貝爾（Frank E. Campbell），一手打點拉佩帝的後事。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克里斯波則因涉嫌性虐待和謀殺他英俊的挪威籍助理遭起訴。他最後無罪開釋，而他的另一個助手成為替死鬼，遭到判刑。克里斯波日後反而因逃稅而鋃鐺入獄。

在拉佩帝去世後，男爵繼續和克里斯波交易，畢竟對方有物品可賣；而握有男爵這位大客戶，克里斯波也能輕鬆找到出色的畫作來賣。魯道夫·海涅曼在一九七五年的離世，某種程度上解放了海里，他得以開放心胸接受新藝術。海涅曼若在世，恐怕不會贊同男爵從克里斯波那裡買入的許多作品。這就是海里繼續向克里斯波買畫的理由，這是一個叛逆兒子對海涅曼這種嚴父（權威人物）的反抗。

然而，男爵也和其他畫商往來。其中一位擁有最非凡的資歷，而且身分甚至不是經紀商。馬可·格拉西（Marco Grassi）是一個年輕義大利人，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然後回到佛羅倫斯，成為一名藝術品修復師。海里在那座城市結識他，請他修復一尊文藝復興時期的半身雕像；格拉西判定它是贗品，也沒有向男爵收修復費。海里因此很欣賞他。海里在紐約也會找另一個畫商：拉里·弗萊

希曼（Larry Fleischman），跟克里斯波相較，弗萊希曼堪比是紐約的杜維恩。弗萊希曼掌管紐約甘迺迪畫廊，和克里斯波是死對頭，兩人都想成為海里的主要畫商，最好是唯一往來的畫商。

弗萊希曼擅長玩花招，他創立了一個名為「美國藝術和宗教之友」的協會，以該會名義邀請海里在梵蒂岡展示他的藝術收藏。這招奏效了。海里出借他的美國藝術收藏在那裡展出，雖然那些作品完全沒有宗教色彩。總之，海里和弗萊希曼去晉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然而，弗萊希曼一走進教宗房間，簡直大驚失色，不僅撒旦化身克里斯波就在眼前，紐約的撒旦律師：魔鬼「清道夫」（fixer）羅依·科恩（Roy Cohn）²⁰⁵，也赫然在列。太讓人意外了！我還記得當時的總主教馬爾欽庫斯（Archbishop Marcinkus，梵蒂岡銀行行長，後來的義大利安保信銀行醜聞案要角）與克里斯波、科恩兩人攬肩合照時，我就在場。馬爾欽庫斯非常高大，克里斯波和科恩只有他的一半身高；這是一組並不神聖的「聖父、聖子、聖靈」。

最後，男爵總算下定決心，以後買藝術品前要合理評估再買，這就是我派上用場之處。鑑於男爵起初是被拖著初識現代藝術（第三任老婆的功勞），他對此領域幾無概念，他顯然需要專業人士來給予客觀意見，幫他篩選、決定。如果說有人為了阻止自己買畫，需要大費周章聘一個館長，那人正是海里。與其說他需要一個美術館館長；不如說他需要一位弗洛伊德、超人和教皇的綜合體。我很幸運對丹尼絲的「狂飆時期」一無所知，我當初要是知道，可能會更願意把我媽的建議當一回事。而如今，木已成舟，我成了他仰賴的「專家」，雖聽說海里背後有瘋狂的一面，但我眼前就得面對他的買畫「瘋」。

¹⁸⁸ 美國紐約上州的一個夏季度假區。一九二〇～一九七〇年代，曾是紐約猶太人喜愛的度假地，又稱猶太阿爾卑斯（Jewish Alps）。也因此孕育出許多猶太裔的喜劇和音樂方面的人才。

¹⁸⁹ iron and steel的同音玩笑。

¹⁹⁰ 德國家族，聲名顯赫，其家族企業是德國最大鋼鐵重工業公司。在二戰以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軍火生產商之一。

- 191 義大利電影與舞台劇導演（一九〇六～一九七六），對於二次大戰後的義大利電影有重要的影響，作品包括《納粹狂魔》及《家族的肖像》（Conversation Piece）、《諸神的黃昏》（Ludwig）等。
- 192 美國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原是靠生產火藥致富，後轉往民用化工產品，近代又積極發展生物科技。是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最長壽的公司之一。
- 193 是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凌晨，納粹黨員襲擊德國境內猶太人（以及店家、教堂）的事件；一般認為這是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開端。
- 194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法國政府。
- 195 納粹德國前高官（一九〇六～一九六二），也是納粹迫害猶太人過程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
- 196 美國印象主義的先驅（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擅長用明亮的色彩、大膽的筆觸描繪城市街道和自然景觀。
- 197 法裔美國畫家（一八四七～一九一六），作品主題以十九世紀的美國本土居民（印第安人）的生活為主。
- 198 義大利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產品設計師（一九一六～一九九八），曾兩度被提名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獎。
- 199 賈姬的妹妹。
- 200 時尚圈炙手可熱的攝影大師，作品具藝術性，常見於《時尚》、《浮華世界》等一流時尚雜誌，同時也為諸多時尚品牌拍攝廣告。
- 201 創立的同名時尚品牌為DVF。
- 202 是指一九八九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由於過程算是和平，因而衍伸為泛指沒有經過大規模暴力衝突就實現的政權更迭。
- 203 猶太裔奧地利籍建築工程師、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也是著名的納粹獵人（一九〇八～二〇〇五）。他一生致力追查納粹黨人，並蒐證將他們送上法庭。
- 204 皮特·科內利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 1872-1944），荷蘭畫家，風格派運動幕後藝術家和非具象繪畫的創始者之一。
- 205 美國律師（一九二七～一九八六），因為在第二次紅色恐慌時期，參與追查美國共產黨地下活動而聞名。

第十三章 男爵的快樂妻子們；一位收藏家的養成之路

說到運動，我也不比男爵在行。我每天的主要運動，是從法沃利塔別墅主屋走上一哩（約一·六公里）長的絲柏大道，往返我和妻子住的看門人小屋。沒有這些步行活動的話，我恐怕更無法消耗餐餐那些高檔美食的熱量，在男爵家裡的每餐飯，都美味得如同出自名廚埃斯科菲耶（Escoffier）²⁰⁶之手。有一天，我正行走在絲柏大道上，一輛計程車司機跟在我身旁慢慢停下。後座的車窗搖下，一個約莫四十來歲、保養得宜的金髮美女開口問我路，她想確定自己沒走錯路。這個宛若凱薩琳·丹尼芙（Catherine Deneuve）²⁰⁷加蘇珊·莎蘭登²⁰⁸翻版的女人有西班牙口音。她沒有自我介紹，她不認為有必要，她有任務在身，當然只看著前方道路和目標。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西班牙女士，一九六一年西班牙小姐后冠得主：卡門·賽維拉（Carmen Cervera）。她將得償所願，成為下一任提森男爵夫人。

總有漂亮女人來見男爵，畢竟沒有比他條件更好的金龜婿了。當時約是一九八四年；他還跟丹尼絲在一起，但因為她是第四任妻子，打他主意的女人不免懷抱希望：誰說不會有第五任呢？當然，他大可以打給克勞德夫人（Madame Claude），叫來一打的頂級應召女郎；該位老鴿專門為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正是我在蘇富比蒙地卡羅辦事處時期要悉心照顧的那些客戶）提供這類服務。不過，叫應召女郎不是男爵的作風，他是一個老派獵豔高手，需要騎士風度、求愛過程和追求佳人的刺激感來維持生龍活虎。若非他有此習性，難保不會在克勞德夫人那裡砸上數百萬美元。

我出席了男爵的第五次婚禮。他在一九八五年迎娶被大家稱為「蒂妲」（Tita）的卡門。地點在莫頓因馬什（Moreton-in-Marsh）的市政廳，因為那座小鎮是距離戴萊斯福特宅邸（House Daylesford）最近、且配置有警察的地方。狗仔隊蜂擁而至，簡直跟一群拿相機的蝗

蟲沒有兩樣，乍看還以為他們是在跟拍保羅·麥卡尼或米克·傑格209，而不是一位六十開外的瑞士藝術收藏家。一個星期後，在盧加諾，我走到離法沃利塔別墅最近的書報攤買星期天的報紙，目光掃到一本德國八卦新聞雜誌的封面，不由得猛然停步。彩色封面上是蒂妲在泳池旁近乎全裸的大幅照片，花園水管宛如伊甸園的蛇，纏繞在她姣好的身軀上。標題寫著：「天哪！新任男爵夫人。」我買下雜誌做為紀念，但沒打算拿給男爵看，我可不想自尋死路。沒想到，我一回到別墅，男爵就等在那裡，他得意地舉著雜誌迎接我。「她看起來很棒吧！」他興高采烈地說。

來自巴塞隆納的中產階級女孩卡門·賽維拉，謀得如此一位乘龍快婿，無異跟中了樂透頭彩沒兩樣，她是如何辦到的？沒錯，她的確拿過選美比賽后冠，但那已是二十年前的榮耀了。沒錯，她曾嫁給一個電影明星，但那位男星是萊克斯·巴克（Lex Barker），一九五〇年代電影史上第十個扮演泰山的演員，並不是克拉克·蓋博210或卡萊·格倫之類的大明星，再說史上最成功的泰山演員不是巴克，而是強尼·韋斯穆勒（Johnny Weissmuller）。男爵大可以選個現任環球小姐，或好萊塢女明星、超級模特兒、年輕貌美的名媛、貨真價實的公主，但他歷任的妻子已是這些類型。

卡門有什麼特別之處？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海里想要什麼樣的女人，想要什麼樣的藝術品？要得到最佳解答，唯有看看每一任男爵夫人都是何方神聖，再來了解海里每次離婚的理由。除了第二任妻子已過世，他的其他三任前妻我都見過。我最歎服的是，她們都是出色的女人，但個個截然不同。不管是愛情對象或藝術品，提森男爵絕不會因循舊規，絕不會始終愛戀同一個類型。他知道美麗有千萬種，而他前後五任妻子都有各自獨特的美。

海里在一九四六年踏入第一段婚姻。他當時二十四歲，是典型的英俊貴族公子。他娶了一個相貌同樣出眾、當時還在洛桑念書的年輕貴族，對方的家族譜系比他家更久遠、更純正。她是利珀公主瑪麗亞·特瑞莎（Princess Maria Teresa of Lippe），一個天主教徒，其奧地

利貴族頭銜可遠溯至神聖羅馬帝國。她出生在維也納，身材高，舉止優雅，與許多歐洲顯赫貴族是親戚，比如她的叔父是荷蘭親王貝恩哈德（Prince Bernhard of the Netherlands）。提森家族在荷蘭曾擁有數家造船廠，但在戰時悉數遭到摧毀，需要當地具影響力的人士支持方能重建。海里透過特瑞莎，以及嫁進荷蘭貴族本廷克家族的姊姊嘉比，獲得必要奧援。

就如同歐洲許多貴族家庭，特瑞莎家族家道早已中落，生活在貧窮邊緣。海里的父親海因里希憎惡那種為錢結婚的拜金女，對她家背景頗有微詞。但大海因里希日漸老邁，在一九四七年即去世，海里的弗里茨伯父健康狀態也每下愈況，提森帝國因而落入年輕的海里手中。他肩負著重整家族事業的重責大任，儘管沒多少人看好他，但他做得卓然有成。

海里迅速擺脫已烙上納粹污名的鋼鐵業和軍火業，專注於航運業和銀行事業，並取得啤酒巨人海尼根的大量股份（他這樣嗜酒的人，非常中意這個投資）。他還投資了其他領域，包括美國房地產、玻璃製造（Indian Head，印地安頭汽車玻璃公司）、鹿特丹港、一家日本紙板廠，以及澳洲數座綿羊農場；說起來，他統領的提森—博內米薩集團（總部設於摩納哥，員工超過一萬名）是史上最早跨足全球的企業集團之一。海里不只是家族繼承人，不只是藝術收藏家，他更是一位商業大亨。

身為一個意氣風發的工業頭子，海里可能感覺與年輕公主的婚姻是個束縛，但她不久即生下他的繼承人：格奧爾格·海因里希（Georg Heinrich）。而我第一次見到特瑞莎之時，她已成為弗斯騰柏格公主（Princess Fürstenberg），是我那趟行程的旅伴，伊拉、伊根姊弟的姻親。她雍容華貴，但也給人一種親切感。她極為文明地與男爵保持朋友關係。儘管已有年紀，她依然美貌驚人，非常有魅力。誰會對這樣的女人不滿意呢？就是海里·提森男爵。

到了一九五一年，海里過起放蕩不羈的生活，不只他如此，當時是二戰後新一代花花公子的全盛期，海里與一群講究美食、縱情生活、深受女人歡迎的有錢公子哥兒頻繁往來，包括義大利汽車集團小開吉亞尼·阿涅利、接連娶了富家女為妻的多明尼加人波菲里奧·魯維羅薩（Porfirio Rubirosa）、俄國公爵暨好萊塢服裝設計師奧萊格·卡西尼（Oleg Cassini）、被暱稱為「寶貝」的巴西工業家皮格納塔里（Pignatari）、伊斯蘭伊斯瑪儀教派精神領袖暨種馬培育者阿里汗（Aly Khan），以及八卦專欄的其他常客。一九五〇年代的報紙八卦專欄就如同現今的電視實境秀，讀者彷彿身歷其境，不由得為之入迷。

那一年，提森在巴黎邂逅他伊甸園裡的第一條性感毒蛇。她是美麗過人的尼娜·夏拉·戴爾（Nina Sheila Dyer）。這位出身利物浦、芳齡二十一의模特兒運用美貌和百變性感魅力，成為深獲第一代噴射機階層青睞的海報女郎，從此活躍於法國蔚藍海岸的上流社會圈子。尼娜的高顴骨臉型帶有一種異國風味的美，她的出身跟英印混血明星瑪兒·奧白朗（Merle Oberon）頗有相似處。尼娜出生在錫蘭（現斯里蘭卡），她父親是在茶園工作的英國人，她母親是印度人。二十歲那年，她懷抱演員夢搬到利物浦，進入戲劇學校。但夢想不曾實現，她又搬到倫敦，開始當泳裝模特兒。因為她有一半印度血統，傲慢、唯我獨尊的英國人拒絕欣賞她的美，並禁止她登上雜誌封面，只因她不夠「純正」。

不過，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巴黎敞開雙臂接納她。她成為皮耶·巴曼（Pierre Balmain）[211](#)的御用模特兒，隨後躍居為時尚圈紅星。上流社交圈就此為她敞開大門，她獲邀出入各個「有頭有臉」人士在蔚藍海岸的遊艇和別墅，自然而然來到了最有錢有勢的提森家別墅。男爵和她相遇時，正受夠了乏味婚姻的桎梏，想要呼吸新鮮空氣，而尼娜剛好出現在他眼前。

兩人濃情密意交往三年後，男爵有了一個情敵：法國演員、編劇和調情聖手克里斯提昂·馬爾貢（Christian Marquand）。此人與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是莫逆之交（交情好到白蘭度以他的名

字為兒子命名），交往的對象皆是碧姬·芭杜、珍·芳達（Jane Fonda）這樣的大銀幕明星。尼娜雖不孕，但海里已有一個兒子可當繼承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真心，他跟特瑞莎離異。一九五四年，他和尼娜搭上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的彗星客機（由德·哈維蘭公司研製，史上第一架、第一種以噴射引擎為動力的民航客機）飛往錫蘭可倫坡結婚（堪稱史上第一場以噴射機代步的婚禮）。特瑞莎則是幸福地待在舊世界，很快也再婚，嫁入海里好友伊拉公主的弗斯騰柏格家族。早在結婚以前，海里即大手筆買下一座加勒比海小島：牙買加的猴島，送給尼娜。（他在牙買加本島已坐擁一幢別墅「鱷魚頭」）他還送給她兩隻黑豹。尼娜堅持將牠們和六隻大型犬養在夫妻倆巴黎的居所：喬治大道近旁、伊莉莎白女王飯店（當年是一家頂級旅館）的豪華套房。動物雖是一種可長久留存的禮物，但極可能出現最壞狀況。法沃利塔別墅較年長的僕人，跟我分享尼娜拉著鑲鑽牽繩，在庭院遛那兩隻豹的故事，聽得我不亦樂乎。男爵從小在完全平和、安寧的環境裡成長，家裡養的這些寵物，以及尼娜跟克里斯提昂·馬爾貢的藕斷絲連，幾乎讓他抓狂。此外，由於尼娜迷戀珠寶，他也在海瑞·溫斯頓店裡花了大筆金錢。

與尼娜結婚的興奮之情，以及與情敵（她喜歡演員和藝術家類型男人）一爭高下的心態，可能是催化男爵成為藝術收藏家的因素。身為一個實業家雖有社會聲望，但不性感；財富和權力可能是春藥，但是說到底，保羅·蓋蒂能有多性感？海里和大多數低調有錢人不同，他很樂意在報紙八卦專欄看到自己的名字，更巴不得能登上頭版。一九五五年他出借一批古典大師收藏品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當中包括那幅霍爾拜因的《亨利八世肖像》，因此躍上報章雜誌頭版。那次契機觸發他第一次自主購入（買下他兄姊繼承的古典大師畫作除外）一幅藝術巨作。那是一幅弗朗切斯卡·德爾·科薩（Francesco del Cossa）²¹²的舉世聞名作品，完成於一四七三年的〈持戒指的男人〉（*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Ring*），此舉使他獲得更有利的個人宣傳。男爵似乎認為女人都熱愛藝術，熱愛女人的男爵當然善用此點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遺憾的是，對尼娜而言，藝術可能是讓她愛慕男人的必要因素，但還不夠。先是男爵在一家巴黎夜總會與馬爾貢打架，後來又發生尼娜在高級訂製品牌：巴黎世家（Balenciaga）、賈克·法斯（Jacques Fath）和迪奧，賒帳數十萬美元的事，男爵忍無可忍，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提出離婚訴訟，最終同意給尼娜超過百萬美元贍養費，還讓她留下價值總計百萬的寶石，此外，她還得到巴黎郊區的一座城堡，以及一幅葛雷柯（El Greco）[213](#)的畫作；而尼娜最主要的損失只有她的男爵夫人頭銜。

事實證明尼娜有絕佳的復原力。還不到一年，她就嫁給阿里汗的兒子薩德魯丁（Sadrudin），此人就如同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溫莎公爵[214](#)，捨棄了成為伊斯瑪儀派精神領袖的繼承權，娶了他所愛的離婚女人。海里獲邀參加兩人在日內瓦舉行的婚禮，但他沒有出席。尼娜從匈牙利男爵夫人搖身成為穆斯林王妃，也改為穆斯林名字：希琳（Shirin），意思為蜜糖。三年後，甜蜜轉為辛酸，這一對可汗王子夫婦的婚姻宣告破裂。在一九六五年，尼娜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男爵告訴我，她過世前一晚曾致電給他，但他沒有接到，有許多次，他在黃湯下肚後對我吐露，他每次想到她都感到心痛，說他當初要是就在電話旁邊，接到那通電話，尼娜或許不會走上絕路。他真的愛她，他知道她也關心他。他告訴我，兩人在打離婚官司的時候，有一次，海里帶著重感冒出庭，尼娜罵了她的律師一頓，說怎能讓男爵抱著病體來受折磨。那小小的體貼善意始終被男爵記在心裡。

比起公主，海里·提森更鍾情模特兒。他離婚三個月後，又娶了一位名模，一個頂尖中的頂尖模特兒。即使蘇西·帕克（Suzy Parker）和多利安·雷伊（Dorian Leigh）的崛起已宣告名模時代的來臨，但是能登上《生活》雜誌封面的時尚模特兒猶如鳳毛麟角，男爵的新任妻子，《時尚》雜誌的臺柱費歐娜·坎貝爾—華爾特即是其一（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該期封面）。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生活》雜誌等同是名人資格認證機構，直到電視出現，它的權威地位才日漸式微。有印度血統的尼娜·戴爾不符合英國人的審美觀，但有著

貴族般臉孔的費歐娜·坎貝爾—華爾特正合乎英國人對理想中的女王相貌想像；王室攝影師塞西爾·比頓也特別鍾愛她。再者，她的血統優良。她的父親是海軍少將（又讓我碰上一位，彷彿整個英國皇家海軍通通是少將），而這朵蘇格蘭玫瑰實際上出生在紐西蘭奧克蘭，那是她父親當時派駐的地點。她到聖莫里茨度假時遇到男爵，兩人在盧加諾湖岸景色如畫的卡斯塔尼奧拉村（Castagnola）市政廳成婚。據說兩人訂婚不過十二個小時即火速完婚，她當時二十六歲，他三十五歲，一張男爵以雙手抱起新娘的照片登上全球報章雜誌頭版，但無疑的，費歐娜才是雙手滿載的那一位。

費歐娜並不需要錢，她是那個時代最高薪的模特兒，只要看一眼她最經典的照片—站在沙灘上，臉上脂粉未施，只裹一條紀梵希浴巾—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她的日薪高達五千元（約臺幣十五萬），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她比現今的超模吉賽兒·邦臣和凱特·摩絲還賺得多。登上《生活》雜誌封面是她應得的榮譽，她是史上第一個被社會大眾接納的模特兒。因此，她是海里非娶不可的美嬌妻，就像他看上那幅弗朗切斯卡·德爾·科薩的傑作，就非要擁有不可。為了任何美麗的東西，即使付出再高昂的價格也值得。男爵可以慶幸的是，費歐娜不像尼娜那般揮金如土。她為他生下兩個繼承人，女兒弗蘭西絲卡（Francesca）和兒子羅恩（Lorne）。這段婚姻更重要的意義是，她對德國「頹廢藝術」的熱情，促使男爵進一步投入藝術收藏，這位實業家進而成為全球無人出其右的頂尖藏家，以此獨一無二的身分永遠名留青史。

男爵如今的名望，確實有部分該歸功於費歐娜，是她鼓勵男爵步上新方向，並落實他的騎士承諾：送妻子她想要的任何東西。另一方面，男爵很有競爭心。他狂買十八、十九世紀繪畫的舉動，是他與造船同行—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重要藏家的那幾位多金希臘人歐納西斯、尼亞爾霍斯、古蘭德里斯—相互較勁的結果。其中最能夠激發海里買畫的敵手，非尼亞爾霍斯莫屬。此位希臘船王在一九五七年，以兩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七千五百萬）購入愛德華·羅賓遜收藏的所有印

象派畫作，因而風光占據各大報頭版版面。海里因此下定決心，他得像那幾位希臘藏家一樣，也擁有印象派畫作。在藝術收藏這方面，他也發揮在造船事業的競爭心。他非常自豪自己是在鹿特丹胼手胝足地從零開始，不像尼亞爾霍斯是靠戰後剩餘的舊船運輸石油而發跡致富。就算娶了全球頂尖模特兒為妻，用最頂級的香檳品牌作為他的新船名稱，海里的成功企業家形象依然堅若磐石。

費歐娜有次拖海里去斯圖加特參加一場拍賣會，他以一萬美元（約臺幣三十萬）得標一幅埃米爾·諾爾德的水彩畫，創下現代德國藝術作品的全球最高拍賣價格。男爵很驚訝以如此低廉的金額便能締造新記錄，便想到能以類似方式來達到自我宣傳，於是他開始出席拍賣會、買現代藝術作品。他很喜歡諾爾德，所以買了不下十件作品。事實上，大海因里希曾收藏了一大批十九世紀德國畫家及其他歐洲國家畫家的作品，但是他於一九四七年去世後，當時還不識貨的兒子海里將該批收藏悉數賣出。

男爵如今火力全開購買現代藝術，有我的監督，甚至促使他快馬加鞭，幾乎到了每天都買一幅畫的程度。他與費歐娜在一起的年代，他才剛開始收集藝術品，平均每年只買十幅畫—當然幅幅都是偉大傑作—如今卻是以量取勝。海里踏出自己的腳步，不再死守父親的收藏原則以後，便猶如脫韁野馬，曾買下一些極其匪夷所思的物品。例如：他買了一幅波洛克一九五一年的作品〈褐與銀一號〉（*Brown and Silver I*）。雖然理論上來說，波洛克已不在人世，因此符合海里的購畫原則，但對於古典派的男爵而言，這幅畫未免過於前衛。海里之所以喜歡波洛克，是因為有一則都市傳說，繪聲繪影地描述波洛克在東漢普頓那場死亡車禍的經過：他開著奧茲摩比（Oldsmobile）敞篷車在路上奔馳，一來因喝得爛醉，二來他的女友兼藝術家同行露絲·克利格曼（Ruth Kligman）²¹⁵正在幫他口交，以致分心未看路。波洛克是海里可以產生共鳴的那種藝術家，所以他買的並不是畫，而是傳說。

費歐娜和海里在一九六五年離婚時，老愛對媒體放話的男爵，告訴一個記者，說如果費歐娜更花心一點的話，或許還能激發他的危機意識，更積極經營與她的感情。但真相是，費歐娜花心的程度跟海里不相上下。這證明了美貌和金錢不足以讓一對佳偶長長久久。費歐娜會出軌的起因，跟她想成為電影明星的祕密夢想有關。你可能以為她會選擇屢獲奧斯卡獎（簡直像蒐集藝術品一樣蒐集獎座）的金牌製作人山姆·史匹格，但她同時也在尋找愛情，因此，她看上的是一位帥氣但屬二流的好萊塢電視製作人，當年電視圈的人就是矮電影圈的人一截。

他名叫謝爾頓·雷諾茲（Sheldon Reynolds），是當時寥寥可數、在歐洲活動的好萊塢製作人。因為還要許久以後，等到民航客機進入噴射機時代，美國中產階級才負擔得起前往歐洲旅行，所以當時美國大眾只能透過電視神遊歐洲。雷諾茲便針對這個目標市場製作節目，打造出一齣熱門影集《外交陰謀》（*Foreign Intrigue*）。這齣劇從一九五一年播到一九五五年，還衍生出一部由勞勃·米契（Robert Mitchum）[216](#)主演的同名電影。該部電影得到很好的評價，但票房失利。畢竟在家就能免費看電視，何必買電影票呢？

雷諾茲邂逅費歐娜時，他正在製作一齣在英國拍攝的美國情境喜劇《迪克與公爵夫人》（*Dick and the Duchess*），由知名男星派屈克·奧尼爾（Patrick O'Neal）與英國邪典（cult）恐怖片女王哈澤爾·考特（Hazel Court）主演。雷諾茲屬於旅外美國人裡的極品，英俊、世故，懂得享樂，熱愛滑雪，還以衣著講究聞名，跟一身卡拉契尼訂製西服的男爵難分軒輊。

男爵和費歐娜離婚的整個過程，簡直像一齣以無所事事有錢人為主題的美國情境喜劇，或是堪比電影《費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217](#)。海里是在馬德里「卡斯提亞大道希爾頓飯店」（旅外美國人眼中的必訪景點）的蜜月套房參加雞尾酒會時，心平氣和地宣布離婚消息。至於離婚協議內容，海里付出的代價算是很低廉，即使仍高達百萬美元，但跟尼娜·戴爾拿走的財物相比，不啻是小巫見大

巫。費歐娜得到價值約百萬美元的珠寶、一幅哥雅（Goya）²¹⁸、一幅莫內，以及兩個孩子的監護權；海里當然有探視權，他也喜歡去看兩個孩子。而且，跟尼娜不同的是，基於夫妻一場的最後善意，男爵允許費歐娜繼續使用男爵夫人頭銜。

四年後，這位前妻竟幫男爵完成希臘式復仇，一位希臘船王因她而雞飛狗跳。那是一九六九年，費歐娜與亞里士多德·歐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的獨子亞歷山大（Alexander）相戀交往，成為媒體頭版新聞。亞歷山大比費歐娜小十六歲。他十二歲時與費歐娜見過面，深深為她的美貌傾倒，有哪個少年能忘懷全球最美麗的女人呢？到了十八歲，亞歷山大已經成長為一個可以贏得任何女人芳心的希臘男神，而他想要費歐娜的心。

年齡差距不是主要問題，而是歐納西斯希望兒子娶一位希臘女孩，最好是另一位希臘船王的女兒，無論如何，絕不可能是德國同行敵手的前妻，一個年齡比兒子大很多的超級名模。歐納西斯動用自己的巨大影響力，竭盡所能想破壞這段戀情，包括動員新妻子賈桂琳·甘迺迪一起挺身反對—話說，歐納西斯與賈桂琳的相戀早已引來一堆批評。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於一九七三年死於水上飛機失事，費歐娜不曾再婚。雷諾茲後來娶了一位匈牙利花蝴蝶，安德麗亞（Andrea）。不過，就在他忙於將一宗審理中的謀殺案改編為迷你影集時，她琵琶別抱克勞斯·馮·布洛（Claus von Bülow）。克勞斯是海里的朋友，也是一同享樂的夥伴，我因此有幸見到他和安德麗亞。她是個活潑、非常性感的女人，也是說故事高手。儘管她容貌美麗，但看在雷諾茲眼裡，恐怕怎麼也及不上他交往過的費歐娜。

我也見到了費歐娜，如今仍然與她保持往來。她依然是史上最出眾的絕色美女之一，秀髮豐盈如雲，容貌傾城傾國。在我還在考慮男爵的工作邀約時，她曾要求與我碰面，想給我一些良心建議。我跟她約在日內瓦會面；就在為我牽線這份工作的澤爾烏達齊的辦公室。百聞不如一見，可以說，與這位傳奇人物的會面也促成我對男爵說好；如果這樣出色的女人都能夠愛上男爵，我也可以。

說到男爵的幾次婚姻，他幾乎沒什麼空窗期。費歐娜在一九六五年出局，丹尼絲在一九六七年進門；男爵與她訂婚二十三天，那年十二月於盧加諾結婚。除了母親都是蘇格蘭人這點以外，費歐娜和丹尼絲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丹尼絲出生於一九四〇年，因此在格施塔德（Gstaad）的社交晚宴上遇見海里時，她已二十多歲。她想當模特兒，可惜身材太嬌小，但她非常性感，總是有人說她像碧姬·芭杜。芭杜被稱為「性感小貓」，而「藝術」是丹尼絲的代名詞。海里與她在一九八三年正式仳離，他在這段婚姻期間，總計買了超過八百幅畫，差不多是一年購入近百幅的驚人速度。

丹尼絲並非出生於藝術世家。她的母國巴西也不是藝術藏家群集之地，而要論高雅文化風氣，里約熱內盧比不上巴塞爾。丹尼絲在美國和歐洲先後讀過幾間時髦的淑女精修學校和女子學院，是海里歷任妻子當中學養最豐富、最有頭腦的一位。絕沒有人會稱她為書呆子，她完全不是溫室裡的花朵，還聰明得像隻狐狸。丹尼絲與她的姊妹、弟弟羅伯托，是那種全球到處跑的典型富家子女。他們周遊各地，和每一國的富豪都有交情，其中一些富人是藝術藏家，擁有的收藏裡不乏藝術精品。至於努力迎合這些富人需求的藝術經紀商，蕭圖姊弟也與他們相識。姊弟倆並非特別有文化修養，只因為出眾外貌和魅力而有一親藝術品芳澤的特權。兩人都走在潮流尖端，已近六旬的海里從他們的青春活力得益甚多，因此不覺得自己遭到利用。

海里會大買特買，也與丹妮絲打的算盤有關。他持續找克里斯波買畫，這位藝術經紀商跟羅伯托十分投契，也深諳如何利用海里的小舅子來促成交易；丹尼絲心中則有更宏大的計畫。她發現大師的藝術作品比其他種類的資產更具有增值空間，所以想盡辦法提高提森財產的總值，有朝一日可由自己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生於一九七四年）來繼承。

丹尼絲知曉海里有過三次失敗的婚姻，她絕不是盲目樂觀的人，認為他倆的愛情會永恆不變。丹尼絲很可能做過美夢，希望男爵將小亞歷山大培養成唯一繼承人，畢竟，只要是她夢想的事，哪一樣沒有

成真呢？這個新夢想自然也不例外，不是嗎？讓兒子一人獨得全世界數量最豐、品質最優秀的一批藝術珍藏，這是她所能給他最棒的遺產了。我也認識亞歷山大，他是一個害羞的男孩，或許被母親過度保護，但不時會給人意外驚喜。有一次，他大約十歲的時候，我和男爵一家來到克里姆林宮近旁的國家飯店。我們所在的列寧套房裡有一架大鋼琴，亞歷山大突然坐到鋼琴前彈了起來，儼然是少年版的范·克萊本（Van Cliburn）²¹⁹，看來提森家族的血液裡確實流著文化基因。

年輕又「酷炫」的丹尼絲和羅伯托一到紐約，自然是連流在新興的西百老匯區，而不是麥迪遜大道。然而，即使是麥迪遜大道也會求新求變。轉折點發生在一九七三年，蘇富比·帕克博內舉辦了史卡爾夫婦（Scully，兩人擁有一支名為史卡爾天使的計程車隊）當代藝術藏品拍賣會。從瓊斯、德·庫寧、沃荷、羅森伯格到紐曼等人作品，總計有五十件，總成交額高達兩百萬美元（約臺幣六千萬），創下全球新紀錄。這場史卡爾夫婦藏品拍賣，堪稱是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第一場拍賣「大事件」；普普藝術就此成為高雅又時髦的象徵，噴射機階層也意識到此類藝術品完全具有收藏價值。並不勢利的威爾遜眼見市場一飛沖天，實在是喜出望外。當然，如此爆炸性成長，全賴威爾遜自己埋設的「炸彈」。收購帕克博內數年以來，他在蘇富比新設了一個當代藝術部門。

藝術市場由商業主義掛帥，倒是深深冒犯了主要得益者之一：羅森伯格。他在麥迪遜大道拍賣場外舉著標語牌抗議，牌上寫著：史卡爾是貪財鬼。他感到憤慨的是，史卡爾和蘇富比賺進數十萬美元，但他們當初買一幅畫只花幾百元。不過，他與其他藝術家的行情很快就走俏，都變成生活優渥的有錢人。而若是必要，連自己母親都敢賣的克里斯波，只要有佣金賺就樂，不在乎自己賣的是羅森伯格還是雷諾瓦。在我到任時，男爵的現代藝術藏品數量已經夠豐富，足以供我為即將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舉辦的「現代藝術大師展」規畫精采內容。前往地球另一端，順便到他的綿羊農場轉一轉，一如之前出借五十七

幅古典大師畫作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時的那趟美國行，男爵也非常享受這趟紐、澳冒險之旅。

自從我在別墅的車道上首次遇見蒂妲以後，她很快就在男爵的生活裡占據關鍵地位，進而取代丹尼絲在公開場合「露臉」的職責。我認為，他們這些人對開放式婚姻的態度，可說非常「世故」或「歐洲風格」。倘若丹尼絲是一隻性感小貓，那麼蒂妲就是性感母獅；一隻不折不扣的大貓。我永遠忘不了兩人剛開始交往期間，海里剛好在雅典娜廣場飯店舉辦一場十二人午宴。周遭每個巴黎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蒂妲身上，她穿的裙子短到幾乎無法蔽體，我差不多以為她下半身只繫了一條皮帶。用餐前，一身黑袍的紀登神父（Father Guydon）揮動一本聖經，要求全桌人站起，接著念起一段長禱詞祝福所有賓客，餐廳裡的人莫不驚訝地瞪大眼睛，巴黎的饕客們肯定從來沒有見過瀆神的人與神職的人如此共聚一桌。

海里會結識蒂妲，是透過另一位大人物，世界上最成功的珠寶銷售員，曼菲德·霍洛韋茲（Manfredo Horowitz）牽的線。他是海瑞·溫斯頓珠寶在歐洲的主力軍，被大家暱稱為「弗雷德」。霍洛韋茲是波蘭裔猶太人、滑雪冠軍，在希特勒上臺後逃難到瑞士。在那裡，他靠斜坡滑雪的技能和吸引女人的魅力，變得幾乎和他的客戶（買寶石給妻子、情婦的有錢花花公子）一樣富有。因滑雪終年曬成的古銅膚色，和一頭異常蓬鬆的金鬚髮是弗雷德的正字標記。他在蔚藍海岸擁有一艘自己的遊艇，名為「鑽石D號」。他的特長和無與倫比的天賦，就是找到像蒂妲這般的女神，介紹給海里這般的男神，接著再賣珠寶給他們當作定情信物，而他當然從中收取銷售佣金；他是歐洲富豪名人圈的頂尖紅娘。

海里向弗雷德買過的頂級珍品，當屬那顆一百七十克拉的鑽石原石「和平之星」（Star of Peace）；海里要弗雷德將其切割、製成一顆大鑽石項鍊，送給丹尼絲，而後又把它取走，轉送給蒂妲。海里和丹尼絲長達三年的離婚官司中，這顆鑽石成為兩人激烈爭奪的目標。而最後贏家是蒂妲，她曾戴著此條項鍊，由漢姆特·紐頓拍攝了一組照

片。她只要出門必定戴著它。「你得有結實的脖子才戴得了呢。」蒂妲對我開玩笑。

蒂妲生於巴塞隆納，這個熱情如火的加泰隆尼亞女孩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生來就擁有的東西並不是金錢，而是雄心。她父親是一名工程師，雙親在她五歲時離異，她母親讓她上唱歌課、跳舞課，還到倫敦上英語課。以培養一個未來的選美冠軍來說，這是十足完善的教育。少女蒂妲在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與日後的法國版貓王，強尼·哈立戴（Johnny Hallyday）談過一段青澀戀曲。蒂妲十八歲那年，她母親為她報名參加加泰隆尼亞小姐選美比賽，她贏得優勝，隨後更摘下西班牙小姐后冠。她帶著這個頭銜繼續征戰世界各地，但在國際小姐選美比賽（三流賽事）排名季軍是她最好的成績。

蒂妲在環球小姐選美比賽未獲名次，但那次競賽讓她得以前往邁阿密海灘，並抓住許多名人的目光，包括鮑伯·霍伯（Bob Hope）[220](#)、狄恩·馬丁（Dean Martin）[221](#)和法蘭克·辛納屈。在一場雞尾酒會上，辛納屈對年輕的蒂妲說了一個鄙俗笑話，但她不熟英文片語，完全狀況外，是辛納屈的約會對象瑪麗蓮·夢露挺身「解救」她，斥罵他是下流老頭。

回到歐洲後，蒂妲開始接廣告拍攝工作，包括數家瑞士鐘錶品牌和其他產品。一九六二年，搭機前往蘇黎世途中，她驚喜地認出萊克斯·巴克。他扮演泰山之後，在好萊塢闖蕩受挫，改到德國發展倒是一鳴驚人，成為大明星（主演電視影集《海灘遊俠》的大衛·赫索霍夫〔David Hasselhoff〕也因異地發展而大放異彩）。蒂妲忍不住大膽走向這位前叢林王子，跟他索取簽名。她的勇氣獲得回報；兩人在一九六二年結婚，她成為巴克的第五任妻子。跟海里一樣，巴克幾任的妻子都是女神級，一位是千金小姐，後來三任則都是女演員，包括兩位知名女星：阿琳·達爾（Arlene Dahl）和拉娜·透納（Lana Turner）。蒂妲也有海里那種調皮的幽默感，她喜歡自嘲說當第五任妻子要比當第三或第四任來得好，因為你更有可能是最後一任。

先是非洲叢林泰山，再來是費里尼《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裡女主角安妮塔·艾克伯格（Anita Ekberg）的未婚夫，除了他身為演員出飾的經典角色以外，巴克還有更多面向。他出身於一個華爾街知名家族，讀過艾希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而後放棄學業闖蕩百老匯，然後是好萊塢。巴克和蒂妲結婚那時候，一下接到兩部德國電影（《嘉年華謀殺案》 [*Killer's Carnival*] 和《慢性死亡》 [*Die Slowly, You'll Enjoy It More*]，是他較不為人知的作品）邀約，算是最棒的結婚賀禮。由於在普林斯頓大學念的是建築，巴克親手設計了他們在吉羅納省（Girona）歷史小村瑪斯瑪那那斯（Mas Mañanas，意思是更多的明天）的新居。海里與丹尼絲大打離婚戰期間，他不時會到蒂妲的這處居所尋幽覓靜。

巴克一九七三年在紐約因心肌梗塞驟逝，蒂妲透過追求未盡的演員夢想來緩解悲傷。然而不知怎的，她擺脫不了B級電影的邀約。她的下一任丈夫是忙碌的委內瑞拉製片人，艾斯帕提可·山多尼（Espartico Santoni）。他最著名的製片作品是一九六三年的《卡斯提爾人》（*The Castilian*），卡司包括了他自己、弗蘭基·阿瓦隆（Frankie Avalon）[222](#)、凱薩·羅摩洛（Cesar Romero）[223](#)和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Broderick Crawford）[224](#)；往後則有《撒旦饗宴》（*Feast of Satan*）、《附魔者的女兒》（*Exorcism's Daughter*）等小眾作品。蒂妲於一九七五年嫁給山多尼，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畢生有七次婚姻）。兩人婚後，她在諸如《野獸的咀咒》（*Night of the Howling Beast*）這類低成本電影裡出飾小角色。

山多尼的夜總會事業做得比電影事業更有聲有色。他在馬貝拉擁有兩家店，一九八〇年代又在西好萊塢的男孩村（Boys Town）開設一家，取名為「艾斯帕提可」（Espartico）。後來蒂妲與山多尼的婚姻因男方重婚被宣告無效，他還因詐欺在牢裡蹲過一陣子。然而，蒂妲得以否極泰來，多虧了她的外貌和魅力。她穿梭在各個權力圈子裡，結識拉斯維加斯的賭業大亨柯克·科克萊恩（Kirk Kerkorian），以及

專做公司併購的英國人懷特勳爵（Lord White）、韓森勳爵（Lord Hanson），都是與提森男爵同等級的人士；然後她遇見了海里。

一九八一年，兩人透過霍洛韋茲牽線，在薩丁尼亞島（Sardinia）見面。蒂妲已和一名西班牙電影公關宣傳育有一子，名為博爾哈（Borja）。海里慨然接納男孩的舉動令歐洲所有八卦媒體都大惑不解。五歲時，博爾哈在第五大道的聖派翠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接受了豪華的受洗禮。海里的一些時髦朋友爭相要當他的教父、教母，包括超級富豪蓋蒂的兒媳婦安·蓋蒂（Anne Getty，她也是藝術藏家）、希臘投資銀行家亞歷山德·帕帕馬爾庫（Alexander Papamarkou），以及西班牙貴族暨西班牙國王的姻親，巴達霍斯公爵（Duke of Badajoz）；公爵也是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Prado Museum）主要展品的出借人。隔年，博爾哈獲得博內米薩—賽維拉此一別名，等到正式與丹尼絲離婚後，海里才收養他為兒子。博爾哈最終成為小男爵，因為對海里來說，愛和忠貞最為重要，而不是血緣。

海里非常迷戀蒂妲，她最終也得以理解他對藝術的迷戀。她怎麼可能理解不了呢？蒂妲取代丹尼絲成為海里出席活動的女伴，她可以看到他如何憑著藝術收藏得到宛如國家元首般的待遇。她是認識很多有錢人，但沒有一個是藝術收藏家。拜海里之賜，她見識到藝術是何等了不起的識別證與通行證，見識到它能發揮的力量、造就的差異，遠遠超過金錢或任何財產。海里和我一起去世界各地巡展時，她若是隨行，就可以親眼見證藝術品如何化身為最佳外交大使。隨著時間過去，股市崩盤，房地產市場（包括她家鄉西班牙布拉瓦海岸、太陽海岸的不動產）也一蹶不振，她眼看著藝術品不斷增值再增值，這小小奇蹟已足以讓她深深迷戀上藝術。

206 現代法國料理之父（一八四六～一九三五）。

207 法國傳奇女星，被譽為法國永遠第一美女。

208 美國電影演員，作品有《紫屋魔戀》（The Witches Of Eastwick）、《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等。

- 209 英國搖滾樂手；滾石樂團的主唱。
- 210 美國電影明星（一九〇一～一九六〇），最著名的角色是《亂世佳人》的男主角白瑞德。
- 211 巴黎著名的服裝設計大師（一九一四～一九八二）。
- 212 義大利費拉拉文藝復興時期畫家（一四三〇～一四七七），主要作品為教堂壁畫。
- 213 艾爾·葛雷柯（El Greco, 1541-1614），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畫家、雕塑師與建築師。他獨特的畫風在當代並不受到推崇，直到二十世紀才被公認是表現主義及立體主義的先驅。
- 214 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因心愛的女子不受王室認可，而堅決退位，以迎娶對方。而即位的喬治六世賜予他溫莎公爵的稱號。
- 215 美國抽象主義藝術家（一九三〇～二〇一〇）。
- 216 美國電影演員、作家、作曲家和歌手（一九一七～一九九七），在黑白電影時代，飾演了不少具代表性的角色，被視為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反英雄電影的先驅。
- 217 是一部有關三角戀愛、離婚又復合的喜劇電影，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是非常受歡迎的題材。
- 218 西班牙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家（一七六四～一八二八），曾擔任首席宮廷御用畫師，他對十九世紀法國繪畫的影響很大，被譽為古代大師的延續，現代繪畫的開創者。
- 219 美國著名鋼琴演奏家（一九三四～二〇一三）。
- 220 美國著名的演藝人員、喜劇演員（一九〇三～二〇〇三），也曾經在百老匯演出，並以音樂劇打開知名度。
- 221 美國歌手、演員、諧星和電影製片人（一九一七～一九九五），以看似輕鬆的魅力和自恃被暱稱為「酷王」。
- 222 美國演員、歌手。
- 223 美國演員（一九〇七～一九九四），是第一代飾演《蝙蝠俠》反派小丑的演員。
- 224 美國演員（一九一一～一九八六）。

第十四章 外交陰謀

身在藝術圈，你有機會遇見各領域的出色大人物，雖然不盡然是在某場藝術展覽開幕派對上，或在某幢豪宅裡，一邊大啖魚子醬，一邊和他們寒暄。我剛到法沃利塔別墅任職不久，還找不到定位，自認僅是一個穿卡拉契尼西裝的解說員時，有一天，守門的葡萄牙人打電話給我，說別墅入口處來了一個人，想要看看裡頭的收藏。那時候是冬天，別墅直到四月才會開放。「他說他叫霍克尼。」守門人對我說。「畫家（Painter）霍克尼嗎？」我問道。然後我聽到守門人詢問男人的聲音：「你是油漆工（painter）嗎？」霍克尼先生說是。「是油漆工（painter）霍克尼。」守門人回報。「讓他進來。」我吩咐他。守門人認為他是一個油漆工，放他通行。

至於我，面對這位偉大藝術家突然造訪，不由得欣喜若狂。他前不久還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為《魔笛》（*The Magic Flute*）設計舞臺布景。為了感謝我的精采導覽，他邀請我和伊莎貝爾前去觀賞首演，安排我們坐在最好的韋瓦第包廂（Verdi Box）。還有一次，海里興沖沖地給我看一封雷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來信，他從紐約來到瑞士，希望能參觀收藏。海里很遺憾當天不在，無法親眼見到寫出音樂劇《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的這位音樂天才，但大方地指定我代他善盡地主之誼。我滿懷期待，安排了國是訪問225規格的最高級接待。但是抵達的大人物完全不符合我在報章雜誌上看過的形象—頂著一頭不羈紅髮的指揮家暨作曲家。而他確實不是；他的確叫雷納德·伯恩斯坦，但此伯恩斯坦非彼伯恩斯坦。此人是一位熱愛藝術的穩重紐約律師。我像是被人用冷水一潑，興奮感消失得無影無蹤，不過律師伯恩斯坦獲得他畢生難得的參觀經驗。

我得以結識的另外兩位重要傳奇人物則確實是本尊無誤。他們是J·卡特·布朗（J. Carter Brown）226與菲利普·德·蒙特貝羅（Philippe de Montebello）227。除了從事外交工作，或者擔任汎美航

空的駕駛，否則世上大概沒有任何一份工作必須像我這樣全球走透透。我一直在路上，或者是在飛機上，陪伴海里去會見某位美術館館長或國家首領—即使多數時候，我無法分辨兩者的不同。

如果有人說美國缺乏本地貴族，卡特·布朗會是絕佳的反證。布朗是出身羅德島的美國貴族，布朗大學即是以其家族姓氏命名。他曾就讀私立格羅頓高中（Groton）、英國斯多中學（Stowe），然後進入哈佛大學，學業成績始終名列前茅。他就讀哈佛大學期間曾擔任男聲合唱團（Glee Club）團長，最後取得藝術管理碩士。提供此類學位的校所雖然仍寥寥可數，但已初露眉目，證明藝術確實能成為一門大生意，一如威爾森多年來孜孜矻矻的目標。

布朗也擁有紐約大學藝術碩士學位；曾在佛羅倫斯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中心（Villa I Tatti）實習，接受伯納德·貝倫森的指導；他的妻子則是保羅·梅隆（頂尖藏家及國家畫廊董事會會長）的姪女。然而，布朗並不需要這層裙帶關係來獲得工作，他的資格俱足。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古巴糖業大亨的千金，也是義大利貴族馬可尼侯爵（Marquis di Marconi，該家族是無線電報的發明人）的外孫女。因此，這對愛侶選擇在西敏寺成婚再合適不過。布朗喜歡海里，想要盡可能爭取更多他的藏品到國家畫廊展出。

菲利普·德·蒙特貝羅則是法國貴族版的布朗。他的父親是一名伯爵，但身為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228](#)的後裔才是他最獨特的血統，雖然以他文質彬彬的魅力，你永遠不可能想像到他有此先祖。蒙特貝羅與布朗年紀差不多，也讀過哈佛大學和紐約大學，畢業後隨即進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任職，在他的統領下，博物館規模擴張一倍，而且將展覽變成一門大生意。

除了海里以外，全球各大美術館館長熱切討好的另一位頂級收藏家叫阿莫德·哈默；我也在法沃利塔別墅和他見過面。哈默居住於洛杉磯，是石油業巨人「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的董事長。這麼說吧，海里有多麼「不喜出風頭」，哈默就有多麼自大，他

和妻子來到盧加諾時還帶著隨行攝影師。以哈默的收藏成就，他對藝術理應無所不知，但事實似乎不是如此。當我介紹一幅卡拉瓦喬（Caravaggio）[229](#)的作品給他看，他只回應說位於西林區、幫他修車的那家修車廠老闆也叫卡拉瓦喬，全名是喬·卡拉瓦喬。

沒有人能否認哈默的成就。他繼承父業成為醫師，雖然絕少執業，卻堅持要大家稱他為哈默醫師。他靠賣藥（藥廠製藥）在新成立的蘇聯賺進第一桶金，再和弟弟維克多（Victor）合力將一部分的藥錢變成油錢，最後則成為最高尚的錢—藝術錢。他們在五十七街擁有業界權威的哈默畫廊，哈默醫師很可能是諾頓·西蒙（Norton Simon）[230](#)以外，洛杉磯最頂尖的藝術收藏家。

海里喜歡建立關係，運用藝術發揮外交影響力，哈默則希望是由自己來結束東西冷戰，或者至少讓別人只提他的功勞。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座諾貝爾和平獎，那也是他一生中罕有的、幾個得不到的榮譽之一。海里（和我）花了將近一年籌畫與克里姆林宮的藝術交流展，而現在，布朗想要克里姆林宮出借給我們的展品，哈默醫師會來拜訪我們，就是希望能敲定合作事宜。當海里左右為難時，哈默提議出借他珍貴的一套達文西素描收藏給蘇聯，以換取他們將館藏借展到美國。他藉此舉贏得蘇聯館方的同意和報紙頭條版面，最後也是哈默收獲所有名聲，美國展覽目錄上甚至沒有出現海里的名字。

不管是否得到美名，為男爵工作期間，與蘇聯的這場交流展是我最感驕傲的時刻。這個構想是在一場晚宴上（何時不是晚宴呢）萌生的。蘇聯駐德國大使，一位熱愛藝術的共產主義黨員（何其少見啊），跟男爵提起普希金博物館（Pushkin）和冬宮博物館（Hermitage）裡藏有極為精湛的印象派畫作，大使順口說或許可以洽談合作，海里出借古典大師藏品到蘇聯展出，而蘇聯提供同等級的精采藏品給法沃利塔別墅。海里喜歡這類「互亮袋裡乾坤」的提議，於是立刻派我到蘇聯查看他們的底細。

我的調查任務還包含了「育嬰」，因為我帶著羅伯托·蕭圖、男爵與費歐娜的兒子羅恩（已是少年）同行。當時是一九八三年，戈巴契夫的改革還未發生，金融和各產業寡頭巨富尚未崛起，更沒有如今堪比沙皇規格的炫耀性消費。那裡沒有電話，自來水是棕色的，走廊裡瀰漫廉價消毒水的氣味，食物根本入不了口，甚至連羅宋湯也難以下嚥。唯一的好東西是魚子醬和伏特加，但我帶著一個未成年人，因此不敢放縱。況且我也得看緊羅伯托，以免他惹出任何事端——街上到處都有超級美麗的女人在做黑市換匯和性交易。在列寧格勒，我們倒是去了一處意想不到的未來風格「54俱樂部」——郊區一家工廠改裝的迪斯科舞廳。所有娛樂依法都必須要祕密進行；我能找到的幾支電話，肯定也都遭到竊聽。

在布列茲涅夫（Brezhnev）當政的那段期間裡，疑神疑鬼是生活常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我們看到的畫作是贗品。那時的東方、西方之間缺少信任，但我自信滿滿地勇往直前。我們的目標是兩位居住在莫斯科的紡織業巨頭所收藏的藝術品。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兩人在巴黎迷上藝術。且兩人都從事「布業」：謝爾蓋·史楚金（Sergei Shchukin）是一名布商；伊凡·莫洛佐夫（Ivan Morozov）是織布商。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畫作還遭學院沙龍拒絕的那個年代，兩人已經接受此一新的繪畫風格。

史楚金成為馬蒂斯的密友，馬蒂斯還替他裝飾了莫斯科宅邸。就如同海里的習慣，史楚金喜歡一連幾天獨坐在辦公室裡，欣賞他的最新戰利品。史楚金的朋友都「看不懂」馬蒂斯，特別是日後名聞遐邇的一些大幅作品，但史楚金不為所動。「一個瘋子畫了這些畫，一個瘋子買下它們。」他曾說。兩人採買的習慣也跟海里一樣，都是大量買入。不過莫洛佐夫並不像海里一般樂於分享，他把龐大的收藏都留給自己看。一如史楚金對馬蒂斯的支持，莫洛佐夫贊助的是塞尚。兩位布商都是俄國革命的受害者。布爾什維克奪取他們的收藏以後，兩人流亡巴黎。但革命分子倒是准許這些畫作在莫洛佐夫已充公的豪宅裡展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史達林以「資產主義、世界主義」為由關

閉了美術館。在共產統治下，涉及資產、世界的，都是叛國罪行。而從我此行所見所聞來判斷，這兩樣特質在這個國度裡依然是犯罪。如今兩人的藝術收藏品分散在普希金博物館、冬宮博物館兩處。

我們在莫斯科的東道主，伊蓮娜·安東諾娃（Irina Antonova）女士，堪稱蘇聯藝術圈的女皇。她時任普希金博物館館長，爾後又繼續在職五十年，二〇一三年才以九十一歲高齡退休。她是於一九六一年八月由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指派接任這個職位。她年輕時，曾與鋼琴家李希特（Stanislav Richter）[231](#)交往，後來在館內創辦以他為名的音樂節。她能說流利的英語、法語、德語，或許還懂更多語言。如果你見過她，就不會相信帝國主義已在蘇聯死去，她宛如凱薩琳女皇一般剛強、堅毅。

我們也去了列寧格勒（現稱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由館長波里斯·皮亞托夫斯基（Boris Piotrovsky）親自接待我們。皮亞托夫斯基是一位專攻高加索地區（Caucasus）、賽西亞（Scythia）和努比亞（Nubia）的著名考古學家，曾協助分析圖坦卡門（King Tut）的陵墓。我們大概也得是考古學家，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冬宮的史楚金、莫洛佐夫收藏品。皮亞托夫斯基在一九九〇年去世後，由他的阿拉伯語學者兒子米金（Mikhail）接任了館長職位，顯示出是裙帶關係主宰一切，而不是共產主義精神。

在安東諾娃女士與皮亞托夫斯基博士許可下，我在館內的陰暗大廳和地下室發現許多「頹廢」畫作，而我能夠「解放」它們，帶它們飛向法沃利塔別墅的陽光和自由。當貨箱運抵時，我萬分緊張，太多位疑神疑鬼的專家警告過我，說蘇聯人會試圖欺騙我們，送來贗品。但我檢證這些作品的結果證明，那種恐慌心態應該通通被扔在莫斯科；所有畫作都是真品。為期四個月的展覽是瑞士史上最成功的藝術展出，近五十萬遊客前來別墅欣賞，而哈默醫師承辦的美國展出，更吸引數百萬參觀人次。

我們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宴會來慶祝展覽閉幕。我們在別墅一樓安排了晚宴桌，四面牆壁懸掛著高更畫作。對於自身的匈牙利血統，海里最喜歡的部分就是吉普賽音樂，因此，我們雇了一隊很受歡迎的吉普賽樂團，團長是表現狂野的小提琴手舒茲醫師（Dr. Suscz）。看著海里神采奕奕地隨著舒茲醫師拉奏的瑪祖卡舞曲跳舞，你根本猜不到他運動方面不太在行；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貴族從一本正經的生活中解放出來，像匈牙利農民一樣跳舞，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只擔心舒茲醫師不斷來回滑動的琴弓會意外捅破幾幅貴重的高更畫作，要是遇上史帝夫·韋恩那樣的災難，搞不好會與蘇聯掀起國際風波。所幸舒茲醫師能恰當控制熱情，不用勞煩倫敦的勞伊德保險公司來理賠損害。在晚宴上，海里醉醺醺地向來訪的蘇聯大使敬酒，信誓旦旦表示，如果柏林圍牆倒下，他會很樂意將自己的全部藝術收藏捐給蘇聯。那時絕對沒有人想得到共產主義會有倒臺的一天，幸好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倒下時，沒有人提醒海里他那晚的承諾。不過，他透過藝術連結起東、西方，也是促使蘇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重要一步。

由於這場蘇聯印象派館藏展覽（Russian Impressionist）非常成功，海里積極回應我的新點子：和出版商邁爾康·富比士（Malcolm Forbes）²³²合辦法貝熱彩蛋展。富比士剛買下他的第十一顆法貝熱彩蛋，克里姆林宮也不過擁有十顆。富比士是那種棘手客戶，他除了喜愛藝術，也熱愛熱氣球飛行。因此，我有一個構想，何不按照富比士新購入的法貝熱彩蛋外型來設計一顆熱氣球？富比士和海里都喜歡這個點子，但有兩個困難需要克服：第一，海里在英國找到的熱氣球製造商報價太高，約在三萬美元（約臺幣九十萬），就算海里這種億萬富翁也覺得太貴。但是富比士不覺得；這位出版商雖辦了一本商業雜誌，但絕不是個精打細算的人。我試著跟他的兒子吉普（Kip）談，但富比士絲毫不動搖，沒有氣球就沒有展覽。我不得不屈服，我不能讓男爵被人視為小氣鬼。

第二個困難在於，富比士希望海里跟他一起坐上熱氣球，這是海里斷然無法接受的事。最終的折衷辦法是用很長的繩索將熱氣球固定在地面上，男爵會坐在熱氣球裡往上飛、往上飛，但是不會飛走。回到地面後，男爵和富比士當時的情人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閒聊以平撫暈眩。沒有人比這位跟女明星約會、騎哈雷機車、搭乘熱氣球飛行的富比士更具男子氣概了。因此，當我前去拜訪他在紐約的雜誌總部，他展示收藏的十九世紀男子裸畫像給我看時，我真是驚訝得合不攏嘴。

男爵與蒂妲的戀情不只有他單向付出，蒂妲樂於介紹海里認識幾位曾追求她的富豪，因此他培養出一些奇特的友誼。一位是蒂妲的朋友柯克·科克萊恩—繼霍華·休斯之後，拉斯維加斯最有權勢的人物。依我看，海里和科克萊恩除了都有錢、都喜歡蒂妲之外，大概只有一個共同點：流言盛傳他們染頭髮。再說到接待客人的排場，一九八二年，沃夫甘·帕克（Wolfgang Puck）²³³在日落大道開設了「史帕果」（Spago）餐廳，科克萊恩邀請海里、蒂妲和我前往用餐。繼「布朗德比」（Brown Derby）餐廳之後，洛杉磯當地終於又出現了一家讓好萊塢明星趨之若鶩的高檔星級餐廳。在「史帕果」那裡，沒有任何明星（裡頭有很多明星）能比科克萊恩—瘦削的亞美尼亞裔前飛行員²³⁴—拿到更好的座位，得到更殷勤的服務。科克萊恩大方地讓我們搭乘他的噴射機飛到拉斯維加斯，入住他的美高梅大飯店（MGM Grand）。在飛行途中，我們想用電話競標一幅貝克曼的畫，但收訊相當糟糕。於是科克萊恩吩咐機長將飛機降落在最近的機場，讓我們可以好好地玩藝術遊戲。降落後，我們總算連絡上蘇富比，卻發現沒有人出價競標此畫，它將會被「買入」（表示拍品未售出的拍賣術語）；我們終究決定不要出價。接著，一行人再次啟程前往拉斯維加斯。這就是噴射機階層玩藝術遊戲的方式。

那些來自蘇聯的印象派畫作有多美麗，男爵與丹尼絲的離婚過程就有多醜陋。只因為他「出借」給她的那些珠寶，他現在想要索回，海里向丹尼絲求償八千萬美金（約臺幣二十四億）。男爵甚至一度切

斷戴萊斯福特宅邸的電話，讓丹尼絲無法打電話給任何人。還有一次，他指控丹尼絲帶了一卡車的藝術品、珠寶，企圖潛逃到瑞士，以致她在列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首都瓦都茲（Vaduz）遭到逮捕。羈押幾天後，列支敦斯登當局才釋放丹尼絲。海里想保護自己的資產不落入丹尼絲手裡，下一步就是建立一筆蕭圖百慕達信託基金，由他的長子格奧爾格（Georg）掌管。我們都叫格奧爾格「小海里」，他就像迷你版的男爵。

這對父子即使外型神似，但其實截然不同。小海里不愛交際，海里則外放。格奧爾格只愛生意，不喜歡男爵愛的吉普賽風瑪祖卡舞曲；他收集藝術品，但只收瑞士藝術家的作品；他住在摩納哥一幢樸素公寓，搭商業客機旅行，隨身只攜帶一個小公事包；他從來沒試圖過著父親那樣活躍的社交生活。總之，他是他父親的完美財政總管，是抵禦丹尼絲貪婪野心的屏障。理論上，她的繼任者蒂妲，也在他的防範名單裡。沒有人料到，二十年過後，這個百慕達信託會成為百慕達金三角，因為蒂妲，提森家族陷入貴族史上數一數二激烈的家族糾紛，數以百萬計的美元不斷流入律師口袋。

第二代裡最有乃父之風的，當屬費歐娜生的女兒弗蘭西絲卡。人稱「翠西」（Chessie）的她，熱情開朗，過著派對生活，是「搖擺倫敦」時期的知名人物（那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她約二十歲，而我剛開始為男爵工作）。她曾就讀甫開始招收女學生的羅西學院，但中途輟學。該校是瑞士最頂級的私立學校，校友中不乏王室（通常已仳離）的小孩。羅伯托在一九六〇年代也讀過該學院，但因為毀壞校園的一座噴泉而慘遭退學。

翠西放棄了瑞士，回到她母親所在的倫敦，進入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就讀—日後許多服裝設計師史黛拉·麥卡尼、約翰·加里亞諾（John Galliano）²³⁵和亞歷山大·麥昆²³⁶都出身此校。她很快成為那個年代的芭黎絲·希爾頓，出入毒品氾濫的迪斯可舞廳，恣意地袒胸露臂。科芬園的華麗搖滾舞廳「閃電戰」（Blitz）即是她最愛流連的地點之一，她在那裡結識了老闆史帝

芬·史奇（Steve Strange）[237](#)，進而開始交往。「閃電戰」客群包括喬治男孩[238](#)、大衛·鮑伊、彼得·湯森（Pete Townshend）[239](#)和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240](#)。只有最後一位會是法沃利塔別墅歡迎的座上賓。翠西、史帝芬、安德魯王子、他的女星女友庫·史塔克（Koo Stark，曾拍過三級片）曾為了逃避狗仔隊，前往羅納威犬守護、記者絕對進不去的戴萊斯福特宅邸度週末；他們也和林哥·史達（Ringo Starr）[241](#)、芭芭拉·巴赫（Barbara Bach）[242](#)飛往印度玩大象馬球。

史帝芬·史奇是挺特立獨行的類型。他是公開的雙性戀，在崇尚中性美的那個時代，是非常合宜的事；他是一個海洛因成癮者，也挺符合當時的時代氛圍。然而翠西就像海里，不會對人妄加判斷。畢竟，誰能比海里的第二任妻子尼娜·戴爾更古怪？她的怪癖說不定還是撩勾海里的春藥。翠西也像她母親一樣，突然迷上演戲，後來跟麥克·道格拉斯談過一段情。不過，最終，她的心歸屬於爸爸和藝術，她收集的是當代藝術，也成為極了不起的收藏家。她比我小七歲，在我看，她是整個提森家族裡唯一的「當代」成分。儘管我外表看來傳統，但翠西猜出我的內心是華麗搖滾客，我們成為時常同行的旅伴，保持了數十年的好交情；沒有人比她更有趣了。翠西和蒂妲並不親密，但她和丹尼絲、羅伯托也不是好友，她和羅伯托的共同點只有：對新藝術的眼光精準。

蕭圖姊弟終於消失，蒂妲在一九八五年正式成為男爵夫人，從此，我們的旅行次數、藝術品採購數量也飛快暴增，以致男爵的會計李卡多·古契蒂（Riccardo Guscetti）忙得焦頭爛額，光是處理男爵開出的買畫支票款項，就足以讓他煩惱到腦中風。男爵成為跳票賴帳的人，怎麼想都荒謬可笑，但總帳目不會說謊。他還有數百萬美元未付，跟債權人拖時間是有失體統、不符男爵身分的事。古契蒂主張賣掉多幅小作品，但是海里愛他所有的藏品（可能比愛孩子更多），他無法捨棄任何一件。況且，他是億萬富翁，為什麼要擔心現金流這種小事？

我們努力做了一些調整，雖然這些仍是王子、而非凡人的節約方式。例如：我們在東京大倉久和飯店裡，用電話競標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的一幅重要高更作品。海里和蒂妲都穿著浴袍，吃客房服務送來的早餐，而我們的競拍對手傑米·奧茲·帕提諾（Jaime Ortiz-Patiño）則是身在西班牙的索托格蘭德（Sotogrande）。這位玻利維亞「錫王」的孫子，比太陽王路易十四更富有，他從事高爾夫球場開發，熱衷收集高爾夫球和橋梁紀念品。他也收集藝術品，他和海里都不是崇尚節儉的人。然而，近來出現一些合資標畫的案例，在一場紐約糖業大王哈弗梅耶（Havemeyer）藏品拍賣會上（拍品件件精采絕倫），諾頓·西蒙與蓋蒂信託公司合作標下一幅竇加的粉彩畫。因此海里和傑米決定要和平，不要戰爭，兩人都不抬高價格。他們將以兩年半為週期，輪流持有這幅高更。最後我們以四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億三千五百萬）標到這幅畫作，並以慶祝香檳結束當天的早餐。五年後，傑米決定出售自己的持份，海里以兩千兩百萬美元（約臺幣六億六千萬）買下整幅畫的所有權。但是，因為海里是共同持有人（其中一千一百萬美元歸他，約臺幣三億三千萬），而當初他只花了兩百二十五萬美元（約臺幣六千七百五十萬），所以這筆交易划算得就像搶劫。

然而，得有幾百筆這類好交易才足以打平米契蒂帳本上的數字。意氣風發的海里又跟盧西安·弗洛伊德訂了第二幅肖像。蒂妲說畫上的海里看來足足老了二十歲，此一批評倒是切中事實。為了表明自己有多厭惡那幅畫，蒂妲提起英國國會委託現代藝術家格雷厄姆·蘇瑟蘭（Graham Sutherland）²⁴³繪製邱吉爾肖像的故事。蘇瑟蘭的想法是讓邱吉爾看起來更「真實」，但更想要傳奇偉人感的邱吉爾極討厭這幅肖像，他形容這幅畫「充滿惡意」，而他的妻子克萊門蒂娜（Clementine）對它更是深惡痛絕。

在國會殿堂，邱吉爾以最冷淡的讚美來反諷這幅肖像，稱之為「現代藝術的出色傑作」。該幅肖像原本應該被懸掛在國會，這是訂製它的初衷，但克萊門蒂娜將之帶回查特韋爾莊園（Chartwell）並燒

了它。蒂妲揚言要效法克萊門蒂娜的暴力處理法，與此同時，她委任一名西班牙畫家馬卡隆（Macaron）繪製另一幅男爵肖像。儘管弗洛伊德畫裡的海里有著長得不可思議的手指，看起來就像老鷹的爪子，但我碰巧很愛他的作品，別燒它，我懇求海里開恩。我提議帶走這幅畫，甚至打算買下，但他不讓我掏錢。

相反地，男爵將這幅畫出借給我，我先是將它掛在我們的臨湖小屋，然後又帶著它搬遷到我們在日內瓦郊外的新家。蘇富比每年會對男爵的收藏品做估價，包括這幅弗洛伊德，它的價格一再攀升，當攀升到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千五百萬）的時候，我決定把這幅弗洛伊德移到我在日內瓦的辦公室，跟我們荒郊僻野的住所相比，那裡會有更多安全保障。這幅畫就掛在我的辦公室牆上，是我一生中觀看次數最多的一幅畫；我對它愈來愈有感情。不幸的是，蒂妲想焚毀的這幅畫很快增值到上百萬美元。「我想我開始喜歡它了。」蒂妲狡黠地一笑。後來，她設法從我這裡取回畫作，當然，是最和善的方式。但蒂妲不曾拿到它；她可能改變心意，但海里永遠不會。

在我為海里工作期間，底特律地產大亨阿弗烈·陶博曼也成為他最喜歡的一位新朋友。舊世界男爵和新世界購物商場大王，這是一對多麼奇特的組合，但是海里就像威爾森，很享受新事物帶來的衝擊。我們曾為底特律朋友亨利·福特和人稱「大弗」的陶博曼，在法沃利塔別墅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方塊舞宴會。這位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購物中心大王，娶了一位前以色列小姐茱蒂（Judy）為妻，她能說多國語言，專精程度足以及在聯合國擔任最出色的翻譯官。茱蒂曾經在佳士得拍賣會場工作，擔任珠寶展示員或說「展場女孩」（跟拉斯維加斯的表演女郎不同）。她還拍過一幀手持鑽石項鍊的經典照片。不久以後，展場女孩將成為佳士得勁敵的老闆夫人。因為在一九八二年，陶博曼以「白衣騎士」（White Knight）[244](#)之姿挺身而出，解救蘇富比免遭兩位紐約投資客馬歇爾·柯根（Marshall Cogan）、史蒂芬·史威德（Stephen Swid）惡意收購。威爾森於一九八四年在巴黎去世，死於

糖尿病，享年七十一歲。我自己相當震驚，因此可以想像蘇富比公司如何因他的死亡陷入動盪。

為海里工作以後，我不是那麼常見到威爾森。我這份工作是嫉妒心最重的情人，儘管如此，每逢要下決定的時候，威爾森總在我的腦海裡。彼得會怎麼做？彼得會怎麼處理？那些問題都是指引我方向的明燈。一九八〇年，彼得才六十七歲就從蘇富比退休，這是我無法理解的決定。彼得就是蘇富比，至少他代表了現代的蘇富比。但是他顯然熱愛藝術勝過公司，他樂於棲身法國南部，在克拉瓦利城堡照看他的花園、繪畫藏品和古董。不過，他仍然與蘇富比保持熱線聯繫，直到陶博曼接手公司以前，蘇富比在一切大大小小事務上，都十分仰賴他的智慧（我也是）。

我前去倫敦參加追思會，與彼得做最後的道別，內心非常難過。在龐德街不遠處的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裡，貴族名流、藝術界人士都前來向這個改變蘇富比（和我）的男人致意、一起吟唱讚美詩。事實上，在教堂聚集的這些人，幾乎都是蘇富比每場藝術拍賣盛會的蒞臨嘉賓。威爾森當初退休時，任命親戚大衛·威斯特摩蘭勛爵（Lord David Westmoreland）接替他的位置。勛爵甚至比威爾森更老派，光看外表（多麼光鮮亮麗的一個人），絲毫感覺不到像他表親那般標新立異的特質。

主持儀式的是一名貴族，傑利柯勛爵（Lord Jellicoe），其父親是著名海軍上將、戰爭英雄暨突擊隊隊員，也是英國最後一位第一海軍大臣（蘇富比多麼愛海軍上將啊，從員工到員工家族盡是他們的蹤影）。不過，傑利柯勛爵也是大英帝國日落西山的象徵。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和蘭伯頓勛爵（Lord Lambton）遭揭發為老鴿諾瑪·列維（Norma Levy）的客戶。傑利柯勛爵不得不辭去英國上議院的領導職。那是自普羅富莫事件（Profumo Affair）[245](#)以來，英國最大的性醜聞。看來蘇富比似乎是想收買上議院的人心，卻先被購物商場大王收買了。

有傳言指出，陶博曼之所以會買下蘇富比，是為了報復那些勢利眼英國人，他們總是將他攆出拍賣會場。海里跟勢利八竿子打不著，陶博曼唯一能責備的對象只有我了，雖然要辦舞會，我在歐洲卻找不到可以演奏美國鄉村音樂的正宗方塊舞樂團。儘管海里很愛舒茲醫師和他那群吉普賽小提琴樂手，可是這次匈牙利人做不來。為了證明我足智多謀（並保住我的工作），我打電話給德國海德堡的美國陸軍基地，總算找到一個真正的美國方塊舞樂團，安排他們搭軍用運輸機前來盧加諾。大弗和茱蒂，海里和蒂妲，四人跳了一整晚方塊舞。我本來以為兩位選美皇后可能會相談甚歡，培養出好情誼。但茱蒂有書卷氣，蒂妲具世俗氣，兩人就像油和水，絕不相容。

大弗一接管蘇富比，就延攬海里加入顧問委員會。其他委員都是一時之選，包括底特律汽車大亨麥克斯·費雪（Max Fisher）、杜林汽車大王吉亞尼·阿涅利、《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彼得夏姆子爵（Viscount Petersham）、巴達霍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Badajoz，西班牙國王的姊姊）和安·蓋蒂（她和巴達霍斯公爵夫人是蒂妲兒子博爾哈的教母），以及西武百貨集團總裁堤清二（該百貨公司舉辦的藝術展，催生了日本一九八〇年代的印象派熱潮）。委員會每年兩次的會議總是在富麗堂皇的場地舉行，例如：我曾陪同男爵參加在弗里克收藏館（Frick Collection）大廳進行的正式晚宴。在那些場合，我很少聽到大弗談論藝術，他總是一派冷淡，直到有人聊起空間（space）的話題。

這裡說的不是土星和天王星那種「宇宙空間」，而是諸如購物中心交通流量與商店配置的空間規畫。沒有人比大弗更專精這個領域了，他是購物商場的愛因斯坦；是創造滾滾人流的巫師。海里正打算擴建法沃利塔別墅，建造一座新館來容納他不斷增加的收藏品，他指派我辦一場廣邀著名建築師的競圖。想到這是打造一個終極完美藝術展示櫥窗的機會，大弗深受吸引，他興高采烈地拿出筆和紙，運用購物商場的規畫原則，替海里畫出夢想空間。我注意到他是用左手畫出那些大氣揮灑的線條，我畢生見過的天才裡，絕大多數都是左撇子。

就在大弗與海里的友誼剛萌芽的這段期間，我陷入了極度尷尬的處境，因為蘇富比連絡我，要我「回家」。第一通電話是大弗的執行長邁克爾·安斯利（Michael Ainslie）打來的。他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田納西州人，講話帶美國南方特有的拖長音，擁有哈佛MBA學位。安斯利老是讓我聯想到大布希。他曾是房地產開發商，也曾於「歷史保存國民信託」組織擔任主管職。安斯利不是只看數字的人；他懂得處理文化。他的魅力打破歐洲人的刻板印象：美國商人都是一群牛仔暴發戶。大弗也扛著別人對他先入為主的這種偏見，得盡力去破除它。不過，就算世界上全部最有魅力的人士都集合在一起說服我，也無法讓我離開男爵，至少接到電話的當下，我是如此想的。

安斯利堅持不罷休。是蘇富比給了我教育和職業的起步，沒有他們，我不可能結識男爵，因此斷然拒絕他們是忘恩負義的行為；不親自到紐約聽聽他的說法，就拒絕邀請，也是無禮之舉。因此我飛去紐約，雖然搭的不是協和客機，那是海里「那階層」的代步工具。正陷於財務困難的蘇富比遠遠不只是撙節刻苦而已，他們把我安置在卡萊爾飯店（Carlyle），送我到新任財務長迪迪·布魯克斯（Dede Brooks）上東區的家裡晚餐。不僅如此，蘇富比出於成本考量，還將總部搬遷到陌生的約克大道（那幢現代建築遭大家嘲笑是「人民宮殿」）。在迪迪家的那頓晚餐，「只聊淨利」的美國人風格，讓我迅速了解到，自從我離開以後，蘇富比改變了多少，而且改變得多麼快。

迪迪·布魯克斯是個精力充沛的女郎，身材高、穿著得體低調，看來熱愛運動。如果有人想將迪迪的故事改編為電影，女王氣質的海倫·米蘭（Helen Mirren）會是最適合扮演她的人選。迪迪與喬治·布希畢業自同一所學校（耶魯大學），但她大概相當輕鬆就擠進長春藤窄門。她的丈夫也衣著優雅，熱衷運動，我記得是在金融界工作（哪個住在上東區的人不是呢？），但他幾乎沒讓我留下任何印象。畢竟迪迪的氣勢驚人，她主導談話，大概用一百萬個問題轟炸我，而我壓根不記得任何一個問題。

蘇富比的拍賣師羅伯特·沃利（Robert Woolley）也在場，為整場的商務會談適時加入一點輕鬆調劑。他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即是在自家的宴會上，肩上帶著一隻鸚鵡（就像獨腳海盜約翰·西爾法〔John Silver〕）四處走動。沃利是英國人，另外兩名座上客，蘇富比的夫妻檔：印象派部門主管大衛·納許（David Nash）和當代藝術部門主管露西·米歇爾·英尼斯（Lucy Mitchell-Inness）也是英國人。我認為這是刻意的安排，好讓我感覺更「賓至如歸」（有歐洲人作伴）、更自在。但是變化再清楚不過：蘇富比的重心已經明顯轉移到大西洋這一端，公司氣氛也變得美國化。

然而，蘇富比還是蘇富比，安斯利愈是對我緊追不捨，我愈明白，這是我無法拒絕的工作邀約。我真正想念的是拍賣臺，根據安斯利跟我洽談的職位，我會得到上拍賣臺的機會，這是在男爵這裡無法做的事。我再次陷入哈姆雷特式的猶豫，也意識到，基於開誠布公和友誼（我感覺自己是一個瘋狂大家族的一分子）考量，我可以諮詢的最好對象就是海里。他一如以往親切，告訴我，我應該依照我想要的職業生涯，去做最佳的選擇，他絕不會阻礙我的這個黃金機會。而我的首席顧問，聰明的伊莎貝爾，她曾勸我大膽離開蘇富比，現在也建議我大膽回去。

出乎我意料的是，特地來洛桑找我商談的安斯利，實在非常慷慨。我將以瑞士區主席的身分重返蘇富比（尤格·威勒已退休），並出任歐洲區（總部設於日內瓦）總經理。職銜聽起來比工作本身更堂皇，但在一個講求形象的行業，宏偉氣勢非常重要。另一個美妙的特別條件是，安斯利同意讓我每週為男爵工作一天。如果我可以魚與熊掌兼得，那麼蘇富比也想分杯羹。

我們交涉過程唯一陷入膠著的地方，就是我要求擁有一支手機。在一九八六年，一支手機就宛如詹姆斯·龐德電影裡的道具，不是史蒂夫·賈伯斯設計的那種輕巧機型，而是巨大、笨重的玩意兒，大多是執法人員，也許還有一些情報員在使用。在蘇富比力行節約的這個時期，沒有做白日夢的餘地。我試著解釋說，這不是要求坐協和客

機，對於一個幾乎時時在路上的人來說，手機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溝通工具。我試著用電影《如果今天是星期二，那麼一定是在比利時》

(*If It's Tuesday, This Must Be Belgium*) 來說明我的移動有多頻繁。最後安斯利讓步，但我得把這個低科技的龐然大物裝在一個巨大手提箱裡，帶著它跑遍歐洲大陸，看起來就像一個旅行推銷員。

就在我即將把命運封印在蘇富比之際，命運對我開了一個大玩笑。海里和蒂妲去紐約參加蘇富比顧問委員會的宴會，問題是，對他們來說，那根本稱不上一場宴會。我半夜在盧加諾接到海里的來電，他已喝醉，氣沖沖地抱怨他和蒂妲坐在晚餐桌最差的位置，靠近一扇不斷開闔的廚房門。他想退出顧問委員會，還打算這輩子再也不跟蘇富比打交道，他的基金會要永遠把蘇富比列入拒絕往來戶。總而言之，蘇富比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結論就是，我也不得與他們有任何瓜葛；我展望的輝煌拍賣生涯霎時間化為雲煙。

我整個下半夜都在為難地搜索枯腸，草擬給安斯利的「婉拒」說法，但我還沒打電話給安斯利，又接到海里的來電，他提也沒提前一晚的事。對我來說，那就像是一場噩夢，讓我聯想到卓別林《城市之光》(*City Lights*) 裡的笑點。劇中的流浪漢結識一個喝醉酒的百萬富翁，富翁夜裡喝醉時很喜歡流浪漢，但隔天早晨清醒後完全翻臉不認人。謝天謝地，我終究能打包借來的弗洛伊德畫作，準備回到日內瓦和蘇富比。

我其實不需要一幅肖像來記得男爵。我之前努力尋覓一位建築師，準備重新設計沃利塔別墅，以便容納我們七年中買入的大量藝術品，但此計畫因瑞士的官僚制度以及政府力行儉約而一波三折。海里認為，既然他的藝術收藏吸引了許多觀光客來到盧加諾，應該由瑞士政府支付擴建費用。瑞士當局斷然拒絕，這一巴掌搥得海里無比心痛，他公開宣布，只要任何一國能對他提供禮遇和尊重，他會將所有收藏搬遷到那個國家。此舉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國際競爭，大抵是需要出動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246](#)、黎胥留 (Richelieu) [247](#) 和梅特涅 (Metternich) [248](#) 三位外交家斡旋的程度。總之，男爵人生中規模最

大的一次搬遷，也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藝術品搬遷行動，就要展開。

-
- 225 意指兩國國家元首之間的正式外交訪問，屬國家最高規格的外交交流。
- 226 當時的美國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館長（一九三四～二〇〇二）。
- 227 當時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館長，任職三十一年，以七十二歲的高齡退休。
- 228 法國貴族及作家（一七四〇～一八一四），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
- 229 義大利畫家（一五七一～一六一〇），對巴洛克藝術影響深遠，甚至被譽為啟發現代繪畫的人。
- 230 美國富豪實業家及慈善家（一九〇七～一九九三），更是數一數二的收藏家，並以他的收藏成立了諾頓·西蒙藝術博物館。
- 231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俄國鋼琴家（一九一五～一九九七）。
- 232 時任《富比士》雜誌發行人（一九一七～一九九〇），是創辦人B·C·富比士的兒子。熱愛收藏，房屋、遊艇、藝術品、摩托車、法貝熱彩蛋，都在他的收藏之列。
- 233 美國知名主廚，十多年來為奧斯卡金像獎晚宴掌廚。
- 234 在成為賭城大亨之前，柯克曾是拳擊手，也曾在二次大戰期間駕駛戰鬥機。
- 235 英國時裝設計大師，曾獲頒英帝國司令勳章。
- 236 英國服裝設計師（一九六九～二〇一〇），風格大膽的創意鬼才，也是最年輕的「英國時尚獎」（British Fashion Awards）得主，曾任古馳創意總監。
- 237 除了是搖滾舞廳老闆，也是一九七〇、八〇年代樂團Visage的主唱，被視為英國新浪漫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 238 陰柔的打扮為其標誌，樂隊Culture Club的靈魂人物，是一九八〇年代英國新浪漫時期最具號召力的流行偶像。
- 239 英國天團「誰」（The Who）的吉他手。
- 240 英國王室成員，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和王夫的次子，一九八六年獲冊封為約克公爵。
- 241 披頭四的鼓手。
- 242 美國女演員暨模特兒，曾在〇〇七系列電影扮演龐德女郎，為林哥·史達的妻子。

- 243 英國藝術家（一九〇三～一九八〇），以玻璃彩繪、織品彩繪、版畫及肖像畫著稱。
- 244 當公司遭到惡意併購時，請友好的第三方出面收購解救；此一友好第三方即為白衣騎士。
- 245 發生於一九六三年的英國政治醜聞，時任陸軍大臣的約翰·普羅富莫和歌舞演員克莉絲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發生婚外情。醜聞爆出之後，普羅富莫第一時間卻向下議院撒謊，後又承認並辭職。
- 246 義大利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官（一四六九～一五二七）。著有《君主論》一書，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另一著作《論李維》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
- 247 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的樞機（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在三十年戰爭時，透過外交手腕為法國爭取了相當大的利益，甚至為路易十四的興盛打下基礎，因此又被譽為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 248 奧地利外交家、政治家（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十九世紀發展均勢外交的重要人物之一。

第十五章 一槌在手

我重返蘇富比日內瓦辦事處的歷程，就跟我初到法沃利塔別墅一般充滿艱辛。正如桑德爾·伯克斯並不樂見我來接替他，我在蘇富比的前老闆，傘兵暨拍賣師尼古拉斯·雷納，對我的回歸也反應冷淡，尤其我已成為他的上級主管。最初，他遺憾地告訴我，說辦事處裡沒有多餘空房間可以給我，雖然公司在城市另一頭還有一幢屋子，而雷納也慷慨地提供我使用，但這無異是把我發配到西伯利亞；我彬彬有禮地拒絕。當一個不可移動的物體遇到不可抵擋的力量，會出現短暫的對峙狀態，但最終會回歸平衡。雷納精通珠寶，而我的專長領域在繪畫，我們努力學著和睦相處，畢竟得為大弗的利益著想，並延續威爾森的精神。

我也欠雷納人情，在我的拍賣師之路上，他的個人風格曾給我啟發，讓我終能走出自己的路。能上拍賣臺，是我回鍋蘇富比的主要動機，過去拜威爾森之賜，我已深深體會手握拍賣槌的樂趣。由於日內瓦這裡拍賣的大多是珠寶，為了重新累積經驗，我先到摩納哥主持拍賣會，第一場拍賣的物品是珍本書。在當地執行拍賣的固有問題就是，摩納哥法律規定得由當地認證的拍賣官下槌成交。為此，我不得不找來一向的好夥伴瑪凱女士，而我自己扮演木偶大師，操縱她的手臂起落，以便能在最佳時機落槌成交。這種做法肯定束縛了我的自我風格展現。

束手束腳，缺乏特色，這正是蘇富比唯一的拍賣師評鑑員彼得·巴金（Peter Batkin）對我的初次評價。巴金創造了一個評鑑系統，根據風格、速度和控場能力三個項目來評價拍賣師的表現。儘管我離開拍賣臺已有七年，卻覺得自己復歸的表現相當不錯，但巴金可不這麼想。有一天，他一臉嚴肅地對我說：「我們得談談。」他把我拉到一旁，給我看了每一個項目不忍卒睹的分數。我覺得很沮喪，這是淒慘無比的結果。

我沒有被擊倒，我更加努力，試著模仿幾位大師，設想他們會如何做。我的第一個榜樣當然是威爾森，他擁有何其大的精神力量和權威，即使在拍賣臺上說話聲音不大，臺下的人仍會聚精會神仔細聆聽，不錯過他說的任何一個字。我的第二位楷模是紐約的約翰·馬里昂（John Marion），偉大拍賣師盧·馬里昂的兒子。看約翰·馬里昂主持拍賣，就宛如看著約翰·韋恩（John Wayne）[249](#)騎馬奔馳。馬里昂也散發權威光芒，但那是神氣活現西部人的酷勁與隨性。多年過後，有一次，我前往達拉斯，為當地的藝術節主持拍賣活動。我與一位精力充沛、貨真價實的牲畜拍賣師同臺（我們輪流上臺），那個當下，我便試著讓自己化身為約翰·馬里昂。

我的第三個學習對象是尼古拉斯·雷納，他的風格非常戲劇化，猶如拍賣臺上的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250](#)。他在競價過程當中會不時改變語氣和音調，營造出一種希區考克式的懸疑氣氛，完全是一場聲色俱佳的表演。他主持的拍賣會總是非常有趣，極具娛樂性，就算不是買家也能樂在其中。我看過他的表現，頓悟到自己必須更活潑一點，於是我開始改變自己。雷納很了不起，我想要像他一樣，所以我努力讓他喜歡我。

我在日內瓦第一次大展神威—或說雷納與我的第一次成功合作—是在一九八七年四月那場溫莎公爵夫人珠寶拍賣會。一九八六年的四月，公爵夫人於巴黎去世，她將所有珠寶遺贈給巴斯德研究所。並由公爵夫人的遺囑執行人，看來鐵血冷面的律師蘇珊·布盧姆（Suzanne Blum）全權決定如何將珠寶化為現金。雷納使盡渾身解數爭取布盧姆的拍賣委託。

所幸我們高傲的對手格札·馮·哈布斯堡已離職，佳士得不再具有皇家王室的人脈優勢。如今佳士得日內瓦辦事處的負責人是卡地亞專家漢斯·納德霍夫爾（他隔年不幸死於愛滋病）。那時候還沒有一九九〇年代的那種精美宣傳競爭戰—實物尺寸目錄、樣本廣告等。我們只能依靠午餐發揮影響力，雷納招待的午餐無人能出其右，我則是精於甜點的挑選。謝天謝地，鐵娘子律師布盧姆因此選擇了我們。

拿到委託後，我和雷納都試著師法威爾森的做法，展開緊鑼密鼓的公關宣傳；我必須說，我們大獲成功。我們著重在這批收藏的浪漫性質，一個男人如何為了「他所愛的女人」放棄英國王位，那樣的愛情化為史上最豪華的珠寶收藏。全球報章雜誌又津津樂道起這段愛情故事，他們避而不談無性婚姻、公爵的同性戀傾向、公爵對希特勒的支持、公爵夫人的自戀與算計，只聚焦在愛情與格調。

我們重點介紹幾樣物品，例如：公爵夫人最喜歡的藍寶石（正好與她的雙眼相映成輝）、動物胸針（特別是卡地亞的美洲豹胸針），以及三十一克拉的葛康達鑽石（Golconda，前主人是華盛頓郵報的繼承人艾芙琳·沃許·麥克林〔Evalyn Walsh McLean〕夫人，她也曾持有希望鑽石〔Hope Diamond〕[251](#)）。我們有很多故事可以提供給各家雜誌，每家各自報導一則也綽綽有餘。三月份，在舉辦拍賣會之前，我們先在紐約蘇富比展出了百餘件珠寶，吸引了排隊人龍，成功引發熱潮。

當然還是有一些小插曲。我們預料勝利在望，但也知道麻煩不可避免。我們日內瓦辦公室旁的美岸飯店（Hotel Beau-Rivage）大廳肯定容納不了預估的人潮，因此我們取得市政府官員許可，在日內瓦湖畔豎立起一頂巨大帳篷。安斯利考慮到斷電的風險（意外事故或蓄意破壞都有可能），堅持我們要有一臺備用發電機，由我負責張羅準備。滿足電力需求確實非常重要，畢竟將會有全球各地的電視攝影隊前來拍攝。帳篷裡聚集了一千位競標買家和三百名記者，另外六百位美國客戶則在紐約約克大道總部透過閉路電視參與拍賣。現場氣氛猶如重量級拳王爭霸戰，令人安慰的是，蘇富比不待鈴聲響起就已獲勝。

我很榮幸能和高里勛爵（Lord Gowrie）比鄰而坐，他是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內閣的藝術部長，不久後會接任蘇富比歐洲區主席，成為我的頂頭上司。都柏林出生的高里頗有詩人氣質，他曾在哈佛大學當講師教文學，也曾擔任詩人羅伯·羅威爾（Robert Lowell）[252](#)的助理。他絕不是迪迪·布魯克斯那種「只談淨利」的效率專家，雖然我們很清楚大弗下的指令：獲利最重要。拍賣進行得很

順利，直到安斯利最大的噩夢竟然成真，電力突然中斷，所有設備都停止運轉。在彷彿無止境、但實際上才幾秒鐘的時間過後，我們的備用發電機運轉起來，拍賣會照常進行下去。第二天，我們從警察那裡得知確實有人蓄意破壞，所有的電源線都遭斧頭切斷，但我們無法證明是佳士得的人下的手，否則將是一段值得大書特書的故事。

倒是有另一件大事足以拿來炫耀，好萊塢的珠寶女王伊莉莎白·泰勒親自打電話競標（坐在她貝萊爾〔Bel-Air〕區豪宅的游泳池畔），買下「威爾斯王子羽毛」（Prince of Wales Feathers）。那是一只依王子紋章圖樣設計的鑽石胸針；是一件皇室規格的絕頂佳作，理應納入皇室珠寶收藏，歸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所有，而不是好萊塢女王。不過，泰勒女王標下它，宣傳效果可是比英國女王來得大，因為她代表了女權自主。事實上，這是伊莉莎白買給自己的第一件珠寶。她花了將近六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千八百萬），不需要康拉德·希爾頓（Conrad Hilton）或邁克·托德（Mike Todd）或艾迪·費雪（Eddie Fisher）或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253](#)幫她買，她自己就辦得到；這是女性客戶在蘇富比拍賣會邁出的一大步。漢姆特·紐頓曾為泰勒拍過一幀經典照片，她一身古銅、容光煥發地坐在自宅泳池邊（當初講電話競標的地點），戴著那只「羽毛」胸針；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就會回想起我們在湖畔帳篷裡的那場盛會。

該場拍賣會不僅帶來宣傳效果，許多件珠寶的成交價也超過原本預估的十倍，我們的總成交額超過五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五億），創下瑞士拍賣史和珠寶拍賣史上的最高紀錄。我隨後動身前往莫斯科，那裡有另一場大勝利等著我。我每週仍為提森男爵工作一天，曾陪他到莫斯科與戈巴契夫夫人（Mrs. Gorbachev）共進午餐。那是一九八八年初，我已到機場準備返家，才黯然發現自己把護照遺忘在飯店櫃臺。男爵從不等人，他把我留在機場，吩咐我取回護照後再自行搭商業班機回去。隨行的文化部官員好心載我回市區，在路上，我向他建議，如果在莫斯科舉行一場藝術品拍賣會，應該會很振奮人心。畢竟

從沙皇時期以來就不曾有過這類活動。令我驚訝的是，文化部官員也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點子。當然，他不知道我做起事來有多瘋狂。

他說：「再研究看看。」此前不久，我也曾到莫斯科一遊，陪同朋友保羅·喬勒（Paul Jolles，雀巢 [Nestlé] 前總裁，亦是往來全球各地搜尋藝術品的獵犬）到幾處祕密工作室拜訪幾位「非官方」（但日後都享譽全球）的藝術家：埃里克·布拉托夫（Erik Bulatov）[254](#)、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255](#)、奧列格·瓦西里耶夫（Oleg Vassiliev）[256](#)。這種祕密結社的地下藝術，通常隱身在莫斯科郊區那片宛如孟買或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以某幢破敗、簡陋的農舍為據點。但那些工作室是蘇聯境內唯一創作出藝術—真正藝術—的地方。畢竟所謂的「官方」藝術，能讓一個人晉身到「藝術家聯盟」的作品，都是國家核准的黨宣品，諸如列寧半身像、史達林肖像、描繪幸福工人和幸福農場的畫作。一切都是假的，而無所不能的蘇聯不久後也將暴露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相。不過，唯有官方藝術家能夠獲得畫材供應，包括顏料、畫筆、畫布，任何創作所需的東西，而且還有報酬可拿。非官方藝術家則一無所有，在往昔控管更森嚴的年代，甚至會遭到射殺。他們曾在森林裡舉行了一場反官方展覽，蘇聯共產黨和KGB發現後馬上剷平現場。若在史達林時期，這些藝術家會被歸類為「非人」。

我醞釀許久的想法是把這些藝術家帶到光天化日之下，領他們進入收藏圈。我見過他們；他們的作品非常出色，能吸引真正的收藏家—那些沒有意識形態窠臼的人。我在回飯店的漫長車程中，不小心脫口而出心底的計畫時，還以為文化部官員會打我槍，說不定乾脆射殺我，沒想到他說再研究看看，我意識到蘇聯確實在改變；改革和開放不僅僅是政令宣傳，而是反映了蘇聯冰山確實在逐漸融解。

等我回到紐約，向上司提出這個拍賣計畫，我其實不太樂觀，畢竟有物流問題要解決，又缺乏顯而易見的獲利。當時蘇聯還沒有家財萬貫的寡頭，還不存在私人財產，我們若是拍賣非官方藝術品，蘇聯當地有誰會購買呢？那裡沒有錢。不過，有蘇聯血統的陶博曼，以及

沒有任何一點蘇聯血液的田納西州好男孩安斯利，兩個人都支持鼓勵我；他們批准了我的進軍鐵幕計畫。事實上，擁有哈佛MBA資歷的安斯利，看到這項計畫的巨大宣傳價值：蘇富比將成為全球首家進入蘇聯的拍賣公司。佳士得，接招吧！

最後成果堪稱是史詩級的巨作。我們的拍賣會納入蘇聯前衛藝術家，諸如羅德琴柯（Rodchenko）[257](#)、斯特潘諾娃（Stepanova）[258](#)、烏東薩瓦（Udaltsova）[259](#)等人的作品，以便展現新秀藝術家崛起的歷史脈絡，比如新人卡巴科夫是一位飽受壓迫的猶太裔藝術家，他必須替「官方」兒童書籍繪製插圖才勉強得以維生。我們在紐約和倫敦舉行了預展，也替藏家安排前往莫斯科的包機，畢竟沒有他們的金錢投入，不可能有一場真正的拍賣會。我們邀集了七十五位富豪，多數來自歐洲和美國，也邀請了眾多媒體到場採訪（好萊塢任何一場名人婚禮或離婚記者會所吸引的媒體都沒有我們多）。會場選在蘇文聖塔國際飯店（Sovintsentr，一家頗有凱悅中庭酒店風格的飯店），那裡只有外國遊客能出入，多數蘇聯人都不得進入。

我主持了蘇文聖塔國際飯店的這場拍賣會。我很緊張，誰不會呢？臺下有三千人。我走上拍賣臺時，可以看到電話競標臺還未接上線，我所有同事都在瘋狂撥號，但徒勞無功。這就像一段走上斷頭臺的漫漫長路，但是，就在鋸刀即將落下的瞬間，我看到「接線生」們一臉喜色。拍賣就要開始的這一剎那，電話總算通了；莫斯科的奇蹟！蘇聯隨處都有伏特加，可喝來壯膽，我主持拍賣時通常會保持清醒，但這次稍微「入境隨俗」似乎也不壞。一般來說，藝術家不會參加拍賣會，因為害怕聽到壞消息，但是對於這場拍賣的蘇聯藝術家來說，這是他們初亮相的一場盛會。每賣出一幅畫，他們就會跳起來互相擁抱道賀，非常有社會主義精神；人人都是贏家。回顧我的職業生涯，僅有這次的拍賣會上，觀眾會在每一次落槌後熱情鼓掌。那樣的掌聲讓整個會場沸騰到極點，我從來不曾有過類似的經驗，以後也不再有過。

我在那個拍賣臺上，自覺有點像列寧，正在重新分配財富。那種感覺非常強烈，不只是單純的刺激感（我每次主持拍賣，腎上腺素都會飆升），而是我喜歡看到那些蘇聯人嚴厲冷峻的臉龐浮現笑容；我也喜歡主持拍賣，脫離雷納的影子，將他招搖浮誇的風格去蕪存菁，加一點馬里昂那種西部佬的自我感覺良好，再加一點威爾森正宗的英式冷靜，身為蘇富比的拍賣師，我設法集各家大成，盡力發揮所能。

這些蘇聯藝術家至今生活艱苦，但是拜這次拍賣會之賜，他們生平第一次靠作品賺了錢，而且是比他們夢想中更多的錢。其中一位藝術家格里夏·布拉斯金（Grisha Bruskin）260掉了眼鏡，我落槌成交後，發現他正趴在地上找。他妻子勸他：「格里夏，別像個傻瓜一樣，別找了，你愛買多少眼鏡都可以，你現在有錢了。」他的作品剛以四十多萬美元（約臺幣一千兩百萬）成交。我們當初的估價只有一萬兩千美元（約臺幣三十六萬），而且已是樂觀估計。從此處可以預見接下來數十年藝術品的投資狂潮。「格里夏，別找了，起來，你是有錢人了。」他妻子繼續苦口婆心勸他。格里夏仍趴在地上找，他大概覺得一切好得不像真的。

布拉斯金不是當晚唯一一個成為紅星的非官方藝術家，另一位是伊戈爾·科格史恩斯基（Igor Kopystiansky）261。拍賣前，一位美國藏家曾到科格史恩斯基的工作室參觀，他拿一幅畫想交換收藏家脖子上那一架看似珍貴的頂級Nikon相機。相機價值約兩千五百美元（約臺幣七萬五千），對藝術家來說是很大一筆錢，但收藏家拒絕了。在拍賣會上，科格史恩斯基原本想交換的那幅畫拍出將近七萬五千美元（約臺幣兩百二十五萬）。買家是誰？是艾爾頓·強。那天晚上，那位美國藏家肯定悔不當初，再烈的伏特加也消解不了他心頭的悔恨吧。

布拉斯金那晚為何不願放棄尋找眼鏡，硬是待在地板上不願起身，答案很快就揭曉了。所有的拍賣收入，將近兩百萬美元（約臺幣六千萬），是由蘇聯文化部代為分發給藝術家，但他們從來沒有拿到半毛錢。算了，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蘇聯有誰能拿到報酬呢？

然而，蘇聯畫家寫了很多信抗議，原本做為良好公關宣傳的這場拍賣，很有可能反過來給予蘇富比沉重一擊。最終得靠柴契爾夫人出馬扭轉局面。她的前藝術部長高里勛爵向她抱怨蘇聯說話不算話，而當時戈巴契夫正準備前來倫敦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讓他知道，她非常看不慣蘇聯的惡行。於是戈巴契夫抵達前一天，蘇富比接到通知，每個藝術家都已拿到應得的款項。除了金錢收入，該場拍賣會也堪稱蘇聯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不久以後，箝制藝術的「藝術家聯盟」解體，共產主義也垮臺，「非官方」畫家總算能夠購買畫材，自由地旅行，其中一些人還成為享譽全球的明星。

在蘇聯的這場拍賣不僅為該國藝術界帶來變革，也徹底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我迅速累積出名聲，主持的拍賣會也被賦予神祕光環。整個世界都進入公關宣傳時代，而且毫無趨緩的跡象（猶如卡達夏家族〔Kardashians〕崛起的速度），我恰巧在對的位置，擁有對的媒介。我的木槌成為我的護照，推動我馬不停蹄到處跑。我為Swatch手錶主持了幾場備受矚目的拍賣會。此家瑞士手錶公司成立於一九八三年，以低價位和強烈設計風格在市場搶占了一席之地。由於用色活潑，設計極為多樣，Swatch（Second Watch，第二只手錶的意思）手錶剛問世不久即吸引眾多收藏愛好者。

我剛回蘇富比任職時，曾提出顛覆性的點子，建議將這些具革命性的大眾手錶納入拍賣會，倫敦總部的手錶專家都目瞪口呆。鑑於蘇富比的崇高尊嚴，這可是有失體面的做法。但我堅持己見，也遂我所願。在一九八六年的拍賣會上，頂尖珠寶商吉安尼·寶格麗（Gianni Bulgari）²⁶²以高於開價五倍的價格標下所有Swatch手錶。一位記者問他是否失心瘋了，吉安尼卻叫那位記者幾年後再來問這個問題，他到時就會知道自己瘋不瘋了。

吉安尼不是傻瓜。我主持的下一場Swatch手錶拍賣會，完全只拍賣Swatch手錶，地點在米蘭一家超模熱愛光顧的夜總會，預計全部收入都捐給紅十字會。該組織將此場拍賣會視為重要慈善活動，甚至是絕佳的宣傳。就像許多時尚潮流都始於義大利，米蘭的該場拍賣會點

燃了全球Swatch手錶熱潮。我很高興能為這股風潮做出貢獻，成功讓一只廉價手錶成為一群收藏家趨之若鶩的普普藝術收藏品，而這家瑞士小企業也扶搖直上，成為營收上億的大集團。

就像所有風潮（比如荷蘭鬱金香瘋）都會走下坡一樣，收集Swatch手錶的狂熱也曾退燒，但歷時不長，是我在二〇一一年協助重燃熱潮。當時我已在菲利普斯拍賣行，計畫在香港四季酒店為中國大陸收藏家舉辦一場Swatch手錶拍賣會。為了此場盛事，Swatch公司讓我設計一只手錶來拍賣，於是我把兩根指針設計為木槌形狀，並將這件獨一無二的重量級作品排為八號拍品，八是中國人的幸運數字，它最終拍出六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億九千五百萬）的驚人價格。即使是手錶界的王者至尊卡地亞也得自歎弗如。

儘管我有本事結合高尚和通俗文化，成功開花結果，也因此建立聲譽，但我絕不敢忽略高尚文化這一端，畢竟它是蘇富比的主要收入來源。我回到蘇富比的時機非常好，當時是一九八〇年代，藝術市場景氣一飛沖天，而且全力投入的生力軍都是日本人——一群花錢毫不手軟的藝術市場霸主。原本只痴迷印象派與後印象派作品的日本人，現在似乎什麼都買，從曼哈頓摩天大樓到好萊塢電影製片廠，無所不買。我父母在日本的生活經歷，以及我在那裡研習藝術的經驗，現在全派上用場，我得以琢磨出一些跨文化溝通的小訣竅。舉例來說，我很榮幸能在東京主持全球第一場日本版畫拍賣會，我的搭檔是蘇富比東京辦事處負責人，傑出的塩見和子女士。我和她完美地各司其職，我以英語進行拍賣，她用日語；每當我努力秀幾句學生時代學的日文，大家都不吝給予包容和鼓勵。

藝術市場盛況持續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日本人對歐洲藝術的熱愛依然如故，新的迷戀對象則是梵谷。一個世紀以前，梵谷迷上日本的木刻版畫，現在輪到日本人對梵谷神魂顛倒。無論景氣好壞，我總是飛來飛去，到蘇富比全球各地的辦事處主持獨家拍賣會。我設法在拍賣領域建立自己的聲譽，藉此提升我在公司裡的地位。一九九二年，我接替高里勛爵，晉升為蘇富比歐洲區主席。而紐約的馬里昂退

休去享受婚姻生活以後，我很快便成為蘇富比全球首席拍賣師。馬里昂娶了一位超級女牛仔，來自沃斯堡（Fort Worth）的社交新秀暨牧場主人、慈善家、藝術收藏家，安妮·伯內特·溫芙爾（Anne Burnett Windfohr），更加符合他在我眼中宛如約翰·韋恩一般的耀眼牛仔形象（巧合的是，韋恩的原名是馬里昂·莫理森〔Marion Morrison〕）。馬里昂是最佳典範，證明離開蘇富比也能另有一片天地。

我希望自己也有同樣美好的婚姻生活，但我的職涯愈是蒸蒸日上，婚姻愈是岌岌可危。由於接任了新職，我必須搬到蘇富比歐洲總部所在地：倫敦。每個月也得花上一個星期待在紐約，因為那裡是老闆大弗居住的城市，也是公司的神經中樞。伊莎貝爾沒有跟著我搬家。而我老是不在家，無法善盡一家之主的職責，完全是我的錯，我感到非常內疚，是我把伊莎貝爾帶離她輝煌的職業生涯，將她困在一個鍍金籠子裡，終究造成我們的婚姻走向毀滅。伊莎貝爾重返學校研習心理學（她可以給男爵上一課），後來致力於協助盲人，但我們的婚姻似乎再也無法修復。由於我父母也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缺席，讓我稍微減少一點罪惡感，儘管我經常不在日內瓦、遠離家人，但比起當初在東京生活的父母與我見面的頻率，我與自己孩子相見的次數已多了許多。我們的四個好孩子在學校表現出色，彼此相處融洽，我對他們的韌性驚歎不已，一如我也佩服從前的自己能捱過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

曾在紐約招待我晚餐的迪迪·布魯克斯，現在已是蘇富比北美地區負責人。迪迪出身紐約州長島蠔灣（Oyster Bay），讀過波特女子中學（Miss Porter's School）、史密斯學院（Smith）和耶魯大學，是一個有長島口音、標準的華爾街白人菁英，幾乎不可能跟藝術沾上邊。除了在大學藝術史課程所學到的零星知識，她幾乎對藝術一無所知。對她來說，要在藝術課程拿A肯定比數學或科學來得容易，所以為了讓成績單亮眼，藝術史是恰當的選修科目吧。從耶魯大學畢業後，迪迪進入花旗銀行擔任信貸員，後來跳槽到蘇富比財務部門。

迪迪成功將蘇富比帶入華爾街時代，把藝術「化為金錢」。如今，藝術品已是比股票和債券更受歡迎的投資標的。在她的協助之下，拍賣行轉型成為財務機構。蘇富比從十八世紀成立以來，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最初的目的只是一個供人快速變現財產（遺產必須分配或背負債務）的地方；一個適合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當舖。而迪迪的貴族氣質和出身名門的自信吸引了大弗的注意；這是一個典型正負相吸的例子，這位身高超過六呎（約一八二公分）的「高個兒迪迪」一舉竄升為「大弗」的手下愛將。

迪迪比蘇富比的任何人都更有「男子氣概」。有一次，大弗安排公司員工到康乃狄克州的精品飯店「五月花」（Mayflower Inn）做研修活動。（飯店老闆鮑伯·慕欽〔Bob Mnuchin〕為高盛合夥人，他將華爾街賺得的財富投入藝術市場，獲得數倍回報，因此能夠玩票性地開設這家五月花。）在這類活動當中，我們總得玩一些哈佛商學院瘋子設計的遊戲，期望能帶來啟迪，更加清楚公司的優勢與弱點。其中一項遊戲是比腕力，我們採用五分鐘不限回合閃電戰，每壓倒對手一次，獲勝者就得到一美元（約臺幣三十元）。而「指導員」—不管他是何方神聖，總之是個MBA碩士—像是有虐待狂似的，居然指定迪迪和我對戰。我完全缺乏運動神經，在學生時代，每有運動比賽，我總是最後一個被選的人；在運動場上，我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傷寒瑪麗。我預期會出醜，被一個女人擊敗，實在很丟臉。

所以我使出渾身解數。迪迪看起來像參孫或歌利亞巨人²⁶³。她是如此強大，如此有力，我可以看出她非常想打敗我，而我就像以小搏大的大衛。不知怎的，我撐了下來。五分鐘彷彿永無止境，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們仍然僵持不下，臉都紅得跟甜菜根似的，最後我們打成平手。總算保住了我的顏面、歐洲的顏面；這是我的想法。指導員卻皺起眉頭，厲聲指責我們兩個人都是輸家，無法協力為公司創造更大的利益。如果我們更聰明一點，知道相互合作，就可以每一到兩秒就由其中一方壓倒另一方，最後抱走大把鈔票，再雙方平方。而我們兩個都想贏，因此都輸了。放下自我，才能賺錢；多麼寶貴的一課。

我更像是個藝術家而不是生意人。主持拍賣、規畫拍賣、敲定客戶委託，這些才是我最樂在其中的事。我不想要做迪迪的工作，但她想做我的工作。她喜歡當拍賣師。事實上，她喜歡做蘇富比有的每樣工作。她什麼都想沾一點，就像一個樂團指揮，同時也想成為鋼琴獨奏家，也想拉小提琴，也想吹小號。

迪迪「什麼都想一手抓」的野心導致許多人辭職離開，拍賣師約翰·馬里昂即是一例。一山不容二虎，約翰不是唯一一個因此掛冠求去的公司高層。雇用我的安斯利在一九九三年離開，迪迪接替他的執行長位置。由於公司仍在獲利，他的離開未造成太大震撼。一九八八年，藝術市場達到高峰，大弗讓蘇富比公開上市，安斯利也許預感到日本市場將要崩盤（一九九〇年發生），賣掉自己的持股，帶來不小影響。大弗和茱蒂不喜歡他的作為，畢竟這對夫婦始終在提醒每一個人，「他們」付出多少心血，才讓每個人能過上好生活。特別是安斯利，他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租了一幢房子，距離大弗、茱蒂在長島的舒適莊園並沒有多遠。兩人倒是不曾抱怨迪迪。安靜的大弗頗中意她活力十足的做事方法，就讓迪迪盡情地施展侵略性手段、強調淨利的策略，而他自己就能「隨心所欲」。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待在倫敦，重新設計已有百年歷史、宛如迷宮般的龐德街總部，拜他之賜，蘇富比員工再也不會在公司裡迷路。

迪迪在一九九六年主持賈桂琳·甘迺迪·歐納西斯物品拍賣，這是她的首場全球性拍賣會。該場拍賣為蘇富比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宣傳效果。只要是賈姬擁有的東西，無論是搖椅、捲尺，或者是喜劇演員米爾頓·伯利（Milton Berle）送給甘迺迪的禮物—刻有「身體健康，吸菸愉快」大字的雪茄盒—人人都想要。迪迪讓我在為期四天的四月藝術節上先行熱身，拍賣了一些物品，但她就像阿莫德·哈默，深諳好萊塢那一套，知道如何讓自己成為鎂光燈焦點。不過我還是非常享受那次拍賣，就算是拍賣貓王艾維斯（Elvis）的物品，也不會掀起如此瘋狂的搶購熱潮。人人都想買件東西，即使是垃圾也無所謂。

賈姬臨終病榻上用來插花的陶花瓶就以極高價拍出。我還見到瑪麗亞·史薛弗（Maria Shriver），對她行了吻手禮。

「你一定是歐洲人。」她的丈夫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嘟囔，「只有歐洲人會做這樣的事。」

「你不也是歐洲人。」我回道，「你一定懂這種禮節。」

「我懂！」我們的魔鬼終結者哈哈笑著，「但我不會吻他們的手。我會捧住他們的頭，親他們的嘴。」

幸好他沒有展示他的新世界禮節，我大大鬆了口氣。

迪迪跟我在倫敦還成了室友。她待在倫敦的時間就和我待在紐約一樣長，於是慫恿某個MBA學位的會計師提出建議，說合租一間公寓比租兩間來得合算。我們在龐德街附近找到日內瓦藝術經紀商楊·克魯治（Jan Krugier）轉租的寓所，但我跟她的生活作息卻是南轅北轍。我深夜仍在外頭流連，不是在哈利酒吧與客戶共進晚餐，就是在安娜貝爾俱樂部（Annabel's）和客戶跳舞，通常當我睡眼惺忪地在黎明返家，迪迪已一如平常在五點半起床，出門去海德公園慢跑。

跟實際又嚴肅的迪迪相比，我簡直是荒唐透頂的傢伙。她做事的效率總是讓我歎為觀止。蘇富比舉辦正式晚宴的時候，她著裝的速度也遠遠勝過我。她可能整天在蘇富比算帳，然後意識到當晚有場晚宴，就衝回我們的住所，大約五分鐘後，已換掉白天的簡單珍珠項鍊和服裝，穿著晚禮服、光豔照人地回公司；超人變裝的速度都沒有她快。

不知怎的，我在她面前做不了自己；我總是覺得我們在競爭，爭時間、爭安靜、爭浴室、爭廚房，諸如此類。一個半月後，我告訴她，合租實在行不通，我必須找自己的住處。她似乎非常難過，就像談戀愛分手似的，順帶一提，我的小女兒叫黛安娜·德芬，暱稱迪迪（DD，只有發音相同），她和她的異母姊姊洛伊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

的女人。而迪迪，她想成為我生命中、每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此一想法正是她的動力來源，她事業成功的關鍵，但最終也讓她像伊卡洛斯（Icarus）²⁶⁴一般，驟然從雲端跌落。雖然我無法和迪迪一起生活，卻能明白許多人何以覺得她極具吸引力。她很成功，有權力，有活力，更有不容忽視的存在感。她讓我想起與漢姆特·紐頓有過的一段對話。我有次問紐頓，他拍攝過的那些高大金髮女人當中，誰最性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瑪格麗特·柴契爾。令我大吃一驚。而迪迪也是一個高大的金髮女人。

擺脫合租生活以後，我回到離辦公室一個街區遠的威斯伯雷飯店（Westbury Hotel）投宿，那是一家跟假日酒店（Holiday Inn）一樣毫無人情味的旅館。每次入住，無論是我的第一次還是第五百次，全新面孔的櫃臺接待員都會朗聲問我：「您是第一次投宿我們飯店嗎？」工作人員似乎每週都大換血，這也提醒我，任何一家企業都該注重穩定性。所以我喜歡光顧企業家馬克·伯利（Mark Birley）在梅費爾區創立的幾家私人會所：安娜貝爾俱樂部、哈利酒吧、馬克俱樂部；那裡的服務生，似乎從伯帝·伍斯特（Bertie Wooster）與管家吉夫斯（Jeeves）²⁶⁵的時代以來就沒換過。最後，我在梅費爾區的丹雷文街（Dunraven Street）找到一處非常舒適的單身公寓，分租人是上奇廣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前執行長羅伯·路易·德雷福斯（Robert Louis-Dreyfuss）。週末我則飛回日內瓦與家人團聚，儘管和他們相處時間非常有限。

迪迪表現非凡，但我時常擔心蘇富比會捱不過她時而略嫌高壓的獨裁統治，但迪迪更操心如何擊敗佳士得。我在蘇富比的所有時間幾乎都花在對抗佳士得。我最初在蘇富比任職的時候，佳士得這個對手雖惱人，但我們總是先置諸腦後，但是現在，它成了每位員工心心念念的假想敵。當藝術市場在一九九〇年也如日本房市，在高點後迅速崩跌，佳士得開始奮發努力，不願再屈居為拍賣行的老二（一如打著「我們更努力」口號的艾維斯租車），打算取代我們，成為業界龍頭。他們在一九九四年如願以償，年度成交總額自一九五四年以來，

首度超越蘇富比，且接下來若干年，繼續擊敗我們。由於大眾對拍賣紀錄愈來愈熱衷，蘇富比和佳士得成了報章雜誌頭條新聞裡的死對頭，一如陸軍對海軍，哈佛大學對耶魯大學，牛津大學對劍橋大學，NBC電視網對CBS電視網，福特汽車對通用汽車。幾年後，我執掌菲利普斯拍賣行，試圖創造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一位記者曾說，如果蘇富比是可口可樂，佳士得是百事可樂，那麼菲利普斯就是紅牛能量飲料。

佳士得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任的首席執行長克里斯多福·戴維奇（Christopher Davidge）。他跟威爾森那種老男孩截然不同，他的肩膀上彷彿植著晶片，刺激他不斷實現野心。戴維奇的家族世代都是佳士得的忠誠員工，他祖父是出納員，他父親是搬運工，母親是祕書。戴維奇在北倫敦的社會住宅長大，十六歲就輟學，胼手胝足一路爬升到印製佳士得目錄的印刷部門。效率和廉價促銷向來是佳士得的註冊商標，品味和優雅不是他們的關注焦點，但也導致他們長年位居第二。戴維奇從印刷部門調往香港後，表現出色，晉升為佳士得亞洲區主席，最後在那個日益重要的市場一舉擊敗蘇富比。佳士得既然能夠在東方告捷，證明蘇富比在西方市場也未必百堅不摧。

一九八五年，戴維奇接掌倫敦聖詹姆斯區（St. James's）國王街（King Street）上的佳士得總部。他有一頭漂白的金髮，以剃刀修剪、精心吹整的髮型，穿著來自傑明街（Jermyn Street）266的紳士風格條紋襯衫，配上極度鮮豔的領帶，還曾對《金融時報》宣稱自己最大的奢侈就是使用頂級衛生紙，這種種都成了當地時髦人士開玩笑的話題；佳士得員工還稱他為「管家」。戴維奇跟拍賣行業的典範人物威爾森大相逕庭，他與當前的對手迪迪·布魯克斯也天差地遠。迪迪是純正美國人；他則猶如電影《風流奇男子》（*Alfie*）裡的米高·肯恩（Michael Caine）。

拍賣行業人士喜歡光顧傑明街上一家維多利亞風格的海鮮餐廳「威爾頓」（Wilton's），我曾在那裡見到戴維奇與幾位重要人物一起午餐。他看起來和餐廳裡其他客人迥然不同，髮型過於一絲不苟，一

般英國男人的髮型看起來會更自然，完全不像精心處理過。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西裝，但它太完美了，毫無一點皺褶，跟一般英國男性風塵僕僕的衣著大異其趣。你幾乎可以看到肌肉在那套訂製西服下方鼓動，戴維奇身材矮小，但非常結實；他一定時常上健身房。總之，戴維奇有拿破崙的小個子情節，這個人似乎太過努力，在英國社會，這是萬萬要不得的事。

迪迪也太過努力。她很拚命，但只在生意上，從不花時間在社交應酬。她擁有美國上流名門的特點：一種與生俱來的自信。你無法想像迪迪和戴維奇會一起吃午飯，更不用說串謀暗定抽佣協議。但他們確實有過私下協議，日後醜聞一爆發，不只讓蘇富比和佳士得都差點沉船，也導致整個拍賣業陷入深淵。

249 美國電影演員（一九〇七～一九七九），曾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個人風格鮮明，以其獨特的男子氣概、說話語調、走路方式而著稱。

250 英國電影演員、導演和製片人（一九〇七～一九八九），奧斯卡獎得主，三次獲得金球獎和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獎，兩次獲得奧斯卡榮譽獎，五次獲得艾美獎；被譽為二十世紀最著名和最受尊崇的演員之一。妻子是費雯麗，曾飾演《亂世佳人》的女主角郝思嘉。

251 世界現存最大的藍色鑽石，傳說是詛咒的寶石，會為擁有者帶來厄運，比如被送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及瑪麗王后，目前該鑽石收藏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史密森尼博物院的國立自然博物館。

252 美國詩人（一九一七～一九七七），自白派詩歌的開創者，常以詩批判社會，第一本詩集《威利爵爺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即獲得一九四七年普立茲詩歌獎。

253 依序為希爾頓大飯店的創辦人（一八八七～一九七九）、美國劇場暨電影製作人（一九〇九～一九五八）、美國百萬流行歌手（一九二八～二〇一〇）、曾是好萊塢身價最高的英國演員（一九二五～一九八四），四人皆為伊莉莎白·泰勒的丈夫或是情人。

254 普普藝術家，在畫作上加上巨大顯目的標語是他的特色，反映出他對蘇聯政府的看法及蘇聯的歷史脈絡，被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在世俄國藝術家之一。

255 觀念藝術家，直到八〇年代才離開莫斯科，創作包含繪畫、素描及裝置藝術，尤其以裝飾藝術著稱，目前定居在長島。

256 一九九〇年移民至紐約，繪畫風格結合俄國現實主義與前衛藝術，經常以家鄉的人事物為主題，至二〇一三年去世以前，定居在明尼蘇達的聖保羅。

257 構成主義藝術家（一八九一～一九五六），追求藝術的實用性及功利性。擅長繪畫和雕刻，也是攝影師和設計師。他曾經從事書籍封面設計，成為一九二〇年代俄國裝幀設計風格的代表之一。

258 構成主義藝術家（一八九四～一九五八），喜好用幾何圖形及線條創作。

259 俄國（蘇聯時期）前衛藝術家（一八八五～一九六一），除了繪畫，也在學校授課。

260 一九八八年蘇富比在莫斯科舉行的拍賣會讓他一炮而紅後，移民至紐約發展。不僅繪畫，也從事雕刻、版畫創作，二〇一二年獲得康丁斯基獎，如今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俄國藝術家之一。

261 一九八八年拍賣會後也移民至紐約發展，目前除了個人創作外，也與妻子蘇維特拉娜（Svetlana Kopystiansky）共同發表了許多作品，廣泛運用不同媒材及形式，攝影、繪畫、裝置藝術都包含在內。

262 曾為義大利知名奢侈珠寶品牌「寶格麗」的董事長暨珠寶設計師，但後來脫離家族事業，專心經營自創珠寶品牌GB-Enigma。

263 兩者皆是出自《聖經》中的人物，參孫是可以徒手擊斃雄獅的大力士。

264 希臘神話中著名工匠代達羅斯的兒子，與代達羅斯使用蠟造的翼逃離克里特島時，因飛得太高，雙翼遭太陽溶化跌落水中喪生。

265 兩人為英國喜劇作家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 1881-1975）筆下的人物，該系列小說背景設定在一九二〇年代。

266 被譽為男人街、男人的衣櫥，是倫敦專賣男性服飾的商店街。

第十六章 敵對陣營

不管在紐約或在倫敦，迪迪和戴維奇都是死對頭。在歐洲區，我有自己的對手：佳士得歐洲區主席弗朗索瓦·庫列爾（François Curiel）²⁶⁷。他是一位優秀的珠寶專家，足以成為佳士得日內瓦辦事處那位漢斯·納德霍夫爾的接班人。外表整潔、個性認真的庫列爾在巴黎出生，父親是珠寶商。他以學徒身分在一九六九年進入佳士得倫敦總部，然後搭上仿效蘇富比的海外擴張列車，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七年分別到馬德里、紐約負責成立新辦事處，一九八九年回到日內瓦。我和他為了爭取重要委託，始終競爭不休，但我們算是友好對手。

迪迪指示我：「為公司帶回利潤。」庫列爾也從他新老闆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畢業於伊頓公學，頗有威爾森氣質的人物，曾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祕書長）那裡得到一樣的指令。藝術戰爭就此開打。我和庫列爾初次競逐就是利潤豐厚的重量級拍賣委託，收藏家是阿爾比娜·杜·博芙維（Albina du Boisrouvray），一個僅有少數人能正確發音的名字。她是伯爵的女兒，玻利維亞國王西蒙·帕蒂諾（Simón Patiño）的外孫女，也是海里好友、高更收藏家傑米·奧茲·帕蒂諾的表妹。

阿爾比娜初次走進我的日內瓦辦公室（位於美岸飯店）時，提著裝有一隻貓的籃子。曾是模特兒的她年約四十，是個優雅的另類美女。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瑞士飛行員，從事冰川救援工作；第二次婚姻則嫁給一位法國電影製片人。她最近痛失至親，二十四歲的兒子方索—札維耶·巴紐（François-Xavier Bagnoud）在巴黎—達卡越野賽期間，因救援直升機失事而去世。她的生活頓時天翻地覆。而這也是她來找我的理由，她想徹底改變原來的生活，她已經賣掉在巴黎經營的製作公司，現在打算出售所有繼承來的藝術收藏，包括前哥倫比亞時期的黃金、印象派畫作、古典大師畫作、大批珠寶和其他藏品，再以

拍賣所得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紀念兒子。當時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她告訴我，她來見我，也會拜訪庫列爾，隔年三月再決定委託給誰。

阿爾比娜這批寶藏最珍貴的部分是她的珠寶，據說精緻程度只略遜於溫莎公爵夫人的收藏。雖然我們拿下溫莎公爵夫人珠寶的拍賣權，拍賣會也大獲成功，但是庫列爾與佳士得在珠寶領域仍然具有優勢。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初入鑽石礦脈（開採）的小孩。我唯一能利用的優勢是我的巴塞爾出身，阿爾比娜正是城裡那家知名藝術飯店，三王大飯店的主人。身為一個藝術迷，我知道那家飯店的所有傳說，比如畢卡索來找保羅·克利，卻被放鴿子，因此在飯店住宿了一晚。我也有飯店的幾本古老小冊子，我翻找出來送給她。那份禮物讓她對我敞開心扉，她說，她要賣的珠寶對她來說毫無意義，那些都是她父親出於內疚送給她母親的禮物，以彌補他無法給予的愛。這位嬌小、可憐的富家女有許多傷感的故事，而我有許多時間聽她說。我希望超有效率的庫列爾行事曆排得很緊，不像我這麼空閒。

芝麻小事也可能意義重大。到了三月，阿爾比娜打電話給我，說她選擇了蘇富比。她邀請我兩週後去策馬特（Zermatt）簽約。我沒有開香檳慶祝，就藝術拍賣競爭來說，兩週簡直度日如年。正如威爾森用心理戰略說服羅絲瑪麗·坎茨勒的丈夫，從佳士得手中搶得拍賣委託，我知道庫列爾不會放棄，他會盡一切力量讓阿爾比娜改變主意。結果他確實沒罷手，但她沒有改變心意。

我抵達策馬特的小屋時，看到裡頭一片花海，鮮花多到比殯儀館裡還多。這些都是佳士得總裁卡靈頓勛爵送來的巨大花束，像阿爾比娜這樣愛花的人當然開心地拿來裝飾擺設。我心頭一沉，以為她會說：「我改變主意了。」然後打發我離開。結果沒有，她反而告訴我，就算送來英國春天的所有花朵也沒用，她不能違背諾言。我很感動。我們在紐約舉行的拍賣會，最後的總成交額超過一億美元（約臺幣三十億），刷新一九八〇年代的拍賣紀錄。更重要的是，拍賣會過後，阿爾比娜以兒子名義向哈佛大學捐出巨款。

這只是我跟佳士得的第一輪交鋒。競爭永無休止，就像永不間斷的政治宣傳活動，攻勢總是連綿不絕。我不由得想起《綜藝》雜誌（Variety）對好萊塢大亨喬·西佛（Joel Silver）²⁶⁸的評語，他這個人為了完成交易，甚至會不惜背後捅自己一刀。什麼是為了勝利而無所不用其極，這裡有個適切的例子。蘇富比有位頂尖的業務高手，他是南斯拉夫的迪米崔王子（Prince Dimitri of Yugoslavia），專長就是找到離婚的同性戀客戶，讓他們委託蘇富比拍賣已用不著的珠寶。這位王子是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他又擄獲一位新客戶歡心。她是黎巴嫩名媛穆娜·阿尤布（Mouna Ayoub），剛與沙烏地阿拉伯億萬富翁納薩爾·阿爾拉希德（Nasser al-Rashid）²⁶⁹離婚，想把價值八百萬到一千萬美元（約臺幣兩億四千萬到三億）的珠寶飾品脫手換成現金。蘇富比已經十拿九穩，具體來說，珠寶都已經放入我們的保險櫃，就待登上拍賣會。沒想到她突然從我們的保險箱裡取出珠寶，改放到佳士得那裡，還委託他們拍賣，我們懊惱地發現，庫列爾似乎在追求穆娜。

庫列爾主持的拍賣會非常成功，總成交額超過一千兩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億六千萬）。穆娜後來否認背叛，說她只是對佳士得的印象更好，於是改變了主意。她說庫列爾不是她喜歡的類型。他戴著招牌無框眼鏡；戴眼鏡的男人無論再怎麼瀟灑，都吸引不了她。一直到她目睹庫列爾在拍賣臺上的魔力，以及看到一千兩百萬美元的進帳，她才發現他的魅力。她強調，是在拍賣會後的慶祝晚宴上，他碰巧摘下眼鏡，她才發現他有多麼英俊；她跟他是在拍賣會過後才開始交往。蘇富比上下沒有一個人相信她說的話。穆娜用拍賣所得為自己和庫列爾買下一艘「愛之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帆船遊艇「風信號」（Phoebe），原屬於法國大亨暨愛迪達（Adidas）老闆貝爾納·塔比（Bernard Tapie）所有。

我當不了拍賣圈的風流唐璜，寧可以最佳拍賣師身分闖出名號。我努力鍛鍊自己，培養更多個人風格，畢竟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藝術拍賣市場空前繁榮，拍賣會已成了眾人目光聚集的表演臺。一九九〇

年代市場崩盤後，復甦非常緩慢（不似二〇〇八年市場潰堤後的快速V型復甦）。許多年間，似乎所有買家都按兵不動，唯一的競標者是納瑪德家族的人，他們就像吸血鬼，趁著一九九〇年代的不景氣不斷收購任何低價釋出的物品。

為了活躍拍賣會氣氛，我決定做點改變，也就是站著主持拍賣。威爾森和其他拍賣師總是坐著，但我認為站著主持能夠增加拍賣活動的戲劇性，從各方面來看都更能吸引觀眾投入。我也爭取高里勛爵和安斯利的許可，我在倫敦可以主持印象派繪畫、現代藝術兩類不同的拍賣會，接著，我成功說服迪迪，讓我也到紐約一展身手；我是史上第一個跨洲際的拍賣師。

一九九四年，我在紐約取得突破性進展。華爾街一位富裕銀行家的遺孀金·史崔朗（Jean Stralem）過世（她的外公其實更富有，是雷曼家族的菲利普·雷曼〔Philip Lehman〕；家族的第三代羅伯特捐贈了大批畫作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留下珍貴的印象派與現代藝術收藏品。這批藏品當中的亮點是畢卡索一九〇三年藍色時期的作品，是畫家昂傑·費南德·迪索多（Angel Fernández de Soto）的肖像畫。為了擊敗佳士得，爭取到委託，迪迪不得不在保底金額大幅讓步，這是為了拯救公司脫離衰退的必要代價。就像時裝品牌以銷售額有限的高級訂製服博取名聲，但最終目的是招徠更廣大的成衣消費者。

我很想主持這次拍賣會，但是迪迪不敢肯定我比得上佳士得的首席拍賣師：在紐約紅透半邊天的克里斯多佛·伯格（Christopher Burge）。我不是他那樣的明星；還不是。但我知道這批了不起的藏品拍賣可以讓我一炮而紅，我得說服迪迪讓我試試看，況且馬里昂已經離開，除了我，她還有哪位拍賣師可仰賴呢？接著，迪迪得說服史崔朗的那些遺囑執行人，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的名字。迪迪堅持眼見為憑，讓他們搭協和客機飛到倫敦，親眼看看我主持拍賣，他們也不反對。迪迪毫不留情地警告我：「你可別搞砸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登場的這場拍賣會出師不利。只有少數物品拍出預估價，大部分都未達到預估水準，似乎連印象派畫作也無法解除我們陷入的衰敗詛咒。藍色時期畢卡索作品是第十四號拍賣物，史崔朗一九四六年在諾德勒畫廊以兩萬兩千美元（約臺幣六十六萬）購入此畫。一開始，出價價格上升緩慢，但我有六個競標人，幾位坐在大廳裡，幾位透過電話競拍，我盡我所能保持拍賣的緊張氣氛，讓他們繼續喊價。

最終只剩兩位電話競拍者。整個過程其實只歷時六分鐘，但對我來說何等漫長。當塵埃終於落定，我敲下木槌，成交價兩千九百一十萬美元（約臺幣八億七千三百萬），買主是倫敦的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成交價超出預估價（八百到一千兩百萬美元之間，約臺幣兩億四千萬到三億六千萬）近三倍，這是從一九九〇年市場崩盤後，藝術拍賣市場成交金額最高的一幅畫作。這幅畢卡索賣出後，接下來的拍品也無比順利地一一成交了，簡直像電影裡「迅雷」橄欖球隊（Thundering Herd）絕地重生的際遇²⁷⁰。馬蒂斯一九二三年的〈印度教姿勢〉（*Hindu Pose*）以一千八百九十萬（約臺幣五億六千七百萬）拍出，刷新馬蒂斯作品的最高紀錄。當晚四十六幅畫（只有兩幅沒有賣出）帶來六千五百萬美元（約臺幣十九億五千萬）進帳，遠高於我們預估的三千七百萬美元到五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一億一千萬到十五億）。市場又恢復生機，對蘇富比和對我來說，都是意義重大的一晚。

我在蘇富比的工作看起來可能像是追著一些迷人的伯爵夫人獻殷勤，說服她們把藝術收藏拿出來，然後精心準備一場演出來追求最大利潤。但是其中也有福爾摩斯偵探小說般刺激的一面，以及利他性質、公共服務性質。比如一九九五年，差不多是史崔朗藏品拍賣會登場的同時，我服務的一對客戶為我帶來豐富多采的回報。一切要回溯到我剛回鍋蘇富比的時候。我剛完成莫斯科的那場拍賣會，奠定我「鐵幕拍賣專家」的聲名。於是，二十世紀一位頂尖收藏家的孫輩連絡我，看我是否能幫他們在蘇聯找到家族遺失的一批藏品，並協助他

們要回來。該位收藏家是德國保險業大亨奧托·蓋斯騰伯格（Otto Gerstenberg），在希特勒尚未掌權的年代，他相當於德國的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²⁷¹。他收藏裡的亮點是一幅竇加一八七五年的傑作〈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

當戰爭陰影逐漸籠罩德國，並非猶太人的蓋斯騰伯格求助柏林國家畫廊代為保管他的藝術收藏，以免遭到轟炸或其他危險。國家畫廊接下重任後，又緊張兮兮地把所有藝術品存放在柏林動物園附近一座安全的地下碉堡。但戰事結束後，所有畫作不翼而飛，碉堡所在的東柏林當時是由蘇聯掌控，官方的說法是，該處碉堡遭遇祝融，所有畫作悉數燒毀。

蓋斯騰伯格的繼承人，分別在漢堡和慕尼黑經商的迪特·沙爾夫（Dieter Scharf）和沃特·沙爾夫（Walter Scharf）懷疑藝術品還在，是蘇聯將它們當作戰利品掠走了。六旬開外的沙爾夫兄弟在一九八六年初次找我商談，希望我能幫忙找出消失藝術品的真相。他們給了我一份長長的藏品清單，有多幅哥雅、雷諾瓦、畢卡索和竇加，這是一份誘人的清單，於是我開始尋寶。我還拿到一本厚厚的畫作照片集，那些黑白老照片都帶著歲月的痕跡，但卻是我能憑藉的唯一證據。我為提森男爵工作時，結識了冬宮博物館的波里斯·皮亞托夫斯基，以及普希金博物館的安東諾娃女士，我去拜訪他們，想探聽一點訊息。但兩人對我百般敷衍，宣稱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因為這是子虛烏有的事。他們一再強調蓋斯騰伯格的收藏已遭焚毀。我沒有死心，找上文化部秀出這份清單，也就此播下長期奮戰的種子。波里斯於一九九〇年去世後不久，我接到他兒子米金的來電。「奇蹟出現了！」他告訴我，並邀請我帶著沙爾夫兄弟前往聖彼得堡。

為了面對可能揭露的重大真相，沙爾夫兄弟不僅帶上他們的家人，也讓頂尖畫商丹尼爾·威爾頓斯坦的花花公子兒子艾力克（Alec Wildenstein）隨行。該位畫商一直試圖和沙爾夫兄弟談定交易，如果真能找到遺失的收藏品，他打算買下一批。不過比起畫作，艾力克對

蘇聯的美女更感興趣。他夜夜笙歌，玩得非常起勁，以致有次談判時，他趴倒在桌上不醒人事（想必是伏特加、魚子醬的威力）。

我們抵達聖彼得斯堡（原名是列寧格勒）後，第一站即是米金·皮亞托夫斯基的辦公室。他父親的書桌後方原本掛著列寧肖像，現在已換成凱薩琳女皇畫像。很顯然，共產主義已死！女皇萬歲！米金帶我們逛了一圈冬宮博物館，他的解說非常精采。我們最後來到一間華麗大廳，中央立著一個背對著我們的畫架。我們走到前面，就是這個！那幅消失的竇加。畫作後面的貼條記載著沙爾夫兄弟的祖母在柏林的地址。兩兄弟看來不像是輕易掉淚的人，但在此刻，他們激動地痛哭起來。

米金帶我們去另一間寶庫。那裡有更多的畫作，幾幅畢卡索水彩畫是那麼清新亮麗，彷彿是前一日剛完工一樣，而這是因為它們已有四十年不見天日。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印第安納·瓊斯，找到了失落的珍寶。我逼問米金：「這是怎麼回事？」他說：「我不知道。我們剛剛發現這些畫，我才剛上任。」他因為父親去世才接手博物館，就算他否認知情倒也合情合理。

米金對我們親切有禮，到了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館，安東諾娃女士卻依然遲疑又語帶保留。畫作從德國被移往莫斯科的那個年代，年輕的她是駐德國的政治委員。據傳，負責把焚毀畫作從疑似遭祝融的地下碉堡移出，再祕密運送到莫斯科的人正是安東諾娃，但她一概否認。同樣地，普希金博物館也才剛找到蓋斯騰伯格的收藏品，有哥雅、杜米埃（Daumier）和其他畫家的作品。總之，又是一次「無從解釋」、天外飛來的神蹟。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讓藝術品回到沙爾夫兄弟手中。蘇聯人不會讓步，這些藝術品若在私人博物館找到是一回事，但是在公共博物館裡發現，又是另一回事。在蘇聯人看來，這些藝術品理所當然屬於他們所有，這是對抗納粹、損失了上億人口以後應得的戰利品。偷走蓋斯騰伯格收藏的人並不是他們，而是希特勒和戈林，希特勒和史達林

之間可沒有產權繼承關係。所幸沙爾夫兄弟很有耐心，所有藝術品安然無恙，沒有毀壞，已讓他們喜出望外。

米金·皮亞托夫斯基與沙爾夫兄弟就畫作的事，開誠布公地進行了商談。沙爾夫兄弟非常感謝蘇聯人精心照顧這些藝術品，他們提議讓蘇聯保留其中一半，至於沙爾夫擁有的這一半，日後他們若有意出售，可以提供蘇聯優惠價格。東、西方經歷了長久冷戰之後，這些友好的討論可說為文化外交開啟了新的一頁。只可惜隨著普丁（Vladimir Putin）在二〇〇〇年上臺，俄羅斯國會回歸強硬路線，通過了一部非常嚴苛的法律。根據此法，從納粹德國取得的藝術品歸俄羅斯所有，俄羅斯是那些藝術品唯一的主人。真心熱愛藝術，不僅僅是爭取所有權的沙爾夫兄弟，倒是能理解俄羅斯的立場。

這對兄弟就和海里一樣，樂於跟全世界分享他們擁有的藝術品。米金於一九九五年在冬宮博物館舉辦的展覽已足以讓他們欣慰，該場展覽展出蓋斯騰伯格收藏裡的七十五幅法國繪畫作品，造成極大轟動。展覽名稱為「遺失的寶藏重見天日」，但全球多數媒體報導的基調都是「遭掠奪的戰利品大曝光」，以抗議俄羅斯人拒絕將價值數億美元的畫作交還給真正主人。我很開心能出一分力，讓這批藝術收藏重見天日，從而激發出相關的辯論，雖然此一重要議題的解決之道至今仍無定論。普丁掌權已經澆熄我們所有希望，但是畢竟還有米金這樣講道理的人，我們仍能期待有朝一日，俄羅斯會將沒收的藝術品物歸原主，不是還給掠奪的納粹黨人，而是希特勒統治下無辜的猶太受害者。

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藝術市場仍然搖搖欲墜。一九九二年秋季，迪迪在龐德街總部召開了一次會議，約莫九位英國、歐洲各辦事處負責人齊聚一堂，她想聽聽大家對調漲買家佣金的想法。我們需要賺錢，而提高佣金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在過去十七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對所有拍賣品一律收百分之十的佣金。現在，迪迪問我們，如果五萬美元（約臺幣一百五十萬）以內的交易收百分之十五，超過五萬美

元的交易收百分之十，客戶會有什麼反應；她也打算在紐約廣徵各方意見。

歐洲的「高層」包括了我、德國辦事處的克里斯托夫·道格拉斯伯爵（Count Christoph Douglas）和法國辦事處的洛荷·德·博沃康公主（Princess Laure de Beauvau-Craon）；那就像一個成年人版本的蘇富比「藝術課程」，不過現在我們有薪水拿。英國的「高層」則是英國蘇富比主席亨利·溫德姆（Henry Wyndham）與蘇富比歐洲區總經理喬治·貝利（George Bailey）。之所以會有這麼多顯赫的頭銜，是因為發頭銜比發錢來得容易，現在可是金錢短缺的非常時期。我們一旦認知到錢源問題，便一致認同提高佣金是一個好主意。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迪迪似乎是遵循了我們的建議，宣布提高佣金。那年十二月，離我們調整佣金費率的宣告還不到一個月，佳士得拍賣行不出所料地仿效跟進（一如往常），宣布他們也將佣金調到一樣水平。「我們別無選擇。」戴維奇告訴《紐約時報》。他對準買家表示歉意，此舉無疑會對他們的財務帶來影響，「但是，我們認為，與蘇富比平等競爭是非常重要的。」的確，二十年前，兩家拍賣行幾乎是同時在歐洲實行百分之十的買家佣金率。至於藝術經紀商，面對此一調整是群情激憤，大嘆這樣的佣金率會害他們破產。陰謀論隨之而生，他們認為兩家拍賣業宿敵一定私下談成「交易」。不過，在英國，聯合定價並不違法，價格協議疑雲很快地不了了之。

佳士得跟隨蘇富比調漲佣金一事，拍賣界倒是沒有人覺得奇怪，佳士得向來是亦步亦趨地跟在蘇富比後頭。

到了一九九八年，迪迪和戴維奇共謀操縱佣金費率的醜聞爆發，我們所有人都震驚得不得了，這兩人是公認的死對頭，還是拍賣界最天差地遠的兩個人。美國反壟斷律師向聯邦法院提起集體訴訟，指控D&D（迪迪和戴維奇）密謀商定新的佣金價格，也談妥許多非競爭性協議。忘了讓海倫·米蘭飾演迪迪的事吧，以迪迪本人的演技，她可以稱職扮演海倫·米蘭了。她的演出何其精采，假裝就調漲佣金一事

徵詢我們的意見，實際上卻已跟戴維奇達成協議。蘇富比和佳士得透過這樣的價格底線，各自獲取數百萬計的報酬。迪迪在一九九二年舉行的高峰會議，不過是一齣唱作俱佳的大戲。

但強制調漲費率並不會導致經營劣勢，由於生意清淡，我們需要盡可能擴展收入來源，從菁英階級下手尤其理想，畢竟他們對價格毫不敏感，只要對我們拍賣的美麗物品感興趣，多少錢都願意給。再說，兩家拍賣行總是彼此模仿，在同一座城市開設辦事處、追逐同樣的客戶、賣同樣的藝術品，那麼收取相同的佣金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並不需要暗中勾結或串謀。然而，美國有嚴厲的反壟斷法，他們只會把此事視為聯合價格操控。佳士得的老闆是英國人，因此高層遵循相對寬鬆的英國標準；而蘇富比老闆是美國人大弗，公司運作得符合更嚴謹的美國規範。

醜聞爆發時，我發現自己被矇在鼓裡，完全看不出迪迪和戴維奇有串謀任何協議。正如我所說，她是如此出色的女演員，在她的布局之下，佣金調漲似乎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我很感謝她沒有把我們牽扯進去，但戴維奇坦白將兩人的協議告知佳士得的同事，害他們成了共謀者。我也看不出大弗和大東尼（佳士得董事長安東尼·坦南特爵士〔Sir Anthony Tennant〕）是否知情此事。

但是迪迪怎麼可能不跟大弗一一彙報她做的每件事、知道的每件事，他可是她的神仙教父。是大弗將她從花旗銀行的帳本堆裡解救出來，給了她每個女人或男人都想要的夢幻工作。二〇〇〇年，聯邦調查局就此案嚴厲盤問我數小時，有幾個問題非常冗長，但我只能簡短回一句：我不知道。我忙著為公司帶回利潤，哪有空操心誰做了什麼手腳。

雖然聯合價格操縱是我在蘇富比任職的時候發生，但這件醜聞一直到我離職很久以後才曝光。史崔朗藏品拍賣會以後，我又主持了幾場規模同樣盛大的拍賣會，赫然明白，自己在蘇富比差不多已嘗試過能做的每一件事了（縱使我不是事事一手抓的迪迪），此時的蘇富比

是迪迪之家，而不是歡樂之家，況且我們還是落後佳士得，居於第二位。我們的毛利率勉強達到百分之一，這家公司在衰退，似乎沒有前景，總是在緬懷過去，而不是放眼未來。我不想再當蘇富比軍團裡拚死拚活的將軍，我渴望自立。儘管我享受當蘇富比的首席拍賣師，卻對公司的官僚主義感到失望；我想輕裝度日。聽到我要辭職，迪迪再高興不過，大弗則是非常憤怒。他的怒火持續了很久，我在一九九七年離開，他一直到十年後才願意再跟我說話。總之，我為大弗盡心盡力了十一年，是時候自立了。

267 後成為佳士得亞洲區主席，而取了中文名字：高逸龍。

268 美國著名電影監製，擅長警匪、科幻、驚悚類別，代表作為引爆科幻熱潮的《駭客任務》（The Matrix），另外還有經典警匪電影如《終極警探》（Die Hard）、《致命武器4》（Lethal Weapon 4）。

269 據說是全世界排名十二的富豪實業家，對阿拉伯王室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他沒有登上《富比士》的排行榜，因為他有部分財產的來源沒有公開。

270 電影《希望不滅》（We Are Marshall）。講述一九七〇年維吉尼亞州馬歇爾大學橄欖球隊（迅雷）隊員加上教練等人，在比賽返家的路上因意外全數喪生，之後全鎮居民從悲傷到振作的歷程。

271 美國金融家及銀行家（一八三七～一九一三），生前可謂壟斷全世界公司金融及工業併購。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及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都是他合併重組的成果。他是進步時代顯赫的金融家，對效率及現代化的追求和貢獻，令美國的商業從此改頭換面。《華爾街日報》曾評論他：「重新組織了這個世界。」

第十七章 女人們

我想我若要自立門戶，就需要一個女人來當合作夥伴，而且那個人必須是丹妮拉·盧森堡。我們曾是蘇富比的同事，她擔任過以色列辦事處的負責人。丹妮拉與迪迪南轅北轍，她出身貧窮，是個異鄉客，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唯二的共同點就是無限的精力和智慧。人們可能會說我的形象非常舊世界的歐洲，那麼，丹妮拉就是一個勇敢無畏的新世界典範。丹妮拉與我勤獻殷勤的那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客戶截然不同，她猶如地中海的一縷清新微風。

用「勇敢無畏」來描述丹妮拉再恰當不過。丹妮拉出生於波蘭，父母曾被關進集中營，家族中不乏死於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一九五〇年，丹妮拉三個月大時，一家三口移民到以色列，落腳在海法（Haifa）的一間石棉瓦小屋。生活相當艱苦，但跟奧斯威辛集中營相較起來，不啻是快樂天堂。丹妮拉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文學教授，她遺傳了他們的聰明頭腦，在校修習法語和藝術史。她也在以色列軍隊服過役，就算日後要面對藝術界的壕溝戰，她也已做好充分訓練準備。她起初在以色列博物館任職，是威爾森的親戚、也就是繼他之後接掌蘇富比的威斯特摩蘭勛爵慧眼發掘她。蘇富比竭力進行海外擴展時，雇用她負責開設特拉維夫（Tel Aviv）辦事處。

丹妮拉成功應對挑戰，帶動以色列新富階級開始購買藝術品。然而，她獲得升遷，被調派到我所在的日內瓦辦事處以後，卻與迪迪發生爭執。起因是丹妮拉打算在奧地利舉辦一場拍賣會，物品是曾遭納粹掠奪、近來物歸原主的藝術品，但其猶太主人都已不在人世，於是拍賣所得將捐給奧地利的猶太人。迪迪否決了這個計畫，她覺得這樣的拍賣「沾滿鮮血」，就拱手讓給了佳士得，結果拍賣會以總成交額一千萬美元（約臺幣三億）收槌，在當時創下歷史紀錄。由於丹妮拉在蘇富比有過那次挫折，她樂意與我結盟創業。一九九七年，我們匯集了所有可貴的人脈，在日內瓦開設了我們自己的公司：德·普里和盧森堡畫廊（de Pury & Luxembourg）。

開業第一天，丹妮拉和我坐在略顯寒酸的臨時總辦公室。我們是小本經營，不曉得是否會有客戶上門。當天的第一通電話是羅納德·蘭黛（Ronald Lauder）[272](#)打來的。你能想像我們有多麼驚喜，住在紐約的羅納德或許可稱得上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收藏家。他是丹妮拉認識已久的朋友，開門見山就對她說：「告訴克魯治，我想買那件畢卡索模型。」

克魯治是楊·克魯治，日內瓦當地最傑出的藝術經紀商之一。當初在倫敦時，我與迪迪合租的就是他在梅費爾區的公寓（一段注定以失敗告終的室友情緣）。羅納德說的是畢卡索創作的一座四呎高（約一二二公分）的金屬雕塑模型，而根據該模型鑄造的五十呎高（約十五公尺）鋼製雕塑聳立在芝加哥一處公共廣場上。那是畢卡索應邀設計的城市雕塑，雖然他從未造訪芝加哥，卻欣然接下委託。羅納德願意支付兩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七千五百萬）買下該件作品。丹妮拉一講完電話，我們就打給克魯治，跟他談定交易。轉瞬間就成交一筆生意，如此輕而易舉，我們簡直不敢相信，第一次登場就打出滿壘全壘打；藝術仲介的工作多麼美好啊！在蘇富比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我們一天之內就做到了。可惜，我們的喜悅很短暫，三天過後，我們從興奮轉為洩氣。與羅納德商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想要的畢卡索模型不是克魯治手裡的這一座，他要的是另一件作品，他搞錯了。

整件事宛如《聖經》的啟示：上主賞賜的，上主又收回[273](#)。誠如《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憤怒」，克魯治的憤怒也非常強烈。我以為他是朋友；我認識他已有許多年，但這件買賣烏龍卻讓我們的友誼破裂。他認定我們違約，即使還沒有白紙黑字簽約，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克魯治氣到想控告我們，還威脅要找律師。我們眼看公司就要名譽掃地。克魯治的註冊商標是頭戴一頂軟呢帽，手杖不離身，我們還擔心他會舉起手杖痛打我們一頓。

對於無意中把我們扯進這樣的混亂局面，羅納德不僅僅表達同情，還表示會以克魯治的名義捐出一筆巨款，在波蘭蓋一間猶太兒童

學校。克魯治曾被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戰爭結束後，他去了巴黎，打算成為一個藝術家。但他最好的朋友賈科梅蒂和馬蒂斯說服他別當畫家，改當畫商。以他深厚的人脈，他不是任何人敢誑騙的對象，而我們卻出爾反爾騙了他。

克魯治沒有接納羅納德的提議，即使我們帶著橄欖枝²⁷⁴親自去見克魯治，但他下了逐客令。後來的許多年，他只要看到我和丹妮拉就會轉身迴避。克魯治在二〇〇八年去世。最大的諷刺是，就算羅納德還是跟克魯治買下那件「搞錯」的畢卡索，並多出十幾倍價格，我都不認為克魯治（不管他在天堂或人間）會原諒我們。順帶一提，我們搞錯的那件畢卡索作品，近來登上倫敦蘇富比的拍賣會，以遠低於兩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七千五百萬）的價格落槌。

雖然一開業就出了大烏龍，我們的新公司不僅存活下來，還成長茁壯。我們與克魯治之間的問題雖然無解，但很自豪能招攬、培養出一批穩定客戶。我們的努力在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得到回報，德·普里和盧森堡畫廊很快在歐洲大陸站穩腳步，當時釋出市場的一些重量級畫作，諸如梵谷、雷諾瓦，克林姆、畢卡索、布朗庫西（Brancusi）²⁷⁵和其他畫家的頂尖作品，有一部分是由我們經手賣出。

我們的生意好到吸引LVMH集團總裁貝爾納·阿爾諾的注意。這位法國精品帝國的掌門人無法忍受死對頭弗朗索瓦·皮諾超前他一步，在一九九八年以十二億美元（約臺幣三百六十億）收購佳士得。就如同蘇富比與佳士得是公認的敵手，他們之間的競爭也是人盡皆知。如果皮諾擁有一家拍賣行，那麼阿爾諾也要有一家。順理成章的選擇是蘇富比，但是大弗不賣。因此阿爾諾決定從一磚一瓦開始，蓋出自己的蘇富比。而他挑中的那塊磚瓦是一家歷史悠久但死氣沉沉的倫敦老拍賣行「菲利普斯」。它成立於一七九八年，其創辦人哈利·菲利普斯（Harry Phillips）正是佳士得創始人詹姆斯·佳士得（James Christie）的首席祕書。拿破崙、美男子布魯梅爾都曾透過菲利普斯拍賣私人物品，讓他非常引以為傲，就連瑪麗王后（就是說沒麵包吃就

改吃蛋糕的那位) 上斷頭臺後的遺產，也由該拍賣行經手。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今輪到丹妮拉與我上場了，我倆的投入將把蘇富比、佳士得兩家拍賣行的戰爭，變為三足鼎立；把拍賣業變成更活絡、更自由競爭的市場。

我是在擔任古馳品牌董事時初次見到阿爾諾，他當時正陷在與皮諾的PPR集團²⁷⁶爭奪古馳的大戰。最後阿爾諾出售手中持股，由皮諾收購了古馳品牌。皮諾「表面上」贏得勝利，但阿爾諾的獲利超過七億美元（約臺幣兩百一十億），且交易底定兩天後發生了美國九一一事件，使得奢侈品市場受到沉重打擊。

我見識過阿爾諾的昂揚熱情，皮諾也一樣熱情有幹勁，但兩人非常不同。阿爾諾是優雅、超然、有禮的思考型；皮諾則是事必躬親的行動派。他雖然散發溫暖和熱情的氣質，卻也與阿爾諾一般剛毅、果斷。

LVMH集團與藝術界交好，將藝術與品牌宣傳相結合的方式，令我刮目相看。路易威登陸續與理查·普林斯、村上龍、草間彌生等藝術家合作，奢侈品牌跨界藝術已蔚為炫酷風潮。阿爾諾幾乎是矇著眼就以低廉的（跟皮諾收購佳士得的價格相較）一億兩千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十六億三千萬）買下菲利普斯拍賣行。他是一個使命必達的男人，而他的使命是藝術，令我激賞。

阿爾諾的辦公室位於蒙田大道（Avenue Montaigne）迪奧總店頂樓，我前往拜訪時，見識到他精緻不凡且無可挑剔的品味。他招待的食物和葡萄酒足以與附近任何一家三星級餐廳媲美。阿爾諾的生活就是文化，聊的話題、講的話題都是文化。他的妻子來自加拿大法語區，是一位鋼琴演奏家；他自己的琴藝也很好。他說服我加入菲利普斯、成為他合夥人，整個過程就像優雅從容地彈奏一首樂曲。他對我說：「你現在缺少一個舞臺，而你需要舞臺。」他知道我有多喜歡主持拍賣，也知道我多麼想念拍賣臺。他彈對每一個琴鍵。我告訴他我有一個合夥人，他說：「她現在也是我的合夥人。」這家新公司將命

名為「菲利普斯、德·普里和盧森堡」拍賣行。丹妮拉和我共持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而LVMH集團擁有百分之七十五。有了史上最夢幻的後盾，我們知道自己有能力與兩巨大頭競爭；我們真的加入拍賣業戰局了。

根據阿爾諾最初的構想，菲利普斯會比拍賣業兩巨大頭更有營利的空間，因為經常性支出和官僚系統已為兩家拍賣行帶來沉重的負擔。人事成本和目錄支出吃掉最多利潤，因為一本目錄成本可能超過七十美元（約臺幣兩千一），而根據拍賣會的規模大小，拍賣行很可能一次送出一萬五千本。每年有許多場拍賣會，目錄開銷也隨之節節高升。人事成本也使得利潤嚴重縮水，兩家拍賣巨頭的員工數量非常多，滿是死忠元老、年資非常久的老鳥、靠裙帶關係進去的親友，宛如是一艘超載的諾亞方舟。我們知道像阿爾諾這般優雅的完美主義者絕不容許省掉目錄開銷，但是人事支出方面，特別是英國菲利普斯拍賣行內部的人員，他預期丹妮拉與我會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

不過最好的計畫經常會節外生枝，以阿爾諾先生的雄厚財力與極大的雄心壯志，我們嚮往的簡單瞬間變得複雜。除了倫敦總部外，LVMH集團也在紐約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七街口租下一處豪華氣派的空間。我以聖瑞吉斯飯店為家，丹妮拉則搬到上東城，曾屬於皮耶·馬蒂斯（Pierre Matisse，畫家馬蒂斯的兒子，職業為畫商）的一戶連棟屋。我們全力籌備二〇〇一年春季舉行的第一場拍賣，為了在紐約闖出名號，這場拍賣會必須非常盛大，登場的拍品確實是重量級，是出自知名藝術經紀商海因茨·貝格魯恩的收藏品。我在伯恩的科恩菲爾德畫廊當學徒時結識了貝格魯恩，直到為提森男爵工作期間，才有機會和他建立進一步交情（他和男爵是朋友）。

就像海里把收藏搬到馬德里一般，海因茨也曾將他的壯觀收藏品搬移到其他國家。他是二次戰後巴黎最頂尖的畫商之一，德國政府找上他，表示要為他興建一座美術館，希望他能將收藏搬移到柏林。那座城市是他的出生地，但在納粹大屠殺期間，身為猶太人的他被迫流亡。不過他接受了提議，寬恕那段歷史、與過去和解的舉動使得他成

為國際藝術明星。海因茨總是說：「我不是法國人或德國人，我是歐洲人。」他也喜歡在柏林受到的待遇，美術館樓上規畫了寬敞公寓供他居住，讓他每一天都能見到自己收藏的畫作。「我可以跟它們道早安、道晚安，知道它們就跟我在一起，讓我夜裡睡得很安穩。」

海因茨原本打算在退休後搬到日內瓦，把所有收藏捐給瑞士政府，但是一九八七年，我負責安排海因茨的藝術藏品到日內瓦一家美術館展出，無奈幾位過分認真、目光銳利的瑞士海關官員注意到幾幅較小的作品沒有進口文件，他們當下沒收那些畫作，直到文件補齊才放行。海因茨深覺受辱，他隨即賣掉日內瓦的寓所，搬離瑞士，改成與英國眉來眼去，直到德國示好，提出絕佳條件，他終於決定落腳地。官僚主義使得瑞士錯失全球數一數二的藝術珍藏。

現在海因茨想要賣出收藏品；我知道一定得提出絕無僅有的好條件才能取得他的委託。海因茨喜歡錢，幸運的是，阿爾諾先生非常有錢，也樂於提供比蘇富比或佳士得更高的保底金額；以好萊塢術語，這叫做「票房保底」。麥可·艾斯納（Michael Eisner）²⁷⁷接掌迪士尼公司後，開始跨足非動畫的電影市場，他們花費了巨資打廣告來吸引觀眾進電影院。頭幾部電影相當賣座，但其實虧本，直到全世界都正視迪士尼也能製作出好的非動畫長片，公司才開始獲利，因此菲利普斯、德·普里和盧森堡拍賣行也會這麼做。我運用自己的資歷、運用LVMH集團願意提供的巨款吸引海因茨選擇我們，我確定這是一筆值得的交易。阿爾諾和我飛往柏林，在當地巴黎酒吧與海因茨敲定委託，那裡瀰漫著電影《酒店》（*Cabaret*，黛德麗²⁷⁸主演）²⁷⁹裡的頹廢時代氛圍，我們猶如來到二戰前的夜總會。

我穿上我的好運卡拉契尼西裝，搭配瑞士銀行家招牌的白襯衫與黑領帶，踏上專為菲利普斯打造、簇新的拍賣臺（我事先吃了一顆蘋果，這已成為我主持拍賣前的幸運儀式）；我準備好了，我會竭盡心力做到最好。塞尚令人驚歎的〈聖維克多山〉（*Montaigne Sainte-Victoire*，他從普羅旺斯艾克斯的工作室望出去的景色）以三千八百萬美元（約臺幣十一億四千萬）落槌，海因茨另外四十幅出色的收藏品

也順利賣出。我還賣出了其他收藏家的物品，比如槓桿收購之王亨利·克拉維斯（Henry Kravis）擁有的兩幅雷諾瓦。最終的總成交額是一億兩千四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十七億兩千萬），這個數字或許低於我們答應海因茨的保底價格，但這場拍賣會的重點不是獲利，而是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菲利普斯拍賣行已經證明自身的能耐，既可以賣出「重量級」的印象派畫作，也可以賣出過去從未經手的現代藝術作品。

我清楚記得那年九月十一日，我人在哪裡，又是如何知曉悲劇的發生。我當時在巴黎，正穿過寧靜的杜樂麗花園（Jardins des Tuileries），走向LVMH集團在蒙田大道的辦公室。忽然手機響起，我獲知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大樓的其中一棟已經倒塌。我前往迪奧總店頂樓阿爾諾先生的辦公室，和他、丹妮拉坐在那裡一起看電視，目不轉睛地盯著第二棟樓在火焰中倒塌，而我們的菲利普斯美夢也同樣化為灰燼。那天晚上在龐畢度中心有一場杜布菲（Dubuffet）[280](#)展覽的開幕晚宴，主辦人阿爾諾趕緊取消。兩天後，LVMH集團律師打電話來，告知我們噩耗：世界情勢已經改變，他們想要抽身。

雙子星大樓倒塌猶如我的婚姻。在工作上，我很果斷決絕，但是對於是否要離開家，我始終猶豫不決，就像當初決定是否離開蘇富比去為提森男爵工作，或者是否離開男爵回鍋已易主給陶博曼的蘇富比，我就是拿不定主意；離開迪迪所在的蘇富比，我倒是毫無遲疑。不過離職還是比離開妻子容易許多，因為我深怕一離婚，就會失去孩子對我的愛，對我來說，他們的愛比任何事都重要。

我徬徨、消沉到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找日內瓦的一位女心理醫師做了十次諮商。沒想到心理治療只讓狀況更糟。住在蒙特勒（Montreux）的一位印度公主介紹我去找她的占卜師，這是一個絕望男人在絕望時期的終極手段。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接觸神祕學。我替海里工作期間，他的好友亨利·福特娶了第三任妻子凱瑟琳。她是出身密西根州的活潑、樸實女孩，曾當過模特兒，第一任丈夫是克萊斯

勒汽車公司的裝配線工人（她也是再婚），暱稱凱西的她醉心於研究占星學，亨利也因此迷上占星。

福特採取任何行動前，一定會先問過他們的算命師（並不是吉普賽人）。說起來，那個女人似乎才是福特汽車的執行長。有一次我到底特律美術館做藝術演講，凱西送我一次免費諮詢。那個女人非常了不起，她不僅知道我是來演講，也說中我生活裡的其他事情，包括伊莎貝爾、丹妮拉和菲利普斯。此刻我很想找她協助，但她已經因癌症過世。

於是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印度公主的贈禮。那位占卜師叫卡門·比騰哈德（Carmen Bietenharder）。她穿著白色長袍，頂著銀白色的男性化平頭，有一隻小西施犬陪伴在旁。小狗是客戶伊莉莎白·泰勒送的禮物；卡門曾在好萊塢生活了十二年。她告訴我，她的狗跟我是同一天生日，這一點有重要意義；雖然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義。卡門在一九九八年來到我們的辦公室，她把一塊布攤開來鋪在桌上，接著鋪開她的占卜牌。

在算命過程中，我和丹妮拉的助理剛好走進來，撞見我們求助神祕學的行為，覺得我們大概失心瘋了。但卡門正確說出錢的問題，她了解丹妮拉和我的所有煩惱，心理醫師做不到的，她都做到了，她幫助我擺脫內疚，讓我可以果敢下定決心。我找到離家的勇氣，在日內瓦租了一間公寓獨居。雖然還沒有離婚（我非常恐懼做這個決定），但四十多歲的我感覺宛如新生。接著，我邂逅了路易絲·麥克貝恩。

我在二〇〇〇年夏天和路易絲第一次相遇。那時候，我的事業和私生活都好得不能再好。卡門給了我勇氣、幫助我看清目標，丹妮拉與我在瑞士經營的畫廊生意昌隆，阿爾諾也即將找上門，把我這個蘇富比前員工變成蘇富比的主要競爭對手。某個週末，我到長島為水磨坊藝術中心（Watermill Center，由德州出生的前衛劇作家羅伯特·威爾森〔Robert Wilson〕所創立）主持一場慈善拍賣。我的友人，專營藝術書的凡登出版社（Vendome Press）老闆，艾力克西斯·格雷戈里

（Alexis Gregory）帶我到琴酒巷（Gin Lane）的一幢豪宅裡享用午宴，那是全漢普頓（我們人在南漢普頓）最負盛名的地點。

伍迪·艾倫的電影《我心深處》（*Interiors*）即在該處宅邸拍攝，豪宅女主人是路易絲·麥克貝恩。她肯定是我見過最美麗又超級有錢的女人之一。路易絲年方四十，有一頭草莓金髮，非常時髦、高雅。她是加拿大人，但只有跟加拿大客人說話、互動時，才能稍微聽出她的口音（法語或英語皆然）。關於她，艾力克西斯只告訴我兩件事，一是她經營一個全球出版帝國，專門出版以底端市場為訴求、靠分類廣告營利的雜誌；二是她有興趣「深入了解藝術」。我老是聽到這個或那個富人對藝術感興趣，所以沒什麼好興奮的，但是路易絲的外表與魅力，以及她特意更動午餐座位表，好讓我坐在她旁邊的舉動，確實讓我心動。她那宛如雕刻般纖細、美麗、完美的相貌令我想到海里的第四任妻子丹尼絲，然而丹尼絲是四處玩樂的女孩，路易絲則是嚴肅認真的人，她的財富很可能是自己賺來的。

我以為路易絲是單身，獨自經營她的帝國。午餐後，艾力克西斯為我解惑，事實不是如此。她的公司叫商人有限公司（Trader Inc.），聽起來像殺人有限公司（Murder Inc.），是她的丈夫約翰·麥克貝恩（John MacBain）一手創立。兩人育有三個孩子。同時，路易絲也是積極參與公司事務，與丈夫平起平坐的合作夥伴。她對新科技很感興趣，想把自家的分類廣告雜誌放上網路，也想把網路帶進原始、落伍的藝術界（業界人士仍在寄送裝滿幻燈片的大包裹）。她在日內瓦有間宅邸，她邀請我過去探訪，給她一些建議。

在那幢《我心深處》場景的豪宅裡沒有擺放、懸掛任何藝術品，因此我無法知道她的品味（如果她有的話），我只注意到她的興趣似乎在我身上，令我受寵若驚。但我不太跟得上她的談話，都是一些關於藝術科技化之類的話題。她的談話內容融合了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²⁸¹那類的心靈教誨，以及《華爾街日報》的嚴謹報導，總之就是新時代心靈運動加上財富五百強的綜合體。無論如何，由於她貌美又擁有成功事業，我還是專心聆聽，試著理解她所說

的一切。她想當先鋒，並認為我可以幫上忙，南漢普頓、日內瓦、藝術、科技……有何不可呢？

再說，有一件事讓我特別興奮，路易絲是從海里的好友（兩人也合資購買藝術品）傑米·奧茲·帕提諾手中買下她那幢日內瓦豪宅。他不愧為高爾夫球之王，在宅邸周邊建了一座九洞球場，並將收藏的藝術精品掛滿屋裡，他後來決定出售收藏品的時候，更全權交由我處理。凡是跟帕提諾家族有關的拍賣，我都擁有好到不可思議的運氣，從傑米的藏品拍賣、傑米和海里共同持有的高更畫作拍賣，到阿爾比娜·杜·博芙維的珠寶收藏拍賣都是。我本來就迷信，算命師卡門成功幫我解惑，更令我深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因此我把過去那幾次成功經驗，當作好運降臨的預兆。

回到日內瓦後，我前往她的豪宅—我眼裡的好運之屋—拜訪。宅邸裡有戴白手套的管家、服務無微不至的僕人，路易絲說他們之前在法國愛麗舍宮任職，服務過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但室內懸掛的畫作只有一幅中等品質的夏卡爾，以及希涅克（Signac）[282](#)的一幅小畫，跟傑米住在這裡時滿室藝術品的盛況相比，實在冷清得不得了，可見路易絲對藝術的品味相當傳統，我不免感到失望。後來，我老實對路易絲說，她的品味跟我南轅北轍，而她的回應是改變自己的喜好順應我。我也坦白跟她說，我不太喜歡她南漢普敦房子的室內設計（阿爾貝托·平托〔Alberto Pinto〕[283](#)的作品），於是她找來我欣賞的法蘭索瓦·卡圖（François Catroux）[284](#)重新裝潢房子；她儼然是一隻變色龍，這種模仿舉動會讓她無往不利，至少在任何關係的開端是如此。

我在日內瓦豪宅第一次見到路易絲的丈夫時，心中的甜蜜幻影瞬間破滅。他拿過加拿大羅德獎學金（Canadian Rhodes Scholar）[285](#)，擁有哈佛企管碩士學位，是一個活力十足、令人欽佩的男人。我也得知路易絲的一點家庭背景。她來自魁北克一個法國天主教家庭，家裡經營保險代理公司，姊姊是億萬富翁保羅·德馬雷（Paul Desmarais）的媳婦。德馬雷為加拿大能源開發公司鮑爾集團（Power

Corporation) 的總裁，地位宛如是加拿大版的巴菲特 (Warren Buffett)。約翰·麥克貝恩在鮑爾集團工作，透過路易絲的姊姊結識了她。約翰在一九八七年離職，跟路易絲一起創辦《週刊雜誌》(Hebdo Mag，與巴黎的《查理週刊》[Charles Hebdo] 286並無關係)，它迅速成長為擁有三百多個分類廣告欄位的刊物。這對夫婦經營生意似乎能點石成金，以我這種藝術家性格、到處東奔西跑的人看來，實在是我無緣擁有的了不起能力。路易絲迷戀文化和社交生活，而約翰喜歡跑馬拉松。

約翰放任路易絲去追求她對藝術的喜好，還用私人飛機載我到歐洲各地，一起探索形形色色的藝術作品。我們去了一趟蒙地卡羅，在那裡，我介紹路易絲認識我的朋友漢姆特·紐頓，她若想宣傳她的分類廣告雜誌，可以跟他談談拍攝廣告的合作案。我首次在《時尚》雜誌上看到漢姆特的攝影作品時，就打定主意一定要結識他。為了和他建立交情，我邀請他擔任日內瓦蘇富比系列講座的演講嘉賓，他與妻子珍一起前來，我們一見如故。他妻子也是專業攝影師，以家鄉澳洲的愛麗絲泉 (Alice Springs) 作為筆名執業接案。

我與路易絲談生意，卻談出天雷勾動地火的情愫。有一天黃昏，我的辦公室裡只有我跟她，安德蕾·普特曼 (Andrée Putman) 287操刀的室內裝潢如此誘人，日內瓦湖的日落美景如此浪漫，我們情不自禁地吻了對方，而一個吻點燃了熱戀的火苗。我稱之為「有後續發展的吻」。我們面露靦腆，她用法語說，她準備買窗簾，爾後她買了法蘭索瓦·卡圖設計的窗簾。

因為約翰和路易絲在一起工作，我們剛萌芽的戀情宛如是一齣法國滑稽劇。約翰 (我很喜歡他) 實在太聰明，要避開他的耳目是個大難題。我們有次前往倫敦，三人一起投宿在克拉里奇飯店。我注意到約翰屢屢在我套房外頭的大廳閒蕩，雖然他表示是在找製冰機，但他出現的次數太頻繁，證明那只是一個藉口。我猜他是特意來巡視，看看是否會撞見路易絲。正巧，一個我偶爾會約會見面的英國女人來找我，他看到了她，這段插曲可能暫時解除約翰的疑心，卻燃起路易絲

的競爭心，因為約翰跟她說我有「女朋友」。路易絲怒不可抑，指責我對她「不忠」，但是我根本沒有別的對象。

某次三對夫婦在日內瓦共進晚餐，滑稽劇情又推陳出新。在場的是路易絲與約翰、丹妮拉和她的丈夫布比（Boubi）、伊莎貝爾與我。當時我跟妻子還沒有離婚，儘管卡門的占卜讓我看清事實，但我還是處於哈姆雷特式的猶豫不決。我知道自己想怎麼做，卻害怕去做。所以不可避免地，我與妻子彼此憎恨。晚餐後，路易絲放了《假如我有一把鐵錘》（*If I Had a Hammer*）[288](#)。最近一個朋友以我主持拍賣的影片剪輯了一支幽默短片，就是以這首歌當襯樂。它並不是我與伊莎貝爾的定情歌，更不是我和路易絲的定情歌，然而，伊莎貝爾似乎把路易絲播歌的這個舉動視為宣示主權。

布比是建築師，他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暨烈士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h）的直系子孫。路易絲家裡穿著制服的僕人，以及儼然王后般的派頭激起他骨子裡的激進革命精神，我差點以為他要放火燒了別墅。我記得在盧森堡大公國的一場拍賣會上，我曾向盧森堡公爵介紹丹妮拉，他們開玩笑說彼此家族來自「不同支脈」。

晚餐後，約翰開著全新的法拉利跑車載我去兜風。那是路易絲送給他的四十歲生日禮物。以兜風來形容不夠貼切，那更像是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我再次想起電影《安妮霍爾》裡克里斯多夫·華肯駕車的場景。之前在盧加諾，桑德爾·伯克斯也曾讓我經歷一趟飆車驚魂記，但這一次，嫉妒的約翰駕車更是險象環生，我根本是搖搖晃晃地下車，驚魂未定，萬分慶幸自己依舊活著。

為了幫助約翰與路易絲了解藝術生意，我經常搭他們的私人飛機一起旅行，但每趟旅程都充滿緊張氣氛，任何芝麻小事都可以讓他們吵起來，比如說，路易絲以震耳欲聾的音量播放艾爾頓·強的《琴歌傳奇：三十三年最精選》（*Elton John's Greatest Hits*）。不過，路易絲籌畫旅程的能力相當出色，她會安排我們搭乘希臘大亨的遊艇，從赫爾辛基航行到聖彼得堡，享受一趟「白夜」（white nights）[289](#)的夢幻

旅程。船上有約翰、路易絲、他們的孩子和我。旅程結束後，約翰與孩子們先返家，路易絲則留下來，和我一起在陸地上繼續藝術研究之旅。

在聖彼得堡，我們偶然碰見一群「機車俱樂部」（biker club）的騎士，其中的成員包括演員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及古根漢美術館館長湯瑪斯·克倫斯（Thomas Krens）；這些人在凌晨三點騎著摩托車繞行冬宮周圍的巨大廣場。我心知這段婚外情太棘手，結局也不會太好，但就像染上壞癮頭似的，無法自拔。有一次，我又和路易絲一家人搭著私人飛機前往俄羅斯，伊芙·沙爾夫（Eve Scharf）也同行；她是我協助過的那對沙爾夫兄弟的孫媳婦。還有另一位同伴則是希臘船王古蘭德里斯的遺孀伊麗絲（Elise Goulandris）。到了莫斯科的飯店以後，伊芙和伊麗絲這兩位聰明的「女巫」把我叫到酒吧，異口同聲地警告我，說她們已經看出來，並以朋友的身分勸我，我正在做的事不會有好下場。

路易絲不是衝動的人。但她之前就明白告訴我，她想與約翰離婚，然後跟我在一起。路易絲向來無法抗拒浮華世界和血統，她有過幾段狂熱的戀情，第一個對象是羅倫·朱諾（Laurent Junot），他的兄弟菲利普·朱諾（Philippe Junot）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後來娶了摩納哥的卡洛琳公主（Caroline）為妻。路易絲還有過一任前夫，是加拿大一家菸草公司的繼承人。那段婚姻也曾經如膠似漆，但是非常短暫。

路易絲不怕分手、不怕離婚，她準備再做一次，好跟我在一起。我四十九歲，她四十二歲。她不像我；我在私生活上經常猶豫，陷入天人交戰，而她呢？一瞬間就能做出改變人生的決定。那樣的果斷力是非常性感的特質，也證明她宛如葛麗絲·凱莉（Grace Kelly）²⁹⁰的冷靜沉穩外表只是偽裝。我們的新戀情以最浪漫的地點為場景，比如搭著噴射機往來歐亞美各洲，投宿在豪華大飯店、或富豪名流光顧的度假村。多虧路易絲和阿爾諾的垂青，我的自信大增。她租了倫敦切斯特廣場的一間連棟屋，當成我們的「愛巢」，後來我在荷蘭公園（Holland Park）找到一幢更寬敞的豪宅，屋主是汶萊蘇丹的兩位「合

法妻子」，她從她們手中買下它，後來又把這間屋子轉手給世界級女企業家戈佳·艾希肯納（Goga Ashkenazi，她曾與哈薩克總統的女婿有婚外情）²⁹¹。不久以後，路易絲與戈佳都成為英國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的密友，這一切宛如是丹妮爾·斯蒂爾（Danielle Steel）²⁹²小說的情節。

然而有一件事帶我回到現實世界，就是我五十七歲的哥哥大衛被診斷出罹患胰腺癌。我從小在他的影子下長大，人稱「大衛的弟弟」。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也是我所有親人當中，最聰明、最有魅力、最迷人的一個。他是歐洲最頂尖的外交官之一，是瑞士傑出的貿易談判專家，曾擔任幾家大公司的董事，包括雀巢集團和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我們前不久才在巴塞爾與他們夫妻慶祝他的生日，隔天，他的祕魯裔妻子前往利馬探望家人。她才剛搭機離開，大衛的醫師就來電告訴他，他罹患了胰腺癌，最多只能再活六個月。他唯一的機會，雖然微乎其微，就是接受手術。大衛一如往常抓住機會。他的妻子從祕魯趕到醫院時，醫師告知她手術非常成功，但問題是大衛再沒有從麻醉中醒來，必須靠儀器維持生命。幾天後，他的家人同意拔掉維生儀器。

就在大衛徘徊生死邊緣期間，我的神學教授哥哥阿爾博慶祝了他的六十大壽。我得在席宴上致詞，但由於大衛的妻子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大衛生病的事，我們一家人不得不製造假象，讓大家以為我們是無憂無慮的幸福家族，就猶如一場沒有人競標的拍賣會，我強顏歡笑賣力演出，實在是糟透了。我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詞，大衛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去世，而我的父親在一九九七年因心肌梗塞過世，這些年來，我的母親猶如逐漸熄滅的火苗。我很難過也很清楚自己即將成為家族支柱，我想盡力維護不可思議優良的家風。

大衛去世後，路易絲安排我搭協和客機去聖巴瑟米（St. Barthélemy）與她會合。在那裡，她租了瑞士製錶大亨喬格·寶齊萊（Jorg Bucherer）的遊艇；前一位租客是吹牛老爹（Puff Daddy）。奢華無處不在，然而痛失親人的我心情黯淡。我努力專注在我的新職

位，全心準備迎戰拍賣業的雙巨頭。路易絲對我說，她想支持我們的事業，甚至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我盡最大努力說服丹妮拉接受路易絲加入；我的這位合夥人也在談婚外情，正處於離婚邊緣。我那時還不知道，我們很快就得仰仗路易絲的商業頭腦。

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一年，我大半時間都往返於紐約與洛杉磯，安排菲利普斯下一場足以引起轟動的拍賣會。登場的是最近離世的斯姆克（Smooke）的收藏品。斯姆克在洛杉磯一手打造出自己的房地產王國，地位猶如現今的洛杉磯皇帝艾里·布羅德。斯姆克夫婦也像布羅德一樣，把金錢投資於文化，跟大多數熱愛運動、海灘的洛杉磯暴發戶截然不同。奈森（Nathan）和瑪麗安·斯姆克（Marion Smooke）夫婦也是洛杉磯郡立美術館的其中兩位創始人，他們收藏的二十世紀初德國及法國繪畫都是絕頂精品。就像力爭海因茨·貝格魯恩的委託一樣，我們也向他們的繼承人提出巨額的拍賣保證金。我知道媒體會批評我們的行為是「票房保底」，但他們也曾大肆抨擊迪士尼的執行長麥可·艾斯納，而現在，迪斯尼可是領先福斯影片公司與其餘業者的龍頭老大；我們希望菲利普斯最終也能在藝術市場上取得同樣的位置。

我們知道菲利普斯永遠不會成為蘇富比、佳士得那樣的全方位拍賣行，不管什麼客層、什麼類別的拍品都接。因此我們的經營策略是爭取菁英階層，將主力放在最高檔的印象派和現代藝術，也就是可以博得媒體報導並拍出高價的作品。就讓蘇富比去賣漫畫書、棒球卡、電影海報、娃娃，或是賈姬的小裝飾、小擺設；就讓蘇富比在官僚文化裡窒息。蘇富比和佳士得是巨型商業機器，員工高達數千位，而我們打算建立小而精、小而巧的團隊，至多不超過一百五十人。沒有人比阿爾諾更熟知何謂精品，我們會忠於他的獨特精神，正如丹妮拉接受記者訪談時說的：「如果你想買一件高級訂製服，你不會去梅西百貨。」

阿爾諾剛接手菲利普斯拍賣行時營運狀況不佳，因此丹妮拉、我與他合夥以後，不得不設定很高的目標以彌補他最初的損失。二〇〇〇

年五月，他買下菲利普斯後的第一場拍賣會簡直是一場災難。不僅拍賣的畫作不是什麼重要大作，他還請來莎朗·史東當主持人，她自從一九九二年以《第六感追緝令》（*Basic Instinct*）走紅後，星途就逐漸走下坡。莎朗以為自己是電視益智節目主持人，在走道來回走動，且由於觀眾相當安靜，她為了活絡氣氛，還坐到幾位競標者的大腿上。其中一位是大衛·納瑪德，他平常身邊就有美女環繞，要是他不中意拍品，就算莎朗坐在他腿上也無法讓他動念出價。如果這是一場慈善拍賣會，莎朗活潑的主持風格還會讓人心甘情願買單，然而，這是一場嚴肅的商業拍賣會，她的方式完全行不通。拍賣會最終以失敗收場，阿爾諾那時才意識到他得找「專業人士」。對丹妮拉和我來說當然很好，但是我們也知道自己不能走錯任何一步，肩負的壓力相當巨大。不過話說回來，壓力讓人成長，所以我樂於迎接挑戰。

很顯然，沒有人能預料到九一一事件，此一事件甚至讓全球金字塔頂端的富豪也大受震撼。皮諾是透過他家族的控股公司阿蒂密斯（Artemis）持有佳士得，而不是透過掛牌上市的PPR集團；阿爾諾不同，他是透過股票上櫃的LVMH集團持有菲利普斯。即使在九一一以前，二〇〇一年對全球精品業都是艱辛的一年。財經媒體絲毫不關心皮諾對佳士得的打算，卻有不少報章雜誌質疑LVMH集團，如此大手筆投資一項非核心業務是否有意義。

我們在八月底與斯姆克家族簽下委託保證金合約，內容無法再更動，但到了九月十二日，不管是阿爾諾、丹妮拉或我，或是任何人，都認為沒必要簽這種合約。阿爾諾決定，在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擁有一家拍賣行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所以他想抽身，出清所有股份。丹妮拉和我接到通知，LVMH集團想立即與我們談判退出事宜；著名的義大利電影《誘惑與遺棄》（*Seduced and Abandoned*）[293](#)正是我們的寫照。我們的新公司菲利普斯、德·普里和盧森堡拍賣行就像一匹疾馳的馬兒倏地煞住腳步，我得努力在鞍座上保持平衡，以免摔下。

我現在成了國際遊民，以紐約市中心的美世飯店（Mercer Hotel）為家，而丹妮拉仍然住在第六十四街馬蒂斯兒子的故居。我們匆匆準

備斯姆克藏品拍賣會，也得面對阿爾諾的退出。LVMH集團不只要擺脫我們，也放棄收購倫敦邦瀚斯拍賣行（Bonhams）及巴黎塔桑拍賣行（Tajan）的行動。從阿爾諾的舉措看來，他似乎認定藝術市場也將如同雙子星大樓一般轟然倒塌，對市場毫無信心。

那個糟透的秋天，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待在著名的德普律師事務所（Debevoise & Plimpton）與路易·貝格利（Louis Begley）商討如何應對LVMH集團。他既是咄咄逼人的公司法律師，也是心思敏銳的小說家（著有《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並且在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容的角色之間遊刃有餘。貝格利雖然頂著菁英公司員工的績優股光環，但他就如丹妮拉一樣，是出生於波蘭的猶太人。貝格利在布魯克林區長大，經過刻苦努力才擠進哈佛大學。他曾是德普律師事務所巴黎辦事處負責人，所以他會說法語，對藝術和歐洲都知之甚詳。

即使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慌情緒瀰漫紐約，斯姆克藏品拍賣會依然為這座城市帶來一絲優雅奢華，別忘了，要論雍容華貴，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得上曼哈頓島。拍賣會在菲利普斯的新總部登場，擠滿會場的五百位貴賓來自各個領域，包括拉斯維加斯賭場大亨史帝夫·韋恩、紐約的羅納德·蘭黛；儘管時局險峻，羅納德在第八十六街成立的「新畫廊」（Neue Galerie）即將要開張了。

拍賣會最終總成交額為八千六百萬美元（約臺幣二十五億八千萬），遠低於預估金額。而且有五件作品沒有賣出，就像五個令我心碎的孤兒；我的孤兒，而不是蘇富比的孤兒，這是我個人要承擔的「庫存品」。媒體報導說我們支付的保證金遠高於拍得的金額，這個損益數字完全是謠傳，卻造成極大的殺傷力，像阿爾諾這般聰慧過人的投資者當然頭也不回地退出拍賣業。

阿爾諾並不是害怕損失，畢竟只要再等幾年，他就能夠出售這些頂級藝術品存貨，裡頭有幾幅絕佳的克林姆作品和其他精品，可觀的利潤足以抵消他所花的成本。他抽身的主要原因並不是錢，而是財經媒體的指責：藝術拍賣行與LVMH集團主營的時尚業務毫不相關。二

○○一年是奢侈品市場有史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即使是億萬富翁也會在意全球媒體如何評論他們的賺錢方式。

儘管貝格利非常努力，我們仍然遭到LVMH的律師團狠狠欺壓。LVMH集團抽身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恥辱，等於宣告他們對我們沒有信心，我們像是被印上了紅A字，永無翻身之日。過去丹妮拉與我經營畫廊時非常成功，開銷低，利潤高；如今我們執掌的是一家大企業，經常性支出高，利潤為零。如果我們打算經營下去，就得面對這個現實，而我們不想放棄。藝術非生活必需品，為拍賣行籌集資金本來就不是易事，而九一一事件之後，對外集資更猶如天方夜譚。假使連阿爾諾都救不了菲利普斯，還有誰能夠呢？

何不考慮路易絲？我靈機一動。她一直催我讓她加入，我始終沒有答應，我不願把公事和私事混在一起。不過，我們正在瘋狂熱戀，她也證明自己是一個商業天才，而我現在需要什麼？正是商業天才，而且這個人最好口袋飽滿。她可以成為拯救菲利普斯的白衣騎士，反正沒有其他人想當。我和路易絲之所以會相遇，是因為她想涉入藝術生意、想融入我的生活圈，而我的生活就是菲利普斯。現在她的機會來了，還能有更理想的時機嗎？

然而，路易絲還沒踏進辦公室，合作關係就出現裂痕。剛開始，丹妮拉同意了 my 提議，「很好，我們這下找到解決之道了。」隔天，她卻推翻前言，大嚷著：「我擔心這會是一場災難……」丹妮拉與我非常熟稔，就像共用一個腦子，不管對方在想什麼都知道。那麼，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為什麼我愛路易絲，丹妮拉卻恨她？很簡單，把公事與私事混在一起就會有這種風險，特別是以私事為重的時候。路易絲希望成為股東合夥人，她承諾，只要我們讓她當菲利普斯的執行長，她就會挹注公司所需的大量現金。但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投入任何一分錢，丹妮拉認為她永遠不會掏錢出來。

此外，在藝術上，路易絲是十足的菜鳥，她卻不願意只負責營運的部分，她想要體驗「藝術」的迷人魅力。但那是丹妮拉的領域；她

是理所當然的領主。接下來一個月，我們不得不聘請巴黎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Coudert Frères）的合夥律師來調解丹妮拉與路易絲的不和，他的工作宛如在做婚姻輔導。第一天，他花了七個小時與路易絲長談，結束後，路易絲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我說的話他都同意。」

接著，他和丹妮拉談了數小時，結束後，丹妮拉也興奮地告訴我：「我說的話他都同意。」

第二天早上，律師向我報告無可迴避的結論：路易絲必須離開。我夾在合夥人與女友之間，盡我所能地發揮聰明智慧，向所羅門王看齊；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這兩個女人的自我都不小，合在一起簡直巨大得令我難以招架。丹妮拉說得沒錯，路易絲雖然信誓旦旦保證，但她永遠不會掏錢投資。她說她愛我，說她愛藝術，但她不會把錢花在這上頭。

然而在我與她的私人關係上，仗著算命師的占卜，我總算鼓起勇氣提出離婚，但伊莎貝爾不同意，我和路易絲結婚的打算因此觸礁。我甚至聘請了歐洲數一數二的律師馬克·博南特（Marc Bonnant），他幫幾位俄羅斯富豪的妻子打過離婚官司，此外，巴西億萬富翁莉莉·薩夫拉（Lily Safra）的丈夫愛德蒙（Edmond）死於摩納哥一場神秘縱火案²⁹⁴時，他也曾擔任莉莉的辯護律師。但是就連神通廣大的博南特也無法幫上我的忙。根據瑞士法律，訴請離婚時，當事人雙方都必須親自到場，在法官面前聲明離婚的意願，但伊莎貝爾不願去。

「我這麼做是要保護你。」她堅持不肯踏進法院。直到今天我都要感謝她當時堅拒離婚。總之，我與路易絲的私人關係、工作關係都無法再繼續下去，戀情就此結束。

路易絲在二〇〇二年加入菲利普斯，七個月後宣告退出；而丹妮拉也想抽身。她的朋友，極為傑出的企業家羅納德·蘭黛幫她做了分析，發現公司根本無藥可救，他建議她離開；這宛如一記死亡之吻。丹妮拉退出後，我們的攝影部經理也跟著離開，接著，公司其他部門的主管跟我約在美世飯店大廳見面。他們也要離開嗎？我還來不及絕

望，他們就表明了共進退的立場：如果你想奮戰下去，我們會跟你一起戰鬥。他們的忠誠帶給我勇氣和力量。

公司能夠繼續營運，都得歸功於他們。我的「神奇五人組」包括了執行長布魯克·哈澤騰（Brook Hazelton）、當代藝術部全球經理邁可·麥克吉尼斯（Michael McGinnis）、業務發展部經理暨德語系國家負責人米凱拉·紐梅斯特（Michaela Neumeister）、當代藝術部經理艾琳·阿格皮恩（Aileen Agopian），以及營運長西恩·克里瑞（Sean Cleary）。每一位都不到三十五歲，要是沒有他們，我無法重建公司。因此，基於他們對公司的貢獻，我決定給整個團隊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也就是讓他們成為我的合夥人。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間，沒有人離開，我們一起創造出藝術拍賣史上最出人意料的東山再起。

對藝術的熱愛可以把兩個南轅北轍的人結合在一起，我與路易絲的戀情正是絕佳例證。路易絲加入菲利普斯、德·普里和盧森堡拍賣行以前，我們經常在巴黎度過最浪漫的時光。她在聖多諾黑街（Saint-Honoré）英國大使館對面租下一層豪華公寓，屋內的大窗戶正對著市中心最美麗的花園。我們夜裡會出外散步，最後總是來到花神咖啡館，坐在室內的位置，與真正的巴黎人常客為伍（從不會坐在只有觀光客的露天座）。我們會點水煮法蘭克福香腸和巧克力閃電泡芙來吃，即使總是自嘲這是多麼不健康、多麼簡陋（跟米其林餐廳相比）的一餐，也吃得津津有味。接下來，我們再到同一區的調色盤咖啡館（La Palette）喝飲料，以粗魯聞名的老闆則照例對我們大呼小喝。路易絲雖年輕，平日卻矜持得有如年老貴婦，看到她偶爾放鬆一下，像個平民一樣生活，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事，畢竟她平日過慣了瑪麗王后般的豪奢生活。

在凌晨兩點左右，我們會結帳離開，走到外頭的塞納河街。這條街上畫廊林立，我們一面瀏覽櫥窗裡誘人的陳列品，一面漫步走向塞納河右岸。路易絲加入菲利普斯以後，兩個女人仍在鬧不和，公司也仍在設法賺錢，但我和她又來到巴黎。我們一如以往沿著塞納河街漫步，經過堪稱裝飾藝術聖殿的瓦洛畫廊（Vallois），櫥窗裡的物品吸

引我們停下腳步。那是兩只巨大陶瓷花瓶，出自一九五〇年代名噪一時的尚・貝納爾（Jean Besnard）[295](#)之手。我對它們一見鍾情，這是我見過最棒的花瓶了，我不斷讚歎，跟路易絲說我好愛它們。我當時興奮得昏了頭，根本沒料到她會嫉妒兩只無生命的物品。

隔天，我打電話給瓦洛女士，她告訴我，已有人預訂了花瓶，所以是非賣品。由於我不是這家畫廊的特別客戶，只能摸摸鼻子接受，但心裡仍有一絲不甘。每隔幾個星期，我就會打電話詢問花瓶的狀況，但始終是有人預訂。等到我再度前往巴黎已是隻身一人，因為生意上的事影響了我與路易絲的感情。我親自登門見瓦洛女士，希望能有所轉圜，卻還是得到一樣的答案。我當下火冒三丈，提出要當場支付全額，可她依然沒有接受。第二天晚上，我孤獨一人來到調色盤咖啡館，聽聽久違的大呼小喝。走出咖啡館後，我漫步走向瓦洛畫廊，想看一眼我單相思的花瓶，沒想到它們不在櫥窗裡。我一早就前往畫廊打探，得知花瓶已售出，我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沮喪。

二〇〇二年稍晚，路易絲離開我和菲利普斯公司，我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此時，我收到了佳士得寄來的卡爾・拉格斐收藏品拍賣目錄，我心中升起一股懷念，想起我在蒙地卡羅時幫他拍賣過孟菲斯家具。結果我翻看目錄，竟然看到我念念不忘的那兩只貝納爾花瓶，不明就裡的感覺取代了懷舊情緒。我明白為什麼瓦洛會捨棄我這筆生意，寧可把花瓶留給拉格斐，我至今所見過各領域的人物裡，他毫無疑問是數一數二的能人。但由於佳士得拍賣會即將登場，瓦洛畫廊應該來不及把花瓶送到拉格斐手裡，只能直接送交佳士得。我不想深究其中緣由，只是感到興奮，這下有機會買下花瓶了。

拍賣會那晚，我透過電話出價，且勢在必得。我發誓不買下這兩只花瓶絕不罷休。意想不到的，我遇到另一位同樣執著的競投人，只要我出價，那個人跟著出更高的價錢。價格飆升到天文數字，對方步步進逼，我總算理解一九五八年那場拍賣會上梅隆所說的話：美麗當前，錢算什麼？我最後成功得標，兩只花瓶成為我的囊中物，成交價也刷新了貝爾納作品的拍賣紀錄。我心裡感到矛盾，雖然得到了朝

思暮想的花瓶，卻氣憤自己付了太高的價錢，尤其是不久後，我看到一則德國報紙的報導，其中提到拉格斐很滿意那場拍賣會的銷售狀況，特別是貝爾納花瓶拍出高價令他喜出望外，他還有更多的貝爾納作品要賣，下一次的成功在望。

不久以後，我碰到一位佳士得的熟人，他偷偷跟我揭露一個祕密，聽完我猶如五雷轟頂。原來，我遭遇了最難以想像的背叛；跟我競爭的競投人居然是路易絲。我怒不可抑，遭受愚弄的收藏家心中的怒火，就連地獄之火都比不上。我還持有那兩只美麗花瓶，但我將它們儲放在倉庫裡，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貝爾納作品的價格不斷攀升，已經高於我當初遭「搶劫」，被迫支付的「愛情贖金」。我從這件事得到一個教訓：如果你購入最好的作品，且能長期持有不脫手，從長遠來看，你付出的任何高價都是值得的。

路易絲繼續對我糾纏不休，存心想要激怒我。與她另一次的手段相比，爭奪花瓶根本是小巫見大巫。二〇〇三年三月，路易絲買下藝術拍賣界的權威雜誌《藝術與拍賣》（*Art & Auction*，相當於時尚界的《女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296](#)）。就如同《女裝日報》的老闆約翰·費爾柴爾德（John Fairchild）好惡分明，他鄙夷的對象不是遭嚴厲批評，就是得不到任何一點版面，而今《藝術與拍賣》落入路易絲手裡，我擔心該雜誌對我的報導將不再客觀。路易絲與我的帳似乎還沒算完，但也可能是我過度敏感，因為路易絲買下《藝術與拍賣》的時候，我正值事業低潮，她毫無打擊我的必要。

菲利普斯繼續挑戰拍賣業的兩大巨頭，但我在二〇〇二年的一場拍賣會慘遭滑鐵盧。我的哥哥大衛過世後，我就像法國諺語「faire 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所說的，微笑面對難關。如今，面對菲利普斯拍賣行的慘敗，我也必須保持笑臉。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我尤其需要這句話的助威，才能在巨大壓力之下保持優雅自若。那天是我人生中相當恥辱的一天；是我的珍珠港事變；是我人生中最慘烈的一場拍賣會。只要涉及拍賣會，我總是相當迷信，那晚的雷暴雨彷彿預告了諸事不順。幾百位冒雨前來的時髦賓客把西五十七街的菲利普斯拍賣廳

擠得水洩不通，我以為人潮是好現象，但事後回想起來，我只是吸引了一群來看戲的人，他們不是來買藝術品，而是來看獅子把我生吞活剝；每個人都是冷眼旁觀。

那晚拍賣的是印象派畫作，我信心滿滿。路易絲和丹妮拉仍然互不相讓，高昂的辦公室租金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但這次的拍品是米歇爾·史托斯（Michel Strauss）從藏家那裡匯集的出色精品。史托斯原先在蘇富比擔任印象派藝術部經理，我們最近挖角他過來。我和菲利普斯都要靠藝術拯救了，我們期望締造至少五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五億）總成交額。第一號拍品是莫內的〈日本橋〉（*Japanese Bridge at Giverny*），起拍價六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一億九千五百萬）。沒有任何人出價，我堅持不放棄，但最終還是宣布：「流標。」這是最殘酷的拍賣術語，我是迫於法律束縛，而不是基於任何慣例，才無奈地吐出這個恥辱的詞彙。我想到一九八〇年代，佳士得紐約辦事處的第一任負責人大衛·巴瑟斯特（David Bathurst）告訴記者，拍賣會上的幾幅作品總計拍出數百萬美元，但依賣家說法，那些作品根本沒有賣出，於是賣家對巴瑟斯特提出告訴，並勝訴。巴瑟斯特灰頭土臉地辭職，五十四歲那年在蘇格蘭野地打獵時死於意外。我的第一句「流標」只是一連串屈辱的開始，在那個漫長的夜晚，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字詞，因為殘酷的眾買家只是冷冷地坐在那裡，毫無反應。我們有十七幅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千萬）的畫作，卻只有一幅賣出。

總成交額為六百九十萬美元（約臺幣兩億〇七百萬），幾乎不足以維持LVMH集團打造又拋棄的這個高開銷公司。現在回想起來，我確實握了一手壞牌，史托斯匯集的畫都是曾經公開拍賣卻未售出的作品，缺乏新鮮感，但這是後見之明，就跟缺乏先見一樣糟糕。我走在麥迪遜大道上，可以感覺到有人幸災樂禍地竊笑，也有人惋惜和憐憫。許多人為了避開我，特意過馬路走另一邊。但我得保持微笑，向媒體、我們的客戶、我們的敵人（無論他們在哪裡）展現樂觀的一面，讓他們知道菲利普斯的未來會更美好。在我看來，今晚的結果並

不是最後判決，我本來應該像慘敗的拿破崙，卻相反地，我覺得自己有如麥克阿瑟將軍，縱然失守了克里基多島（Corregidor），但「我必將重返」。菲利普斯從一七九八年左右存活到現在，它不會在我手中滅亡。我在痴心妄想嗎？或許吧。但是，如果你愛藝術，你相信藝術，藝術就會帶你重返榮光。

272 美國實業家、慈善家、藝術收藏家、政治家。知名品牌雅詩蘭黛集團家族成員之一、曾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現為世界猶太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

273 出自《聖經·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

274 出自《聖經》典故，大洪水後，鴿子將橄欖枝銜回諾亞的方舟，表示洪水已退；後來橄欖枝被視為和平與希望的象徵。

275 康斯坦丁·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 1876-1957），羅馬尼亞裔法國雕塑家及攝影家，被譽為現代主義雕塑先驅，是繼羅丹之後，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雕塑家。

276 巴黎春天集團，二〇一三年已更名為開雲集團，旗下包含古馳集團，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和零售業巨頭。

277 美國的企業家，曾在一九八四至二〇〇五年擔任迪士尼公司的執行長。

278 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德裔美國演員及歌手。她是少數於柏林發跡又至好萊塢發展的女演員。德國納粹掌權時，瑪琳歸化為美國公民。

279 一九七二年美國的音樂電影，改編自同名音樂劇。內容講述一九三一年一名美國女子在柏林酒店表演時的遭遇，同時側寫納粹如何在德國掌權。

280 讓·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85）法國的畫家、雕塑家、版畫家、收藏家暨作家，為二戰後巴黎派主要畫家之一。其創作破除正統的表現規則和油畫技藝，並廣泛使用各種媒材。一九六二年達到藝術頂峰，表現出如兒童塗鴉、或史前洞窟壁畫、或街道塗鴉的風格。

281 祕魯裔美國作家和人類學家（一九二五～一九九八），以他曾師事印第安人薩滿巫師唐望的經歷，撰寫了一系列書籍，但唐望的真實性曾被多名學者質疑。

282 保羅·希涅克（Paul Signac, 1863-1935），法國新印象主義畫派的畫家，和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同為點描派的代表人物。

283 法國室內設計大師（一九四五～二〇一二），被視為將室內設計提升到「高級訂製」境界的傳奇人物。

284 法國知名室內設計師，客戶包含許多皇室、貴族。

- 285 於一九〇二年設立的國際性研究生獎學金，是全球最久負盛名、也最難申請的獎學金，被譽為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
- 286 法國政治諷刺雜誌，最早成立於一九六〇年，一九七〇年因遭政府禁止發行而改為現在的名稱，重新出版。
- 287 法國知名室內設計及產品設計師（一九二五～二〇一三）。
- 288 創作於一九四九年，由民謠歌手西格（Pete Seeger）和海斯（Lee Hays）所寫，為的是支持「進步運動」（反對資本主義壟斷造成的社會問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也同樣藉由這首歌引起許多迴響。
- 289 聖彼得堡的特殊現象，每年五月底到七月初，晚上幾乎跟白天一般亮，其中又以六月中到七月初最明顯。
- 290 美國電影女演員（一九二九～一九八二），出道僅六年，聲勢卻如日中天，一九五六年嫁給摩納哥親王、成為王妃後息影，於一九八二年因車禍去世。
- 291 俄裔哈薩克名媛暨實業家，為石油及天然氣能源工程公司「MunaiGaz Engineering Group」的創辦人之一及CEO。二〇一二年接掌時尚品牌薇歐奈（Vionnet），總部設在米蘭。同時也是艾芬豪礦業（Ivanhoe Mining Group）的董事之一。
- 292 美國暢銷羅曼史小說作家。
- 293 一九六四年義大利知名導演皮亞托·傑米（Pietro Germi, 1914-1974）拍攝的諷刺喜劇。劇情講述礦工的一對女兒，妹妹被姊姊的未婚夫誘惑、始亂終棄，而父親氣不過，派兒子去殺掉姊姊未婚夫的故事。
- 294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愛德蒙·薩夫拉死於摩納哥豪宅的一場大火，後證實縱火犯為他的私人看護。薩夫拉家族是敘利亞的猶太人，後經黎巴嫩輾轉來到巴西，以金融及貿易業致富。
- 295 法國視覺藝術家（一八八九～一九五八）。
- 296 美國時尚雜誌，成立於一九一〇年，已有百年歷史，內容不僅限於女裝，也包含男裝。原本以日報的形式提供最快速的時尚業界訊息，並以公信力和專業度成為最具權威的時尚刊物，現則改為週刊的形式，但內容更有深度。

第十八章 我的那些寡頭巨富朋友

二〇〇二年不是我喜歡的一年。我失去路易絲，失去丹妮拉，而我的拍賣行似乎已回天乏術，造就我事業（儘管它在垂死中）的那個男人——提森男爵——也在四月離開人世，享壽八十一歲。我難以相信這是真的，我總以為他會活得長長久久。他中風過許多次，一些人認為他的死也許跟嗜酒貪杯有關，但是依我的判斷，應該是家族爭產官司所致。我離職以後，他花費了大半時間在避稅天堂百慕達打官司，律師照例是唯一的贏家；他們獲得勝利，而男爵心力交瘁。基於我跟LVMH律師團交手的經驗，我能懂他的感覺，完全感同身受。我既是滿懷同情的弔唁者，也是他悲痛心碎的名譽家人。

我出席在杜塞道夫（Dusseldorf）城外、蘭茨貝格城堡（Schloss Landsberg）舉行的小型葬禮，海里與父親、祖父同葬在這座家族城堡裡。觀禮者不多，鑑於海里交遊廣闊，這一點我至今難忘。我對城堡裡精緻絕倫的「新藝術」風格浴室，也還留著鮮明印象。一九〇〇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上「新藝術」首次登場，那是一個全然跳脫古典束縛的全新造形風格，而那個浴室裡的一磚一瓦都是從那年的萬國博覽會運送過去的。我站在墓園觀禮時，想起了這個家族收藏藝術的起點：海里的祖父。這位從賣鐵絲網起家的鋼鐵大亨暨男爵，僅擁有一些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的複製畫，唯一值得一提的收藏品傳承自他的祖父——其祖父與羅丹是摯友，因而擁有幾件羅丹雕塑。海里為丹尼絲重新裝潢戴萊斯福特宅邸時，將曾曾祖父留下的那些白色大理石雕像運過去，放置在室內游泳池周圍，以打造出奢靡的古羅馬浴場風格。

我的悲傷難以言喻，回想起蒂妲成為女主人以後，現金流開始枯竭，海里的會計師古契蒂先生曾懇求我幫忙，別再讓海里狂買藝術品。我試過，但徒勞無功。每年元旦，海里都會信誓旦旦地決定要少買一點，但到了第五天就故態復萌。藝術收集癖曾被稱為「美麗的病」，但在氣派堂皇又陰暗的蘭茨貝格城堡裡，我確信了一件事，我的朋友海里並不是因為這個美麗的疾病而死，而是因它而活。

我看了看在家屬：男爵的孩子們、前妻們、現任男爵夫人蒂妲。前西班牙小姐不只會帶著貴族頭銜回到馬德里，還有男爵的藝術收藏，或許是全球質量最好的一批收藏也將永遠留在那裡。美國有一個益智節目叫《家庭大對抗》（*Family Feud*）；男爵家人之間的官司糾紛，就猶如一場古怪的貴族版家庭大對抗。海里的孩子當中，最得他真傳的是女兒弗蘭西絲卡。她原本是愛玩樂、跟史帝芬·史奇交往的女孩，後來嫁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直系後裔，卡爾·馮·哈布斯堡（Karl von Habsburg）大公。海里的匈牙利爵位是冊封的，卡爾則是實實在在的貴族後代。不過，無論岳父和女婿的頭銜是否天差地遠，海里竟然打扮成哥薩克人（Cossack）[297](#)的模樣出席女兒的婚禮，無意中搶走所有風采和焦點；有海里在的地方，就不缺熱鬧。

現在官司纏訟已經結束，倫敦有一半的律師靠此案賺飽了口袋。男爵在垂死之際決定和解，孩子們會得到錢；蒂妲和西班牙會得到他的藝術收藏，這是自從拿破崙把征戰各國所得的藝術戰利品（差不多是全歐洲一半的藝術珍寶）運往羅浮宮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文物跨國轉移。從柴契爾夫人、查爾斯王子、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298](#)、蓋蒂、美國國家畫廊，到迪士尼公司（令人驚訝）都想爭取海里的收藏品，但這批珍寶落到西班牙手中；這就是蒂妲的力量，美貌的威力可以凌駕藝術。

還要再過幾個月，我才會在十一月那場拍賣會上遭逢自己的「死亡」命運。在男爵葬禮當下，我仍然志氣高昂，畢竟，我擁有一家大拍賣行，不是嗎？但是十一月那一天過後，我再也無法如此看待菲利普斯。面臨悲慘的失敗，我決定退守並緊縮開銷。在二〇〇三年，我關閉了五十七街金碧輝煌的辦公室，將「菲利普斯·德·普里」拍賣行（丹妮拉已經退出）遷移到非常遙遠、宛如狂野西部的雀兒喜區西十五街，進駐到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倉庫裡。當時還沒有興建空中鐵道花園（High Line Garden）[299](#)，那一帶不是什麼人氣、時髦景點，只是一個同志酒吧、廢棄屠宰場林立的荒涼肉品加工區。由於缺乏與蘇富比、佳士得競爭所需的資源，我不得不放棄古典大師和印象派，甚至

是現代藝術市場，把主力放在二十五年以內、所謂「超當代」的藝術作品。雖然大多數人以一九七〇年代做為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分水嶺，但我採用一九八〇年代為分界線，如此可以更進一步縮小作品範圍，集中火力在我認為自己最有勝算的領域，而我確實壓對了寶。

我見識過昆斯和赫斯特引發藝術新風潮，過去的藝術評論家曾嘲笑是華爾街新貴將他們的作品炒到天價，但我直覺認為那無非是大勢走向的起點。菲利普斯的拍賣類別也擴及到攝影及設計，因為我賣的是當前的藝術；我所生活時代的藝術。對於勇敢留下來的寥寥可數員工，我會分給股份，讓他們成為新菲利普斯的股東。我們之間將是一種合作關係；菲利普斯·德·普里拍賣行將成為一支團結一致的游擊隊。

儘管藝術界極不看好我們，菲利普斯最後仍成功轉型。我擁抱當代藝術的作法，也把紐約的雀兒喜區變成披頭四、滾石合唱團成員當年居住的倫敦雀兒喜區；變成哈德遜（Hudson）河畔的國王路（King's Road）[300](#)。我熱愛流行音樂，每一家我拜訪的畫廊都聽過我的歌單。有些客戶會抱怨，但他們終究適應了。佳士得二〇一五年那場刷新所有拍賣紀錄、締造近十億美元（約臺幣三百億）總成交額的春季拍賣會，現場播放的是什麼音樂？正是流行音樂。改變已經悄然開始。

我在菲利普斯舉辦的拍賣會，一向附帶狂野派對或搖滾演唱會，也搭配其他各式各樣的「偶發藝術」[301](#)。以如此的方式操作，藝術明星都成了超級明星。我的煉金術是把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滿溢的財富送進當代藝術家日益飽滿的口袋，不只是昆斯和赫斯特受惠，李希特、村上龍、普林斯、費雪（Fischer）[302](#)等，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藝術家也名利雙收。加入這股淘金熱的不只有畫家，設計師蘭·亞烈德（Ron Arad）[303](#)、馬克·紐森（Marc Newson）[304](#)也成為紅星；攝影師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Andreas Gursky）[305](#)和漢姆特·紐頓所獲得的敬重、作品市場行情之高，都超乎他們自己的預期。一個全新

的時代已來臨，曾經三餐不繼的藝術家都變成富人；每個展露頭角的超級明星幾乎都是由菲利普斯帶入拍賣市場。

菲利普斯於二〇〇五年舉行的一場拍賣會正是這股風潮的具體展現。那次登場的拍品來自我的老朋友，有「龐克公主」、「炸藥名媛葛洛莉亞」稱號的葛洛莉亞·圖恩塔克西斯（Gloria Thurn und Taxis）。她在二十出頭時嫁給三十三歲的巴伐利亞王子約翰尼斯·圖恩塔克西斯（Johannes Thurn und Taxis）。王子是一名公開的雙性戀者，由於擅長開粗俗的笑話而和海里相當合得來。他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擁有一座和凡爾賽宮一樣大小的城堡，有一次，他在那裡舉辦一場必須穿白衣出席的舞會。王子把紅葡萄酒倒在瑪格麗特公主的椅子上，如此一來她一落座衣服就會沾上污點，還是在尷尬的部位。

全世界找不出幾個像葛洛莉亞這樣擅長辦派對的人。一九八六年，她為王子辦的狂歡生日宴更是她的得意之作。那天的生日蛋糕裝飾著杏仁糖製成的六十隻陰莖，而把蛋糕吃下肚的賓客包括了米克·傑格與他的妻子潔莉·霍爾（Jerry Hall）[306](#)，陶博曼夫婦、邁爾康·富比士、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307](#)、安·蓋蒂，以及絕不會缺席的海里與蒂妲。當天晚宴的餐盤是由凱斯·哈林（Keith Haring）[308](#)所設計，也成為收藏家爭相收藏的物品。就連麥可·傑克森也曾是他的座上佳賓，這世上有幾位城堡主人能邀得歌壇巨星王子和傑克森同場出席呢？葛洛莉亞喜歡紐約，喜歡其當代藝術環境。她曾委託一名風格新潮的愛爾蘭室內設計師重新改造城堡裡的套房，將房間裡的牆壁掛滿一九八〇年代的天才藝術家，諸如昆斯、哈林、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309](#)等人的作品。

葛洛莉亞的丈夫於一九九〇年因心臟移植手術失敗而過世，留下超過五億美元的債務，她一夕之間成為貧窮「富家女」。為了償還債務和支付稅款，她不得不出售大批藝術收藏。一次是於一九九二年，由日內瓦蘇富比舉辦拍賣會；另一次是一九九三年，再次委託蘇富比，在城堡裡舉辦一場長達五天的「開放宅邸現場拍賣會」。我兩次

都參與主持。在長達五天的那次拍賣會，我主持完開場，第三天就打算離開，但葛洛莉亞產生分離焦慮，她馬上打電話給大弗下達指令，說在最後一件拍品賣出以前，絕不許我離開城堡和拍賣臺。大弗很少打電話給員工，總是由迪迪代勞，但這回，他親自打給我，指示我一定要留下。

客戶指名要我，非我不可，這是非常光榮的事。我還有過一次類似的經驗，那次是在佛羅倫斯，為期三天的科西尼宮（Palazzo Corsini）現場拍賣會，科西尼公主堅持由我主持每一天的每一場拍賣。蘇富比的律師嘗試在拍賣合約裡加入一條例外條款：基於「健康理由」違反的話並不算違約。但公主反過來要求，若有健康狀況必須附上醫師證明，以免我裝病遁逃。

我嘗試挽救菲利普斯的那段時期，曾找來一些新潮時髦人士組成公司的顧問團隊。葛洛莉亞為主幹成員，其他成員包括同是王室貴族的弗蘭西絲卡·提森；吉亞尼·阿涅利的外孫、飛雅特集團繼承人拉波·埃爾坎（Lapo Elkann）；服裝設計師暨收藏家馬克·雅各布斯（Marc Jacobs）；來自洛杉磯的藝術專家暨肥皂劇《不安分的青春》（*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編劇瑪麗亞·阿瑞那·貝爾（Maria Arena Bell）；超級名攝影師馬里奧·特斯蒂諾和尤根爾·泰勒（Juergen Teller）[310](#)；專門收購地標物築物的地產大亨阿比·羅森；性手槍樂團（Sex Pistols）前經理麥爾坎·麥克拉倫（Malcolm McLaren）[311](#)。

菲利普斯的作風和正經八百的蘇富比南轅北轍，它就像藝術界版的《動物屋》（*Animal House*）[312](#)，最愛特異獨行，把老古板氣得牙癢癢。我們在二〇〇五年的年營業額略高於一億美元（約臺幣三十億），蘇富比則為二十七億美元（約臺幣八百一十億），佳士得為三十二億美元（約臺幣九百六十億）。但營收多寡並不重要；我的目標不再是跟雙巨頭一爭高下，而是為了存活而戰，在二〇〇五年，我展開這趟瘋狂旅程的第五年，菲利普斯總算第一次出現盈餘，無論是紐約或倫敦的業界人士都不敢相信我能成功開創新局。

二〇〇二年，我的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葛洛莉亞的人生也有一百八十度翻轉；她成為重生的天主教徒，與同樣待過雷根斯堡的樞機主教約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二〇〇五年成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結為摯友。既然擁有出入梵蒂岡的特權，再加上跟義大利公主亞歷珊德·波佳斯（Alessandra Borghese）談起戀愛（令人難以置信），她乾脆搬到羅馬居住。波佳斯公主的母親來頭不小，是聖沛黎洛氣泡礦泉水（San Pellegrino）、奇泰瑞火腿（Citterio）兩家企業的繼承人。

我猜想葛洛莉亞打算出售更多的藝術品，而我是幫忙拍賣的理想人選。我們一起創造過出色的紀錄；我們有過合作經驗又是朋友。儘管如此，我仍然擔心她會選擇蘇富比，畢竟她和亡夫都跟陶博曼夫婦交情匪淺。我心知自己出馬說服才是最好辦法，於是動身前往羅馬找她。與我同行的是公司「忠誠五人組」當中的米凱拉·紐梅斯特，葛洛莉亞最喜歡她；我也是，但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多喜歡她。後來，米凱拉與我墜入愛河，我們在二〇〇九年結婚。

我們在人民廣場（Piazza del Popolo）附近的「俄國飯店」（Hotel de Russie）巧遇一個好朋友，就是海因茨那位注重生活享受的兒子尼古拉斯（Nicolas Berggruen）。尼古拉斯跟葛洛莉亞一樣都熱愛巧克力，因此我們整個下午都在飯店餐廳裡大啖甜食，之後，葛洛莉亞就同意了委託。拍賣會訂於二〇〇五年舉行，我商請攝影師尤根爾前往雷根斯堡的城堡拍照，打造出藝術拍賣史上最大膽、叛逆的一本目錄。封底的那張照片以惡搞的方式呈現巴伐利亞人愜意、舒適的生活日常：葛洛莉亞公主打扮成酒吧女侍的模樣，一手拿著火雞腿，另一手舉著啤酒杯。葛洛莉亞敢於接受任何挑戰。

有時候，尤根爾的勇於突破也不免讓他跟我陷入麻煩。我曾委託他拍攝菲利普斯一場珠寶拍賣會的目錄，他讓所有家人穿戴上這些珠寶當模特兒，包括還在襁褓中的兒子。後來，我們收到兒童保護機構的來信，揚言要控告我們猥褻和剝削兒童。尤根爾的創意可不止於此，他還用披薩紙盒裝那次拍賣會的目錄。尤根爾喜歡將滑稽荒謬與

高尚相結合，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作風幫我確立了心目中最理想的菲利普斯定位。

這場葛洛莉亞的一九八〇年代藝術藏品拍賣會，也是菲利普斯鞏固形象定位的機會。拍賣會前，我們先舉辦了一場充滿美食佳肴的熱鬧晚宴，地點就在紐約的總部，湯姆·福特（Tom Ford）[313](#)與馬克·雅各布斯皆是座上嘉賓。再來是舞會，我們邀來葛洛莉亞最喜歡的一九八〇年代樂團「紀德克瑞奧與椰子合唱團」（Kid Creole and the Coconuts）現場演唱。熱鬧活動吸引了以時尚為導向的紐約媒體來報導，再者，葛洛莉亞向來是康泰納仕（Condé Nast）[314](#)旗下雜誌熱衷追蹤的人物。當晚的焦點拍品包括昆斯的媚俗作品〈約克夏梗犬〉

（Yorkshire Terriers）木雕，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315](#)的顛覆性作品〈長頸聖誕老人〉（Santa Long Neck），以及凱斯·哈林的〈自畫像〉（Self-Portrait）。由於上拍作品全數成交，這場葛洛莉亞藏品拍賣會即是業界所稱的「白手套」。登場的拍品百分之百成交是難得一見的佳績，在蘇富比、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官若是完成這樣的一場拍賣會，就能得到一雙白手套以茲紀念。但我既是拍賣官又是總裁，自己拿這份禮物似乎不太恰當。儘管如此，我仍像初為人父的父親般，感到非常自豪。菲利普斯確實浴火重生，願菲利普斯·德·普里拍賣行活得長長久久；至少只要我還在，就不會垮。

我很享受這段意想不到的重生過程，尤其有了布魯克這位年輕執行長的協助，不只紐約菲利普斯東山再起，倫敦菲利普斯也成功重返榮耀。布魯克有哈佛MBA學位，曾任職高盛銀行，如今是佳士得美國區總裁，他證明了長春藤學校畢業生也能活躍在潮流尖端，也證明了我果然有識才的眼光。本來宛如老寡婦的倫敦菲利普斯，在我的改造下也搖身一變，成為活力十足的時髦女孩。二〇〇六年，倫敦菲利普斯搬遷到維多利亞區一幢原本做為郵局的建築裡，與前古馳設計師湯姆·福特、超級設計師馬克·紐森比鄰而居。新址的開幕宴會由明星廚師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掌廚，「人類聯盟樂團」（Human League）[316](#)現場獻唱，是一場電音繚繞的頹廢盛宴。即使協和客機已

經停飛，我仍舊過著往返於大西洋兩岸的生活，一半時間住倫敦的克拉里奇飯店，一半時間住紐約的美世飯店，就連我的住宿地點也反映了我能高尚與大眾之間穿梭自如。最終，菲利普斯的新形象、新魅力吸引了俄羅斯超級新貴的注意，那是一些特別迷戀當代藝術的寡頭巨富。

業界應該沒有人比我更有資格和俄羅斯打交道。我過去為舊蘇聯「開放」盡了一己之力，如今那個國度已成為嶄新的奇幻世界，也就是「達莎與瑪莎」的世界；兩位俄羅斯藝術界精英，兩位年輕、迷人女沙皇執掌的世界。達莎·朱可娃（Dasha Zhukova）是億萬富翁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317](#)的妻子。此位居住在倫敦的俄羅斯寡頭可說是世上最當之無愧的金龜婿，莫斯科最火紅的車庫當代藝術博物館（Garage Museum）即由他一手創設。而與達莎競爭現代凱薩琳女皇（或俄羅斯版佩姬·古根漢）寶座的對手，則是億萬富翁奧里戈·拜巴科夫（Oleg Baibakov）[318](#)的女兒瑪莎（Masha Baibakova）。瑪莎是一名文化經理人，她將莫斯科一座巧克力工廠規畫為藝術空間，用來展示俄羅斯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我就是在那裡與她結識。達莎生長於洛杉磯的移民後裔中產家庭，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後來遇到她的王子；而瑪莎則是出生在莫斯科的公主，畢業於巴納德學院（Barnard）、哈佛商學院、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學院（Courtauld），也曾就讀蘇富比的藝術培訓課程，擁有在不同國度生活的經驗。達莎的使命是把昆斯和赫斯特介紹給俄羅斯大眾；瑪莎則致力於培養、提升大眾品味，不只介紹本國的新興藝術家，也規畫展出國外藝術家的作品，比如洛杉磯藝術家斯特林·魯比（Sterling Ruby）[319](#)。

我很快就認識對藝術感興趣的每一個俄羅斯巨富，他們將會超越美國對沖基金經理，成為當代藝術作品的大買家。這些近年才快速崛起的寡頭們並不嚮往蘇富比、佳士得這兩家權威機構，反而樂於跟我這般的業界異類往來，要是我有他們想要買的藝術品，更是再好不過。這一群「狂野東方人」形形色色且各有特色。就以維克多·平丘

克（Victor Pinchuk）來說，他是俄羅斯出生、頭腦聰穎的冶金工程師，靠著專利權致富，進而創建了「國際鋼管」（Interpipe）集團，後又娶了當時烏克蘭總統的女兒，藉由個人財富與政治權力相結合，更為自己鋪就一條事業坦途。

平丘克跟我一樣喜歡日本文化，因而建立起交情。平丘克在基輔郊外的住家旁邊蓋了一幢仿京都寺廟的宏偉建築，由於與宅邸的建築風格天差地遠，看起來相當引人注目。平丘克擁有精采絕倫的一批藝術收藏品，我曾試著賣一幅卡巴科夫的畫給他，但他敬謝不敏。因為卡巴科夫雖然出生在烏克蘭，卻假裝是俄羅斯人，假如你是烏克蘭總統的女婿，面對這樣一位缺乏民族認同的畫家，你絕不可能買他的畫。平丘克的觸角可不僅限於基輔，他曾幫忙籌辦在凡爾賽宮舉行的昆斯展覽，還在法國阿爾卑斯山區慶祝五十大壽。那場生日宴會上，他請來艾倫·杜卡斯（Alain Ducasse）[320](#)掌廚，太陽馬戲團（Cirque du Soleil）做現場表演，因此吸引媒體注意，登上了頭條新聞。

還有弗拉季斯拉夫·多羅寧（Vladislav Doronin）；如果普丁非得跟他助長崛起的任何一位寡頭巨富交換人生，他肯定會選擇多羅寧。以龐德自居的這位富豪，想必符合普丁嚮往的完美形象。兩人都出生於列寧格勒，性格一樣狂熱，一樣大膽；多羅寧看起來甚至像好萊塢美化過的普丁。他是俄羅斯大亨當中最世俗、最西方化的一個，過著或許是全世界最精采的生活。他甫與娜歐蜜·坎貝爾（Naomi Campbell）[321](#)分手，才跟環球小姐中國冠軍羅紫琳交往不久。但根據報導，他已甩掉中國小姐，新歡是一位俄羅斯美女。他在全球各地擁有頂級豪宅，且最近剛收購頂級的安縵集團（Amanresorts）。

與其他寡頭相較，多羅寧算是相對年輕。他出生於一九六二年，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是他最好的美國朋友，兩人對藝術都非常感興趣。多羅寧曾是石油大王馬克·里奇（Marc Rich）手下的交易員，所以我透過里奇的介紹，在巴塞爾藝術展上結識他。美國對伊朗商業制裁期間，里奇仍然與伊朗進行交易，以致遭到美國政府起訴。多年後，柯林頓總統於任內特赦他，反而為自己招來排天倒海的抨擊。儘

管赦免案在美國引起巨大爭議，里奇卻不曾返回美國享受無罪一身輕的喜悅。多羅寧喜歡普普藝術，一如其他的俄羅斯富豪，他在極短時間內累積了可觀的收藏品。多羅寧也與平丘克一樣擅長籌辦精采絕倫的派對，我曾獲邀參加他的生日宴會，地點在印度久德浦爾（Jodhpur）的梅蘭加爾堡，主辦人為坎貝爾，她的同行超模卡洛琳娜·柯考娃（Karolina Kurkova）、愛娃·赫茲高娃（Eva Herzigova）、凱特·摩絲都蒞臨參與。還邀請夏卡·康（Chaka Khan）³²²和黛安娜·羅絲（Diana Ross）³²³在現場表演，後者演唱〈浴火重生〉（*I Will Survive*）一曲時，不慎從舞臺跌落，足足幾分鐘不見人影，後來才再度上臺唱完歌曲，讓全場賓客虛驚一場。幾天後，我看到《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刊出她的大幅照片，真了不起。在印度，大家都騎著大象，打扮得跟王公一樣，而多羅寧自然而然流露出王者氣勢。

再來該介紹我的巨富合夥人：俄羅斯水星集團（Mercury）的兩位老闆。既然俄羅斯人跟我志同道合，二〇〇八年，水星集團於美國金融危機正烈時收購菲利普斯的股份，恰恰是天時地利人和。水星集團在莫斯科等同比佛利山的高級地段設立「精品城」（Barvikha Luxury Village），號稱為全球最大的購物商場，因而享有盛名。集團由弗里德蘭（Friedland）和史莊南（Strunin）創辦，兩人同名，都叫李歐尼德（Leonid），也都是猶太裔，都曾經一貧如洗，在蘇聯解體後才一躍成為大富豪。他們白手起家的過程，實在是一則精采的勵志故事。一胖一瘦的兩人，從幼稚園就認識。他們在一九九〇年代還是街頭小販，專門向遊客兜售漆盒和俄羅斯娃娃，之後更上一層樓，在麗笙飯店（Radisson SAS Hotel）設攤賣起手錶，自此迅速累積起財富和社會地位。

我是透過巴黎藝術經紀商阿爾貝·班南姆（Albert Benhamou）介紹，而結識了舊共產主義國度的這兩位新資本家。我從二〇〇七年開始與兩人往來，而後在聖托佩（Saint-Tropez，擠滿小明星的一個地方，那裡的星光比坎城影展還燦爛）的一艘遊艇上與他們敲定交易。兩位

李歐尼德皆是四十開外，穿著聚酯纖維全套運動服，模樣彷彿是手頭不寬的觀光客而不像商場大亨。不過，他們消費的香檳金額並不輸海里的葡萄酒帳單，再者，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模特兒、小明星等的數量，可是比《花花公子》老闆海夫納在全盛時期還多。有一次，在聖托佩的「紅帆沙灘俱樂部」（La Voile Rouge，常有包場私人派對在此舉行），兩位李歐尼德玩開了，一瓶接一瓶狂搖、狂開香檳酒，把昂貴的美酒泡沫噴向在場的賓客，而大多數客人都裸著上半身，絲毫不會介意。

兩位李歐尼德最初對藝術不感興趣；他們愛的是錢。他們將菲利普斯·德·普里拍賣行視為他們零售帝國的一環，又一個納入旗下的奢侈品品牌。由於管理並非我的強項，再次有一個精明的巨擘集團來掌舵、管理公司業務，我再高興不過。但是，他們聘用了史上最缺乏業界背景的一位執行長，讓我心頭陡然一凜。那人是貝恩德·蘭吉（Bernd Runge），他曾負責康泰納仕集團旗下《浮華世界》德國版的創刊，在二〇〇三年被評選為德國年度媒體人。但蘭吉對藝術一無所知；這恐怕是藝術業界的一大問題，不像在好萊塢，即使大多數高階主管對電影一竅不通，生意還是照做。蘭吉長得像電影《藍絲絨》（Blue Velvet）裡的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³²⁴，但樣子更凶狠。

果不其然，相貌不會騙人。二〇〇四年，蘭吉遭揭露曾是東德祕密警察，或稱「史塔西」（Stasi）。他的臥底生涯從一九八一年就讀莫斯科大學時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九年結束，使用的身分代號為「奧登」（Olden）。據說他還受命監視自己的姊姊，因為她有逃離東德的意圖。康泰納仕集團的所有者，紐豪斯家族（Newhouse）表示，那已是「遙遠的過去」，不該與蘭吉的商業成就混為一談；兩位李歐尼德在監視無所不在的國度長大，也壓根不在意蘭吉的「祕密警察」背景；但是我介意。我表明了疑慮，他們回答我：「他畢竟做出了成績。」其中一個成績，就是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二年期間，共計有三十六位員工從菲利普斯離職。

與祕密警察並肩工作並非易事，但是登上電視實境秀擔任固定班底，卻是更為嚴峻的考驗。那是美國精采電視臺（Bravo）的《藝術新秀生死鬥》（*Work of Art: The Next Great Artist*），因為該臺製播的《決戰時裝伸展臺》（*Project Runway*）大受歡迎，於是複製成功模式推出這個全新的實境秀，目標是尋找藝術界的下一個安迪·沃荷，並冀望能和前作一樣收視可觀。主要製作人為影集《慾望城市》的女星莎拉·潔西卡·帕克，由她的公司「最佳拍檔」（*Pretty Matches*）與洛杉磯「魔法精靈」（*Pretty Matches*）製作公司聯手打造。這些名字在娛樂圈可是如雷貫耳！同時也是莎拉·潔西卡手下的一位製作人「慧眼發掘」我。他曾出席菲利普斯的一場拍賣會，目睹我主持拍賣的表現，認為我具備「明星特質」。當威廉·莫里斯奮進經紀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325](#)找上門時，我的感覺應該就和當年在好萊塢史瓦布（*Schwab*）藥妝店被星探發掘的拉娜·透納（*Lana Turner*）無異。

想當然，我的拍賣界朋友都說萬萬不可行，怎能把藝術，神聖的藝術，變成表演節目。但因為我把藝術，特別是當代藝術視為表演節目，所以毫不猶豫就點頭答應。我將擔任節目的導師，負責激勵每位參賽者發揮最大能力，做出最好表現。跟評審相較，我的職責沒有那麼殘忍。評選的任務則是交給三位優秀的業界人士：第一位，珍妮·格林柏格·羅哈廷（*Jeanne Greenberg-Rohatyn*）是來自聖路易的畫廊第二代主人，也是超級銀行家暨美國前駐法大使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的媳婦。第二位，威廉·鮑爾斯（*William Powers*）也是畫廊主人，他是時裝設計師辛西亞·蘿莉（*Cynthia Rowley*）的另一半，兩人為紐約知名的「權力夫妻檔」。第三位則為《紐約雜誌》的藝術評論家傑瑞·索爾茲（*Jerry Saltz*），他與《紐約時報》藝術評論家蘿貝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也是一對「權力夫妻」。

海選過程猶如一場馬拉松，約有一千一百個藝術家在攝影棚外等候，每人帶來五分鐘長的影片，附加殘酷的兩分鐘提問時間讓他們表現自己。整個過程就猶如快速約會，也同樣沒有公平可言。我注意

到，初步甄選出的八十位（最後會篩選出十四人）選手裡，有六位是我們剛用完午飯，肚子和精神都飽足的情況下看到的前六個人；多麼「客觀」的評選。

結識莎拉·潔西卡是令我開心的事。她身為大明星，卻似乎很容易緊張，每次上鏡頭前都緊張得不得了，經常需要我給她精神上的支持。其實，我每次上拍賣臺前也跟她們一樣，然而，這不是拍賣會，而是所謂的電視實境秀，並不是我習以為常的環境，我反而老神在在，莎拉·潔西卡也對我的沉穩刮目相看。我想這是因為我不靠精采電視臺謀生，只是來玩玩的。但是等到攝影機一開動，緊張的帕克小姐立刻口若懸河，展現大明星的專業風範，反倒是冷靜的德·普里先生頻頻結巴、吃螺絲，馬上露出業餘人士的馬腳。

這個節目一共播出兩季，雖然電視臺最終沒有續訂第三季，但每一集都吸引上百萬觀眾，史上絕少有藝術家的展覽能有數量相近的入場人次。跟《決戰時裝伸展臺》相比，《藝術新秀生死鬥》算是失敗，但在我心中，它無庸置疑是成功的；它證明了電視和新媒體的力量。當初路易絲打算將藝術和網路相結合的野心，確實是走在時代前端。我就像提森男爵，目的是盡可能讓更多人接觸藝術，儘管節目的參賽者並不是林布蘭這般的天才，也不像一鳴驚人的昆斯。

到了二〇一二年，雖然我的巨富老闆與我安然度過上一波金融大海嘯，我卻認為自己受夠了，再也難以忍受哈佛商學院那套思考模式，甚至是東德祕密警察的思維。兩位大老闆想在倫敦設立新總部，想把菲利普斯做得更大，就像當初的阿爾諾一樣，想要挑戰拍賣業的兩巨大巨頭；那是任何一位拍賣界人士都嚮往的聖杯，我可以理解。至於我，我決定改變生活，回到雄心滿滿但營業開銷極低的平靜日子，以前當藝術經紀商的時候，我需要的只有一支手機及客戶的信任。藝術經紀商的工作是誘惑人來買，拍賣行則是說服人來賣，雖然說服的過程也需要施展魅力和誘惑，但是買賣收藏品、累積收藏品應該是實踐美夢，而不是純粹的財產交易。

我的人生似乎以十年為一週期，我在二〇〇一年開始經營菲利普斯，如今應該要迎向下一個週期了。伊莎貝爾在二〇〇四年同意離婚（威脅已離開，她毋須再保護我），我單身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終於再婚，娶的是伊莎貝爾、我們四個已成年孩子都衷心認可的對象：我的菲利普斯同事，史丹福大學博士米凱拉·紐梅斯特。她的家族正是慕尼黑知名紐梅斯特拍賣行的所有人，她跟我一樣熱愛藝術。我們不久後就喜獲女兒，黛安娜·德芬，暱稱迪迪（不是那個迪迪）。二〇一二年底，我將自己剩餘的菲利普斯股份賣給水星集團，接著展開全新的冒險；就如同我之前的每一段歷險一樣，它肯定也是無限精采。

297 東歐草原的游牧民族。

298 德國政治家，曾任德國總理，對推動兩德統一及歐盟一體化多有貢獻，晚年曾捲入非法政治獻金醜聞。

299 位於紐約第十與第十一大道之間，建成於一九三〇年代，原本是海港貨物運輸的重要高架鐵道，廢棄多年後，於二〇〇九年起陸續改建為空中花園及行人徒步區，成為紐約著名的景點地標。

300 位於倫敦雀兒喜地區。在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這裡曾是反主流文化的中心，聚集了許多嬉皮及年輕人。同時也是倫敦最時尚的地區之一。原本是查理二世的專用道路，因此叫做國王路。

301 盛行於一九六〇年代，是一種「活動的」藝術，也就是讓藝術成為「事件」。從環境和物體所感受到的聲音、氣味、時間，甚至動作都包含在其中，而觀賞者本身就是參與者，在沒有任何腳本的情況下，即興演出。偶發藝術不僅表現在視覺藝術上，也包含音樂、戲劇等其他領域。

302 瑞士藝術家烏斯·費雪（Urs Fischer），現居於紐約，擅長以現成的材料如木頭、釘子、麵包、畫框等即興創作。

303 以色列的建築、家具與產品設計師。

304 澳洲設計師。創作多元，從家具、手錶，到室內設計、私人飛機內部裝潢皆有，曾獲選為《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

305 德國知名攝影大師，擅長透過嚴謹、精細且極為單一化的構圖，呈現出高科技、規模化、快節奏和全球化的世界景觀，反映出在這個龐大的景觀中，個體完全被淹沒的現實。

- 306 曾為美國超級名模；後來她與米克·傑格分手，於二〇一六年與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結婚。
- 307 沙烏地阿拉伯的軍火商巨頭，據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 308 美國新普普藝術家（一九五八～一九九〇），創作風格簡單直接，往往反覆重複幾種圖案。他早期是街頭塗鴉畫家，後也涉足雕塑、海報設計、表演藝術等。
- 309 美國知名攝影師與藝術家，也是電影導演，以自己演出所有攝影作品中的主角而聞名。
- 310 德國知名時尚攝影師，與許多時尚雜誌及設計師合作，且著有多本攝影書籍。
- 311 除了曾是英國著名龐克搖滾樂團「性手槍」的經紀人，同時也是視覺藝術家、表演家、音樂家及服裝設計師，曾在紐約經營帶動龐克風潮的特色服飾店「Sex」。他的作品橫跨不同領域，卻又彼此結合，因其創意十足及叛逆前衛的風格而著稱（一九四六～二〇一〇）。
- 312 一九七八年的青春校園喜劇電影，講述大學裡兩棟不同學生宿舍之間的競爭，一棟是富家子弟組成的兄弟會，一棟是邊緣學生組成的三角屋，各種瘋狂、惡搞的手段盡皆出籠。
- 313 美國知名時尚設計師暨電影導演。曾一手重振瀕臨破產的古馳，並收購聖羅蘭，擔任兩大品牌的創意總監。二〇〇四年辭去總監職位，專注電影導演工作，著名的作品為《摯愛無盡》（A Single Man）。
- 314 美國的一家國際期刊出版集團，旗下包含《紐約客》、《浮華世界》、《誘惑》、《時尚》、《GQ》等知名雜誌。
- 315 美國當代藝術家，擅長以照片、素描、油畫、雕塑、影像、行動藝術以及裝置藝術等多種媒材及媒介創作，透過誇張、煽情、血腥的手法諷刺好萊塢電影工業和美國流行娛樂文化。
- 316 英國一九八〇年代紅極一時的電子流行樂團。
- 317 俄國猶太人，以石油致富，後又涉足鋁業、航空業。二〇〇三年收購英國雀兒喜足球俱樂部，現在英國、德國、法國、莫斯科皆有多處房產。
- 318 俄國寡頭、礦業大亨，全球第三大礦業公司諾里爾斯克鎳業（Norilsk Nickel）的前執行長。
- 319 美國當代藝術家，創作包含雕塑、繪畫、拼貼畫、陶瓷、塗鴉、影像等，主題也很廣泛，涵蓋邊緣化社會、現代主義建築、工藝品和古董、城市幫派、戰爭機制等，借以反映潛在體系和社會權力結構。
- 320 法國名廚。米其林評鑑創始百年以來，擁有最多星星的廚師，被譽為世紀廚神。現今不僅在世界多國經營餐廳，在法國也開設了廚藝學院，並出版多本著作。
- 321 暱稱「黑珍珠」的英國超模、歌手、舞蹈家、作家及慈善家。
- 322 美國黑人女歌手及作曲家。渾厚的嗓音及舞臺爆發力，被譽為靈魂放克女王。

323 美國黑人女歌手及演員。一九六〇年代「至上女聲」的主唱，單飛後聲勢不減，跨足電影與百老匯也大獲成功。

324 美國演員、導演及製作（一九三六～二〇一〇），因自編自導自演了可謂是美國公路電影開山作的《逍遙騎士》（Easy Rider）而聞名。他在《藍絲絨》裡演出的性變態，也是影史上的經典角色。

325 創建於一八九八年，是美國最老、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

第十九章 「攀龍附鳳」

昆斯與赫斯特共處於一個屋簷下？我不免憂心那會是何等場面。兩人各自的顯赫名聲相加起來，豈是沙漠中的一座小帳篷所能容納的。畢竟，這兩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在世藝術家，考量他們巨大的自我，就算一座以上的帳篷也嫌小，恐怕得是比卡達還要大的國家，或許是像格陵蘭那樣大的島嶼才容納得了。無論如何，我很高興自己將前往卡達，親眼目睹兩雄相遇的奇景。我之前獲邀出席在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舉行的赫斯特回顧展開幕式，現在，回顧展移師到杜哈（Doha），我再次受邀。任何一位藝術界人士都不會回絕卡達發出的這項邀請，就連昆斯也不例外；他也應邀與會，向他的「偉大」對手致敬。我絕不是誇大其辭，他要是拒絕，就等同米開朗基羅回絕來自佛羅倫斯的邀請函。卡達就相當於今日阿拉伯世界的佛羅倫斯，而國王的妹妹，畢業於杜克大學（Duke）、三十一歲的瑪雅莎公主（Sheikha Al Mayassa），就猶如阿拉伯沙漠中的凱薩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她是當今全球藝術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女人，卡達王室也成為藝術收藏界最雄心勃勃的買家。

對大眾而言，在卡達這場展出的重頭戲是赫斯特十四座銅製雕塑的揭幕儀式。展現人從受孕到出生過程的這一組十六呎（約五公尺）高作品，今後將矗立在西薩·佩里（Cesar Pelli）[326](#)設計的錫德拉醫學研究中心（Sidra Medical and Research Center）前方。在杜哈這座位於波斯灣畔的現代化首都，隨處可見明星建築師，諸如貝聿銘[327](#)、哈蒂（Zaha Hadid）[328](#)、努維爾（Nouvel）[329](#)、赫爾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330](#)等人操刀的建築傑作。至於專屬受邀賓客的重頭戲，則是堪與阿拉伯勞倫斯（T. E. Lawrence）經歷媲美的沙漠旅行。二十五輛荒原路華（Land Rover）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駛過沙丘綿延起伏、無邊無際的蒼茫沙漠。車行約兩小時以後，我們抵達一處綠洲，只見天際高掛一輪滿月，錯落而立的帳篷及一切景物沐浴

在浪漫銀光下，一群穿著白長袍的深膚色男人領著聲勢浩大的一隊沙漠之舟——駱駝——在那裡迎接我們。

主帳篷被特意布置成藥房，為了對赫斯特致敬，因為他新近在倫敦諾丁丘（Notting Hill）開設了一家非常顛覆傳統的「藥房」藝術餐廳。由於我們身在聖地，席上並不供應酒精飲料，但我們不介意。服務生端著大托盤送上一管管用針筒盛裝的五顏六色鮮榨果汁，這下子「來一管」也對健康有益呢。以羊肉及米飯為主的各式佳肴令人彷彿置身在《一千零一夜》的天地；穿西裝、戴黑色領結的爵士樂團樂手演奏著狐步舞曲，又讓人宛若來到《大亨小傳》的一九二〇年代紐約。簡而言之，這個夜晚是麥加與長島西卵村的完美結合。我們跳舞，我們大啖美食，我們騎駱駝，我們讓沙漠馴鷹人吆喝獵鷹飛到我們的手臂上；不管是買家或賣家，賓客們一面玩樂一面謹慎地尋找藝術品交易機會。

當晚共計有一百五十位賓客，一半為本地人，一半來自外國。卡達本地婦女悉數穿著黑衣、戴頭巾、裹面紗，這倒提供了一個學習機會：你要如何從一個女人的眼神、身上的長袍款式做工，盡可能地了解她。那些黑袍乍看之下一模一樣，但仔細觀察就能發現無數細微差別。如果你做的是藝術生意，就會早早學會留心觀察，上帝就藏在細節裡。西方賓客囊括了全球頂尖藏家和頂尖藝術經紀商，大概因為從歐洲飛來的時間較短，當中的歐洲人顯然多於美國人。不過大家真正關注的焦點還是明星藝術家赫斯特和昆斯兩人，就像是讓米開朗基羅跟達文西，或讓畢卡索跟馬蒂斯置身同一個房間，究竟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是否會火花四射、硝煙四起？

事實上，兩雄相遇的氣氛遠非大家所想像的那般火爆。我在這兩位藝術家剛嶄露頭角時就認識他們，當時赫斯特是個叛逆的藝術系學生，有廣告大亨查爾斯·沙奇（Charles Saatchi）贊助他；而昆斯則是事業平平的期貨交易員，獲得匈牙利裔義大利色情明星「小白菜」史脫樂（Cicciolina, Elena Staller）的支持。兩人既有匠心獨具的藝術創意，也有結合市場的行銷魔法，從而竄升到如日中天的地位。赫斯特

活脫像電影《發條橘子》裡的角色，石破天驚地撼動了英國藝術界；就如同「地獄廚神」戈登·拉姆齊顛覆了英國美食「沙漠」。

比赫斯特年長十歲，五十五歲的昆斯也曾為藝術界投下震撼彈，引領了一波風潮。昆斯深知買家是作東的國王（或稱埃米爾），於是他努力讓會場每一個客人覺得自己備受尊寵，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我第一次和昆斯打照面時，他穿得像貓王艾維斯。那天，他是到日內瓦蘇富比的藝術講座擔任主講人。演講過程中，他秀出的裸體藝術作品震驚全場聽眾，那些作品儼然是印度《愛經》（*Kama Sutra*）圖解，主角正是他與「小白菜」。昆斯就像好萊塢巨星（他終究會成為大明星）向我們提出他的特殊飲食需求，那是一份包含紅肉、牡蠣等的「壯陽」菜單（阿諾·史瓦辛格特地幫他設計的），而我們也供應到場聽眾同樣的餐點；待昆斯講完性愛藝術後，每個人都意猶未盡再續盤。

二十年後，我在杜哈見到的昆斯衣著光鮮，看來像婚姻幸福（但沒有背地出軌）的郊區中產階級男人，就連赫斯特也一身西裝革履，暫時捨棄他平日愛穿的骷髏頭圖案T恤。無論在哪個時代，想要「攀龍附鳳」、尋求名流顯貴青睞的人，都得先循規蹈矩、舉止得宜，因此兩位藝術家都彬彬有禮，忙不迭地互捧互誇。拚鬥爭勝負？才不！在當今的藝術市場，每位藝術家都是贏家，而且是大贏家；再說，客戶至上。

我現今的工作正是與達官顯貴、富豪名流打交道，上週飛卡達，這週到上海，或者某一座「夢幻島」；我去的那些地方住著一些很棒的人，收藏藝術是他們的夢想，而我就是去那裡協助他們盡情實現美夢。這種繞著名流打轉的生活，讓我得以在全球各地主持慈善拍賣，繼續執木槌，做我熱愛的拍賣工作。二〇一五年七月，我在法國聖托佩為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基金會（該會為倡導環境議題的重要機構，不遺餘力地推動野生動物和棲息地保護）主持的那場拍賣會，到場的各界名流、超級富豪人數，已超過蘇富比或佳士得的任何一場拍賣盛會。蘇富比或佳士得的拍賣會是免費入場，而狄卡皮歐基金會的這場

宴會一張門票要價一萬兩千英鎊，將近一萬九千美元（約臺幣五十七萬）；這就是男孩和男人的區別。總共有六百五十人買票參與李奧納多主辦的這場宴會，可見金字塔頂端的「百分之一」富人數量多麼龐大，也多麼慷慨大方。

在我看來，洛杉磯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藝術創作基地，自然而然好萊塢也不再是以前公認的文化沙漠。從前電影圈裡的藝術收藏家就跟常春藤畢業生甚至大學畢業生一樣寥寥可數，但時代不同了。在一九五〇年代，愛德華·羅賓遜和比利·懷德（Bill Wilder）是好萊塢浮華世界僅有的兩位真正的收藏家，伊莉莎白·泰勒那票明星在貝萊爾區豪宅牆上或許掛著大師藝術品，但極可能是製片廠道具部門的傑作。如今明星與影劇大亨已經體驗到收藏藝術品的樂趣，狄卡皮歐即是這群好萊塢新藏家的龍頭老大。這位「華爾街之狼」也是龐德街的智者、麥迪遜大道之王，是一位對藝術鑑賞相當內行的大明星。

我首度見到李奧納多，是在二〇一四年坎城影展會外的美國愛滋病研究基金會（amfAR）慈善晚宴上，這個重要的會外活動已有二十年歷史，我很榮幸負責拍賣「和李奧納多一起走奧斯卡紅毯」的機會。這次的典禮之所以格外令人興奮，是因為已獲奧斯卡五次提名的李奧納多很可能首度贏得小金人。

同一場慈善晚宴上，我也迎來更加興奮的時刻，赫斯特的〈消失了但未被遺忘〉（Gone but Not Forgotten）；一副玻璃缸裝的長毛象骨架，在我手中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約臺幣四億五千萬）成交，創下慈善拍賣會的新紀錄，也是有史以來藝術家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過去無論哪一場慈善晚宴，無論現場有多少明星蒞臨，單件藝術品至多拍出三百萬美元（約臺幣九千萬），但是那天晚上，居住於倫敦、生於烏克蘭的華納音樂老闆李恩·布拉瓦尼克（Len Blavatnik）為了赫斯特的這具長毛象一路競價，最終締造新紀錄。我想李奧納多很欣賞我當時的表現，因為不久之後，他就邀請我主持他的基金會的首場慈善拍賣會，而我欣然答應。正如李奧納多經手的一切事情，在七月舉

行的該場拍賣會大獲成功，籌集了兩千六百萬美元（約臺幣七億八千萬）用於地球保育。

之後，為了李奧納多基金會的第二屆拍賣會，我來到聖托佩。那年夏天由於破紀錄的高溫熱浪襲擊，蔚藍海岸酷熱得猶如撒哈拉沙漠。米凱拉和我剛從紐約飛過來，深受時差所苦，因為我們先前往漢普頓接受「洛什藝術慈善基金會」（Rush Philanthropic Arts Foundation）的表揚。該基金會由美國嘻哈大老羅素·西蒙斯（Russell Simmons）及他傑出的兄弟約瑟夫（Joseph “Rev. Run” Simmons，Run-DMC樂團成員）、丹尼（Danny，視覺藝術家）所創辦、領軍，致力為貧困孩子提供接觸藝術的機會。我和妻子相當認同其宗旨，因此竭盡所能提供協助，在雀兒喜區各畫廊和哈林區街頭之間搭起橋梁。在藝術界多數人看來，這座橋梁要連接的距離實在太遙遠，因此當多數美國同胞無動於衷時，是我們兩個歐洲人出手協助基金會獲得更多人注意，西蒙斯兄弟於是銘感不忘。洛什基金會的另外三位受獎人分別是喜劇演員戴夫·查普爾（Dave Chappelle）、《逐夢大道》導演艾娃·杜威納（Ava DuVernay），以及生活在美國的傑出非裔藝術家瓦格西·穆圖（Wangechi Mutu）。當晚晚會以《大亨小傳》的狂騷一九二〇年代為主題，我們夫妻倆在大群盛裝的非裔人士裡不免特異顯眼。不過，偶爾當個少數「異類」也是很有意思的改變。當然，我不是專程去「白吃白喝」，我先主持了慈善拍賣，隨後盡興地跳了一整晚的舞，隔天一早又拖著疲憊的身體從甘迺迪國際機場搭商業航班飛往尼斯。

追逐名流巨富不代表我能跟他們一樣搭私人飛機旅行，不過一抵達尼斯，我們就住進了賽巴斯汀·柯吉克（Sebastian Kulczyk）夫婦的豪華遊艇。賽巴斯汀的父親為波蘭首富楊·柯吉克（Jan Kulczyk），為福斯汽車的首位波蘭經銷商，從而逐漸累積財富；他幫助自己的國家從共產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也是華沙的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的主要贊助人。遺憾的是，就在我們接受賽巴斯汀盛情款待的一週過後，楊驟然離世。

賽巴斯汀的盛情難卻，然而我沒有餘暇享受，我還要主持一場拍賣會，不管會場地點在哪裡，我總是緊張不已。對我而言，每次主持拍賣都像第一次上拍賣臺，總會極度焦慮，但這是好事，讓我隨時處於備戰狀態。李奧納多不是滿足於既有成就的類型，他希望二〇一五年的拍賣會能比前一年募集到更多款項；他想要有更多的拍品進來。凡是李奧納多想要的，他都能得到。我與拍賣會的兩位策畫大師密切合作，他們跟我一樣，也是因為愛滋研究基金會慈善晚宴的出色表現，得到李奧納多賞識。其中一位是製作人安迪·布斯（Andy Boose），他曾是搖滾歌手，藝名為雷內·里斯克（Rene Risque），後來開設活動公司，成為愛滋研究基金會在全球各地慈善活動的幕後籌畫。

我當初之所以成為安迪與美國愛滋病研究基金會指定的拍賣官，就如同現今被李奧納多提拔一樣，是正面骨牌效應的結果。六年前，我湊巧在愛滋研究基金會慈善晚宴上小露身手，是因為我的朋友，私人飛機租賃公司維思達航空（VistaJet）老闆湯瑪斯·弗洛爾（Thomas Flohr）捐贈澳籍塗鴉藝術家，理查德·漢布頓（Richard Hambleton）的兩幅畫作，並指定由我負責拍賣。所以輪到它們登場時，我站起來，上臺主持競拍，成交後又回座。我幸運地與肯伊·威斯特³³¹、金·卡達夏同桌。幾分鐘後，籌辦這項慈善晚宴的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³³²來到桌前，請我再回到臺上主持其餘拍品的競價。從那以後，我年年都為愛滋研究基金會主持慈善拍賣會，這真是莫大的榮幸。

李奧納多挖來的另一位活動大師是米盧廷·蓋茲比（Milutin Gatsby），這位高頭大馬、魅力十足的東歐人正是美國愛滋病研究基金會的募款主席。他的名字本身就獨一無二，令人聯想到身材壯實的塞爾維亞人與費茲傑羅的小說世界，再說，李奧納多就演過《大亨小傳》裡的蓋茲比。正如蓋茲比說女主角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的聲音「充滿金錢」，米盧廷這個名字也「充滿金錢」；他是籌募善款的高手。身為兩個基金會的「牧錢人」，他的職責是將

各地富豪聚在一起，確保他們不僅買下一張一萬兩千英鎊（約臺幣五十七萬）的門票，也會豪氣地出價競標。

米盧廷非常稱職，他匯集了全球各地、各領域的巨擘，堪稱「全球前一千位要人」的賓客蒞臨參與，包括亞洲的電子業億萬富翁、非洲的石油大王、美國對沖基金經理人、俄羅斯新貴。他們與全球超級名模濟濟一堂，甚至曾有那麼一瞬間，我恍惚以為自己身在「維多利亞的祕密」時尚秀，而不是慈善拍賣會現場。娜歐蜜·坎貝爾、海蒂·克隆（Heidi Klum）、珮卓·妮姆柯娃（Petra Nemcova）、伊蓮娜·莎伊克（Irina Shayk）、潔西卡·史坦（Jessica Stam）、克莉絲汀·泰根（Chrissy Teigen）是當中最赫赫有名的幾位超模。做為會場的巨大帳篷設於聖托佩馬球俱樂部旁、一座宛如《大亨小傳》場景的貝爾托·貝里歐葡萄酒莊（Domaine Bertaud Belieu）；聖托佩這座神奇小城為《上帝創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333](#)的拍攝地點，碧姬·芭杜憑藉此片一炮而紅，成為她那個時代的海灘女神。

好萊塢名人也是座上嘉賓，更能確保活動在全球媒體的曝光度（沒有人比超級明星李奧納多更了解媒體運作），在座包括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明星母女檔歌蒂·韓（Goldie Hawn）及凱特·哈德森（Kate Hudson）、安卓·布洛迪（Adrien Brody）、奧蘭多·布魯（Orlando Bloom）、瑪莉詠·柯蒂亞（Marion Cotillard），以及明星推手哈維·溫斯坦。藝術界人士則有拉里·高古軒、納瑪德家族，我的老朋友安·朵，專精非洲藝術收藏、出身法國汽車集團的皮戈齊（Jean Pigozzi），以及印尼農業億萬富翁余德耀；他在雅加達、上海創辦私人美術館，收藏品質量均是一等一，被視為亞洲的艾里·布羅德。

商界權力精英則有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他在會場附近擁有別墅）與洛杉磯超市業大亨羅恩·伯克勒（Ron Burkle）；音樂界人士則有從不缺席慈善活動的布拉瓦尼克（Len Blavatnik）[334](#)；造船業有伊丹·奧佛（Idan Ofer，以色列的船王歐納西斯）；時尚界有湯米·席爾菲格（Tommy

Hilfiger) 335；珠寶業有勞倫斯·格拉夫。那天晚上會場冠蓋雲集，熱鬧滾滾的程度不輸火熱氣溫。一般而言，這類慈善場合少有明星，多數是平常人叫不出名字的大人物，也就是勢大力大但鮮少在媒體上曝光。我們這一桌的成員即是最典型的例子：波蘭的柯吉克夫婦、哈薩克的富豪薩桑·高德哈里（Sasan Ghandehari）與其妻子，以及法國的購物商場開發商勒克萊克（Thomas Leclerc，他可說是法國版的「大弗」）。假如你不曾聽說過他們的名字，那正合他們的心願。

這次的拍賣會猶如置身三溫暖，我從來沒有這麼熱過。我在晚上九點站上拍賣臺，但穿著不是往常的海軍藍卡拉契尼訂製西服，而是白色亞麻襯衫搭牛仔褲，襯衫還沒扎進褲子裡。這場馬拉松式拍賣會持續到凌晨兩點半，從頭到尾，我四度到後臺換白襯衫。我渾身是汗，心情又激動，甚至忘了吃好運蘋果就站上拍賣臺。往常我主持拍賣時只喝礦泉水，這次也破例喝了一杯當地產的粉紅酒（rosé）來幫助放鬆。我回想在柯吉克的遊艇上吃了什麼，一塊牛排嗎？正好補充蛋白質；但也可能是義大利麵，正好補充碳水化合物。不論如何，我就像奧運比賽前夕的選手，得盡可能補充體力。

李奧納多最愛的以色列魔術師，利奧·蘇查德（Lior Suchard）帶來的表演，多少舒緩了我的緊張。他和尤里·蓋勒（Uri Geller）336一樣能彎曲湯匙，也能透視任何人的心思。他請史特龍（這兩人是初次見面）在心裡想第一任女友的名字，讓他來猜。他先請史特龍給一個提示：愛上她時是多大年紀？「八歲。」大明星粗聲說道。蘇查德動筆在紙上寫下幾個字，然後問史特龍他初戀女友的名字，史特龍說出來後，蘇查德秀出剛才所寫的名字，居然一字不差，大家吃驚又讚歎。蘇查德接下來轉向史特龍的妻子，猜她第一任男朋友的名字。

總算輪到我上臺了，由李奧納多親自介紹我出場，我站到臺上，開始我的演出。拍賣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有錢也買不到」的體驗，例如：跟哈維·溫斯坦一起出席好萊塢每場重要的頒獎典禮。總共有二十隻手舉起，若是在蘇富比拍賣一件畢卡索的作品，大概五人，至多是十人舉手競拍。最後由一位來自中國，漂亮、富有的年輕

女人以一百萬歐元（約臺幣三千三百萬）得標。接著還有羅傑·費德勒（Roger Federer）[337](#)捐贈跟他對打一場網球賽；摩納哥阿爾貝親王（Prince Albert）親自站上拍賣臺，提供一個名額與他共遊北極。而李奧納多在貝里斯（Belize）擁有一座私人島嶼布萊克朵島（Blackadore Caye），正在興建一座環保生態度假村，他也提供其中幾間房屋供競拍，最後由美國房地產巨頭、柯羅尼資本集團（Colony Capital）的創辦人湯姆·貝瑞克（Tom Barrick）花一千兩百萬歐元（約臺幣三億九千六百萬）標下。米盧廷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每一件拍品都有多位競拍人，而且個個大手筆出價。

第二部分是傳統拍賣會的藝術拍品，其中幾件，比如安迪·沃荷和班克斯（Banksy）[338](#)的作品，為李奧納多自己捐贈；納瑪德家族則捐出一幅莫內。一件巨大的羅丹《沉思者》（*The Thinker*）複製品拍出一百五十萬歐元（約臺幣四千九百五十萬）；紐約的瑪麗布斯基畫廊（伊萬·布斯基的女兒）捐贈一件法蘭克·史帖拉（Frank Stella）[339](#)的雕像作品，以不錯的價錢成交；經營高級中餐廳的大亨周英華[340](#)最近跨足繪畫創作，他捐出自己的一幅畫，拍出四十五萬歐元（約臺幣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令他喜出望外。壓軸的拍品為艾爾頓·強的個人演唱會，他現場彈琴獻唱，一連唱了兩曲，大家開心地大飽耳福。親耳聽見他的歌聲想必是絕妙體驗，因為一位亞洲億萬富翁以一場三百萬歐元（約臺幣九千九百萬）的價格，標下兩場演唱會。

拍賣於凌晨兩點半結束，我們共計籌集四千萬美元（約臺幣十二億），打破前一年的紀錄。我這下能盡興和妻子一起跳舞到天亮來慶祝了。戴圓頂硬禮帽、獨挑大梁的DJ名為卡西迪（Cassidy Podell），是業界個中翹楚，曾經負責歐巴馬總統就職典禮及碧昂絲婚禮的音樂。他和現場所有賓客一樣，也是一位明星。在腎上腺素作用下，我整夜精神抖擻，直到黎明返回柯吉克的遊艇，睡意才襲來。第二天晚上，我們仍然有餘力出席倫敦房地產大亨魯本兄弟（Reuben brothers，英國版的川普）[341](#)舉行的盛大派對。找空檔休息只是徒勞，我就像那些通宵營業的餐廳，背上掛了一個牌子：通宵不打烊。

隔天，我黎明即起，搭乘達美航空飛回紐約，下機後又搭車回到漢普頓，準備參與另一場慈善拍賣。那是羅伯特·威爾森（Robert Wilson）水磨坊中心藝術盛會的活動，過去二十一年，我年年前來主持競拍；我不問木槌為誰而敲，因為我知道是為了自己。

由於我已有數十年的拍賣經驗，敲下木槌的次數多不勝數，大家可能以為我已經克服舞臺恐懼症和業績焦慮，但是並沒有，我雖有告捷的時候，如二〇一五年夏季接連的三場拍賣會；可也不乏失敗，尤其二〇〇二年「黑色十一月」在菲利普斯的那場慘敗最為觸目驚心。其他還有不少出師不利的狀況，舉例來說，我曾經在瑞士的一座城堡裡主持名為「伸出雙手」的慈善拍賣會。唉，「緊握雙拳」恐怕是更貼切的名稱。房裡坐滿日內瓦的銀行家，當中大部分人我都認識，而我知道他們都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競拍過程中，這些富裕卻節儉的喀爾文教派信徒個個不動如山，幾乎沒有人舉手出價，所以我自己伸出雙手，代替他們喊價。「狄迪耶，謝謝您；賈克，您非常慷慨；亨利，您的善舉會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煩惱拍賣很可能掛零收場，只得採取非常手段，總算順利募得善款。

另一次情況更糟，是我家鄉瑞士納沙泰爾參與的一場慈善拍賣。我一位童年朋友的太太請我主持一場為帕金森氏症募款的活動，我當然樂意協助，然而，我一到會場就發現狀況不妙。大多數的出席者是帕金森氏症病患，而且他們的財力相當有限。以拍賣界行話來說，就是「場內沒有錢」；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令人難過」。我再有拍賣技巧也派不上用場，他們根本沒有餘裕出錢購買。我盡我所能活絡會場的氣氛，但拍賣結束後，我帶著最沮喪的心情返家。

幸運的是，慈善拍賣會締造高昂成交額的機率極高，一些優秀的慈善拍賣師在普通拍賣會的表現反而糟糕，反之亦然。我認為自己兩者都擅長。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愛滋病危機中（在藝術界蔓延迅速，疫情特別嚴重），我累積了不少慈善拍賣經驗，還曾協助日內瓦的夜總會籌辦慈善活動，拍賣湖人隊球衣和魔術強森（第一位向大眾宣布自己感染愛滋的傳奇球星）的簽名籃球。不過，一直到瑞士藝術經紀商

托馬·阿曼（Thomas Ammann）不幸早逝（他原本可望成為下一個杜維恩）才促使藝術界群起展開有力的行動。

轉捩點發生於一九九〇年的巴塞爾藝術展。那一場為愛滋病募款的慈善拍賣會上，伊莉莎白·泰勒與奧黛麗·赫本一同登臺，懇請在場收藏家慷慨解囊（兩年之後，泰勒成立美國愛滋病研究基金會）。那一晚是無聲競標，我也獲邀上臺向投標人解釋遊戲規則。有幸與兩位人美心更美的傳奇明星站在一起，對我而言，是猶如聖方濟領受聖痕的神蹟時刻，更從此致力於慈善活動。主持慈善拍賣會有其優點，表現好不好無關緊要，做好事已經讓我心滿意足；再者，買方不需要付佣金，我毋須煩惱業績。

326 阿根廷裔美國建築師，設計了許多世界矚目的標誌性建築，例如：紐約的世界金融中心、現代藝術博物館新館、卡內基大廈，以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327 美籍華人建築師，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作品有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畫廊東廂、法國巴黎羅浮宮擴建工程、卡達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328 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師（一九五〇～二〇一六），是首位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作品有美國羅森塔當代藝術中心、德國斐諾科學中心、丹麥奧德羅普格園林博物館。

329 法國建築師，曾榮獲許多獎賞，包括阿卡汗獎、沃爾夫藝術獎和普立茲克獎，作品有阿拉伯世界學院、巴塞隆納的阿格拔塔、明尼亞波利斯的格斯里劇院。

330 與創辦人同名的瑞士建築事務所，最著名的作品是將倫敦河岸發電站，改造為泰德現代美術館。

331 美國的饒舌歌手、唱片製作人、作家和歌手；金·卡達夏的現任丈夫。

332 美國製片、導演、編劇及演員，一九七九年成立米拉麥克斯影業，在電影圈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333 一九五六年的法國電影，導演是羅傑·華丁姆（Roger Vadim），碧姬·芭杜擔任女主角。內容描寫三男一女的愛欲糾葛，在當時引起轟動。

334 俄裔實業家，原是以石油、天然氣致富，後跨足媒體及音樂產業，二〇一一年收購華納音樂。

335 美國時尚設計師，一九八四年創立同名品牌公司，但自二〇〇六年起已陸續為他商收購。

336 同樣為以色列出身的魔術師，曾在電視上表演彎曲湯匙。在世界各地表演超過四十載。

- 337 瑞士著名網球選手，擁有十七座大滿貫單打桂冠，為男子網壇之最。
- 338 英國塗鴉藝術家、社會運動家、電影導演及畫家。作品具政治諷刺的意味，第一部執導的電影《畫廊外的天賦》（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即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 339 美國藝術家，極簡主義的先驅。創作多元，從繪畫到雕刻都有。以色彩豐富、結構複雜的風格著稱，特有的視覺效果與藝術概念影響美國現代與後現代藝壇。
- 340 高檔中餐廳Mr. Chow的創辦人；國際華人餐飲業大亨，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之子，有「華裔食神」之稱，同時也是電影人、演員、收藏家和畫家。
- 341 印度裔英國富豪，原以礦業致富，後又涉足房產。

第二十章 先鋒者

面對別人最常提出的老問題：「你接下來要做什麼？」或「藝術會走向哪裡？」我總算找到一個簡單答案。我要發展的方向，或藝術正在發展的方向，就是全世界任何事物都在發展的方向：網際網路。乍看之下，藝術和科技似乎格格不入，如果你抱持跟提森男爵相同的古典大師至上的觀點，認為偉大的藝術家或值得收藏的藝術家都已經作古，那麼肯定更難以相信藝術能與新科技扯上關係。然而，現今大批錢潮湧向當代藝術作品的趨勢已經證明了，那個墨守成規、超級傳統、抗拒改變的藝術界；那個孕育我的藝術界，已面臨改革的時機。我想搭上這股新浪潮，於是在二〇一五年十月，成立了德·普里（簡單明瞭的命名）新公司，打算走高級路線，在網路上做單一收藏家的珍藏拍賣會。

我是從一九七七年羅絲瑪麗·坎茨勒藏品拍賣會得到靈感；那是我職業生涯的第一場「開放宅邸現場拍賣」，由我與威爾森先生一同主持競拍。人們喜歡來日內瓦湖畔的豪宅觀賞所有收藏品，包含藝術品、家具和雕塑的整體配置，欣賞整體比只看單一傑作更能體會那些珍藏品的價值。藏家喜愛這類「宅邸拍賣」，因為他們可以從中得到靈感，想像自己買下某件藝術品以後，該如何展示擺設。我從這個點子進行發想，經過一番腦力激盪後，認為可以在網路上做虛擬「宅邸拍賣」，並且與實體房屋結合，任何有意競標的人都可以走進屋子觀看實體物品。乍看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就愛不可能的任務。我來說說是如何執行的。

首先，我從技術面分析藝術市場現況，要不是全球最大的跳蚤市場eBay；要不就是歷史悠久的拍賣行蘇富比、佳士得，以及仍然落居第三的菲利普斯。高檔與底層兩端中間幾乎沒有任何業者涉足；就如同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³⁴²為《紐約客》所繪的一張封面，美國只有紐約和加州，兩地之間一片空白。我的計畫也考慮了藝術市場的消費者金字塔，最頂端約有五十人，可以花一億美元（約臺

幣三十億）以上買一件藝術品，而可以消費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千萬）以上的人大概數千；李奧納多基金會在聖托佩那場慈善晚宴的出席者就屬於這個層級（過去花一百萬美元買一幅畫可是能夠登上《紐約時報》頭版的大事）。金字塔底層自然是eBay，客群廣大，但尖端與底部之間還有很大的中間層，這塊市場仍然大有可為。

我在蘇富比時最感困擾、掌管菲利普斯時也試圖拔除的肉中刺，就是高成本問題：眾多員工帶來的高人事成本，還有必須寄送到藏家手中（他們通常擁有數間住宅）的高成本目錄，以及對買家而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佣金。網路是一個毋須成本的美妙福地，不過，似乎還沒有人想出該如何在網路上銷售「資產階級藝術」，也就是價格介於一萬到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十萬到三千萬）之間的藝術品。這塊領域的開路先鋒是德國人漢斯·諾爾多夫（Hans Neuendorf）所創辦的Artnet網站，它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價格指南網站，但在線拍賣的部分成效不彰。

Artsy網站也面臨相同的窘境。該網站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二十來歲的卡特·克利夫蘭（Carter Cleveland）的創意結晶。他打造的「藝術基因庫」，吸引了高古軒、達莎·朱可娃、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的前妻鄧文迪³⁴³等名人投資。基因庫的概念類似於潘多拉線上音樂盒（Pandora）：如果你喜歡這一件藝術品，那麼你也會喜歡以下這些藝術品。這是很棒的點子，但是實際運作起來，不免出現一兩件平凡作品，對任何品味一流的人都是一種打擊。

另一個還在遲遲等待起飛的網站是Artspace，最近才剛被金融大亨萊昂·布萊克（Leon Black）收購。在我心目中，布萊克和羅納德·蘭黛同為美國最偉大的收藏家，他的雄厚財力是任何一位企業家夢想的後盾。不過Artspace是在網路上販售藝術品，而不做拍賣。

還有Paddle8（仿效曼哈頓的標竿時髦夜店Bungalow 8命名），其創辦人是一位衝勁十足的年輕人，曾於菲利普斯工作的亞歷山大·吉爾克斯（Alexander Gilkes）。Paddle8的定位是賣一千到十萬美元（約

臺幣三萬到三百萬）之間的藝術品，與我瞄準的更高端客層截然有別。如果你要從一個網站的後盾來判斷它的未來，Paddle8勢必會成功，因為吉爾克斯的投資人包括了赫斯特、白立方畫廊（White Cube）老闆傑·喬普林（Jay Jopling）、梅隆家族的馬修·梅隆（Matthew Mellon）、周仰杰（Jimmy Choo），以及香奈兒品牌的持有者維德摩爾（Wertheimer）家族。吉爾克斯迄今最成功的表現是在網路上舉辦慈善拍賣，但是慈善活動屬非營利性質，Paddle8要獲利的話，就得銷售藝術品，而且考量其設定的物品價格範圍，吉爾克斯得向大眾客層賣出許多藝術品才可能創造盈餘，這仍然是一個挑戰。

我也觀察各時尚品牌的作法，他們就和畫廊與拍賣行一樣，起初對網路販售抱持懷疑，甚至輕蔑地哼笑：誰會在網路上購買高級時裝。後來Net-a-Porter出現，證明他們每一個人都錯了。接著又有1stdibs網站專賣高檔的當代設計家具。既然人們樂於在網路上購買昂貴衣服和昂貴家具，為什麼不會買昂貴藝術品呢？當然，如果不是一些因緣巧合，我可能也不會把這個「為什麼不」的想法化為現實。首先，我有幸在倫敦與克勞斯·霍莫斯（Klaus Hommels）會面，這位居住於瑞士的德國人是人們眼中的高科技「天使投資人」，他在Skype、Spotify和Facebook等成功企業的早期階段即投入資金。我和他有很多共同點，於是一拍即合，想一起合作創業。

第二個機緣是我的好友瑪麗恩·蘭伯特（Marion Lambert）男爵夫人，大約在同一時期打電話給我。她打算出售自己的藝術收藏品，想徵詢我的意見。她的丈夫剛過世不久，兒子又對藝術不感興趣，因此瑪麗恩請我向三大拍賣行透露她的意願，看看他們有何提案。比利時的蘭伯特家族和歐洲任何人一樣擁有好品味，他們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脈，於一八四〇年創立布魯塞爾銀行（Banque de Bruxelles），也資助利奧波德二世對剛果（舊稱薩伊）進行殖民統治。瑪麗恩是一位高雅的荷蘭女人，她跟二〇一一年去世的丈夫菲利浦男爵（Philippe）在日內瓦、格施塔德（Gstaad）和希臘都擁有豪宅。菲利浦的哥哥萊昂·蘭伯特男爵（Leon Lambert）則以布魯塞爾銀行總部

樓上的豪華公寓為家，家裡的藝術收藏品質量之高在歐洲名列前茅。萊昂於一九八七年不幸因愛滋病過世，引發世人矚目，就如同他的朋友，藝術經紀商托馬·阿曼的離世，對抗愛滋病從此成為二十世紀末期許多慈善募款活動的目標。

瑪麗恩曾是全球最重要的攝影收藏家之一，她將大量的攝影收藏品存放在家族旗下的布魯塞爾蘭伯特銀行（Banque Bruxelles Lambert）。後來，一位過於挑剔的銀行行長力主他的銀行不該變成美術館，於是瑪麗恩到菲利普斯來找我，想脫手她的攝影收藏。二〇〇五年那場拍賣會成為史上最重要的攝影拍賣會之一，我們稱它為「韋羅尼加的復仇」（Veronica's Revenge）。聖韋羅尼加（St. Veronica）用她的面紗為耶穌擦臉，耶穌的面容就此留在面紗上，一些人認為那是史上第一幅照片，儘管並不是相機拍攝的。

這就是信心的力量。而瑪麗恩考慮過三家拍賣行的提案之後，最終沒有選任何一家，而是選擇信任我。瑪麗恩要出售的這批收藏就跟她本人一般不拘一格、另類獨特，但每件物品都符合她無可挑剔的品味，包括十八世紀家具、二十世紀裝飾設計藝術，以及當代藝術作品，諸如克里斯多佛·沃爾的最佳抽象畫。其中最昂貴的拍品預估價為九百多萬美元（約臺幣兩億七千萬）。還有高級訂製服，甚至有一輛一九五〇年代的義大利車「小老鼠」（Topolino），車型比飛雅特還小，幾乎可以當成腳踏車。總計有四百多件物品，都是她以兼具創新和優雅品味所累積的畢生收藏。佳士得提出一個量身打造的高水準方案；蘇富比也很用心，但有點制式化，缺乏個人特色；而我認為應該盡全力爭取她委託的菲利普斯，所提出的方案反而最平淡無奇。於是我建議瑪麗恩選擇佳士得。

但她卻選擇了我。她說：「由你來拍賣。」我笑了，認為她在開玩笑，可她是認真的。我問她要在哪裡拍賣，我現在不在拍賣行工作了。男爵夫人對電腦的熟悉度跟她同輩的貴族無異，但她信心十足地說：「網路上。」我告訴她，不曾有這麼大規模的藏品透過網路銷售，並試著勸她打消念頭。「你來當第一個。」她堅持到底。

這狀況讓我回想起當年在蘇富比，威爾森曾給我的建議：「該你吃的餅乾，你就吃吧。」機會來了就得抓住；甜點托盤都已經擺到桌上了。而最後一個機緣出現之後，這盤遞到我手中的甜餅乾變得更有滋味。過去一年半來，我的妻子米凱拉一直試著安排我倆與Net-a-Porter的聯合創始人阿諾·馬斯內（Arnaud Massenet）見上一面。她的一位好友跟馬斯內很親近，承諾會幫我們安排。但承諾只是承諾，從未履行。現在有了男爵夫人親手奉上的餅乾，米凱拉立即打電話給這位朋友，總算敲定會面事宜。我們與馬斯內約在倫敦梅費爾區戴維斯街上的一家私人俱樂部「阿爾弗雷德之家」（阿爾弗雷德·登喜路〔Alfred Dunhill〕344的故居），那裡離蘇富比很近，就位在高古軒畫廊（它們無處不在）對面。

馬斯內在巴黎長大，於北卡羅來納州大學取得MBA學位，曾在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工作。他不僅是國際商業奇才，也是狂熱的藝術品收藏家。當初時尚界對Net-a-Porter極不看好，他以亮眼的業績證明自己的遠見，因此一聽到我們的構想，他馬上就明白我們希望成就的事，也認為我們可以辦到。這就叫緣分；我們需要專家協助，才能將想法付諸實踐，而現在我們眼前就有一個專家。馬斯內、霍莫斯、米凱拉和我當場決定合作，於二〇一五年秋季，以男爵夫人藏品拍賣會初試啼聲；我們樂意同享這一大盤餅乾。

我們將這場拍賣會命名為「視覺奧德賽：蘭伯特藝術珍藏精選」（A Visual Odyssey: Selections from the Lambert Art Collection），並計畫結合虛擬和實體。我們將打造一個供準買家上門參觀、鑑賞物品的空間，就如同一場貨真價實的「宅邸拍賣會」。我們找到非常棒的一幢房子，是位於梅費爾區多佛街三十七號的「伊里之家」（Ely House），建成於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做為伊里主教的倫敦住所之用。如今，昔日的主教居所被公認是倫敦最美麗的連棟式住宅之一，最近更成為老字號古董商「馬利特」（Mallet）的總部。

我們決定在拍賣會前租用馬利特總部十四天當「實品屋」，幸運的是，瑪麗恩跟巴黎室內設計師雅克·葛蘭許（Jacques Grange，作品

包括曼哈頓的馬克酒店，以及聖羅蘭、拉格斐、范倫鐵諾和皮諾的住宅）是好友，我們委託他將伊里之家改造為蘭伯特之家。在為期兩週的開放參觀期間，我們也推出與蘭伯特藏品相關的各式主題座談會，廣邀專家、教授、策展人和藝評人與會暢談。最終拍賣會將在馬利特「實品屋」現場進行，並做線上直播，感興趣的人可以透過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收看。

我們想在梅費爾區的這幢宅邸裡打造猶如電影《南海天堂》（*Brigadoon*）³⁴⁵的夢幻饗宴；這次經驗也將成為德·普里公司未來線上銷售的範本。我們不出紙本目錄，而是做實體展示，地點可能在紐約、洛杉磯、上海、杜拜，或任何一個有優秀收藏品和收藏家的地方。為了提供買家誘因，成交價兩百萬美元（約臺幣六千萬）以上的物品，在三間大拍賣行收取百分之二十五的買家佣金，但我們只收取百分之十五。我們對男爵夫人或未來的拍賣委託人都不提供最低保證價，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減輕營業成本，同時也減輕買方荷包的負擔。

在多佛街四十號的一幢巍峨連棟宅邸，是狄更斯與特洛勒普（*Trollope*）³⁴⁶於一八六三年創立的藝術俱樂部，竇加、莫內和惠斯勒等人都曾經在那裡出入，現在則常見高古軒、赫斯特和昆斯等人的身影。多佛街是一條藝術街，是全球藝術界的心臟。我們在馬利特打造出蘭伯特之屋，必然吸引許多時尚人士上門，創造出鍍金鑲銀的口碑。

隨著拍賣會的日期愈來愈接近，我和米凱拉意識到，儘管我們專精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但男爵夫人的獨特收藏還囊括其他類別，比如這批拍品的亮點為十八世紀法國古董家具，而在該領域裡，有比我們更內行的專家，像是佳士得的查爾斯·卡特（Charles Cator）就絕對是個中翹楚，他也比我們更懂亞洲藝術和日本畫（也是拍品的一部分）。由於讓男爵夫人的藏品拍賣取得最佳結果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我們認為應該跟佳士得合作這次的拍賣會，令人高興的是佳士得也同意共襄盛舉。

這次拍賣會主要運用網路科技，此項特色讓它在藝術拍賣史上寫下開創性的新頁。它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另一個理由在於：我因此首度站上佳士得的拍賣臺。在位於倫敦國王街的總部拍賣場，我與佳士得的頂尖拍賣師彭肯南輪流主持競拍。彭肯南先登場，由他拍賣一九七〇年之前的「老東西」；其餘三百多件拍品則由我負責，整整耗費四個半小時才結束。我從此多了一項足以自豪的榮譽：蘇富比、佳士得、菲利普斯三大拍賣行的拍賣臺我都站過。拍賣會的成果更讓我自豪，透過電話和網站傳來的競標非常踴躍，最終締造了高達兩千兩百九十萬美元（約臺幣六億八千七百萬）的總成交額。拍賣會圓滿收槌，這次的佳績讓我們信心滿滿，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再辦一場領先群倫的線上拍賣會。

拍賣藝術品固然令我熱血沸騰，但是造就藝術更讓我雀躍激動。鑑於我原本想當藝術家，能先於任何人發現一位藝術新秀，沒有比這更令我開心的事了。我還在菲利普斯的時候，不僅熱愛發掘藝術新星，也領先業界，率先將設計、攝影這兩種不曾登上拍賣會的類別納入營業範圍，亞烈德、紐森和已故的漢姆特·紐頓都千謝萬謝我的創舉。雖然我不是藝術界的哥倫布，但我喜歡探索帶來的亢奮感；也樂於當第一個發現者。

舉例來說，李希特大概是全球目前在世最重要（作品最昂貴）的畫家，我或許不是發掘他的伯樂，但我是獨具慧眼、識得他才華的第一人。二十多年前，天才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在瑞士錫爾斯瑪麗亞村（Sils-Maria）、以尼采故居改建的博物館裡策畫了一場李希特展覽。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看到李希特作品的悸動心情。雖然再過很久很久以後，李希特才成為藝術界公認的大師，但是在那場展覽上，我直覺認為這位藝術家的未來大有可期。

我向那位嗅覺敏銳的畫商阿曼傳達自己興奮的心情，說我非常看好李希特，但他不置可否，只說：「你說的也不無道理。」我很高興自己看對人了，如今李希特的作品動輒以數千萬美元成交，而當初讓

我驚豔的抽象畫，拍賣成交價更高於他的具象畫。李希特的創作風格如此多樣，除了繪畫，也跨足攝影和雕塑，沒有人能將他歸類；誰想得到這原本還被視為他的缺點。早知道我該在那時候大買特買，囤積一卡車他的作品。

另一個早早被我看out潛質的當紅藝術家，是我的瑞士同胞烏斯·費雪。年方四十的費雪是過去十年來獨領風騷的藝術家，他對二〇一〇年代（不管藝術史上會怎麼稱呼這段年代）的意義，就如同一九八〇年代的昆斯、一九九〇年代的赫斯特，以及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〇年的卡特蘭（Cattelan）³⁴⁷。我還在菲利普斯的時候，始終在尋覓下一個李希特或費雪，我在媒體從不報導的日拍場推廣新興藝術家作品，並盡我所能把它們放到夜拍場，期待善變的藝術媒體會發現那些藝術新秀，幫助他們一舉成名，獲得萬眾矚目。我協助推上檯面的那些藝術家當中，特別讓我引以為傲的是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他的拼貼繪畫與成長經歷一樣引人入勝。馬克成長於洛杉磯郊區，他的母親在當地開設了一家美容院，即使一家人搬到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以後，美容院仍然繼續營業。馬克在高中畢業後到那裡擔任美髮師，直到三十歲才去上藝術學校，就讀專產優秀藝術家的超級名校，加州藝術學院（Cal Arts，一如加州理工學院 [Cal Tech] 培養出許多科學界人才）。

馬克大器晚成，但一鳴驚人，發掘他的人是紐約極具影響力、熱中非裔美國藝術的義大利收藏家姬卡·波佳斯（Kika Borghese）。馬克的作品首次登上拍賣場是在菲利普斯的拍賣會，拍出十八萬美元（約臺幣五百四十萬），對藝壇新秀而言是可觀的金額。從那以後，他作品的價格不斷攀升。蘭伯特男爵夫人的收藏裡有一件他的作品。他也曾以兩百五十萬美元（約臺幣七千五百萬）的價格，受託為新建成的美國駐英國大使館創作憲法主題的作品。馬克從未忘記自己的根，在母親退休後接手她的美容院，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我和妻子年年都到洛杉磯拜訪藝術新秀，我記得有一年，我腰痛到哪裡也去不了，只能窩在貝萊爾飯店的房間裡。米凱拉說算我倒楣，因為她準備

前往馬克的工作室。我聽了馬上拖著疼痛的身體下床，就像一個無論如何也要去盧爾德（Lourdes）朝聖的跛子。我樂於相信是藝術的力量治癒了我的病；說不定真的可以。

馬克的性格跟他的作品一樣棒，但並非每位藝術家都是如此。一般來說，我喜歡先看到藝術家的作品，以免對方性格影響我的判斷與觀感。儘管如此，收藏當代藝術作品的好處在於（提森男爵，請包涵我這麼說），你可以去拜訪工作室，進而認識、了解這位藝術家。過去幾年來，米凱拉和我年年八月都到洛杉磯；我們心目中全球最具活力的藝術基地。一如巴黎是印象派或超現實主義畫家的城市，洛杉磯是當代藝術家的城市。光線完美，房租相對便宜，收藏家眾多且具有影響力，文化寬容開放，且藝術家聚集的市中心不再槍枝氾濫、充滿危險；洛杉磯甚至比柏林更前衛。

拿亞歷克斯·以色列（Alex Israel）來說，他是我們每年夏天洛杉磯之行期間所發掘的藝術家。能與他結識，是透過周英華的女兒，曾與我在《藝術新秀生死鬥》共事的周佳納（她是主持人）；她對他的描述引起我的興趣。亞歷克斯的作品以名人崇拜和名人文化為主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工作室設在攝影棚，確切來說是華納兄弟電影製片廠的藝術家。他可說是洛杉磯藝術家的最佳代表，因此，米凱拉和我出發去見他。我們沿著四〇五號高速公路往前開，再轉一〇一號公路、一三四號公路，終於抵達片場。我們用洛杉磯腔英文（老是遭譏笑）跟門口警衛說明來意（他看來彷彿從格洛麗亞·斯旺森演出《紅樓金粉》時期就在那裡工作），接著搭上遊園車，穿梭過各式各樣的電影外景片廠，諸如狂野西部、狂騷一九二〇年代、美國郊區和外太空，最後抵達一座巨大的停機棚，那裡即是亞歷克斯的藝術工作室。

一位寡言內向的男人來迎接我們，他戴著一副厚墨鏡，正如周英華戴的黑色圓框眼鏡，墨鏡是亞歷克斯的註冊商標（他也創立了自己的太陽眼鏡品牌「高速公路眼鏡」〔Freeway Eyewear〕）。亞歷克斯的作品與沃荷一脈相承，他對文化、藝術及商業經營都自有一番見解。他出身西岸洛杉磯富裕家庭，在東岸讀完耶魯大學，又回西岸的

南加州大學拿到藝術創作碩士，接著又去了東部，深入產業內部以了解藝術市場。他進入蘇富比，在托拜厄斯·邁耶（Tobias Meyer）手下工作，待過豪瑟和沃斯畫廊（Hauser & Wirth），也曾擔任已故藝術家杰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348](#)的助手。

亞歷克斯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學徒生涯以後，才以藝術家身分出道。在華納片廠的工作室，以及一隊技術人員、道具師和工人的協助下，他完成了一系列霓虹粉彩畫。一些藝評人將這系列作品比擬為色情片布景（洛杉磯聖費爾南度谷 [San Fernando Valley] 有色情片好萊塢之稱），而對電影（不管高尚或低俗照單全收）情有獨鍾的歐洲人，將它們搶購一空。

亞歷克斯接著完成一部行為藝術影像作品〈順其自然〉（*As It Lays*），標題取自瓊·蒂蒂安（Joan Didion）[349](#)的小說書名，而整部作品則是對沃荷致敬。在粉彩布景的攝影棚裡，戴墨鏡、穿筆挺西裝的亞歷克斯扮演一個面無表情、冷淡漠然的採訪者，無論對方如何回話，他完全無動於衷。每段訪談約十分鐘，他的訪問對象大多是已走下坡但曾經紅極一時的洛杉磯本地名人，諸如菲麗絲·迪勒（Phyllis Diller）[350](#)、謝麗爾·提格絲（Cheryl Tiegs）[351](#)、喬恩·彼特斯（Jon Peters）[352](#)、瑪麗蓮·曼森[353](#)、奧利佛·史東[354](#)、鮑比·施萊弗（Bobby Shriver）[355](#)等人。這份名單比較像是在證明亞歷克斯在洛杉磯擁有廣大人脈，而不是這些昨日之星對藝術特別感興趣，樂於為他的創作獻出一己之力。

他的人脈不只限於洛杉磯，無論米凱拉和我到哪裡去，似乎都會巧遇亞歷克斯。我們在法蘭克福古代雕塑博物館（Liebieghaus）的昆斯展覽開幕式見到他（他曾公開表示昆斯是他的榜樣）。在那座古典博物館的埃及殯葬用品之間，陳列著昆斯的〈麥可·傑克森與他的黑猩猩「泡泡」〉（*Michael Jackson and his chimp Bubbles*）鍍金雕像。亞歷克斯倏然出現在我們眼前，身旁是他的巴黎經紀商，具法國與泰國血統的阿爾敏·萊克（Almine Rech）；萊克是畢卡索孫子伯納德（Bernard Picasso）的妻子，相當於藝術界的王侯貴族。

亞歷克斯曾在高古軒畫廊的羅馬新店（建築物前身為銀行，離西班牙臺階〔Spanish Steps〕不遠）與凱瑟琳·安德魯斯（Kathryn Andrews）[356](#)舉辦聯展，我們也在那裡碰見他與他的雙親。假若亞歷克斯有中間名，我敢打賭是Network（人脈網絡）。亞歷克斯有一次登上《紫色》雜誌（*Purple*）的封面，昆斯舉著那本雜誌合照，還把這張照片發上自己的Instagram；這相當於藝術界的認證章。

這樣的認可帶來相當驚人的回報。二〇一四年，亞歷克斯的一幅粉彩天空畫作在佳士得拍賣會以一百萬美元（約臺幣三千萬）成交。兩天後，在菲利普斯拍賣會上，另一幅畫作拍出了七十五萬美元（約臺幣兩千兩百五十萬）。他的作品價格還會節節高升嗎？我認為無庸置疑。我和米凱拉上一次見到他是在蘿塞特·德勒格（Rosette Delug）舉辦的派對上，德勒格是土耳其裔的金髮美女，洛杉磯當代藝術界的元老人物，目前為漢默美術館（Hammer Museum）董事會的一員，也曾經是洛杉磯當代美術館（MOCA）董事，但艾里·布羅德大手筆贊助美術館且過度介入營運，令她萌生退意而辭去職務。

德勒格居住在楚斯岱爾（Trousdale）的一幢一九五〇年代豪宅，屋裡滿是她短短收藏生涯斬獲的數百件出色傑作，包括洛杉磯人最趨之若鶩的魯沙（Ruscha）[357](#)和巴爾代薩里（Baldessari）[358](#)。在她家，即使是洛杉磯家家戶戶必備的游泳池也是藝術品，池底裝飾著勞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359](#)的字母作品〈盡可能繃得緊緊的：綢緞與凡士林〉（*Stretched as Tightly as Possible: Satin & Petroleum Jelly*）。她從二〇〇一年才開始收藏藝術品，卻由於沉迷到不可自拔，而曾經穿工作服、戴假臂章偽裝成安裝工人，好溜進巴塞爾藝術展會場先睹為快。德勒格辦的派對也是各種行為藝術的大集合，比如有人在現場噴漆花花公子的兔子商標等。那天晚上，亞歷克斯當然也沒有缺席，他帶著周佳納一起來；她纏著要嫁給他，如此一來冠上夫姓，她就成了中國·以色列[360](#)。

米凱拉和我喜歡挖掘像亞歷克斯這樣的新秀，也喜歡收藏他們的作品。每次奔波全球各地工作，總會結識各領域的佼佼者，但我們似

乎都跟藝術家最投緣。我想，這是同類之間的惺惺相惜。況且，在藝術家還未成名以前就和他結為朋友，是極為有趣的事，尤其是知道自己是引領潮流的「品味創造者」，感覺非常爽快，就像俄羅斯巨富爭奪一件作品、一路競價到八位數字，會讓藝術家樂不可支一樣。金錢代表認可，哪個藝術家不想獲得認可呢？市場行情無庸置疑是一門品味的微積分學。

打從我踏入藝術交易這行以來，總是將自己視為披著經紀商外衣的藝術家，正如我的第一位導師貝耶勒告訴我的，我只能從感官的層面了解藝術，而不是從智識層面。我感興趣的從來不是藝術史，也不是金錢，而是親近藝術品，被各種藝術傑作圍繞的生活。如果我的興趣在錢的話，應該會比現在更富有，甚至已經買了一幢大豪宅來展示我的豐富收藏品。

並不是說我反對藝術和金錢扯上關係，我所遇到的每位收藏家，沒有一個樂於見到自己購入的藝術品貶值，畢竟價格與品味可不是呈反比關係；至於藝評家又是另一回事。對於新興藝術家作品價格不斷飆升的趨勢，有一些藝評人抱持著擔憂、懷疑態度，我只能奉送他們一句：胡說八道！按照他們的邏輯，收藏家應該趕緊拋售手中的畢卡索、馬蒂斯作品才對。我必然是深愛一件作品才會買它，也祈望買的每一件作品都會漲價。身為一個藝術迷，我行有餘力的時候，每個月都會買兩或三件作品，再將它們存放在瑞士的自由港，等待有一天蓋起自己的法沃利塔別墅來展示所有收藏品；雖然我心知肚明，這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幻夢。不僅如此，藝術也帶給我慰藉。對藝術的痴迷指引著我的人生，這是我在世上唯一懂的事。我把所有的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一個叫做藝術的籃子，只可惜我的蛋沒有一顆是法貝熱彩蛋……

342 羅馬尼亞裔的美國漫畫家和插畫家（一九一四～一九九九）。

343 媒體大亨魯柏·梅鐸的第三任妻子，曾任亞洲衛星電視業務的副董事長。

- 344 英國知名奢侈品牌「登喜路」創辦人。最早以製作汽車飾品出名，後轉跨男裝及皮革、飾品。該公司現為歷峰集團的子公司。
- 345 一九五四年在美國電影，改編自同名百老匯音樂劇。講述兩名年輕人誤闖一座受到詛咒、百年才甦醒一次的十八世紀小鎮的故事。
- 346 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長篇小說家。
- 347 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義大利後杜尚主義裝置藝術家；沒有受過正規的藝術教育，完全以自學出師。作品具有強烈的戲劇張力。
- 348 美國知名裝置藝術家（一九六五～二〇〇六）。
- 349 美國文壇大師，被譽為當代最優秀的散文體作家。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文化評論與電影劇本，如《奇想之年》。
- 350 美國喜劇演員（一九一七～二〇一二）。
- 351 美國一九七〇年代紅極一時的超模。
- 352 美國電影製片。
- 353 美國同名搖滾樂團「瑪麗蓮·曼森」的主唱。
- 354 美國金獎導演，作品有《閃靈殺手》、《誰殺了甘迺迪》、《七月四日誕生》等。
- 355 美國政治家、律師及記者。
- 356 美國裝置藝術家。
- 357 愛德華·魯沙（Edward Ruscha），美國藝術家，受普普藝術影響。
- 358 約翰·巴爾代薩里（John Baldessari），美國概念主義藝術家。
- 359 美國觀念藝術的開創者，也是較早使用文字做為創作媒介的當代藝術家。
- 360 周佳納的英文名字是China Chow。